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新市场
社会主义

[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著
姜辉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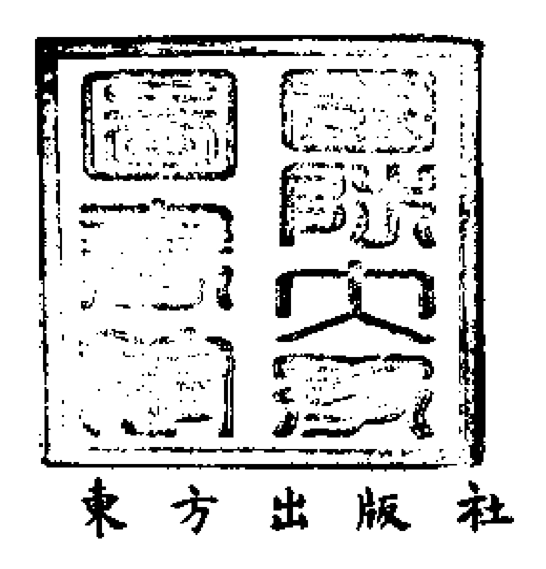
東方出版社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新市场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英]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著　　姜辉 译



東方出版社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First published in 1995 b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UK
in association with Blackwell Publishers, Oxford UK
据英国剑桥政策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中文版经作者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186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英)皮尔森(Pierson, C.)著;姜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12
书名原文: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The New Market Socialism
ISBN 7-5060-1310-X

Ⅰ.新…
Ⅱ.①皮… ②姜…
Ⅲ.社会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Ⅳ.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0861 号

新市场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

XIN SHICHANG SHEHUI ZHUYI

DUI SHEHUI ZHUYI MINGYUN HE QIANTU DE TANSUO

[英]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著 姜 辉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46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60-1310-X/D·135 定价:18.00 元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

约翰·皮尔森

1921—1994

旅行者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并且迷了路。他们偶然遇到一位看上去很聪慧的当地人,于是就请求他指点路径,以回到通向目的地的正确道路上去。“啊,”这位当地人思忖了一会儿后答道,“如果那里真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我是不会从这里出发的。”

——无名氏

当你排除了不可能的东西时,不管剩下的东西如何不大可能,它们必然就是真理。

——亚瑟·柯南·道尔《四签名》

中 译 本 序

姜辉博士翻译的《新市场社会主义》一书即将与读者见面，这是理论界的又一喜事。该书对于从多视角了解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模式无疑大有帮助，对于反思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肯定也是不无启益。姜辉博士参加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精品管理项目”“市场社会主义研究”和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研究”，我们课题组对这一领域涉猎已有多年，有了初步了解，这本译著正是作为其中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奉献给读者的，我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市场社会主义”话题。

（一）

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或模式，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股重要思潮，它是对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笼统称谓。这种探索是在与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辩论中引发的。

当科学社会主义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时，资产阶级理论家就开始责难社会主义条件下不能有效进行经济运行，认为马克思只是说明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与危机，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运

行作具体设计，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如何进行经济计算，如何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等问题。19世纪中叶，德国经济学家汉姆·H.戈森就臆断社会主义国家中央经济当局很难合理组织经济活动。此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时断言，社会主义消灭财产私有制将同时消灭合理的经济计算与资源的最优配置。法国经济学家阿·谢费尔、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等都曾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格如果不考虑使用价值的情况而单纯以劳动成本来估计，就不可能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就不能正确估价生产要素，因而不能正确指导生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否定性论调在20世纪初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荷兰经济学家皮尔逊在其190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一文中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市场、没有交换，从而无法衡量产品价值，不可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论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进一步加以发挥，后者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中攻击社会主义没有货币价格，没有经济计算，一切都将在黑夜中摸索，因此，“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破产”。1935年，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头面人物哈耶克把皮尔逊、米塞斯等人的文章翻译编辑成册，连同自己的《问题的性质和历史》一起，汇集出版了英文版《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成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立的宣言书。

在这期间，与上述相反的另一派观点也在探索中发展和成熟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如瓦尔拉、维塞尔、帕累托等在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上，有意无意地对社会主义学说作出了贡献。瓦尔拉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首创者，他在论文集《应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进

一步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组织和维持自由经济竞争，建立完全竞争机制，从而使一般均衡价格得以实现。维塞尔在其《自然价值》中认为，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需要经济计算，存在“估算价值理论”，必须运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衡量标准和本质上一致的计算原理。帕累托则在《社会主义》等著作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创造并实现“最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比自由主义经济更容易实现最优化产出量，更为有效。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经济学家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是在探讨“经济行为的一般逻辑”时自动带来的副产品，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一样受到他们所揭示的同样的经济规律的约束。然而，他们的学说却为此后的论战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1908年，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发表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发展了帕累托的上述思想，系统阐明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最优配置的必要条件，并初步提出运用“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式，达到计算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20年后，著名经济学家弗雷德·泰勒针对米塞斯等人文章引发的辩论，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了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为题的会长演说，进一步发展了巴罗内的试错法思想，提出采用“反复试验法”的计划形式来决定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详细论述了社会主义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五个步骤。此外，英国学者迪金生也发表文章批驳米塞斯的观点，提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理论经济学说明竞争机制形成价格，引导生产方向。

这样，当哈耶克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存立的文集出版以

后，社会主义的同情者一方就有足够的思想资料去建构一种系统清晰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作为对否定派的反驳。这个任务是由当时侨居美国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完成的。兰格在1936—1937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一时期理论争论中社会主义肯定派一方观点的集大成者。兰格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央计划局通过模拟竞争市场机能，采用分散决定的方法，即依靠市场竞争中供求的均衡作用来调整价格和产量的方法，进行资源配置的系统设想，形成了著名的“兰格模式”。兰格模式的形成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的诞生。

（二）

当人们谈论市场社会主义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著名经济学家布鲁斯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概念（或模式），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在众多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定义中，布鲁斯的定义应该算是最具权威的。然而仔细考察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其中产生的各类模式，却发现这种定义并不符合具体实际。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1）上面所说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2）60—70年代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的

“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中比较著名的模式有：布鲁斯“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3)80年代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4)苏东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在这四个阶段中，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我们这种“两时期四阶段”划分法不仅充分考虑到不同阶段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特征，注意到这些模式所描述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方式、中央计划与市场的作用范围等方面存在的实质性差异，而且把市场社会主义与本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起落跌荡的历史联系起来，尤其是，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划分中还可以领略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运行、改革的历程，以及在整个国际大背景下经济社会制度冲撞与整合的情景，因为市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潮，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思潮。

很明显，前期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无论是兰格模式，还是布鲁斯模式或锡克模式，甚至后来的科尔奈模式，都是在传统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行政干预)的框架内运用市场，使计划模拟市场或市场与计划并存。而近期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到其基本特征，均与前期形态有很大不同。在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已充分暴露，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机制在“实验”中未能很好协调。此外，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其发

挥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90年代重构各种新模式时，不仅苏东剧变之后中央计划经济被彻底抛弃，而且有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与这种背景相一致，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强调只在市场无法奏效的地方才运用政府干预，在所有制问题上也很少有人主张国有经济，而是采用劳动合作组织形式"雇用资本"，突出分配平等要求，或福利共享。这类市场社会主义已经脱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框架。因此，布鲁斯在定义中使用笼统的"公有制"与"市场"概念，显然无法具体、准确地界定不同时期产生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我们认为，以60年代东欧改革为主的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探索革新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替代模式，寻找传统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与运用市场配置资源争取效率的有机结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就其社会主义性质而言是：以某种形式的公有制为基础，运用市场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经济民主、分配平等、选择自由、消除剥削等等。

（三）

90年代以来，西方理论界掀起新一轮的市场社会主义辩论热潮，而且无论是从参与的人数看还是从建构新模式的数量看都属盛况空前，发表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这是苏东剧变之后，左翼理论家在反思苏联模式，重构社会主义未来前景时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有论者甚至断言，市场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导方向。英国学者皮尔森的《新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在这股热潮中产生的、值得一读的新作。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已经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1986)，《超越福利国家?》(1991)和这部《新市场社会主义》(1995)以及一系列理论文章。

《新市场社会主义》全书分三部分共八章以及导言和结论。第一部分从讨论苏东剧变后聒噪一时的"社会主义死亡"论开始。工人阶级的队伍缩小了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淡化了吗？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衰退了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否存在危机？作者运用新颖广泛的资料认真分析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三个方面深入考察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境况和面临的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尽管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基础在许多方面都面临严峻挑战，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能真正证明"社会主义死亡"论的正确性；使资本主义不具吸引力不具合理性的那些基本问题始终存在；在迎接社会主义面临的挑战的各种尝试中，最勇敢、理论上最连贯的尝试是目前西方出现的新型市场社会主义。这就把话题转到新市场社会主义中。

第二部分仅有一章的篇幅，讨论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大致轮廓。皮尔森这样概括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社会主义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包括社会所有制、企业家问题、企业结构与管理、收入分配，以及国家的作用等方面。但是，新旧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对这些基本构成的认同是大有差异的，即使在新型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中也是大不相同的。皮

尔森不像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那样根据自己认同的诸种构成要素的性质，去建构和倡导某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是尽力揭示各个不同论者在同一构成要素中的不同主张，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市场？市场社会主义能否达到或达到怎么样的经济效率、自由民主和社会公正？在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问题的描述中，皮尔森同样竭尽全力揭示其中的不同观点，甚至相互之间的矛盾。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更能开阔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也才更加值得一读。

第三部分是全书的重头戏，是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可行性的评价。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由是市场产生不平等、不公平、不正义、无效率以及它的反民主、反自由和反社会；右翼则大肆攻击市场社会主义歪曲和篡改了市场秩序，从而瓦解市场公正，剥夺成功者的财富，维护穷人的依附感，强化集团利益特权以及侵犯个人自由，等等。皮尔森还评述了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所有制”问题上的致命弱点，以及工人管理型（合作社企业）经济的适用性问题。关于民主和国家问题，皮尔森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扩大工人参与性民主、扼制私人资本权力和淡化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因此，“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政治理论，要比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理论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最后的第八章是讨论如何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它的政治支持）的问题。

（四）

市场社会主义的前景如何？或者说，什么样的国家最有可能向市场社会主义过渡？对于这个问题，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约

翰·罗默在其阐述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社会主义的未来》(1994,中译本重庆出版社 1997 年版)中分析了如下几种情况:(1)原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和社会转型时,如果能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不仅机会成本最少,而且可以避免经济和社会产生的许多不平等和动乱。(2)独裁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左翼政党掌权,社会具备沿着市场社会主义路线发展的民众意向等基础。(3)劳动阶级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左翼政党可以凭借市场社会主义舞台赢得未来选举,向着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方向前进,或是改造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部门。(4)发达民主的资本主义要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是最不可能的。

在《新市场社会主义》中,皮尔森在分析像英国这样的"福利国家"的情况后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不能作为左翼重新确定战略的基础。这种结论与罗默分析的第四种情况是一致的。当然,市场社会主义不适合于这类国家,并不等于它在其他诸多环境没有前景。况且,各种经济社会制度,包括市场社会主义,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国家的形势和整个世界的形势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在今天不会选择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没准明天遇上什么危机,又会想起市场社会主义来。而像皮尔森《新市场社会主义》这样从多种视角来评论市场社会主义,甚至多少带有否定性结论的著作,对于推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无疑也会很有帮助。

目前,中国正在深化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经济运行机制特点、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而不是依赖所谓的"理性选择"基本假设、提供社会政治制度保障等方面,与国外市

场社会主义有着重大区别。然而无庸质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经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模式及其“实验”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料和经验教训。如果进一步把市场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种广泛的含义，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如若深入地研究国外市场社会主义，读一读像《新市场社会主义》这类思路和视野开阔的评论著作，相信不会没有收获。

因此，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我认为，无论要从多视角了解市场社会主义，还是想深入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皮尔森的《新市场社会主义》都是值得一读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　余文烈

1999年中秋

作者中译本序

当人类的第三个千禧年到来之际,资本主义看来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胜利。而似乎作为插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干脆将其大约划在1789年和1989年这200年之间,看来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尽头。共产主义,这种曾经主宰了地球上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制度,现在也是力量耗尽。这种判断很容易找到自己的理由,而证明这种判断的变化也确实比比皆是。但是不论如何,我们仍然可以反驳说,这样的描述是一幅非常片面、视觉单一的图画。从斯德哥尔摩或从索韦托(南非东北部城镇。——译者注)或从上海等地分别进行观察,资本主义看来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而且,资本主义不仅是在形式上有所区别,而且它在不同政治体制下对市场结果的制约形式和对私人所有权的限制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将社会主义等同于集权计划,人们从目前的组织变化情况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区分很有诱惑力,且初看起来也令人信服,但我们认为这种区分难以成立。尽管社会主义的定义并不明晰,但很显然,人们不能把它等同于一种特殊形式的集权经济组织。资本主义也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市场统治。的确,虽然市场和准市场越来越普遍建立起来,但是它们决不会成为惟一的配置资源形式,它们仍像以往那样被广泛积极地调整。卡尔·伯兰尼(Karl Polanyi)作出的如下论断是颇有道理的:谁创造了市场,谁也同

时创造了试图取消市场后果的力量。

上述这些评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成功,也不是想掩盖共产主义的大部分令人遗憾的记录(尽管任何对这两方面因素的较为完整的分析都需要实际的限定性条件)。但不论如何,这决不是任何历史的终结,尽管我们面对着一种极为自信的反对意见。我们在西方所看到的那些资本主义统治形式由于它们和社会民主主义交互作用,已被改头换面了。而那种关于当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已完全“屈膝”于新自由主义的看法也不能真正令人信服。的确,依许多经济学家们看来,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新自由主义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一种占尽优势的正统,而像是对那种早期原始形式的凯恩斯主义所抱有的错误信仰进行的临时“调整”。与此同时,在现实的全球经济范围内,对于每一位新冒险家式的资本家来说,看来至少存在着两种新的调节手段。

中国在新型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近些年来它的经济快速增长,也由于其幅员辽阔,或许在21世纪它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相结合的模式——将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不可能采取本书所概括和讨论的那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我们也不希望它成为美国模式的最新翻版。但我们应该希望:在探索符合21世纪新生活形式要求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新形式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能作出重要的贡献。

克里斯托弗·皮尔森

1999年5月,于英国诺丁汉大学

致　　谢

我要向斯特林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tirling)、位于美国圣巴巴拉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苏格兰大学卡耐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Trust for the Universities of Scotland)和英国研究院(the British Academy)等单位表示感谢,它们对本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我也感谢在牛津、斯特拉思克莱德、爱丁堡以及阿伯丁等地的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的一些同事,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使我不至于在书中出现更大的疏漏和错误。我还要向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弗吉尼亚·鲍威尔(Virginia Bovell)、亚历克·诺夫(Alec Nove)以及政策出版社两位尚不知姓名的编审表示由衷的谢意,是他们对本书原稿作了认真有益的审校和阅读。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父亲约翰·皮尔森(John Pierson),他在本书写作的后期离开了人世。

本书作者和出版人感谢下述出版机构和组织允许本书使用它们出版的资料:

巴西勒·布莱克维尔(Basil Blackwell)出版社,本书中的表2.1来自该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和全世界范围的滞胀》(M. Bruno 和 J.D.Sachs,1985);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本书中的图 8.1 来自该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A.Przeworski,1985),图 8.2 来自该出版社出版的《民

主和市场》(A. Przeworski, 1991);政策出版社(Polity Press),本书中的赫尔德模式,来自该出版社出版的《民主模式》(D. Held, 1987)。

序　　言

精明的英格兰足球运动员诺曼·亨特肯定不是第一个提出“要先发制人”这种有效的政治忠告的人。然而这种说法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忠告。因此我想在这里预先提出一两点解释，以说明什么是、什么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

首先，关于我对“社会主义”一词的用法问题。在某些人看来，在目前情况下讨论社会主义问题，从最好的意义上讲是一种拟古的做法，而从最坏的意义上讲简直是恣意任性。社会主义或者属于只适用于破坏的思想范畴，或者是关于政治傲慢的历史记录，它曾经一直被残忍地误解着，而现在则彻底地精疲力竭了。甚至“在左翼方面”(这是最委婉的说法)，社会主义也被看作是最好应同其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我至少对后面这种看法颇为同情。社会主义变成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其含义是如此地被耗尽，其朋友和敌人是如此地滥用它，以至于我们最好还是寻找其他方式来描述那种曾经在它的名义下所进行的社会工程和实践。但是，假如将来有一天真的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一用语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当代历史学家们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可思议地死亡”这种说法。正如我在本书开头几章里所表明的那样，“社会主义死亡”被广泛地错误渲染和理解了。任何放弃社会主义的做法都不会出自这种假设：能够存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只是一部失败的累积史。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资本主义及其后果

的最睿智的批判家们在社会主义的标题下构建了他们的主张。在评价这个传统时，我们需要知道自己应该牢记什么，应该忘却什么，同时也应明白：任何对往事干脆"一笔勾销"的企图都可能会转移我们对这些前辈仍然可信的真知灼见的注意力。用当前颇能为人接受的语言重写社会主义目标的企图也是十分危险的。在我看来，设法在诸如民主或自由(这些术语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滥用和误解了)等术语的标题下对社会主义思想中全部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改写，这种做法一定是大错特错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在本书后半部分坚持认为的那样，对于"左翼"人士的当代政治目标来说，社会所有制(社会主义话语中的关键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不是相反。

我还认为有必要作一点说明的是，本书对经济思想和范式作了极为广泛的讨论。然而同我的专业知识相比，我对经济思想和范畴的了解毫无疑问是十分有限的(或者连这一点也谈不上)。但我之所以还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出于理论讨论的需要。经济组织问题对本书的讨论是如此重要，以至无法回避它们。尤其对于那些关于市场形式的社会主义讨论来说，情况更是这样。与此同时，对源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和经验进行经济性讨论也是很重要的。近些年来，经济学对政治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影响主要(尽管不是全部)是通过发展理性的精辟阐释。但这种情况不是单向进行的，在经济分析的中心区域当然也有政治概念的空间。更明确地讲，那就是：市场真的太重要了，它决不是经济学家们所独享的！

最后我强调的一点是，这本书是对有关"社会主义死亡"的争论以及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种争论的反应所作的批判性研究。尽管我在书中指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一些明显

疏漏，但是我对其中错误观点的关注远胜于对遗漏东西的关注。我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表述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大体上说，我不想去填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疏漏，也不想在书中构建自己的替代“蓝图”。任何一种对当代问题和当代可能性进行讨论的社会主义理论，如果它不谈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或环境退化问题，那么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可思议的。讨论这些问题又会引起许多其他问题，而这些问题将对所有形式的市场理论构成严重和广泛的挑战。很遗憾，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评价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

目　录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死亡了吗?

第二部分 市场社会主义方案

第三部分　市场社会主义评价

导　　言

当人类的脚步刚刚跨入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看起来就已经到了宣布"社会主义死亡"的时候了。大约100年前，洛德·哈考特(Lord Harcourt)关于"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断言曾经预示了集体主义时代的到来，而100年后的今天，政治评论家们则争先恐后地为"社会主义时代正走向终结"(Jenkins,1987,p.335)提供形形色色的证据。举两个典型的例子：戴维·马昆德(David Marquand)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展开的史诗般的斗争结束了；资本主义成了赢家"。拉尔夫·达伦道夫(Lalf Dahrendorf)则执拗而简单地宣布"社会主义已经死亡"(Marquand,1991; Dahrendorf,1990,p.38)。当然，"社会主义死亡"这句口号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初就有人曾经这样广泛地预言，而且那些保守的政治雄辩家们更是一直对此老生常谈(间或适时警告一下要提防沉寂的但仍具危险性的红色魔鬼)。90年代初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死亡证据的那些社会变化随处可见，甚至在(以往的)政治左翼中间也能找到这种证据，其中赞同"社会主义死亡"观点的也大有人在。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为抛出极端渲染的"历史的终结"的断言而声誉鹊起，他断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全球化是人类管理的最后形式"(Fukuyama,1989,p.4)。然而关于系统性变革之或然性

的讨论早就存在了，并且不局限于政治右翼。80年代初，左翼人士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在一篇被广泛援引的文章中就这样指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社会主义从历史上看已经过时了"。90年代初，布莱安·特纳(Bryan Turner)撰写了《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终结》的文章，指出"我们现在毫无疑问地进入到了后社会主义"(Gorz，1982，p.12注8；Turner，1990，p.134)。这些理论家有关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枯竭的记录在1989年东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场期待已久的巨变终于到来的时候，它却是一种"民主的、实质上反社会主义的巨变"。据说"那些到来的思想是陈旧的、为人熟知的、已被充分检验的东西。(是已经过时的新思想)"(Selbourne，1990，p.274；Garton Ash，1990，p.154)。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在东方轰然倾覆，在西方则在无声的啜泣中消失。

社会主义：最终衰亡了吗？

最束缚我们的政治判断的莫过于公认为正确的看法这不散的阴魂，看来"社会主义死亡"这一断言已经令人吃惊地轻易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政治共识。[1] 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将深究这种断言，特别是运用发达西方国家提供的材料和经验。我的意图并不是拒绝接受这种新正统说法据以确立的那些巨大的社会变化，而是真正想冲淡一下围绕"社会主义死亡"所作出的那种划时代抽象概括的浓重气息，这将主要通过分析一些支持这种断言的经验证据来进行。我还将竭力再具体些分析一下已经死亡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社会主义死亡"是意味着东欧国家苏联模式的终结，还是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衰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呢？

在何种意义上能说发达西方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从社会主义退却了回来”呢？仅仅是社会主义组织机构受到了挑战，还是长期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那些核心思想（可能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共有）在时代意义上说已经陈旧过时了呢？

提前一点讲，我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真正说明那种颇有争议的所谓“社会主义死亡”的庆典是能够经得起检验的。然而，这种渲染夸大的论断是基于一系列的社会变化作出的，这些变化合起来足以对西方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信仰和既定纲领构成严重的挑战。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信仰及其可能赖以实现的组织机构面临着根本性变革。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目前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信誉扫地，而且人们确实最常把市场表面上的普遍存在（于“全球”经济中）视为这些困难的根源。在回答这种“迎面而来”的特别挑战的过程中，最勇敢的尝试之一来自于一种新形式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市场社会主义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了，主要见于一些著名东欧经济学家的理论著作中。近些年来，一些西方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又使市场社会主义复活起来。这些人主张，在一种极为不同的组织形式下，市场社会主义代表了一条社会主义摆脱目前所处战略困境的可行出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退却占支配地位的时期，这是一种最为深思熟虑的，也是最富冒险性的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重新塑造社会主义政治的尝试。本书第二和第三部分将对这种富有创造性的设想进行详细分析。在第二部分，我将概括一下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在第三部分，我将对这些基本理论要素进行详细而严谨的分析。在结论部分，我将根据自己所做的分析，重新思考一下现代社会主义政治所面临的一些普遍

性的问题。

注　释

1 当然，麦克尔·诺维克(Michael Novak)在90年代再也不能宣称“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呈现出来的事实就是社会主义的死亡”了！(1982，p. 187)。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死亡了吗?





第一章　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消失

“社会主义死亡”这个话题促使庞杂多样的著述纷纷问世。我在本书中将从三个广泛且相互关联的问题着手对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和评价。第一，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日趋瓦解，这主要表现在工人运动的政治属性和产业基础正在“萎缩凋零”。这个过程的主要征象体现在工会会员人数的减少，以及整个 80 年代左翼政党在选举中的不幸失利。第二，与前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衰退。苏联和东欧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对西方的计划倡导者具有巨大的“示范效用”，而全球经济的重组看来会使福利国家和西方社会民主党在传统上所依赖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成为赘余。第三，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也在各个方面消解着。无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还是作为“劳工主义的危机”，无论是被消费主义的喧嚣或新社会运动的勃起所取代，还是逢遭后现代主义的侵蚀，总之人们发现，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在消退。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还将考察一下那些在 1989 年东欧剧变中亲见亲历社会主义崩溃的人对这一事件作出的反应，并对社会主义在目前的地位作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下面我就从考察社会主义在产业工人阶级中间的传统社会基础正在“萎缩”这一话题开始。

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们,即便是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漫长而激烈的阶级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的人,都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的到来会符合(几乎)每个人的利益。然而,至迟从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不论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良者还是革命者,他们几乎一致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要取决于工人阶级(一般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和产业动员情况。同时,改良者和革命者也都期望工业的发展能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纲领创造一个多数选民层。正是基于这种信念,马克思主义者才相信社会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到来,社会民主主义者才期望议会民主的多数原则将最终为自己所信奉的社会主义带来稳定的多数。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核心要素却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怀疑。

与主张社会主义衰亡的其他理由一样,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趋于瓦解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至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当时伯恩斯坦对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进行了谴责。可是伯恩斯坦的理论对中间阶层和农业阶层的强调在当时还是比较含混,而在实践中,西欧社会民主党却在20世纪前半期及以后一直处于持续发展之中(Bernstein, 1909, pp.48—49, 103; Przeworski, 1985, pp. 16—19; Floda, 1987; Mackie 和 Rose, 1991)。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评论家们才广泛地看到"工人阶级前进的脚步停止了"(Hobsbawm, 1981; Piven, 1991; Lemke 和 Marks, 1992; 虽然 Przeworski 和 Sprage 在1986年的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这种忧虑的关键之处是相信在社会和经济发生迅猛变化的环境中，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前提的“传统”工人阶级看起来在数量上正在逐渐减少。正如诸多关于社会阶级的显著特征的争论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工人阶级作出怎样的界定。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雇佣劳动者在整个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增长，因而目前靠出卖劳动力挣得工资或薪金以谋生的人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构成了绝大多数。如在欧盟内部，目前这个数字足以超过 80%，而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了 90% 以上(Eurostat, 1990, p.59)。如果人们承认这种处于雇员地位的多数人至少应是实现社会主义集体(阶级)利益的潜在力量的话，那么“工人阶级边缘化”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难题也许在于如何动员社会主义的这种潜在的阶级多数，但这就与“多数不再存在”的说法截然不同了。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讲，这正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拥护者所坚持的立场(见 Wood, 1986; Mandel, 1978; Panitch, 1986, 1990)。

近些年来人们普遍认为，虽然这种“技术无产阶级化”过程在整个 20 世纪确实在持续发展，但是这种日益增多的人口甚至不能成为对促进社会主义感兴趣的阶级的潜在基础。的确，尽管无产阶级化的广泛过程一直持续进行着，但在整个发达工业社会，能够构成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并在实践中支持社会民主党的范围狭小的工人阶级，从长期来看人数在不断减少。尽管人们对这种真正的工人阶级的精确范围的划定还争论不休，但在大多数评论家看来，其核心部分还是那种全日雇佣的体力劳动者(经常是男性)。他们处于传统的(经常是高度集中的)产业部门，生活在发展已久的城区工业地区(见 Poulantzas, 1975; Hobsbawm, 1981; Przeworski 和 Sprage, 1986; Hall 和 Jacques,

1989)。

一般来说,这样定义的核心工人阶级在绝大多数发达工业社会已变成正在损减的少数(尽管他们确实还存在)。在英国,这种锐减十分突出,体力工人人数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3/4,而到了1981年,这个比例低于1/2。(Price和Bain,1988, pp.162—164) 在美国,这个数字由1950年的40%降至1980年的1/3还少,(Lash和Urry, 1987, p.120)即便是在典型的社会民主国家瑞典,体力工人的人数占全部劳动人口的比例也由战后最初几年的50%略强降至1970年的47%(Esping-Andersen, 1985, p.52)。在同一时期,由于农业就业人口的先持续边缘化,就业领域从冶炼制造业(许多传统蓝领工人工作的部门)向服务业(经常是白领)工作转变。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转变明显加快了,到1990年,在欧共体内部,在服务业领域就业的工人人数(60%)几乎是在工业领域就业人数(32.5%)的两倍。在美国,服务领域就业人数比例更高,约占70%(欧共体委员会,1991)。在整个80年代,英国在制造业领域就业的工人人数减少了1/4还多,而且那些被广泛认为是工人运动先锋的工人人数减少得更多。例如在采煤业,从业人数从1971年的423 000人降至1993年17 000人(《就业报》,1971年2月,1994年7月)。在美国,从1950年到1970年,制造业的从业工人人数减少了一半。

伴随从业领域发生的这些区段的变化的,是工作方法的变化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化。首先,在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各成员国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着女性劳动力不断增多的趋势。到1988年,欧共体内部的劳动人口中妇女占了近40%,在一些国家(如瑞典)甚至更近于50%。在欧共体,约有3/4的就业妇女

在服务领域工作。虽然多数妇女从事全日制付薪工作，但也有1/4的女工和1/3的已婚妇女从事非全日性工作（Eurostat, 1989a; Rein, 1985）。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非全日性工作人数在不断增加。这个趋势在最近20年来的发展尤为明显（OECD, 1985）。当然，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女性工人与男性工人相比对阶级利益的要求反应较冷淡，尽管也许是典型的家庭劳动分工使妇女较难有效地参加政治和工会组织。可是，具有工会会员身份的人——霍布斯鲍姆（Hobsbawm）将其描述为“阶级意识的……最基本的标志”——在妇女工人、非全日性工人和非体力从业人口中的确很少，而且所有这类人的数量一直还在增长着（Hobsbawm, 1981, p.15; Blanchflower 和 Freeman, 1992, pp.56—60）。

产业和经济变化的其他一些方面表面上也削弱了实际阶级动员的基础。虽然经济重组创造了许多庞大的多国公司或跨国公司，但是数量不断增多的服务领域内的企业的规模比起传统制造业领域内的企业规模一般要小，工人通常也不太容易联合起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变化过程加快了。因为在一系列工业化国家，工厂的平均规模变小，从业地点也由传统的城市工业地区向半农业地区转移（Lush 和 Urry, 1987, pp.84—160）。在许多经济大国，工会会员人数在近十年里确实减少了。例如在英国，工会会员从1979年的1340万降至1994年的900万，而在美国，从1970年到1987年，工会会员的密度几乎减少了一半（《社会趋势》，1991年第21期，p.183; Blanchflower 和 Freeman, 1992, p.59; Visser, 1992, p.19;《就业报》，1994年6月）。

11

最后，还有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正在发生的结构变化也瓦

解了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种“普遍的无产阶级生活方式”(Hobsbawm,1981,p.7)。尽管本位主义一直是工人运动存在的问题,但霍布斯鲍姆在其有影响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问题的文章中指出,自从二战以来这个问题才变得尖锐起来。随着妇女和移民的不断流入,工人阶级内部已经较多样化。巨大的社会和人口流动已经侵蚀了既有的共同体利益。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公共领域的增加已使工人内部的分歧和冲突十分普遍。对于大多数工人来说,劳工行动的目标已经不是资本所有者,而是政府、“公众”或只不过是其他工人(Hobsbawm, 1981)。海曼(Hyman, 1992,p.150—158)认为,可以根据不断加速的工人阶级分化过程将80年代的困难概括为以下几点:

1. 从集体主义向个人主义转化。表现为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工人对集体决定的政策和集体纪律的响应能力降低。

2. 工人阶级内部两极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的区分相对应)。许多著作者将此描述为“中心-外围”或“内部人-外部人”关系。

3. 根据雇主、职业、经济部门或产业领域来划分的、在集体认同感和集体事业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排他主义。

4. “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分裂。这表现为工会内部和工会之间的冲突,以及国家领导人和中央联邦权威的削弱。

这种广义界定的工人阶级的内部利益多样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概括。一些人强调,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改变了工人阶级的消费方式。这样,住宅持有的多样性、私人小汽车的增加、闲暇时间和机会的增加、工作地点和居住地点距离的扩大——所有这些都瓦解了集体的消费方式,而集体消费方式却往往有助于加强传统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和经

验(Lash 和 Urry,1987)。有些人还关注双重劳动市场的存在。那些在主要部门全日稳定就业的工人的利益和机会,与在第二 12 劳动市场中处于边缘化和断续就业的工人比起来是截然不同的。还有一些人在这种新的劳动分工中看到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社会的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少数一批人(有时被描述为"下层阶级")实际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困于贫穷和半经常性失业之中,依赖国家的支持,他们与"可尊敬的"多数(包括定期就业的工人)日渐分离开来(Wilson,1987; Field, 1989; Therborn, 1989a)。

一些人越来越把这些变化当作是工人阶级作为政治改造实践之社会基础的行为能力减弱。在高兹的打破常规的公式中,"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危机"(Gorz, 1982, p. 66)。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现在已不再是具有特权的少数,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这样的工人阶级,总体来看他们不能支配生产资料,他们的直接利益也与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不相符合"(Gorz, 1982, p. 69, 15)。赖斯和尤里的较为慎重、经验证据较为充分的判断是"无组织的资本主义"近期的结构变化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能力的衰退"。这样,"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规模,而且它的'核心'也在无组织的资本主义中缩小了。空间上的分散意味着联系和组织网络的崩溃,结果是阶级资源的极大削减"。因而,"整个产业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设想改造社会的力量被极大地削弱了"(Lash 和 Urry, 1987, pp. 11, 311)。马昆德则更为直截了当地说,"传统工人阶级……几乎销声匿迹了",传统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工程也随之而去。的确

在社会主义仍然是工人阶级表达自己情感和思想的手段这

个意义上讲，目前在最为发达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已经成为障碍，而不再是源泉。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已经被吸收转变为庞大的、几乎没有边界的中间阶级。其余的…… 则沦为下层阶级，实际上被排除在全资格的公民之外。(Marquand, 1993, p.55)

二、"资本主义的掘墓人"[1]：死亡了和被埋葬了吗？

上述社会变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说明"社会主义前进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的说法是正确的呢？不言而喻，我们(可能是暂时地)生活在社会和经济迅猛变化的时代，在这种环境中，我们更难断定哪种变化是有意义的，以及这种意义究竟蕴含在哪里。尽管什么也没有真正改变的说法绝对是迂腐可笑的，但我们从早些时候的大规模社会改造的设计中("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终结"等等)得到的有益经验提醒我们，要对那种过于扩张的社会学想象谨慎小心。

13

我们在作出评价时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并不是社会变化的结果，而是它的出发点。认为我们挥手作别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时代"，显然是想当然的。的确，如果没有更多的实在的限定性条件，人们很难把经合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点值得人们注意：即便是那些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来说具有相当理想的阶级结构的社会和时期，它们也不是以步调一致地向社会主义推进为特征的。

如果转向更为具体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过分关注英国和美国非常特殊的经验的倾向始终存在着(可能对于英美作者来

说是正常的)。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例外情况"一直是各种社会科学文献的共同主题。不管人们如何理解美国新右翼的兴起和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人们在最近的时期很难看到旧时曾经对社会主义发展极为有利的条件正在逆转(Sombart,1976; Pierson,1990; Mann,1993)。英国给人的直接印象也许不是那么特殊。的确,英国曾经是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发展的典型和独特的阶级政治的典型,人们认为是其阶级发展导致独特的阶级政治。然而,与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况一样,英国具有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地位也使它的阶级发展史与众不同,将其作为"典型"例证确实会令人误解。例如,英国农业领域的雇佣人数比欧洲大陆国家要少,时间也短。它在20世纪初体力工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也是与众不同的。1911年,英国劳动力的75%是体力工人,不足10%的人受雇于农业领域。这一时期,在大多数可比的欧洲国家,体力工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35%(德国)到41%(丹麦)。近在1939年,德国工人的1/4从业于农业领域(Esping-Andersen, 1985, p.52; Lash和Urry,1987,pp.141,144)。在其他欧洲国家,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农业部门迅速减少也只是战后的事情。在法国和美国,体力工人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 *14* 40%(Bell和Criddle, 1988, p.34; Lash和Urry, 1987, p.119; Mitchell,1975, p.158)。因而,体力工人构成劳动力多数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是真正的例外。相应地,体力工人减少的情况也决不是像草草地浏览一下英美数据所得到的印象那样严重。在英国,体力工人的比例几乎降低了一半,但是即便在1990年,几乎一半多的男性工人仍然从事体力工作。相对于全部劳动力而言,体力工人也超过了40%(《社会趋势》,21,1991,p.74)。

并不是20世纪发生的所有的阶级结构变化都十分明显地

对社会主义事业不利。和体力工人人数减少现象相伴随的，是小资产阶级人数的长期性缩减，尽管在整个 80 年代个体经营者数量在增加。这个阶级曾经对社会主义力量持坚决敌视的态度(Eurostat, 1986b; Mann, 1993; 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见 Esping - Andersen, 1985, p.53)。下面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即服务领域的扩大必然意味着“中间阶级”或白领工人的增加，或必然会使那种保守的/支持市场的政治态度得到发展。例如，美国服务领域内的诸多快速增长一般是非技术性的、不熟练的或非全日的工作，其中许多都是所谓的“麦当劳式无产者”(Wood, 1989, p.17; Esping - Andersen, 1992, p.146)。[2] 与此同时，各个国家扩大了的服务领域在市场部分或在非市场部分(一般是国家部分)的比例构成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在美国，受雇于市场部分服务领域的工人数量是非市场部分工人的三倍(54%: 17%)。相反在欧洲，市场部分服务领域的工人数量只比非市场部分的工人数量多 50%(37%:24%)(Eurostat, 1990)。从事服务业的工人不论是在公共部门(主要是在福利国家)还是在私人部门，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和方向)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我们还可以根据工会运动的衰退情况来展开广泛类似的讨论。工会是否能够或怎样才能持续有效地开展活动，是我们在下面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工会会员人数问题，我们会发现实际情况仍然不是像英国和美国的资料所显示的那样严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 1970 年以后的时期，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工会会员人数减少了，尽管它们的情况较为特殊。但是在 80 年代，只有荷兰和意大利工会成员的缩减情况才可与英美国家相比。而在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法国和日本除外)，工会会员人数在 70 年代是稳定增长，在 80 年代处于停滞状态。在

瑞典和丹麦,工会会员人数超过了70年代达到的"饱和"水平,分别是96%和95%(见表1.1)。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下降的很大部分是由于持续大规模失业造成的直接和间接后果(见 Visser,1992, p.19)。[3]

表1.1 非农业工人中工会成员数占全部资薪雇员人数的比例(%),1970—1986/7

国家	1970	1979	1986/7	1970—1987年的变化
丹　麦	66	86	95	+29
芬　兰	56	84	85	+29
瑞　典	79	89	96	+17
比利时	66	77	76	+10
爱尔兰	44	49	51	+7
西　德	37	42	43	+6
澳大利亚	52	58	56	+5
加拿大	32	36	36	+4
瑞　士	31	34	33	+2
挪　威	59	60	61	+2
意大利	39	51	45	+6
英　国	51	58	50	-1
新西兰	43	46	41	-2
奥地利	64	59	61	-3
荷　兰	39	43	35	-4
法　国	22	20	17	-5
日　本	35	32	28	-7
美　国	31	25	17	-14
非加权平均(美国除外)	48	54	53	+6

资料来源:布兰奇弗洛和弗里曼(Blanchflower 和 Freeman, 1992, p.59)。

下面的一些结论看起来是合理的。在所有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中，体力工人的比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实际的下降趋势。这在英国由来已久且发展最为严重。除英国外(部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50年代的情况除外)，没有别的国家体力工人人数构成过劳动人口中的稳定多数。尽管他们的数量在减少，但几乎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体力工人一直是切实存在的少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雇主和个体经营者的人数也在下降。就业人数增长的主要范围在白领雇员之中，特别是在服务部门。16 目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挣工资者形成了劳动人口中的绝对多数。总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那种有绝大多数体力工人可以动员起来支持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几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2)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体力工人的数量在减少，但它们实际上一直是劳动人口的少数；(3)工会成员人数确实从70年代的高峰期降了下来，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在世界各地是不同的，在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间也有很大的差异。

这样，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前途仅仅依赖于体力工人构成绝大多数的情况，那么事态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前景来说肯定是致命性的(虽然近些年来“事情已经发生急遽变化”的提法有些降温，但体力工人构成绝大多数的情况几乎从未发生过)。可是那些反对“社会主义死亡”提法的人正是对这一结论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明显的原因证明为什么工人阶级应该要由体力工人构成，或由男性或白人构成，或应该在某些传统的产业部门就业。认为那些把工人阶级贬降到人数持续下降的少数地位的人实际上成了技术决定主义的牺牲品。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至关重要的并不是具有某种特别的技术，而是在剥削性的工资劳动合同中存在着的社会生产关系(见 Wright，1985)。

那种白领工人在某些意义上讲是“中间阶级”的提法也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布莱沃曼(Braverman)可能是这种观点最有影响的鼓吹者,即认为20世纪白领工作的增加同时也伴随着不熟练工作的增加,而且也把工厂纪律移到了办公室(Braverman, 1974)。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20世纪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从蓝领工作向白领工作的转化,然而挣工资者或雇员的人数也在持续增长(当然,尽管有越来越多的挣工资者并不是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雇主)。

这种立场的困境在于,尽管受雇佣的地位可以形成一个集体行动的轴心,可是挣工资者看起来并不像(或其行动起来不像)一个有着集体的社会政治利益的阶级。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关于劳动分工中不直接从事生产的职务(也即“为资本服务的功能”)较细或较粗的界定,甚至那种由来已久的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区别,相对来讲都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4] 在此成问题的主要议题也不是一种陈旧的、令人颇费脑筋的说法,即高级经理和不熟练的店员拥有“共同的”阶级地位的说法。现在的经理确实不再是生活在19世纪的那种所有 17 者了,这个事实也许很重要,但是比较而言,(高级)经理的数量很少,而且有证据表明,他们通过控制生产过程和参与所有权,自己绝对不是那种完全出卖劳动力的人。对阶级分析及政治后果而言更为重要的问题,倒是“严格意义上的”挣工资者内部存在的分化现象。与马克斯·韦伯的阶级分析观点大体一致的是,这些分化现象部分体现在控制市场资源方面的差别上,但在就业条件、消费方式和对待国家干预的态度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在一系列潜在的分化当中(其中一种我们将在后面讨论),最重要的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就业工人的区别。这种区别以

前曾以很令人曲解的方式表现出来，实际上大规模公共领域的出现并不表明对资本主义的逐渐抛弃。至于能够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受雇者区分开来的东西（如对公共开支的态度）是否就比将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如对收入政策的敌意）更重要一些，我们对此也还无法断定。然而不管其明确的政治特征是什么，经常是但不仅仅是社会民主主义所支持的（福利）国家就业的扩大，倒是先进资本主义的较为显著和较为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实践中，这些雇佣劳动者利益多样化的论述并不一定就说明阶级特点的衰退。例如，在近期的经济衰退中，体力工人（特别是在私人领域）仍然是最容易失业的人。这种事实对所谓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一"社会的提法（这种提法将大部分工人置于社会的"舒适多数"之中）提出了反证。的确，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历史揭示了从阶级同质性向阶级异质性径直转变的任何一种提法，都会使人误入歧途（Hobsbawm，1981；也见 Marshall 等人的著作，1989；Hyman，1992）。但是，另一种与此对抗的希望，则期待在终将显现出来的社会化过程中所有雇佣劳动者能分享最为重要的利益，也是特别不能令人信服的。

三、社会主义的选举危机

对当代资本主义复杂的阶级结构所做的解释纷杂庞多，我们对此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幸好，还有一个较为合适的替代选择。因为，虽然"社会主义死亡"的见证者们对当代资本主义

18 阶级构成的变化都无法避免地作出了一些颇为笼统的判断，但他们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一个正在分散的）阶级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衰退的）选举运气之间的关系上。这样，他们通

过集中关注传统意义的阶级与左翼政党获得的选举支持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关于阶级构成的“真正”实质这一难题。

这种评论的核心主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再)构成社会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左翼政党的潜在基础：(1)社会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已经不再是选举意向的有效指示器(阶级分化论题)，或者(2)工人阶级的缩减使社会主义者失去了潜在稳定多数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消失”命题)。(见 Crewe，1985，1991 和 1993；Heath 等，1985 和 1991。)[5]

在英国，人们会经常看到“最纯粹的”的阶级投票；同样也是在英国，左翼的选举失败也大多是与“‘纯粹的’工人阶级迅速衰退”联系在一起(Butler 和 Stokes，1974，p.88；Crewe，1984，p.199)。简单地说，阶级分化论题意味着社会阶级已经不再是投票意向的安全指示器。在 50 年代，职业——特别是体力或非体力工作的地位区分——是可信的投票意向的十分清楚的指示器。在英国，体力工人所投票数中的 2/3 多支持工党，而非体力工人所投票数中的 4/5 支持保守党。60 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发现职业性阶级不再是投票活动的有效指示器了。最基本的理由是，体力工人阶级不再是工党选票的可靠基础，阶级分化在英国经常被认为是保守党力量的“体现”，这种趋势由于工人的内部分化而加剧了。旧时的“传统”工人阶级仍然忠诚于工党，“新”工人阶级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其他政党。克里维(Crewe)在英国 1987 年大选后这样讲：

工党现在仅代表工人阶级中的衰退部分——统建住房部门、公共部门、苏格兰和北部工业区以及旧有的工业联盟的

传统工人阶级,不能吸引南部新地产和新服务部门中人数众多、正在扩张的工人阶级。(保守党)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新工人阶级的持续扩张,旧时的[工人阶级]在缩减……新工人阶级不仅变成主要部分,而且越来越占据优势。人数统计和时运都不在工党这边。(Crewe, 1987; 也见 Crewe, 1991 和 1993)

19

丹里维和哈斯本茨(Dunleavy 和 Hunsbands, 1985)作出了类似的重新评价,他们认为阶级分化产生了与干预主义国家不断增长的作用相联系的新型选民分化。这些新型的选民分化取决于私人(商业)部门和公共(非商品化)部门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主要是在诸如就业、消费(如住房和交通)和收入来源等方面发生的。这种部门分化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分化是不同的,并且引导投票意向。当私人部门的生产和消费扩张吸纳了工人阶级选民时,他们就可能不再支持与公共部门相关的政党,即工党。

在美国也出现了极为类似的现象(当然美国现存的阶级结构和公共供应的基准与英国不同,传统选举联盟的参数也差异很大)。与英国一样,关注的焦点也是集中于右翼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的持续胜利上。80 年代以来的事实说明,自从 30 年代以来曾一直是民主党总体选民优势核心组成部分的工人阶级,其忠诚现在更加分化。尽管少数民族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很高(约有 80%的黑人选民支持民主党),然而白人工人阶级中对民主党的支持却有很大的下降,他们中的多数在 1980 年和 1984 年的选举中支持里根。在 30 年代的重新调整中,工人阶级对民主党的支持是很稳定的,但"在 50 年代的总统竞选中却急

剧下降，在60年代有所恢复，接下来又是下滑"（见Piven，1991，pp.235—241）。一些评论家认为，美国现在形成了新的选举格局，共和党取代民主党成了"自然的"选举多数党。实际上，这种重新调整的前景只有在忽略了民主党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的持续力量时才能维持下去，1992年克林顿当选为总统更是对这种格局的冲击。分化的证据（选票分散、选民的极大不稳定和党派认同淡化等等）倒更充足了。（进一步的讨论，见Ladd，1981；Schneider，1981；Beck，1984；Lowi，1985；Burnham，1989；Mckay，1993）。

虽然许多人把这种分化趋势当作近期事态发展的主导潮流，但并不是没有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在英国（这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民异乎寻常地严重流失），安托尼·希思（Anthony Heath）和他的同事们就提出了一系列的反驳意见。他们以实际的统计数字为证据，所提反驳意见的要点有：(1)尽管绝对的阶级选票（中产阶级是保守党的选民，工人阶级是工党的选民）自从60年代以来确实下降了，但是相对阶级选票（鉴于全面政治支持的一般变化和阶级规模的变化，政党从现存所有阶级中吸引选民的程度）的下降却是"很缓和的"（Heath等，1991，p.78）；(2)尽管"工人阶级 …… 确实按照地区、民族和住地，以及在较低程度上按照工会成员身份分化了"，但这并不是新近才发生的现象，"克里维和其他一些人指出了业主职业的增加和工人阶级中工会成员人数的减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这些变化在解释工党选票分散方面并不起多大的作用"（Heath等，1991，pp.113—114）；(3)尽管在"中产阶级"中工党的选票出现了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之间的分化，但这可以从涵盖范围更广（包括公共和私人部门和"其他领域"）的"福利性与创造性职业"的分化中

20

得到解释;"一旦我们根据福利性职业和创造性职业的划分来看问题,部门区分就没有太大的统计作用了"(Heath 等,1991,p.94)。"公共和私人部门中工人阶级的政治差异是很小的",因而希思及其同事"反对那种基于生产领域的利益差别论"(1991,p.104)。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对关于工人阶级分化的所有争论作出完全公正的评判。然而,可能最重要的(如果考虑到争论双方的极大分歧,也最显著的)是,各种观点在阶级结构潜在变化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所以,虽然希思(Heath 等,1985 和 1991)和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1989)各自所做的研究都反对克里维的工人阶级分化理论,但是他们都同意工人阶级在缩小这一情况。希思发现:"在 1964 年,工人阶级约占选民总数的 51%,但是到了 1987 年,这一数字降为 36%"(Heath 等,1991,p.67)。马歇尔运用类似的阶级分析模式,但基于极为不同的标准和基础,也发现体力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由 48% 降为 35%(Marshall 等,1989,p.101)。希思部分是为了证明:工党在 1964 年和 1987 年间的选票流失(约 13%),直接的政治因素(可能最重要的是三党候选人格局的形成)和社会变化因素(包括阶级结构的变化)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但他估计说,从 1951 年到 1981 年间阶级结构的变化本应使保守党的选票增加 3.8 个百分点,自由/联盟增加 0.7%,工党选票要减少 4.5 个百分点(Heath 等,1991,p.203)。这给人的印象是,工党的政治损失本是"可以避免的",包括支持"错误的"政策和插手一些"几乎不可避免的"社会结构变化(也见 Harrop 和 Shaw,1989)。同样,马歇尔也认为,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工人阶级的社会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新形式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或阶级意识的消失等,都缺少证

21

据),但是这个阶级的规模的确变小了(Marshall 等,1989, pp. 98—142,196—224)。这样,即便是阶级分化理论的反对者,也赞同工人阶级正在缩小的说法。在美国,关于民主党选票减少的论述各式各样,包括强调选举的民族和地区因素的变化,但是人们也都把这些变化置于蓝领就业工人减少的背景之中(见 Piven, 1991; Esping-Andersen, 1985)来讨论。

当然,阶级结构变化的政治后果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英国和美国。的确,对近期左翼政党的选举情况所作的比较分析表明,世界各国的情况确实差异很大,美国民主党和英国工党的表现一直是异乎寻常地糟。同时,尽管民主党获得的支持有所下降,但很难说清这就应被看作是"支持社会主义"的选票减少。例如瓦尔特·科皮(Walter Korpi)描述说,在美国,左翼政党的支持选票在 1946—1960 年只下降了 1%,而在 1961—1980 年下降比例却是 0%! 同样,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特殊的无产阶级结构为这种下降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可是在德国和法国却出现了分化的一些迹象(尽管在法国这种迹象很"有限")。还有,很有意义的是,埃斯平-安德森、塞安伯里(Sainsbury)和莱菲提(Lafferty)都发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分解"(decomposition)已经深入到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主义的中心地带(Lash 和 Urry, 1987, pp. 214—219; Esping - Andersen, 1985, pp. 114—141; Sainsbury, 1993; Lafferty, 1990)。同样有趣的是,埃斯平-安德森对丹麦、挪威和瑞典各国政党初始分解的不同步伐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各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执政情况以及它们在体力工人和其他雇员间形成有效联盟独特的能力上。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之外,也曾有左翼力量的令人吃惊的退却。法国可能最严重, 22 在 1993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社会党的支持率实际下降了一半,

这个数字是19.2%(《选举研究》)。

尽管如此,左翼的长期选举衰退情况也经常容易被夸大(见Merkel, 1992)。实际上,西欧左翼联合选举力量在70年代的得票率是40.1%,在1980—1983年增加到42.5%(Lane和Ersson, p.1987, p.112; Pierson, 1991a, pp.171—172)。在80年代,虽然右翼在英国、美国和西德获得或保持执政地位,但在瑞典、挪威、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左翼仍继续执政或恢复执政(Mackie和Rose,1991)。在澳大利亚,工党连续五次赢得选举胜利。在法国,左翼总统候选人在1981年当选,1988年再次当选。但80年代最具戏剧性的选举胜利可能属于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它在1982年的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获得48.7%的选票之后,又赢得了1986年和1989年的选举,尽管其所得票数大大下降(Share,1989, p.29;《选举研究》)。为了正确评价左翼政党的选举成绩,我们应该牢记左中右三翼共同面临的那些困难。实际上,所有的主流政党都由于自己的支持力量被第三党或选民的否决力量所侵蚀而面临着"代表危机"。因而在1993年,加拿大保守党的溃退远远超过了法国社会党的失败,它的支持票数由1988年的43%降至仅16%(议会议席从154席降为2席!)。同样在主流政党处于选举困境的情况下,爱尔兰工党(作为第三力量)却在1992年大选中将自己的代表数增加一倍,进入了新联合政府。我们也应记住,社会主义政党不是经常期望自己获得难以达到的51%的选票。在多元化选举制度中,40%的选票就足以占据议会席位多数,而在比例代表制中,结盟和联合的复杂性经常使社会主义政党关注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不仅仅是使选票数最多化(进一步的评论,见Kitschelt, 1994)。

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便在当今环境下，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能赢得或继续维持执政地位。但也非常清楚的一点是，这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确实，只有在超出社会民主党的“天然”选民传统工人阶级的范围来作出成功的社会吁恳时，这种胜利才有可能。例如，如果只以传统工人阶级的选票为基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不可能在1982年获得巨大的选举胜利，实际上，在这场历史性的胜利中，这个党只获得熟练和非熟练工人中不足一半的选票，它是从所有阶级中获得胜利支持的。在1982年，它获得了白领工人的1/3多的选票，获得所有“企业家”的1/4多的选票(Share, 1989, pp.111—112)。这并不是一种新发明，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也曾经在某些阶段试图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人民党”(Volksparteien)；瑞典社民党也许最成功，它将瑞典变成“人民家园”的热望可以追溯到20年代波·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的著述，甚至还可能追溯到19世纪末杰尔马·布兰亭(Hjalmar Branting)的思想(Tilton, 1990)。 23

尽管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同样面临着支持率下降和政党忠诚淡化等问题，但很明显的一点是，它不是“没有候选资格的”。也许对于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们来说非常烦恼的问题来自西班牙、法国和澳大利亚选举经历中出现的一个情况，即当代社会民主党只有抛弃那些与传统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目标相联系(甚至最温和的联系)的那些原则时才能获得选举胜利。关于这种抛弃社会主义原则的典型做法，常常可以在密特朗起初抛弃凯恩斯主义和1982年开始紧缩计划中找到。在西班牙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安东尼奥·加西亚·桑特斯马塞斯(Antonio Garcia Santesmases)在1985年这样写道：“仅仅在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从共和主义、中立主义、反资

本主义、工人自治主义变为西班牙加入北约的辩护人以及市场经济效率的坚强拥护者"(见 Share,1989, p.150)。西班牙在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高出 20% 的失业率(Share,1989, pp.76—77)。这种情况也在其他地方再现。戴维·丹马克(David Denemark)在 1984 年写了一篇关于新西兰第四届工党政府的文章,指出"一个如在西方工业世界所见到的一样全面的政治经济'大转弯'。工党,在历史上一直致力于集体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现在变成了拥护个人主义、'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的'新右翼'"(Denemark, 1990, p.62)。

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民主党执政的"U 型转弯"是因为它们优柔寡断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背叛"。总的来看,这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尽管领导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容易在政治上不知所措,但令人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运动为

24

何如此不幸,竟然要一致选举那些最后背叛了自己核心选民的人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呢?纵使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刚愎无知,我们最好还是在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能够开展工作的条件中寻找这些倒转的根源。在一方面,可能的情况是,要赢得选举的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应该超越处于少数地位的工人阶级范围而向全社会吁恳,这样就淡化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日程。当这种必要性可能变得越来越明显时,它当然就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见 Przeworski, 1985; Przeworski 和 Sprage, 1986;下文第 195—205 页)。可能较为新鲜和更加令人生畏的是这样一种前景:目前社会党及社会民主党政府得以在其中运作的经济秩序,即便是最温和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的策略也难以在其中维持下去了。所以可能的情况是,即便社会主义者证明是有候选资格,他们也不能再追求一种甚至是温

和的社会主义政治目标了。我们将在第二章讨论这种前景。

注 释

1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出来的首先是其自身的掘墓人(Marx, 1973c, p.79)。

2 埃斯平-安德森(1992,p.148n.2)指出:"在美国,餐饮业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工资仅是制造业工人的44%"。

3 有必要指出的是,杰勒·维塞(Jelle Visser, 1992)涉及的时期直到80年代末的关于工会成员人数的列表比较显示的人数减少程度要比布兰奇弗洛和弗里曼(Blanchflower 和 Freeman)所记录的严重。可是,维塞的数据也确实肯定了不同国家间的很大差异,也表明了美国特殊的绝对低数值和下降的严重程度。

4 同时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即便挣工资者不能为确定"真正的"工人阶级提供令人满意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把体力劳动工人当作必须选择的替代角色。见埃里克·奥林·怀特(Eric Olin Wright, 1985, pp.182,195)的著作。他反对将体力劳动者作为界定工人阶级的标准,但他却将美国40%的劳动力(瑞典43%的劳动力)看作是"毫不含糊的无产者"。

5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广泛的论述,我们将在本书第八章对此进行分析。他认为靠选举实现社会主义是永远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在民主秩序中处于少数地位,而这种秩序把统治权力赋予了选举的多数。

25

第二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衰退

尽管“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有许多普遍性用法，但人们是否最好将其理解为一种经济的或政治经济的理论，目前还无法断定。[1] 当然，对于诸多社会主义倡导者来说，社会主义的经济生活组织(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将来能够用于实现某些道德或政治目标的手段。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会看到，这种立场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者重新评价市场也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论如何，虽然社会主义者一直把建立一种在道德和伦理意义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尽管不是全部)，借以实现这种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主要机制还是重组经济。

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它决不局限于这一理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被认为是产生“危机、残酷竞争和战争”的根源(Bukharin 和 Preobrazhensky，1969，p.89)。它将导致资源的滥用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不合理分配。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导致“过度生产危机”、劳动和资本的不充分运用和许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等现象同时发生。同时，这种经济组织还被认为是极端反民主的。尽管经济生活决策对于每一位社会成员和每一个“社区”来说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实际决策权却被庞大私人资本所有者集中掌握，那种形式上自由平等的政治民主制度实际上是为其经济权力服务

的。

对于这种不合理和不民主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者提 26
出的主要克服方法是建立一种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经济管理模式在东方(苏联)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实践起来差异很大。可是尽管东欧各国的经济(甚至把前南斯拉夫模式排除在外)各有千秋，但从总体上看它们都属于苏联模式，其实质是一种中央计划经济，它的极端形式包括对劳动的强制指导和对消费品的定额配给(见 Ellman, 1989)。[2] 在西方，一些工业企业被纳入公有制范围之中，而且经常在政治上来突出这种经济的"社会化"。尽管如此，多半不过是凯恩斯模式的某种变种而已，在这些模式中，国家对一些宏观经济手段进行控制也许会使较广泛的经济得到有效的管理，这些模式描述了(间接)控制经济生活的较好形式。当然，我们对东方或西方的社会经济被有效"计划"的程度应持谨慎态度。许多政府采取的行动从来就没有很多的"计划性"，只不过是"即时应对"而已。一些事实证明，即便是在苏联，"计划"也经常是对已发生情况的事后矫正(Schmidt, 1983; Ellman, 1989, p.17; Rutland, 1985)。在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经验中，在对"计划"抱有一般同情感的同时，也对这种计划在实践中究竟包括什么内容抱有十分模糊的看法(Marquand, 1988, pp.42—43)。尽管如此，对经济的政治控制在对社会主义有利的辩护中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

正是这种计划经济形式的可信性目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势是：20世纪的"现实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最引人注目且又十分不同的两种形式——苏联模式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看起来同时走到了尽头。苏联模式(以及东欧各国衍生的"改革"模式)和凯恩斯主义模式如今都备受指责。

人们认为它们不能(真正地)"配置商品",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官僚手中,而不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东西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衰退看起来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将其完全归咎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弱点(例如,产业劳动力构成和分布的变化或资本主义市场全球化造成的后果)。但不论如何,人们已普遍感觉到,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的两种主要实践形式在实现自己所承诺的合理民主的经济生活方面,却都以失败而告终。

27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这些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衰退的观点。第一,我将(十分简要地)讨论一下苏联模式的危机。关于这个问题在别处的调查研究已很充分,我在这里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东方经济的困境对正在寻求改革的西方经济的"示范效应"。第二,我将较为详细地评价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危机,特别是要考察如下这种观点:不论战后所追求的那种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还有多少剩余力量,由于全球经济秩序的变化,它现在已经变得不可行了。

一、计划经济的衰败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以各种方式论证,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将比资本主义经济组织更有效率、更加公正和更具生产能力(见 Marx, 1973a; Brus, 1972; Lenin, 1960; Stalin, 1955, pp.40—41; Bukharin 和 Preobrazhensky, 1969, pp. 119—120)。进一步讲,依照布鲁斯的观点,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都"植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中央计划经济这种信念"(Brus, 1972, p.27)。不管马克思和列宁期望这种计划将采取何种形式的制度,在实践中,那种始创于苏联、尔后强制输出到

东欧共产主义社会的苏联模式，却打上了斯大林主义高度集中的“命令”经济的烙印。这种“传统的”集权的苏联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 所有的经济决策实际上都集中于中央（消费和就业领域的个人选择除外）。

2. 计划的等级性质和“从上至下的”计划执行结构。

3. 指令性的而不是指导性计划。

4. 直接按照实物（而不是货币）来进行经济计算和计划。

5. 货币在国营部门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

6. 计划在权威政治制度中的体现（Brus，1972，pp.65—71；Ellman，1989，p.18）。[3]

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89年东欧巨变这段时间（当然南斯拉夫发生得早一些），各国都曾经对这种体制进行过重复的尝试性改革。这些改革中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在“计划”经济中引进更多的市场决策和分权因素以矫正传统模式的许多僵化弊端。其中一些改革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例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机制（Berend，1989；Kornai，1986；Xavier，1989；Swain，1992）。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讨论这些改革对明确说明市场社会主义的意义。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认为这些改革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计划和市场相混合的经济模式，甚至少有人认为它们有效地矫正那种被广泛认为是现存计划经济形式的固有弊端。1989年的巨变进一步削弱了（甚至可以说是淹没了）这种改革进程的作用。不仅仅是东欧经济突然走上了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且那些曾经明确拥护这种改革进程的人现在也满腔热情、毫无条件地拥抱市场原则了（见Hankiss对匈牙利情况的讨论，1990；Brus，1989；Kornai，1990b；Kornai，1993；Swain，1992）。 28

"苏联经济模式的失败"已经成为西方政治评论中的共识，但我们在评价计划经济的弊端时还需持谨慎态度。一些将市场经济记录和计划经济记录作了严肃比较的人警告我们，不要无条件地盲目崇信市场的优越性（见 Bergson, 1987 和 1989; Ellman, 1989; Nove, 1983 和 1988）。然而不管对市场的运作持有何种保留意见，他们还是一致认为，看起来正是严重的结构性弊病瓦解了现有计划经济模式的运作能力。很少有人对伯格森的下述较为温和的观点提出异议，即："社会主义经济的绩效由于西方标准的运用而显得毫无特点"，"如果运用西方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那么它们可能产生的主要成果则显得逊常低下"（Bergson, 1989, pp.1, 51）。我在这里只是简要地说明一下计划经济的几项最为突出的固有缺陷：

1. 对最终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只是迎合计划，而不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结果形成卖方市场，商品长期短缺，排队购物，商品和服务种类极为有限，质量低劣，强制交换或延迟购物以及强制储蓄。

29

2. 不合理的激励结构。总体来说，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计划目标，而不是以尽可能最合算的方式满足需求。经理们竭力去接受那种松弛的计划，因为这种计划可以在企业的生产能力限度内完成，企业还可以积藏劳动和产品。产品质量很难控制，产出以直接的实物数量而不是根据消费者的偏好来衡量。利润分配官僚化、软预算约束、有效竞争和发明奖励的缺乏降低了生产效率——所有这些使逃避风险制度化并缓滞经济增长。

3. "比例之患"（the Curse of Scale）。经济的全盘计划导致比例性问题、复杂性问题和信息处理问题的发生，并导致部门之间的配置无效率，加剧瓶颈和短缺，强化了经济决策的官僚化倾

向。

4.第二和第三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不合理性和无效率本身逐渐引发了第二经济("非法的"和不规范的私人经济活动)和第三经济(国营企业之间未被准许的交换活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官方计划机制失灵)。(Nove, 1983; Kornai, 1980 和 1990a; Bergson, 1989; Ellman, 1989)

埃尔曼对传统计划经济的经验作出了如下概括:

> 社会主义的传统计划模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国家进行管理和控制、依照计划发展的经济类型。经验已经表明,这种模式无法得到有效实现…… 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计划",原本的意义是由直接计算和直接产品交换替代市场关系的合理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起来。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说明这种或那种社会群体对计划的怨恨,也不反映相关国家的落后状况,它所反映的只是传统的计划概念在理论上的不适当。(Ellman, 1989, p.327)

二、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危机

实际上,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就抛弃了他们自己曾经追求过的中央控制计划经济的任何一项目标,因此,苏联模式的失败在我们这里的讨论中就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过去的 *30* 25 年里越来越困扰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那些问题。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要考察一下这些问题的演变,并分析它们产生的纲领性政治难题。

当然，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一种无原则的权宜之计的特殊招牌而已，它缺乏形成一种政治纲领所需的任何起重要作用的东西(不管怎样适度考虑这一问题)。在其社会主义批评家们看来，在它应该遭受的谴责中，机会主义多于实用主义。然而这里还是有可能发掘出许多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基本原理，这至少是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自我理解的一部分——尽管其在"讲究实用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中是十分地例外(Kesselman, 1982; Keman, 1993)。在各种各样的形式中，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策略是基于这种考虑的，即：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具备有利的社会条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对经济决策环境和经济产品的分配进行有效的控制，以达到逐步进入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有一点值得强调，即当代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见 Przeworski, 1985, pp.7—46)。如果回溯到30年代，我们就会发现，将社会主义运动主要分割成"革命"和"修正"两翼的(至少就它们的纲领目标而言)是关于手段的争论多于目的的分歧。显然，列宁、考茨基和伯恩斯坦(引证的是同一个传统)可能对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持不同的看法，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期望这种社会要以废除大规模私人资本财产为前提。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需要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自由运作，所以这种理论的社会主义批评家们(包括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主张，社会主义相反要以某种形式的集中直接计划和投资为前提。但是，向这种社会所有化经济转变要付出很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代价，甚至可能难以克服，因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决定要通过自由议会民主的途径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在20年代尤为如此，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发现自己是在处于少数

地位的工人阶级力量的支持下进入少数派政府的(见 Emmanuel, 1979; Offe, 1985; Przeworski, 1985; Przeworski 和 Sprague, 1986)。他们在同促进扩大福利国家有联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发现了解决社会民主主义两难困境的"方法",这种复杂的经济政策经常被简便和习惯地概括成为凯恩斯福利国家。[4]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终于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中占据了中心地位。 31

三、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凯恩斯主义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作为"对经济生活的一种政治控制机制"的地位(Skidelsky, 1979, p.55)。其最大的战略优势是承诺对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政治控制,而避免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担心的那种由于"剥夺剥夺者"所带来的可怕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代价。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这一理念,即资本主义条件下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运作能够保证充分就业。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供给本身能够创造充分需求——只是在充分就业的特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但它自己无法保证这种充分就业时的均衡。这种均衡只有在市场之外才能实现,即由国家控制那些关键的经济参数,这可以由"中央权威机构加以自觉地控制或管理"(Keynes,1973)。凯恩斯指出,政府的职责在于干预市场以创造和扩大"有效需求"、增强消费和投资倾向,以此保证有效的经济活动来使用可利用的一切劳动力并由此保护充分就业均衡。为实现这一点,一系列间接方法 ——包括税收政策、公共工程、货币政策和利

率控制——都是政府实行干预的手段。[5]

凯恩斯倡导的"受控制的资本主义"看起来为社会民主主义难题提供了一种精巧的解决办法。这个难题是，如何既为自己扩大了的选民提供改革，同时又保持自己长期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又不威胁私人资本的支配权。经济控制可以通过政府对重要经济参数进行控制的方法来实行，资本所有者可以被引导按照提高社会民主党的广大选民的利益的方式从事活动。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所有化目标可以弃之不理，或者推迟到遥远的将来的某一不确定的(具备有利条件的)阶段。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货币政策，或通过调整公共消费水平来引导消费倾向。它们还可以通过收入转移和社会服务等被认为是福利国家的政策，来矫正仍然继续发挥作用的市场力量的无效方面。

32

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者内部的右翼和左翼根据各自对发达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解，对上述纲领的认识也有很大差异。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反，社会民主主义的右翼或"修正主义"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围绕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或生产领域的剥削来进行的，而是批判资本主义产生的财富和消费的不平等现象，及其在国家人力和物力资源使用方面的无效率。[6]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赢得议会民主的胜利，能够保证纯粹政治权力的有效性，以及支配经济生活的消费方面。通过采取明智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政策和扩展福利国家，就可能缓和阶级对抗，减轻不平等的程度，从而逐步迈向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特别是近来较有影响的"权力资源模型"理论的倡导者，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

系持极为不同的见解(见 Korpi, 1983 和 1989)。其观点的核心主张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行使上的区分。在经济领域,支配性的权力资源是控制资本财产,权力的行使途径是雇佣劳动合同,主要受益者是资产阶级。但在政治领域,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依人数多少流动,受益者主要是"数量上占优势的集团",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权力资源模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斗争重要性的逻辑分析在新形势下仍然有效,但社会主义阶级政治的实行可以利用议会民主和国家干预等新手段。在普遍公民权条件下选举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成为与私有经济领域中的资本权力有效抗衡的力量。如果这种政府的权力得以持久巩固的话(这本身可能是重要的前提),那么就可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之间形成一种实际的均衡,至少会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劳资之间的某种(暂时性)妥协就可能出现。但社会民主主义者期望劳方的力量最终会得到增强,以使投资机制社会所有化的可能性变为现实。 33

四、"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兴衰"

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两翼都力图通过采取凯恩斯福利国家政策以广泛地推进他们的政治战略。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环境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要比此前和此后(30 年代、70 年代末期和 80 年代)的形势都有利。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才试图去理解究竟什么才是社会民主主义。然而,我们应提防把凯恩斯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本身设想得太一致了。我们必须要把"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的两种表

现形式区分开:(1)社会民主主义者所采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典型形式;(2)在特殊"资本积累时期"实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典型形式(见 Aglietta, 1979; Harvey, 1989)。实际上,从二战末期到70年代初期(盛极一时的"福特主义"时代),所有的政党和经济主体都在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中追求着各自的利益,以致一些评论家把这一时期描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黄金岁月"(Jenkins,1987)。然而,正如最近一些关于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著作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一时期的干预主义政策具有不同的政治意图和后果,是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服务的(见 Esping-Andersen, 1990)。

将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经验和(正在衰落的)时运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历史等同看待,当然不是错误的。但是,如果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仅仅意味着经济干预加福利政策,或相应认为干预和福利政策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产物,那就不正确了。就战后这段时期的历史被简单地描述成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兴衰"而言,这种错置的对应可能曾经使一些评论家对50年代和6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成功过于乐观,而对70年代初以来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前景又过于沮丧。无疑在实践中,日常管理上的意见一致问题一定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意识中显得很突出。尽管如此,值得强调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经常把社会民主主义描绘成不止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而且在原则上,"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这种战略混合物只是追求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一种历史的偶然环境。在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正力图按照与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不同的方案重新塑造他们的政治纲领之际,这一限定条件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重新塑造也包括倡导"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

34

虽然已经声明这一重要的限定条件，但我们在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困难（和成功）作出评价时，必须关注战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经验。简言之，其诋毁者认为基于凯恩斯宏观管理政策和福利国家的扩展，社会民主主义表面看来在战后的25年里取得了成功，但是现在却有些穷途末路了。在战后初始阶段，甚至右翼政党也不得不在社会民主主义者限定的框架内活动。而现在形势则反转过来，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也不得不追求新自由主义政策了（见上文边码22—23）。

在其广泛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这一经历仍在进行着。西方的工业化经济在战后进行了重组，牢固地确立了一种新型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简而言之，这种新秩序有如下特点：(1)为达到充分就业而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和混合经济，并在自由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统一范围内实现国内的经济增长；(2)采取或多或少"制度化"的福利国家政策来处理市场经济产生的机能失调问题，保证公共服务的最低水平；(3)通过精英层次的谈判在基本社会制度方面（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在调和他们之间的（合理）竞争性利益方面左翼和右翼在广泛基础上达成一致，劳资双方达成了和解（Bowles 和 Gintis, 1986; Taylor-Gooby, 1985; Kavanagh, 1990; Kavanagh 和 Morris, 1989）。这些自由民主和社会民主制度看来是避免两次大战期间发生的那种经济灾难及伴随而来的政治分化的最好方案。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它们是改善其广大工人阶级核心选民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有效手段。 35

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保持了"西方世界发达工业国家 …… 史无前例的持久繁荣"（Shonfield, 1965, p.61）。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经合组织经济的

平均年增长率为5%，而通货膨胀率在60年代末期以前尽管有所上升，但始终保持在4%以下。这一时期的失业率也很低。从1950年到1967年，六个主要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为2.8%，和1933年大萧条高潮时期13%的失业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与1980年后欧共体国家持续10%以上的失业率形成了明显对照(OECD,1991; Eurostat 1988)。与此同时，这也是福利国家支出急速增加的时期。1960年，经合组织国家社会开支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而到了7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已经升至占已经增加许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21.9%。从1960年到1975年，经合组织国家已经紧缩的社会开支的平均年增长率超过了6%(OECD,1988, pp.10—11)。正是在这一时期和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关于管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并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确认和信赖。

五、衰退之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

上述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可信性在近些年来受到了广泛的挑战。有些人士认为，战后实行的两党制虽然名副其实，但它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的真实基础之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适宜气候使得解决分配冲突的积极改良手段成为可行的政策。但是当这种手段不适用时，政治冲突也就尖锐起来(Pimlott,1988; Deakin, 1987; Taylor - Gooby, 1985; Esping - Andersen,1985)。在一些人士中间，还存在一种重新划定(缩小)这种共识所确认的持续经济增长和相对和平时期的时间范围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一时限只是15年多一点，即从1950年到1965年(见 Gamble, 1988; Deakin, 1987; Kavanagh 和 Morris, 1989)。即便是在其最热切的

崇信者中，他们也相当广泛地认为，共识政治是以生产出不断增长的经济剩余为条件的。经济增长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即引导投资的基础，是支持经济活动以保证充分就业的促进因素及卫生、教育、福利和社会服务经费增长所需财力的源头。正是经济增长使得劳资双方相互冲突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使调和得以维持。相应地，凯恩斯福利国家最成功的阶段也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 36

不管人们把“结束的开端”放在这一时期的哪一点上，到了7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的迹象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973年将石油价格提高四倍，这加速（而不是导致）整个西方工业化世界处于严重滑坡状态。可以用一些数字描述50—60年代与1973年以后的对比情况。从1965年到1973年，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5%。1974年，这一数字降为2%。1975年，九个经合组织国家经济“萎缩”，年均增长率降到零以下。尽管以后自这一低谷有些复苏，1979年又发生了第二次石油价格“冲击”，从1974年到1984年的十年时间里，年均增长率只有2%多一点（Alber, 1988a, p.187）。这些经济困难并不限于经济增长缓慢。到1975年，经合组织地区的失业人数已经上升到史无前例的1500万人，在十年里翻了一番（OECD, 1991）。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加剧，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赤字上扬。七个主要经合组织国家的“悲惨指数”（通货膨胀率加失业率）在整个60年代平均只是5.5%，而到了1974/1975年则上升到17%。同时投资水平和利润水平下降，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价值停滞下来。整个发达西方的各国政府都不能同时实现四项主要经济政策目标——增长、低通胀、充分就业和贸易平衡——而这是战后秩序得以建立的基础（Gough, 1979, p.132;

Goldthorpe, 1984, p.2)。

7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是特别严重的挑战。他们对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是以如下预期为前提的,即这种经济能够带来低通胀增长,以及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为扩大的社会福利提供资金。低增长不仅瓦解了他们对充分就业的承诺,而且也对福利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现在它不得不用日渐衰竭的税收收入来应付快速增长的需求。这表现为“收支差距不断增大”和公众家庭债务的不断增加。与高通胀相伴随的高失业(“滞胀”的到来)看起来使得用政府刺激经济需求的办法应付高失业的凯恩斯主义疗法失去了效力(见 Scharpf, 1991, pp.35—37)。

37

表 2.1 经合组织宏观经济运行状况,1960—1981年(%)

经济指标	1960—1973年	1973—1981年
失业率	3.2	5.5
通货膨胀	3.9	10.4
GNP 增长	4.9	2.4
生产率增长	3.9	1.4

资料来源:布鲁诺和萨赫斯(Bruno 和 Sachs, 1985, p.2)。

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他人)对70年代初的危机的最初反应是,它是暂时的干扰导致的,经济增长不久就会恢复。基于这种观点,一些人士认为原本正确且秩序良好的国家经济秩序受到了一种“外部冲击”或一系列冲击(特别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四倍的石油价格),使这种秩序暂时失去了平衡。最重要的是,这些冲击实质上是外来的(来自制度之外),它如果不是不可

再复制的(结果石油输出国组织能够而且确实第二次提高了石油价格),那么它就一定是偶然的。保尔·麦克拉肯(Paul Mckracken)撰写的1977年经合组织报告就典型地代表了这种观点。该报告总结说,70年代初期的衰退源于“一系列不正常的不幸干扰的汇集,而这种情况不可能在同一规模上重复”(OECD,1977)。

六、凯恩斯主义和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危机

当70年代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愈发明显时,这种十分乐观的观点——经济增长的“打嗝”导致了凯恩斯福利国家发展的暂时中断——逐渐被严肃的研究代替了。这些研究强调,战后解决方法中的内在矛盾是危机的真正根源。原油价格的增长四倍不过是一个促发事件而已,它暴露了在战后25年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弊病,而且这一弊病至少从60年代末期起就开始展现在有观察力的人士面前。这种见解的核心主张是,战后经济增长时期的结束并不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而是社会民主主义一致同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固有的缺陷引起的,特别是植根于那种处理基于经济的政治冲突的改良制度中。这种质疑在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和新自由主义右翼那里都可以听到。尽管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一致认为,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困难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经济问题。实际上,它们是1945年以后在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名号下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民主秩序中一直潜藏的经济和政治矛盾不断累积的产物。 38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后的解决方法代表了一系列处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度设计方

案,这种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力量和私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凯恩斯福利国家的核心是运用国家干预机制处理发达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过程。在战后的解决方法中,国家越来越负责劳资双方关系的谈判、创造投资机会、承担经济增长的机制失调方面的代价。在二战后的25年中,社会民主主义这种控制危机的形式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但是,当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越来越易受其自身长期的危机逻辑("治理危机的危机")伤害时,最终它还是无法维持下去。"补偿措施"的代价体现在,福利国家开始销蚀经济增长的动力,而经济增长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下去的惟一基础。凯恩斯福利国家的这种核心矛盾主要表现为:国家负债的财政危机、衰退的经济增长、国家政策有效性的降低,以及相应的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秩序合法性的丧失(Offe, 1984; 至于较充分的论述,见 Pierson, 1991a, pp.49—61)。

这一时期对凯恩斯福利国家的衰败更有影响和更为夸张的论述是新右翼人士的著作。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敌视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是这一立场的最老练和最坚定的代表人物,他从二战末期开始就坚持这一立场(Hayek, 1944),对战后的解决方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正是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困境才给新自由主义理论带来新的威力。这种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下述理念:自发产生的市场经济,或哈耶克所谓的"catallaxy"(普遍的市场秩序),为获得最理想的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提供了最好的手段,并为个人自由提供最可靠的保障。而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却违背了这种"自然"秩序,甚至在它们最成功的时候,也侵犯了公正原则和经济合理性。但是到了70年代,取代"普遍市场秩序"的累积后果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不仅仅是一种违

39

反道德原则的并非最理想的方案，而且对自由民主的持续完整性本身构成了威胁。新右翼经济观点的核心内容，就是坚持认为凯恩斯福利国家具有如下弊端：

1. 非经济性。它取消了必要的市场规范和激励机制，削弱了(资本)投资和(劳动力)工作的动力。

2. 非生产性。它鼓励(非生产性的)公共官僚迅速增加，迫使资本和人力资源离开(生产性的)私人经济领域。国家福利供给的垄断使公共部门的工人人为地提高工资，引起通货膨胀。

3. 无效率。国家对福利供给实行垄断，导致具有特殊利益的工会组织的形成，使服务的提供缺乏效率。那种取消了市场规范的制度倾向于为(有组织的)生产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分散的)消费者服务。

4. 无功效。尽管把许多资源用于福利国家事业，但福利国家在消除贫困和剥削方面还是成效甚微。

到了7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倾向弥漫于整个西方工业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承受着支出和干预的双重负担，看来有衰退到无法控制的可能。新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通过建立社会主义解决危机，而新右翼则希望通过消除社会民主主义秩序寻找救赎方法，并声称要重新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秩序。

七、社会民主主义死亡了吗？ 40

现在我们从90年代回头看，这些关于7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统治危机的言论大有预示世界末日的色彩。虽然实行干预的年代政治不稳定现象增多了(选举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政府的

尊敬态度变淡、抛弃两党制的倾向),但当时并没有真正出现自由民主政府垮台的威胁,人们对激进的宪法改革也是兴趣有限。的确,没有人建议通过采取激进的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措施来解决70年代的危机！但是人们广泛认为(不仅是具有必胜信念的新右翼),真正解决危机的办法是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战略,重新复兴自由资本主义。基于该种立场,终结福利国家共识、抛弃社团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充分就业的承诺,以及重新实行严格的市场秩序,都是抛弃社会民主主义"挽救"自由民主的具体步骤。显然,这对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完整性造成了巨大冲击。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以抛弃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为前提的话,则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选举复苏将会产生极为不同的反响。因而,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问题:70年代中期以来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使得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成为赘余。

八、福利国家崩溃了吗?

70年代的批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样的共识:通过福利国家和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而实行的资源再分配措施,最终将被证明是与维系可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不相容的。70年代末期,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和新保守主义右翼的实践政治家们又取得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将他们两者截然分开的主要分歧之一就是右翼对现存福利国家结构的敌意不断增强。1979年,英国第一届撒切尔政府赢得选举胜利上台,这时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像英国那样明确地与战后的管理秩序决裂。在1979年的竞选运动中,保守党是以与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枯竭遗产彻底决

裂的姿态出现的。这种决裂包括抛弃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承诺。对于福利国家,则通过把资源集中用于最需要的领域以削减成本,抑制“保姆国家”对日常市民生活的官僚主义的干预,非官方福利机构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鼓励个人通过私人领域为自己谋求福利。总之,在抛弃社会民主主义共识方面,没有别的国家能像英国这样提供了一个轮廓鲜明的试验场。[7]

毫无疑问,英国1979年大选可以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以前的15年里,工党执政长达11年,而这次大选却把保守党政府推上了权力宝座,且在整个80年代一直处于执政地位,一连赢得四次选举胜利。然而人们在评价它所代表的与民主主义共识决裂的政策时,还应持谨慎态度。首先,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秩序决裂是发生在1979年保守党上台之前。正如人们时常观察到的那样,正是1974—1979年的工党政府主持了最早的福利开支的削减,从而导致了战后尚无先例的失业率的上升。其次,1979年后撒切尔政府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经常与其政治上的华美约言保持一致。的确,当时失业人数被允许攀升到前所未闻的水平(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了300万人),一些大型公共企业和设备转归私人领域,竭力出售公共住房,对教育开支进行有限的削减。然而在第一届撒切尔政府执政时期,全部社会开支竟然大幅度增加了1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1.6%上升到24.1%,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高的失业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结果(Eurostat, 1988, p.135)。

尽管第二届撒切尔政府许诺“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做一番最根本的考察”,但实际上只是到了1987年第三届撒切尔政府上台时,对福利国家的大规模改革进程才可说是真正开始(DHSS, 1985; Kavanagh, 1990, p.217)。格兰

纳斯特(Glennerster)、帕维尔(Power)和特里沃斯(Travers)在著述中把 1988—1990 年这一阶段说成是开始了"与 1944—1948 年以来的英国社会政策最彻底的决裂",1944—1948 年是现代英国福利国家的创建时期(1991,p.389)。从 1988 年到 1990 年,政府实行了《社会保障条例》(1986 年)。这一时期还颁布了《教育改革条例》(1988 年)、《住房条例》(1988 年)和《国民保健和大众医疗条例》(1990 年),1989 年发表了白皮书《医疗法规》后,还实行了国家医疗保健的全盘改革。将这些改革付诸实施的有争议的过程目前还主导着政策局势,教育、卫生和津贴(可能是最重要的)等这些福利国家的主要项目的新变化表明,一场巨大的变革可能即将出现。但在目前,变化只是集中在制度改革(将福利服务的使用者和提供者区分开)以及如何处理仍主要由国家提供资金的服务项目方面。鉴于以往的经验,人们必然怀疑这是否就是国家的彻底撤退,或是否能使公共开支水平得到实际的削减。1991 年,距撒切尔夫人第一次选举胜利已有十多年了,社会开支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4.7%(Eurostat, 1993, p.163)。(更为广泛的讨论,见 Pierson, 1993b)

42

美国的情况也极为类似。里根政府在反对福利国家的"依赖文化"方面言辞激烈,在整个 80 年代,美国社会中最贫困和处于社会最边缘的人口的生活状况确实进一步恶化,但传统的(昂贵)社会保障计划却极难控制。尽管克林顿政府对医疗保健改革极为关注,但这只是意味着公共管理费用的增加(Katz, 1986, p.274)。在欧洲大陆,也实行了改革和削减政策,但即便在保守党执政时期,对福利国家的"冲击"也从未像在美国和英国那样强烈,所以人们应该认真看待削减支出和政策转变的可能性问题。自 1975 年以来,在整个经合组织国家,实际的政策结构和

开支情况表明,“其实福利国家得到了加强,而不是削弱了”,近年来欧共体国家的社会开支始终高居国内生产总值的25%(Alber, 1988b, p.463; Eurostat, 1993, p.163)。

总之,70年代以来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经历并不是像人们在这十年里所预期的那样悲观。当然,削减政策确实得以实行,依赖国家维持生计的人的生活条件急遽恶化,但这很少是因为“福利国家的矛盾”,而多是直接源于较低的经济增长和不景气的经济状况。这里并不存在福利政策的全盘逆转,既没有大规模社会供给的削减,也没有从福利领域向私人领域的总体转移。曼弗雷德·斯密特的看法(Manfred Schmidt)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新右翼截然不同,他认为这十年中“临时应对”是政府政策的固有形式。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Schmidt, 1983, pp.14ff)。

然而这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完整性来说可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70年代左右两翼关于“福利国家终结”的共同诊断是基于对福利国家本质的错误理解。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在福利措施使工人远离市场规则的条件下),福利国家可能是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的组成部分,但是那些归结在福利国家名号下的诸多社会政策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或超出资本主义)所有管理制度的共同特征。保守党和自由主义政府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一样,对于公共福利管理都有自己的时髦政策。正如埃斯平-安德森所揭示的那样,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变化的)并不是福利国家本身的存在(这在以市场组织为基础的社会中几乎是必然存在的),也不在于投入公共福利的资源有多少,而在于究竟要采取何种类型的福利国家管理政策(Esping - Andersen, 1990)。 43

我们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看到的是,对社会民主主义

形式的福利国家管理政策较为有利的或至少是可以忍受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福利国家保持高水平的社会开支和持续的对普遍性项目的公共投入,很可证明是和一种内部转变一致的,这种转变是从僵化的、无所不包的和以公民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期望的)福利国家转为较慷慨地提供保险类津贴,并也使贫困的和地位卑微的人的处境更加恶化(Alber, 1988a, pp.187—189; 也见 Parry, 1986, pp.155—240)。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近些年来福利国家的供给政策也更依赖于劳务市场情况的变化,更屈从于(不断变化的)经济政策。福利政策的改变(包括普遍抛弃那种将充分就业作为真正政策目标的想法)只是为了加强经济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劳务市场。每个角落都在加紧考虑控制成本问题。我们能够在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福利国家看到这种变化,也能够在所有的发达工业社会(几乎不考虑政治制度类型)看到这种变化。

一些评论家们已经领悟到按照从战后福特主义体制向新型后福特主义国际秩序转变的逻辑所发生的这些变化(见 Pierson, 1994)。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就这样认为:“福特主义促进了充分就业政策的推行和满足需求的福利权利的实现,从而奠定了劳资双方阶级妥协的基础,而新型的后福特主义则提出了这种充分就业和阶级合作所带来的严重问题”(Jessop, 1991, p. 90)。根据阿伯森(Albertsen)的观点,这些变化是更广泛的“国家干预主义结构调整”的一部分,“通过国家对总体社会需求的调控以实现充分就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正逐渐让位于“以工资水平的国际竞争为目标的节俭政策,这种政策主要对公共领域的服务阶层和工人阶级的下层不利”(Albertsen, 1988, p.349)。为了理解这一过程及其政治后果,我们需要分析凯恩斯福利国家

44

混合体的第二个因素,并考察凯恩斯主义的近期遭遇。

九、凯恩斯主义终结了吗?

对于战后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来说,凯恩斯主义制度可能要比实现福利国家更为重要。长期以来人们承认,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选民的经济条件的改善基本上是通过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实现的,而不是依赖福利国家制度。与贝弗里治(Beveridge,1944)和埃斯平-安德森(1985)的观点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充分就业(以达到税收收入最大化和利益要求最小化)这个前提,无所不包的福利国家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其他一些人,包括夏普夫(1991),也看到实现充分就业是社会民主主义事业的首要政治责任。相应地,对于社会民主主义事业来说,"凯恩斯主义的衰落"甚至比"福利国家的危机"更具危害性。

当然,有一些人(证据充分地)怀疑社会民主主义实践是否真的就是凯恩斯主义的那一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1945 年后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应较少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政策,而是由于,例如,美国和美元的领导作用、新的国际贸易秩序和战争中的新技术民用化等因素(见 Keane 和 Owens, 1986; Skidelsky, 1979)。马休斯(Matthews)在 60 年代末期指出,经济增长的"黄金岁月",英国政府实际上采取了(通货紧缩的)预算赢余政策,而且,当历时已久的战后发展开始停滞时,正是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可以发挥真正推动作用的时期,可这时却又重新提倡传统的"合理财政"说了(Matthews, 1968)。依照安德鲁·加姆伯(Andrew Gamble)的说法,"凯恩斯主义在尝试实行时却不

45

需要它，而当需要它时却又不尝试实行了”(1988, p.43)。

但不论如何，把这一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描述成为广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看起来也是有道理的(至少就其意图来说)。凯恩斯主义政策主要关注通过政府保证充分的总需求以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充分就业，而倡导充分就业是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基石，而且在整个战后时期，(各种政治面目的)政党都声称它们支持政府倡导的充分就业、“混合经济”和增加公共开支的政策(Webber, 1986, p.19; Marquand, 1988; Kavanagh, 1990)。尽管这些政策不经常都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如包括对住房的公共投资和扩大公共部门就业范围等，但它们确实包含着下面这一信念，即财政政策和公共开支应该用来促进充分就业。60年代初以后，看来调整宏观经济参数的古典的“间接”凯恩斯主义方法变得越来越没有功效，这预示着英国人马昆德所说的凯恩斯主义“调整”时期的来临，政府越来越卷入日常的(有组织的)资本和(有组织的)劳动之间的市场安排的调停问题(Marquand, 1988)。在一些欧洲国家，这种(劳资)联合制度延续已久，在制度化和组织化方面较为稳固(Schapf, 1991)。尽管这种国家、资本和劳工精英的利益可于其中谈判的联合制度的发展与加强总需求控制的原初的凯恩斯主义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仍然被“运用国家力量促进经济增长和最大程度的就业水平”的愿望所推动。

一些评论家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统治早在60年代中期就开始衰落了，联合主义制度重要性的加强就是这种衰落的症兆。的确，60年代末以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困难已较明显，到70年代中期，即便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特别典型的是英国首相吉姆·卡拉汉在1976年英国工党代表大会的讲话)看起来也抛弃

了这一信念: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凯恩斯主义都能为经济宏观管理提供一种适宜的政策。[8] 英国新工党政府于 1975 年通过谈判所签订的不幸的“社会合同”看来无法与战后处于最佳状态时的资本、劳动和国家之间的联合制度相比,它不过是想把已经受到削弱的联合交易维持下去的最后一次绝望的尝试。这种趋势在 *46* 70 年代末期继续发展着,在 1978—1979 年的“怨愤之冬”达到了顶点,于是工党被赶下执政权力宝座长达十余年之久(Deakin, 1987, pp.2—3)。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发誓要与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枯竭遗产决裂。它承诺要实现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但这要通过抛弃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和充分就业的承诺、通过采取货币主义和供给方面的改革来实现。当然,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面临着消除战后形成的共识体制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工会组织的力量,而且撒切尔体制的非永久性在十年以后要比 1981 年的最初时期显得明确得多。然而,其社会民主主义对手除了提供自己在 70 年代中期就已被迫抛弃的那种共识政治之外已是黔驴计穷,这种认识无疑加强了保守党政府的权威。

在欧洲其他国家,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不像英国这样迅速和广泛。夏普夫(1991)对英国、奥地利、德国和瑞典经验所做的比较分析表明,英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应对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方面最不成功。在瑞典,特别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能够预测到 70 年代初的经济震荡,能差不多维持充分就业。在奥地利,没有引起令人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的上升。夏普夫主要依据欧洲劳工运动的制度差异来解释上述各国的不同,特别是根据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拥有的管理能力不同进行解释。奥地利实行的“联合主义的凯恩斯主义”,与英国实行的“单纯的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相比,使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具管理

能力(1991,p.166)。但到了夏普夫所考察的时段的末期(80年代初期),瑞典和奥地利的凯恩斯主义所拥有的制度优势已经受到严重侵蚀,看起来凯恩斯主义在各个地方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Scharpf,1991,pp.238—255)。

是什么东西加剧了这种凯恩斯主义危机呢?最简单地讲,到了70年代中期,成功推行古典凯恩斯主义政策的背景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最明显的表现可能就是"滞胀"的发生。战后凯恩斯主义对需求的控制是基于以下假设,即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作用"。如果失业达到不可接受的程度,就可以通过政府增加需求的措施加以抑制,同时通货膨胀率上升幅度较小、可以被人们接受。如果通货膨胀上升到不可接受的水平,那么就可以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同时失业率略有上升。虽然这种有计划的"交替"政策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令人不快的阻碍后果,但是它确实赐予了政府一件(尽管笨钝的)控制经济活跃程度的工具。"滞胀"——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看起来终止了这种平衡运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两者在70年代中期都上扬到战后的最高水平。

导致滞胀发生的原因无疑是很复杂的。但一些评论家认为(不仅仅是新右翼人士),"滞胀"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内在弊病的外在表现。其中有两种互相强化的观点影响较大。第一,有些人坚持认为,由于政府致力于充分就业政策,这使(有组织的)工人获得很大权力,从而最终使这种政策无法维持下去。这是最常见的新右翼观点。塞缪尔·布里坦(Samuel Brittan)就这样认为:"在最后的分析中,政府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或者允许通货膨胀率无限制地上升,或者在需要的范围内抛弃充分就业,以使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集体权力得到

削弱"(Brittan, 1975, p.143)。但有一些左翼人士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二战期间凯勒基(Kalecki)认为,充分就业的制度化至少大大强化了像工会这样的阻碍力量。还有一些左翼人士认为,它导致的"充分就业资本主义"的矛盾只是表明了用社会主义的充分就业取而代之的可行性(Kalecki, 1971)。

第二种弊病潜藏于自由民主的宪法结构中,人们认为它使追求充分就业带来的难题更加严重。自由民主政府(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府与工会联系密切,政府致力于充分就业)面临着增加公共开支的巨大压力,而且缺乏严格的预算限制作为相应的规范。这就容易产生罗斯(Rose)和彼特(Peter)所说的"片面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衰退时期的赤字预算不是用经济繁荣增长时期的预算赢余来进行平衡)。通过维持(临时性)的预算赤字,政府的慷慨施与使其获得了眼前的选举胜利,却将代价推迟给将来的政府(及/或后代)。这对于经济的长期稳定来说具有累积的破坏后果。如鼓励通货膨胀,排挤私人领域的投资和使国内工业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等等。如果对政府行为(和政府开支)没有某种形式的宪法约束的话,政治家、官僚和理性的选民将会推出一种最终无法维持下去的经济政策。 *48*

也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种发展趋势表明:与其说是凯恩斯"错了",不如说是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理论极不完全。部分反映出凯恩斯本人的失察。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认为,如果凯恩斯承认充分就业会导致工人谈判力量的加强,看来他相信工会主义者无论是出于社会尊重的原因还是集体自利的原因,都会自我克制不会完全运用这种权力。看来他也相信政策制定者也将尽力做到不受群众民主压力的影响,以保证自己(如果不是在政治上,也是在财政上)以谨慎的方式行事(Skidelsky,

1979)。人们也看到其他类似的弱点削弱了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前提。依据马昆德的观点，“虽然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但是它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理论”。如果缺乏这种理论，“无论是运用其经济政策的政治涵义还是政治假设的经济涵义，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和官员都不能达成一致”(Marquand, 1988, p.58)。因而，即便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实行某种收入政策才能实现低通胀的充分就业，他们也不具备推进制度改革的意志和能力，然而只有这种改革才能使他们的政策得以维持下去。还有，政府看起来越来越对日常的宏观经济决策后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缺乏将自己的决定实施于资方或劳方的有效权力。马昆德认为，在英国，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首先是政治上的和宪法上的，即没有能够建立起足以满足20世纪末期管理需求的“发展成熟的国家”。

对于福利国家的“转变”来说，英国的经验不能被视作“典型”。如果它们能够表明一些情况的话，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凯恩斯主义规则发生逆转的“最坏的案例”。70年代，在运气较好的一些国家，特别是瑞典和奥地利，也存在着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和低通胀的困难。但正是这些欧洲国家劳工运动(不论是政府还是工会方面)的自我约束，才使它们在70年代的成功成为可能。依据夏普夫的观点，这种制度性的自我约束，49 甚至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实行的把收入从劳方向资方的再分配政策，是在有利的环境下实现充分就业的惟一途径。但即便是在这些最有利的环境中，凯恩斯主义面临的问题也不是被彻底解决了，而是被延缓下来。

十、变化的国际环境

实际上，在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困难的解释中，人们不仅从国内环境中寻找病根，而且越来越多地从凯恩斯主义的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探求原因。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破坏了各国推行凯恩斯制度的条件。各国政府、国内劳工运动和国内资本的力量——正是在它们之间达成了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协议——被现代世界经济更广泛的全球化和一些限制的取消所削弱。即便是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内困境也经常被理解为国际进程的局部表现。冒着过于简单化的危险，人们可以说凯恩斯主义及其典型的福利国家形式已经越来越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相容了。

虽然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且人们对此看法各异，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确认出某种对凯恩斯主义有显著影响的总体趋势。尽管人们把凯恩斯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国内的政治经济学，但它只有在某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战后的成功时期，这种国际秩序是围绕美国经济的主导作用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确立的。这就是克汉恩(Keohane)所说的“植入的自由主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内的国家干预主义是在完全自由的世界贸易的环境中运作的，由美国的霸主地位来保证(Keohane, 1984)。从70年代初开始，这种秩序遭到破坏，这是由于美国经济霸权的衰落、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及其汇率稳定性的丧失。与此同时，其他的经济变化也使工业和金融制度越来越独立于现有政府的权威之外。跨国公司的数量和权力都迅速增长。这些跨国公司，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从事生产和经

营，它们的运营预算经常超过个别国家的预算，其活动可以不受
50 任何民族国家的监督，而且各个民族国家还越来越得吸引这些跨国公司以获得国内投资。同时金融机构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国际信用市场也发展起来并超出了各国中央银行的控制范围(Scharpf, 1991, p.241)。随着信息技术新发展的来临，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瞬时转移。的确，当资本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做经常性的飓风般运动时，社会民主主义对"资本外逃"的传统恐惧看起来变得越来越陈旧了。"不利于本国货币的投机"已不是实施某种激进的社会主义纲领时才担忧的事情，它已经成为日常经济生活的现实。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预计国内的冲突和利益分配将越来越被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所左右，单个国家越来越失去控制权。

国际政治经济的这些变化至少产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后果：第一，它们加强了资本对劳动的讨价还价地位，而劳动跟不上资本新确立的国际流动。第二，它们瓦解了国家干预的权威和能力。这些发展无疑给那种以一国范围内的"驯服私人资本"为前提的政策带来了尖锐的问题，并可能被证明对传统的凯恩斯福利国家战略造成极度破坏。7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使得在一国范围内实行增加流通货币以恢复经济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国内的货币政策丧失了对利率的主权"时，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赤字预算控制经济的能力要承受更重的压力(Scharpf, 1991, p.245)。而在高利率的国际条件下，这种政策可能被证明是代价昂贵。凯恩斯主义曾经是各国政府在本国经济领域内所采取的主要战略，但到了 70 年代中期，甚至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也不能享有超出国际经济环境之外相对独立地实行纯粹的国内经济政策的权利。英国政府在 70 年

代中期所醒悟的、密特朗政府在1981年以后所发现的就是，"'一国实行凯恩斯主义'是不可能的"(Harrington, 1987, p. 140)。夏普夫认为，这个证据表明我们已经达到了"凯恩斯主义监护的尽头"(1991,p.238)。

十一、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被超越了吗？

51

那种对"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进行划时代超越的普遍性观点如何令人信服呢？的确，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使得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战略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大大减少了，特别是国际市场和金融机构中一些限制的取消削弱了国家干预的能力，促使所有的经济更加开放，也使国内资本，特别是国内劳工运动更加受国际竞争规则和条件的制约。[9] 在取消限制的国际经济中，那种在特定的民族国家范围内维持长期的社团主义安排(包括"社会福利工资"的制度化)的前景似乎变得更加黯淡。当然，民族国家的能力和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的潜力被削弱的情况可能被夸大了。在发展最成熟的福利国家中，国家仍然是最强大和最具支配力量的经济角色，大多数可征税活动(特别是在社团领域之外)仍然是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必须在某个地点生活、购物和工作)。与此同时，尽管福利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停顿下来，但(到目前为止)现存社会的开支(历史高水平)还没有发生彻底变化，而且，就福利国家干预还保持效力而言，我们还期望它能在更具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得以加强(见 Therborn, 1989b; Barr,1987 和 1992)。尽管民族国家的权力遭到削弱，但在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一些超国家机构也发展起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组织和东盟等等)，这

将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外进行经济协调和社会政策干预。

但是，对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来说，这些变化的累积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在新的经济秩序中，政府仍有机会干预经济和实行提供公共福利的政策，可是看起来这些干预措施必然受限于高度流动的国际资本的利益，至少也要与其保持同步。政府的社会和经济干预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期望（以充分就业和福利权利为前提的"公民"福利国家）保持一致（Offe, 1987）。正是这一点和其他事情一样决定了现代 52 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困境。变化了的政治经济，特别是对供给的重新强调，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者缺乏一个连贯的政治纲领。在他们执政的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发现自己在羞羞答答地追随自己的反对者的政策，实践着资本的利益（尽力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

在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曾经抛弃了经济社会化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目标，与凯恩斯福利国家的纲领目标联姻。但在变化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凯恩斯主义看来再不可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的政治利益。一些同情者们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和多少有些乐观地）作出如下结论，即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在具备了新纲领的情况下才能复苏（如果会复苏的话）。这种新纲领不再以控制需求和间接左右投资功能为前提（关于两种相反的观点，见 Esping－Anderson, 1985; Sharpf, 1991）。我们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对此进行讨论。

注　释

1 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声称科学社会主义优越于它的道德教化先驱的理论，但长期以来人们还是认为，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

论也充满道德诉求，其他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也同样包含着一种相当自觉的伦理要求(见 Kamenka，1969；Lukes，1985；Dennis 和 Halsey，1988；Shaw，1993)。的确，许多社会主义的批评家都坚持认为，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有关实现“社会公正”的道德理论，它甚至缺乏一种连贯的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Hayek，1982；Lomasky，1988)。

2 这个地区的经济被改造得相互间如此一致，以至一种东欧的或甚至苏联模式的集中计划经济的提法几十年来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都具有某种基本制度特征：公开宣称国家所有制优越于其他所有制形式；国营部门由等级制官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组织；通过指令性中央计划指标实现集中的生产计划；生产资料集中供应，以及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外贸的垄断(Sutela，1990，pp.59—60)。

3 也见布鲁斯 1973、1975、1980、1985、1987、1989 和 1990 年的著述；布鲁斯和拉斯基 1989 年的著作(Brus 和 Laski，1989a 和 1989b)。

4 这里是性质的简略表述。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都经由凯恩斯获得“凯恩斯的”方法，正如瑞典的经验受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影响便是证据，也不是每一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都同时得出这种方法，更不是所有社会民主主义经验的评论家都承认“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提法的有用性。关于一种重要的不同意见，见舍伯恩(Therborn)1986 年的著作。

5 关于凯恩斯主义及其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的精彩论述，见夏普夫的著作(Scharpf，1991，pp.17—37)。

6 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最明确阐述，至少在英国传统中仍然是克罗斯兰(Crosland，1964)的著作。

7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分析的那样，英国的经验不能被当作“典型”，更不能作为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先驱”。实际上，福利国家及其“瓦解”的经历在整个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是极为不同的(见 Alber，1988a 和 1988b)。

8 卡拉汉在工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最常被引用的一段是：“我们过去

认为，只要通过减少税收和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就能够度过萧条和增加就业。我极为坦率地告诉你们，这种选择不再存在了。如果它真的还要存在的话，就必须向经济躯体内注入大剂量的通货膨胀药剂，这样，更高的失业率就会随之出现。”由舍伯恩援引(1986，p.37)。

9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在历史上，经常是那些实行“开放”经济的(小)国家，其福利国家发展得最为充分。

第三章 “历史终结”时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危机

53

“意识形态”是一个模糊不清、难以捉摸的概念，同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十分宽泛和捉摸不定的探究领域。[1] 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轻易回避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自我理解和为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依据的中心主张是，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系列连贯清晰的价值和信仰。同样，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也认为，正是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危机从深层加重了社会主义的其他诸多难题（见 Fukuyama, 1989）。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及诸多往昔的社会主义支持者）都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瓦解的长期过程在东欧 1989 年巨变事件中有了一个明确的结局。依诸多评论家们看来，这种转变是社会主义思想最终普遍崩溃的戏剧性和权威性证明。

人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两种极为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理解这一所谓的崩溃过程。第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价值和信念，它们被用来证明和动员那种创建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价值如平等、共有和公平）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遗产中的积极因素。与其相反的是第二种、在今天或许还处于支配地位的那种意识形态概念，即它所反映的是一种“为权力服务的含义”（J. Thompson, 1990, p.7）。在该种意义上说，意识

54

形态是一种具有强烈贬义色彩的歪曲不实的反映，它试图掩盖那种打着“社会主义前进”的旗号而进行的权力运营和统治。从其最颓废的形式来看，这种含义上的意识形态已经没落成为一种特殊的例行程序。在这种程序中，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含义被冲淡，与其倡导者的玩世不恭态度相伴随的只是对其计划目标的漠不关心。

所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就包含以上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在许多人看来，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和思想在今天已变得毫无意义、无法实现、陈旧过时了，结果，社会主义就越来越被人们理解为第二种贬义概念上的意识形态，它不过是求助于那些已经没有人（包括它自己的代言人）相信的价值来遮掩“权力意志”的运作。当然，意识形态和“现实世界”的关系，特别是人们所设想的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特别复杂的，人们对此是争论不休。但不论如何人们广泛地认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如工人阶级人数的减少和凯恩斯主义的衰退），加剧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反之亦然，“社会主义思想”的危机也进一步削弱了极可能支持社会主义目标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

我们还是不能从社会主义的最激烈的诋毁者所提供的最坏情况出发来继续讨论问题，它们根本不能为我们提供社会主义思想在目前所处境况的准确证据。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即便是在社会主义的“黄金岁月”（不论人们将其划在何时何地），社会主义思想都遭到反对者轮番的谴责和讥讽。可是近些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到的是持续不断的攻击，有时竟会从意料不到的角落杀出一支人马。这种攻击在1989年的东欧事件中达到顶点，一些人竟然把这一事件当作是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最

后历史清算。

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从历史上看，正是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最为系统的辩护。尽管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大体处于第二位，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各种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J. Thompson, 1990）。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传统也“陷入危机泥潭”的普遍观点也颇有分量（Gouldner, 1980; Gorz, 1982; Cohen, 1983; Laclau 和 Mouffe, 1985; Mclennan, 1989; Mouzelis, 1990; Wright, 1993）。我们必须谨慎看待这种“危机”的论点。它们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所作的颇有影响的研究中，他将“马克思主义崩溃” 55 的起点定在本世纪 20 年代，但其“内部”挑战事件的出现不妨追溯到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修正主义的辩论”（Kolakowski, 1978; Bernstein, 1909; Pierson, 1986）。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编纂的起点定在 1891 年爱尔福特纲领的传播，那么此后的八年时间无疑是正统时期，但此后便是百年危机了！这并不是完全草率的看法。即便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和知识权威处于鼎盛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量不仅存在于正统理论中，也同样存在于它的异议中。的确，这种非正统观点不但没有削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力量，反而使其得到了加强。在关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地位的争论中，存在着许多明确的观点上的差异。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严肃考察，可以合理地追溯到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一些批判理论家们的著作（见 Held,

1980; Habermas, 1972)。

虽然这种历史上的长期辩论结下了累累硕果,但自从70年代初以来,马克思主义面临着特别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远远早于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剧变。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要在下文讨论),与此同时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口号下艰难跋涉的国家,早已被西方(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抛弃了,他们认为这些国家所推行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模式。[2] 对于西方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削弱主要是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前提遭到持续攻击,以及一些"后马克思主义"替代方案的出现。

简单地讲,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经典"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推论中掺杂着一系列几乎不成立的认识论假设,因而它必然会被逐渐削弱。他们提出的反建议就是,只有把这些削弱它的因素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才能拯救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有价值的东西。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3] 第一,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种被误导的信念,即"历史哲学"所提供的可能性。历史决定论——历史发展的倾向性规律是一种内在固有的秘密——和一些更为具体的企盼(持续的社会发展将为先进的社会力量带来社会主义的利益),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东西。现在看来,这种乐观主义没有丝毫根据,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是十分有害的。第二,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存在着一种从唯物主义分析的其他(和逻辑上优先的)方面"推导"出政治和意识形态现象的倾向。它以现代经验难以证明的方式特许了"阶级"和"劳动"等范畴的解释权力。第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倾向于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当作本体而不是功能。这会转

56

移人们对现存国家和民主实践中存在的那些偶然性的、历史性的和可争论的因素的注意力；并促进那种自认为是"本质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策略，例如，"打碎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第四，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力量主要集中于对整个社会范围的甚至世界范围的现象的解释，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形式都能够在这种宽泛的世界范围内得到最好的解释。不仅那些一国内大量发生的斗争几乎无法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得到说明，而且社会中存在的地区性(概念性的)辩论，有可能不具有国家范围的和以阶级为基础的那种意义，可它们仍然是争取自治斗争的战略场所。认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几乎得不到概念性的阐释，马克思主义过多注重说明社会的整体模式。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范围很广的修正主义人物，从那些仍然希望尽量保持经典方法的人(如 E. O. Wright, 1993)，到那些最后抛弃几乎所有可被描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事物的人(如 Laclau 和 Mouffe，见下文边码 59—60 页)。"后马克思主义者"对多样性和灵活性的存在也怀有不同的态度，在实践中这种多样性和灵活性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相距甚远。但不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为，如果不重新建构其阐释前提的话，马克思主义将不能够解释当代世界，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

二、劳动"中心性"的下降

一些更深层次的难题加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遭遇的认识论挑战，这些难题也是传统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的。在第一章里，我

们讨论了近些年来在社会基础和选举方面"劳动衰退"的证据(仍有争论)。现在我们考察一个相关的观点:"劳动"这一范畴,

57 两百多年来一直是左翼意识形态的特权性概念,现在则失去了中心性。这种观点有许多表现形式,它基本上是反映这一经验证据,即工人阶级既不能获得多数地位,也不能实现其"历史使命"(Gorz, 1982; Przeworski 和 Sprague, 1986)。正如一些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也许是基于一种信念:劳动这一范畴通常并不代表一种共同利益,围绕这种共同利益本可以动员集体的政治行为,或者基于一种推测: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合理兴趣(Przeworski, 1985; 见下文边码 195—205 页)。在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或至少向一种全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劳动作为"社会学中心范畴"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Offe, 1985, pp.129—150; Habermas, 1990b)。在这种条件下,新利益群体、新政治认同和新社会运动可能取代那种过去围绕有组织的劳动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运动。当"集体劳动"的标志和话语越来越不能同社会和政治主题的"生动经验"相一致时,它们可以被用来动员围绕其他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可能最重要的是围绕女权主义和生态思想开展的运动(Offe, 1985; Laclau 和 Mouffe, 1985; Dobson, 1990; Boyne 和 Rattansi, 1990)。[4]

三、后现代的挑战

近些年来,社会主义思想还遭到了后现代主义倡导者发起的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挑战。这种后现代主义究竟包含什么内容,人们现在还不很清楚。艾哈·哈森(Ihab Hassan)认为它已经

从"笨拙不堪的新语症转向废弃的旧词,从未获得过概念的尊严"。与其倡导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相一致,它具有无中心特性。即便是最清晰的论述也是散漫无序的(见 Smart, 1993)。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现代性的实证逻辑持普遍的怀疑主义态度,敌视"现实的"社会变化进程,倡导多元性、个人习语和不确定性(Hassan, 1985, p.119; Boyne 和 Rattansi, 1990; Harvey, 1989, pp.39—118)。然而,不管后现代主义本身如何"多样化",其否定社会主义思想的那种打破一切偶像的行为基调却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对此要特别关注。

社会主义,确切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看来充满着现代性的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逻辑,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强烈反对的东西。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经常将社会主义思想当作启蒙运动的产物,是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人类事物中的应用。启蒙运动宣 *58* 告了一个新世界的到来,包括一个人类世界,人类可以按照理性揭示的规律对其进行控制和改造。它宣布用科学代替神话和宗教,用理性的自主代替迷信和非理性的操纵;用进化和进步代替人类存在的轮回宿命论;期待理性和哲学按照人类现实的享乐生活的需要(的确,也只能按此需要)联姻。更为乐观的启蒙思想家"还过度奢望艺术和科学不仅提高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而且还将增强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理解,促进道德进步和制度公正,甚至整个人类的幸福"(Habermas, 1981, p.9)。启蒙运动看来送来了一个世界计划的幻象,即"通过动员技术、科学和理性的力量达到全人类的解放"(Harvey, 1989, p.41)。

正是这种关于普遍理性的统治引导着整个社会变化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是后现代主义者的怀疑主义所集中攻击的目标。的确,依据莱奥塔德(Lyotard)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可以

被简单地归结为“对元叙事的怀疑”(Lyotard, 1984, p.4)。后现代主义者拒斥现代主义和启蒙运动所声称的理性和解放之间的联系,他们提出的否定见解是,(西方工具性)理性的实际应用和解放之间的关系正是启蒙运动昭示的反面。理性和现代的元叙事并不支持自我实现;它们没有揭示,而是掩盖了权力的行使——所以“理性本身摧毁了它起初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性”(Habermas, 1987, p.110)。关于人类存在之基本结构的“深层知识”是没有用处的。如果以为这种知识有用,按照“理性支配”的结果改革和指导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压迫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实践。

看来社会主义也深深卷入了这种具有病弊的“现代工程”之中,其目标就是按照合理的社会秩序所揭示的要求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即便是它的非马克思主义变种形式,如果称不上是一种历史哲学的话,也体现着如此假设,即历史本身偏袒那种向更加善良、合理和社会主义的秩序转变。它同样也包含着启蒙思想的假设——元叙事的连贯性,“深层知识”的有用性,人类社会的可塑性——而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深恶痛绝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结果是极为可怕的。无论社会主义者实行政治干预的意图是多么善良,他们根据世界理性的规则改造社会的目的经常导致极权主义的出现。社会主义者对现代性的假设应用得越是积极和彻底,后果就将被证明是越具压迫性和令人反感。

显然,在政治右翼那里对这种理性应用的批判由来已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苛责,现代的典型代表是哈耶克的著作)。一些左翼批评家认为后现代主义不过是提供了“轻松愉快地享受晚期资本主义乐趣的理论基础”(Burke, 1910;

59

Hayek, 1982; Callinicos, 1990, p.114)。其他左翼人士认为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种更有希望的发展前景。他们欢迎与极权的和同质性的"幻想"决裂,并认为正是这种幻觉统治着传统左翼。他们欢迎后现代主义的非限制性、多元性和为"其他选择"提供空间的做法,认为这是尊重现代解放斗争的多元化,是与阶级话语特权截然相反的。他们认为不是要进行"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的成功遥遥无期。他们提倡开展一系列地区性的解放斗争,如争取种族和性别认同或刑罚改革等等,这样才会取得真正的进步(见 Boyne 和 Rattansi, 1990)。

将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左翼面孔"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敏感进行联姻的最持久、最雄心勃勃的尝试,可能要数拉克洛和穆斐(Laclau 和 Mouffe)的著作《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了(1985; 也见 Laclau, 1990; Mouffe, 1992)。拉克洛和穆斐是坚决明确地在话语分析的领域讨论问题的。虽然他们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右翼倾向,但也十分明确地反对左翼的传统观点。他们认为

> 现在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它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本体论中心性之上,建立在革命的作用之上,运用字母"r"(革命的意思。——译者)…… 建立在一种极为统一、同质的集体意志的虚幻前景之上。这将使政治的机会变得毫无意义。(Laclau 和 Mouffe, 1985, p.2)

他们修订了新葛兰西(neo-Gramscian)领导权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否定带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色彩的主张,特别是生产进步的特权性诠释地位和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作用。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经济斗争和政 *60*

治斗争之间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一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新型"社会运动得以有效推进,工人运动或其他运动是否具有"进步的"性质,"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支配自己与其他斗争和要求的结合"(Laclau 和 Mouffe, 1985, p.87)。他们剥夺了经济和工人阶级的特权,对各种形式的"本质主义"("阶级主义"、"国家主义"、"阶段主义"、"经济主义"和"革命行为的基本特征")猛烈抨击,这促使他们对当代左翼的政治抱负进行激进的改造。在这种散漫的气氛中,"左翼的任务 …… 不是抛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而是相反,在激进和多元民主的方向上使其得以加深和拓展"(1985,pp.176—177;原书印成斜体字)。这样,社会主义政治就被改造成为一种实现各种形式的解放的无限制的、多方面的民主进程。社会主义在一种不仅无限制的而且没有终点的过程中越来越变得民主(1985, pp.176—193)。

四、捍卫马克思主义

在本书第一章里,我们曾评论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消失"的问题,我们发现,虽然存在着许多实际深刻的变化,但尚未出现一些激进人士所说的那种大规模的转变。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的争论也是一样激烈。下面我们列举四种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点。第一,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描绘了一幅极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漫画,以作为他们攻击的靶子。例如,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就谴责广大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诽谤"和随便的贬低,认为这些谬言就连最平庸的马克思主义辩护者也不会认可。只有通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感知力、适应性和一系列理论分析,如用极为荒

唐的机械主义方法来解释"决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得以维持下去(Geras, 1990)。第二,后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进行攻击的基础也受到了人们的公开指责。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必然性上,都是一种决定主义,但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理论问题值得怀疑的理性主义解释"(McLennan, 1989, pp. 153—154)。第三,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上后马克思主义也遭到了批判。一些人坚持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解放斗争多元化的强调而提倡的阶级政治非中心性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他们坚持认为对解放斗争多元性的认可并不与对阶级政治首要性的一贯强调相矛盾(Geras, 1990; Wood, 1986)。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候抛弃阶级政治,就等于在极为需要的时刻抛弃了回应新保守主义攻击的最有效的武器。另一些人认为,不管当前理论环境中的创新气氛是多么浓厚,后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重复着前一代反马克思主义作家的批评观点,例如最为明显的是卡尔·波普的观点(McLennan, 1989, p. 203; Popper, 1961 和 1962)。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援助各种形式的古典多元主义思想,而这些思想就连其最著名的倡导者现在也弃置不用了。[5] 最后,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也来支持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立场,批评家们认为,这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基础观点不一致。即便是那些最彻底地脱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如拉克洛和穆斐,也坚持认为,"当然,每一种激进的民主纲领都暗含着一种社会主义维度"(Laclau 和 Mouffe, 1985, p. 178)。但是为什么会如此认定,从他们的理论方法中得不出清晰的答案。拉克洛在他最新的著作中明确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偏好某一种未来而不是别的选择?"他认为,"如果这个问题

61

是要求笛卡儿的那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先于任何信念而存在),那么它就可能没有答案。但是如果必须作出选择的主体已经具有了某种确定的信念和价值,那么选择的标准 …… 也就可以表述出来了"。他评论道,"这种对我们信念中某一层面的确凿性的认同不过是对我们的偶然性和史实性的认同而已"(Laclau, 1990, p.83)。对于那些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应该支持社会主义纲领"的人来说,这种听起来近乎韦伯主义式的回答是否让人满意,我们还不清楚。

五、捍卫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批评观点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应,其中最为系统的反驳意见可能要数哈贝马斯(Habermas)的辩护性著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哈贝马斯的目的是要表明,对现代性的批判(从尼采到福柯)是错误的。他承认,现代性方案在实践中确实被扭曲了,但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者指出的弱点和扭曲并不是现代性方案本身所固有的。他们得出的那种苛刻结论——应该抛弃现代性方案——则是其批评论据难以证明是正确的。的确,哈贝马斯认为,即便是对现代性最严厉的斥责本身也没有超出它们试图反对的理性话语或"意识哲学"的范围。例如,在对德里达(Dridda)的评价中,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他"承继了形而上学批判的弱点,而这并未动摇第一哲学的含义"。对于福柯(Foucault),哈贝马斯坚持认为他的方法"未能超出主体哲学的范围,因为他提出的权力概念也为相反的语义因素提供了一个共同标准,这个权力概念是从整套主体哲学中抽取出来的"(Habermas, 1987, pp.181,274)。

62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意见中，哈贝马斯所赞同的一点是，“意识哲学的范式已经过时了”(1987, p.296)。但是他完全反对这种看法得出的结论。哈贝马斯认为，对这个困难的认识与现代性哲学话语本身一样历史久远，这个认识可以通过现代性哲学的重建来应和，这个认识也是基于矫正其发展历程中在战略点上的“错误转弯”而实现的。实质上，这意味着“用在合作规范下形成的交际社会中的自由认同模式”代替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模式(1987, p.295)。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将某种个别形式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的局限当作全部形式的理性的局限了。哈贝马斯的主张是，重新确立现代性倡导者提出的传统的但却是带有缺陷的观点，这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净化这个传统与(过时的)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之间的联系，通过诉诸主体间的理性或交际理性来补救这个传统。

六、“‘后……’意味着资本主义永恒”吗？[6]

我们在这里并不希望确切地解决围绕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诸多神秘的(有时是故作神秘的)辩论问题，但我们可以从辩论的术语和内容中获得一些较为深刻的认识。的确，在如此基本的层次上开展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广泛地讲是关于理性的现代应用)的辩论，本身就表明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愿望(和保证)普遍失去了信心。对阶级和生产领域的政治作 63 出如此广泛的质疑，也表明人们对劳动和工人政治的未来方向难以确定。使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此复杂棘手，(又一次)突出地表明了这两“大”现代工程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

紧张状态。

这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展开的辩论也体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终极衰退。首先，我们应该强调把意识形态置于适当的位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具有如此魅力，这是非常自然的，但是这种魅力从来就没有像那种证明其崩溃的力量那样强大持久。至少在西方，对"新耶路撒冷"的偶尔祷求被世俗事物所吞没，有时是被一些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为取得短期或中期利益而暗中进行的肮脏交易所吞噬。所以，社会主义政治远不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现。其次，"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观点确实值得人们高度重视，这大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翼间，特别是在60年代中期以后的"复兴"阶段享有较高的理论权威。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西方左翼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弱点的承认由来已久，如果把这些弱点首先归于认识论方面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也不能用来说明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衰败命运。马克思主义曾赋予社会主义的那种特殊历史地位的丧失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前途岌岌可危的证明，这也不是十分明确的。尽管一些人因为自己发现了历史的天平没有偏向社会主义这边（当然也没有偏向其他任何一边）而感到恐慌，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即便社会主义在伦理和道德的阵地上也可能要争取或捍卫，似乎也不是那样地令人不安。的确，在知识分子圈外，只有经常立足于道德基础之上，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承诺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履行。至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根本无法得到保证的说法，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社会主义目标的价值的信息，而且这与证明它无法实现是不同的。甚至社会主义思想是否（至少像在西方的实践

那样)就是如此不受欢迎,人们也是无法断定的。民主的民众有很好的理由嘲讽那种认为带他们进入希望之乡眼前吃点苦完全必要的政治家(左翼的或右翼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民众一直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如普遍的医疗保健,体面的居民住宅,等等)抱有同情,即便是在一些刚刚脱离了共产主义监护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Talor - Cooby, 1989; Smith, 1989; Swain, 1992)。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民众全盘撤回自己对社会主义思想(至少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来说)的支持,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践行这一思想的能力却日渐怀疑。最后,那种消极的、全盘否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越是彻头彻尾,其倡导者就越是难以找到自己的政治防御阵地。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确实缺乏一种政治语用学的话,那么就确实有理由相信丹尼尔·辛格的如下怀疑了,那就是,在实践上,"后……"(post - everything)就是意味着"资本主义永恒"。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对待所有元叙事的怀疑主义",而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政治性问题。如果真的要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社会主义者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具有提出建议的资格。当然,这要远远低于将"历史的必然规律"实践到底的程度,但它也决不限于新"意识形态终结"的设计者们所能允许的那个范围。 64

七、1989年的巨变和社会主义的崩溃

如果说上述一些理由在以前还曾经被考虑过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则普遍认为,它们已经被1989年巨变所导致的大规模社会转变席卷一空了。无论是锐气大伤的左翼还是得意洋洋的右翼,他们几乎怀有一种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社会主义者来说

"游戏结束了"。对那些倾注半生或更多的时间谴责东欧政权的左翼人士来说，令人遗憾的也许不是苏维埃帝国的崩溃[虽然谁都料想在左翼中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怀着羞涩而缠绵爱慕之情的不单是格里·科亨(1992)]，而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外的道路抉择。这种抉择不是循沿"第三条道路"，而是恢复资本主义，同时还伴随着这样的看法，即"社会主义已经不能再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替代方案了"(Lukes, 1990, pp.573—574)。如果把目光转向这场事件的大体结局，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死亡"的看法。对于东方持续变化过程之可能后果的诸多评论和推测，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尽管有些证据表明 1989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并不是像那些自由先驱们所期望的那样)。我对事件发展过程本身的兴趣远远低于我对这些事件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社会主义者需要于其中采取行动的现实环境的变化。例如，在欧盟的东部边缘出现了一片相对不发达的新型市场化经济区域、局部裁军过程、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最重要的是德国的统一，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社会主义力量及其他力量开展活动的战略环境。但我在这里将很少顾及这些战略上的变化，我主要关注的是东方的转变对西方社会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所产生的"示范效应"。

65

一种显然是极少数人的观点这样认为，不管东欧的转变蕴含着什么内容，它们不能被理解为是社会主义的倒退。艾莱克斯·凯林克思(Alex Callinicos)在其较为激烈的论述中这样认为：

东方集团(指苏东国家。——译者)在分崩离析的过程中死

亡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这些东西连社会主义的蜕变和扭曲形式都算不上，死亡的东西正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即斯大林主义)。(1991,p.2)

因为东欧社会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在半个世纪的官僚专制统治结束以后，联合生产者经济自治的幽灵(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工具)完好无损地存留下来。这种看来其内在逻辑一贯的见解，是要求我们接受那种现在很少有人认为可行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也要求我们支持一种我认为对我们的分析不利的判断，即东欧社会和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在关于"社会主义究竟意指什么"的辩论中，我们就被抛进了争论的中心。的确，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即普通劳动大众深受压制、工人显然不能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没有理由被描述成社会主义。虽然这种反对意见具有合理内容，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将那种大部分经济资源非正式私人所有的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话，(不论在其他方面看来其制度和实践是怎样地"非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能作出较清楚的分析和判断。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讲，我认为最好还是把东欧和苏联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在此范围内，特别是将那种恢复财产私有制和资本市场的要求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话，也最好将1989年的巨变当作是反社会主义的。这样，1989年事件就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全盘抛弃。然而，如果我们确实把苏东社会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就应该指出一点，即：几乎没有哪个西方社会主义者会渴望或者甚至捍卫这些国家(指苏东国家。——译者)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方案，也许在极为严格的限定条件下这才有可能。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 *66*

义者来说,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种极为有限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逆转是令人痛苦和困惑不安的。

但是1989年经验中的另外一些因素对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性来说却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例如在东欧,倡导共产主义内部改革的传统(即使主要是理论方面的)由来已久,这种改革意在将那种苏联监护之下的专制压迫统治改造成为人道民主的自治社会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改革”的议程在奥塔·锡克的名著《第三条道路》(1976)中经常提倡。这种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渐进内部改革过程也在1989年巨变中遭到了致命的一击。改革日程被狂热的反共情绪和对西方社会制度(多党议会民主、市场和富有)的渴望所吞没。1989年事件发生后,许多改革进程的著名倡导者一变而成为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见 Brus, 1990; Kornai, 1990b)。如果需要的话,1989年的转变还进一步证明世界经济的全球联系(以及信息媒体和通信的全球化)。它向西方社会主义者提供证据(也许是不受欢迎的证据)证明:将民族经济或地区经济与全球(市场)经济的支配作用隔绝开来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方的转变是“一国社会主义”不可行的决定性证据。

至少从短期来看,1989年巨变也助长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政治反对派的声势。到80年代末,狂热的新保守主义政府(美国和英国)经过十年时间的经济治理,到头来最好地讲也是绩效平平。在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科尔总理的声望也降到历史最低点。在国内压力重重的情况下,东欧的转变可被右翼政府看作是自由民主的胜利和西方降服极权恶魔的明证。东欧巨变的领导人得到了西方右翼政党的青睐。刚刚释放出来的市场激情、旧共产主义秩序的僵化无能、前共产主义各国不同程度的经济

67

困难，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保守人士声称“整个世界”都在向新自由主义转变。尽管其影响还不可估测，但新保守主义右翼却在寻找每一个机会重复下面的断言：“社会主义正在全球范围内退却”。7

八、“社会主义不可思议的死亡”：三种观点

当然，关于1989年巨变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还存在着一种预示末日般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1989年东欧的转变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消逝的标志，而且它也让我们相信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工程已化为历史的尘烟消散一空。实际上，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事件发生前所描绘的“历史终结”的图式极为夸张地铺叙了这种论调。福山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相当令人怀疑地来粉妆矫饰，认为20世纪80年代人们亲眼见证了“西方确切无疑的胜利”和“西方自由主义的各种替代方案的彻底失效”。这不仅是一场划时代的胜利，而且臻于“历史的终点，也就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终管理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在西方的现实生活中，作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向往之所，我们生活在最好的社会里，这里是“政治领域的自由民主生活和与经济领域轻松享用录像机和录音机的生活的有机结合”(Fukuyama, 1989, pp.3,4,8)。显然，人们对福山言词的广泛引用重于对其进行理解。有人认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Fukuyama,1992)中装扮精巧的论调，却对自由民主的最后胜利没有更多的把握(见 McCarney, 1993)。然而，正是福山的这种极为简单化的论调在1989—1990年声誉鹊起，成为皇皇宏论，但它对被人们广泛承认为复杂的世界历史

事件的解释却苍白无力。

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的文章《欧洲革命的反思》看起来较为严肃谨慎一些,尽管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预测也具有浓厚的预示末日的色彩(1990)。鉴于达伦道夫将自己的文章说成是"对波普(Popper)的说教"和文章盛赞"开放社会"的成就,因而他将福山自诩的黑格尔历史主义视为"对严肃辩论的讽刺"(p.35),看起来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在描述1989年巨变对东西方社会主义前途的影响方面,达伦道夫仍是诅咒满腹。他毫不犹豫地坚持认为,"结果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死亡,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变种都不可能在从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双重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世界上复活"(p.38)。他认为下述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即苏联通过革命、东欧通过武力强迫而确立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现象",这种现象看起来许诺了一条"摆脱独裁统治和前工业贫穷的快捷而无痛苦的道路",而它正是在这方面彻底失败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得到的是"独裁和灾难"以及"无效率和压迫的结合,所有这些最终启动了我们近些年来所看到的那种自我瓦解进程"(pp.44,46)。

68

>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现象,而且在最初发展阶段过后人们也不会支持社会主义。它迟早会让位于一种更加开放、有效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政治也可能卷入。社会主义实际上无法维持下去 …… 在这种意义上说(颠倒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p.46)

如果说共产主义是其自身失败的牺牲品的话,那么依达伦道夫

看来,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则是其自身成功的牺牲品。社会民主主义努力调整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坏方面,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自己成为多余。由于它改善了工人们的生活条件,所以工人阶级人数减少,工人们越来越渴望个人自由流动,而不是集体前进。因为福利国家为全体民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健和福利条件,所以对于那些现在渴望更好的选择、独立和自主的人们来说,国家和官僚机器已成为重负。达伦道夫承认,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融入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中,而不是经常被直接拒斥。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和事业,其能量已大量消耗。

最后,达伦道夫反对下面这种理念,即:东西方的未来可以围绕"第三条道路"的追求被重新设计,建立一种把"资本主义的最好方面"和"社会主义的最好方面"结合起来的社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达伦道夫的反对反映了他对"制度"逻辑的敌意。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他反对哈耶克),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开放社会"的真实追求。他还提出一个更为尖锐和现实的观点,大意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不幸经历中能够学得或借鉴的东西少得可怜(pp.53—57)。总之,达伦道夫的结论直截了当:"共产主义崩溃了;社会民主主义元气耗尽"(p.71)。 69

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著名的人种史专家狄莫西·加顿·艾锡(Timothy Garton Ash)对1989年巨变所作的政治性评判,他撰写的关于革命事件的小品文非常精彩,对西方读者的认识产生了极大的(可能非同寻常的)影响。依照加顿·艾锡的说法,1989年巨变重新肯定了"我们已经拥有了的那些东西的价值:古老的真理和经受检验的模式,自由民主的三大要素,以及作为惟一存

在的现实欧洲共同家园的欧共体"(Garton Ash, 1990, p.156)。他总结说:"那种其时机已来临的思想是古老的、为人熟知的、经过了很好检验的思想。(时机已过的是新思想)"(1990:154)。在东欧正在崛起的新秩序中,如果存在着一种为所有政党所接受的"启示"的话,它就是:

> 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只存在民主。而就民主而言,它们意味的就是在现代西欧、北欧和南欧正在实践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它们齐声说:不存在"社会主义法制",只存在法制。而对于法制而言,它们意味的就是由以宪法为后盾的司法独立所保障的法制。它们齐声说(对于左翼而言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声音):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只存在经济。至于经济,它意味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的市场经济……总体方向确定无疑,目标是走向这样一种经济:增长的引擎就是市场,而生产、分配和交换工具则实行广泛的私人所有制。(1990,151)

九、社会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

上述三种对东欧巨变的评论在内容(和可信性)上差异很大,但是它们存在着一个几乎是一致的判断,即1989年引人注目的事件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东西方的最后解体。虽然达伦道夫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融入现代西方社会而不是经常遭到攻击,但他们都确信,从历史上看,现存的自由民主比任何一种存在的或现实想象中的社会主义形式都优越。尽管在遥远的边缘地区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力量在苟延残喘,但毫无疑问的是,社会主义不论是

作为一种理论还是作为一种实践，都确切无疑地死去了。

这一结论能否被证明是正确的呢？当然，人们有理由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因素不再合理了，"社会主义"这一术语遭到了严重歪曲，以至它的分析价值和政治价值现在大大降低了（见 Kaldor, 1991, pp.41—42）。然而，由此并不能得出这一结论：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着人类道德和政治发展的最大成就。至于那种关于所有认同社会主义的历史力量现在都已枯竭的说法，也是没有道理的。就上述三种评论正是包含着如此不准确的判断来讲，特别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1989 年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有些被夸大其词了。 *70*

这样，如果我们想谈一谈"东西方社会主义危机"的话，我们就得弄清楚是社会主义的什么东西已经死亡了，什么东西构成了它的"危机"，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虽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像政治右翼人士那样去急于谴责苏联及其所有行为，但是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左翼这里，几乎没有人认为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是适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即使是一种最畸形的形式。的确，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的分裂，可以较为确切地追溯到对十月革命的地位和革命后社会的性质的认识分歧上。而且，即便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传统（关于这方面的经典争论，见考茨基的著作，1920，1964；列宁的著作，1960；也可参见皮尔森著作中的评论，Pierson, 1986）。与"共产主义改革"战略相伴随的，在左派这边还存在着一种观点，即：在一种具有历史可行性的、较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形式出现之前，东欧和苏联本来应该经过一段"复辟的"资本主义阶段。在这种环境下，把苏联模式和西方的（社

会主义)模式都说成是"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形式,就可能会在二者之间划上一个颇令人误解的等号。苏联模式已经崩溃了,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独特的西方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体制上和选举上的挑战也是极为严峻的,但是认为社会主义的传统制度濒临灭亡,认为社会主义政党不再具有"候选资格",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这些观点(见 Pierson, 1991a; Esping-Andersen, 1985; Flora, 1987)。的确,就是在东欧本身,距 1989 年事件发生刚刚五年后,在一些全国大选中,前共产党的选票数高居榜首(在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见《选举研究》)。

对 1989 年事件的各种评论观点尽管不是那么完全一致,但是它们都倾向于将社会主义的衰退和自由民主力量相比,而很少将其与仍然十分健壮的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比较。因为,虽然西方社会主义的经济还可以被合理地描述为资本主义的,但是它绝对不是那种向东方如此广泛兜售的哈耶克模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正如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1990, p.7)所说的那样:"至于斯密的自由市场 …… 我们西方不存在,也不容许它存在,它也存在不下去 …… 对于东欧来说,纯粹而严格的资本主义并不比在我们这里多受欢迎"。如果 1989 年突出的不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比较,而是东方的社会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之间的比较,那么人们就必须得承认一点,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压力下,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经受到重塑和改造,并作出了妥协。不管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政党和/或政策在某些地区如何占据优势,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在社会结构中仍然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实践中,西方宪法舞台上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几乎一直参与一种同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妥协的政治(不管其长远利益眼光有多

71

远)。"极左翼"人士也经常以此为理由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谴责。然而,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人承认社会民主主义人士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话(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关于(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比较是无法成立的,因为从部分实质内容上看,现实存在的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产物。

这种见解同样可以用来评价狄莫西·加顿·艾锡在1989年事件中悟出的启示。他认为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只存在民主;不存在"社会主义法制",只存在法制;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只存在经济。这种看法也许是正确的,但显然加顿·艾锡的理解远不止于这些。实际上他的真正理解是,不存在社会主义民主,只有我们西方现实存在的自由民主;不存在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只有我们西方现实存在的自由合法性;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只有我们西方现实存在的自由经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别是"社会主义者"对这些思想和制度(人们只能在它们现存的自由的公式化阐述中找到它们)的诉求是不真实的。仅举一个例子,很可能被人接受的一种观点是,在不存在诸如"社会主义经济"这类东西时,人们也可以支持"可以存在和应当存在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判断。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正是亚历克·诺夫颇有影响的著作《可行社会主义的经济》中的核心观点(1991)。同样,对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热望吹毛求疵,并不一定就能够使人们接受这一观点,即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践行民主承诺的最好途径。

这种讨论使我们最后转向"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问题。 72
"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制度的替代物,人们现在并不是很清楚的。一些人认为,它所代表的既是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也是对

社会主义的替代。另一些人认为,它所代表的既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替代也是对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替代。我曾经说过,作为走出东欧专制政权死胡同的"共产主义改革"路线的那种"第三条道路"已经失败了。我也曾经指出过,从前那些热衷倡导以这种"第三条道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内部改革的一种方法的人们,在新的环境下看来是热衷于拥抱传统形式的资本主义市场了。但我在这里更为关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是否由于东欧社会主义的消失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面临的困境,对现存自由民主进行替代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存在了呢?

上述提法大体上讲是很难成立的。如果任何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都不再存在的话,我们也就不能再设想提高西方民主和经济可信度的途径了,也不能再考虑去动员实现这种变革目标的社会力量了。这个世纪人们亲历和目睹了以"整体化"社会工程竞争的名义所从事的种族灭绝的极端行为,就是在这个世纪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据说自由资本主义的一笔最大财富就是为人类提供了低风险、"害处最少"的未来前景。但是,这种判断是否正确,部分取决于人们从哪个方面看问题以及人们期待的是什么。也许只是由于社会主义所遭遇的极大困难,才使我们的注意力从资本主义一直面临的那些问题上转移开。毕竟,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是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的基础之上的,西方在战后25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着这种增长和繁荣。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经济增长迟缓,大规模失业现象长期存在,公共服务贫乏低下,还存在着积重难返长期持续的环境问题。到20世纪末期,使全球资本主义变得不具吸引力和不具合理性的那些问题仍旧存在(当然,由于排除了作为替代的苏联的弱点,便使这些问题突出了)。

生态问题的重要性为加强集体控制全球资源的利用提供了新的和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同时，那些极其敌视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和处于新自由主义复兴前哨阵地的经济，在过去的十年里是否取得了最大成功，现在也难以断定（见 Scharpf, 1991）。虽然以凯恩斯福利国家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可能正在消失，但新型跨国机构（包括欧盟机构）的发展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新的立足领域，其制度和实践活动都已准备就绪。 73

十、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

我们现在有责任对“社会主义死亡”这一结论作出有根据的判断，尽管这种判断在目前仍多少具有暂时性。我认为有一点很清楚的是，不论由于何种原因（过度关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苏联的经历，易于将混乱不堪的现在和理想化的过去作比较，等等），社会主义已经死亡的结论有些言过其实。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那样，社会主义力量的社会基础确实遭到了侵蚀，但情况绝对不像一些批评家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也肯定没有达到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永远排除出政府的那种地步。同样，虽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断言（特别是宣称能够指导社会和政治变化进程）也大受削弱，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倡导的许多东西（如充分就业和福利的公共保障）是否都变得不得人心，现在也很难肯定。民众看法转变的关键之处在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力量以人们可接受的方式和可以承受的社会代价来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而不是对这些目标有反感。

这使我们转向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到侵蚀这个问

题。我认为就是在这一领域，社会主义才面临着最大的困难。关于传统形式的计划经济（及其衍生物），我同意尼格尔·斯维恩（Nigel Swain）所作的极为感伤的结论：中央计划经济"看来并不是本质上就不可行，它与'社会主义工程'中的许多经济类型十分吻合，但它现在无法（也不能）发挥作用了"（Swain，1992，p. 53）。也许将来有一天，一种民主的完全计划经济形式会被人们冒险尝试，我们不能预先排除这种可能性（虽然新自由主义认为：因为这种计划经济源于认识论错误而不是制度问题，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将其拒之门外）（见 Lavoie，1986）。然而我认为，尽管我们仍然坚持要提高经济干预的程度，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抛弃那种把计划作为中心指导力量的经济模式。[8] 尽管目前确实存在着本书第二章所概括的那些困难，但我认为不需要如此全面地抛弃（被普遍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东西）。在实践中，那些新执政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力量为了实现其选民的利益，在短期内除了利用凯恩斯模式外也是别无选择。至少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他们在能够对其天然的支持者有利的范围内一直参与管理资本主义的那种微妙的、不太光彩的事务。即便是在目前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左翼人士仍然认为，对于难以驾驭的全球资本主义造成的后果，由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进行管理要比由新保守主义政治力量来管理好得多。正如夏普夫（Scharpf，1991，p.274—275）指出的那样，在全球资本主义占尽优势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者及其工会伙伴在进行财富再分配时，不得不作出有利于资本的政策，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太多的抉择。但是我们相信，在新保守主义掌权的情况下，再分配会更加不公平，会对社会民主主义的长远利益和制度的完整性造成更大的损害。

74

从长期来看，显然我们要更为根本地重新考虑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可能性问题。虽然我们不应低估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取得的成就，但即便我们现在还能重建战后那种政治力量平衡的有利环境，“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也不能成为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战略了。而且，如果人们还有理由继续倡导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的话，或至少还存在替代资本主义政权现存形式的方案的话，那只能是承认，传统社会主义信仰中的一些因素确实是已经过时了。这些因素包括：认为社会主义是作为弥赛亚的城市工人阶级的特殊历史工程，或认为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可以让位于计划经济的精密组织。的确，任何政治支持者如果想利用那些对传统社会主义来说仍然是很关键的因素的话，那么他们必然会遇到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理论问题：(1)经济无效率；(2)中央计划的失败；(3)缺乏经济民主；(4)国家行为的控制；(5)经济干预的无效，以及(6)单一“好社会”的幻想。总之，我认为目前需要重新开展对一个古典话题的讨论，这个话题由于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而被搁置一边了，它就是：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和形式。

在迎接这种挑战的最为持续有力的各种理论尝试中，有一种便是目前为西方及在西方倡导的新型市场社会主义。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极端非传统的市场经济观点及其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能力。它提出要相应减少计划的作用(及对计划的信赖)和国家干预的范围，并对提高诸如平等、公平和共有等传统社会主义价值的条件作了极具特色的说明。但与此同时，市场社会主义者(针对凯恩斯主义的实践)倡导恢复那种非常传统的社会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制原则。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内容作出详细考察，对于我们了 75

解在现代环境下修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帮助极大。正因为这一点，我在本书的其余章节要着重考察市场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模式。

注　释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较为清晰详细的论述，见J.汤普森的著作(1990)。

2 当然，关于这些社会为什么不能被称为社会主义，也存在着一系列相互争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如见 Callinicos，1991)。

3 更为充分的论述，见皮尔森的著作(Pierson，1986，pp.133—152)。

4 当然，这些同样的社会主体也可以对其他形式的“政治认同”有用(如种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这些政治认同在左翼人士看来不是那么温良。

5 例如考察一下罗伯特·达尔和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的思想轨迹(Dahl 和 Lindblom，1953；Dahl，1985；Lindblom，1977 和 1982)。

6 这句引言来自丹尼尔·辛格的著作(Daniel Singer，1988，p.219)。

7 西方关于 1989 年巨变及其影响的诸多理论评述中较有趣的有：Heilbroner(1989)，Prins(1990)，Furet(1990)，Habermas(1990b)，Blackburn(1991)，Kumar(1992)，Therborn(1992)，Held(1993)。

8 在本书第四和第五章，我们还要讨论计划问题。

第 二 部 分

市场社会主义方案



第四章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如果说第一部分提供的事实可能说明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失去力量,但不论如何这些事实却表明:社会主义目标与价值的重新确立如今必须要在和 20 年或 30 年前的情况迥然不同(也更为困难)的环境中进行。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任何一种成功的未来社会主义政治可能必须要建立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制度基础之上。对这些变化了的环境的认同,已经对许多西欧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发起持续不断的"纲领性更新"进程大有帮助,同时也有益于一些社会和政治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的再思考"。[1] 鉴于大多数人对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所怀有的深刻的幻灭感,以及面对国际经济环境的迅速变化,许多政党和理论家已经被驱使去满怀热情地拥抱市场。对于多数政党来说,转向市场完全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选民基础而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对于一些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特别是那些关注基本理论而不是热衷于选票的人来说,转变关注的对象看来重要得多。的确,有一些人正试图"盗来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为市场制度作出一种"原则性的"而非单纯"实用性的"辩护,并且谋求"抓住"市场来为复兴的社会主义政治工程服务。正是基于这种信念,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可以在市场的标题下重新塑造自己的目标,同时这也为人们展示了一条走出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那种困境的道路。这也是我要在以后

的章节中进行探讨的问题。在第二部分，我要描绘一下以市场

80 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大致轮廓。在第三部分，我将分析和评价这样的模式能否为社会主义摆脱目前所处的实践和理论困境开拓出一条希望之路。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会看到，左翼和右翼政治派别传统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是相互矛盾的原则。一般来说，市场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个人经济主权密切相连的；而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以财产的社会所有制和对经济资源的有计划的共同使用为前提的。对于大多数传统主义者来说，市场产生的地方就是社会主义终止的地方。这毫无疑问是对计划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占支配地位的理解，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却从来不曾这样泾渭分明。除了少数几个短命的乌托邦试验外，差不多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都有过利用市场的经历。即便是那种高度集权的指令性经济也曾在劳动和消费品方面求助于市场（尽管对市场作了严重的歪曲）。如果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还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一种把市场放在中心位置的社会主义形式。的确，德国哥德斯堡社会民主党人纲领就提出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利用市场，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利用计划”（参见 Hodge, 1993; Padgett, 1993）的口号。此外，长期以来还存在着许多生产者合作社和消费者合作社运营的经验（尽管经常处于次要地位），它们试图在市场环境中实行经济资源的某种社会所有制（见 Oakeshott, 1978; Lambert, 1963; Jones 和 Svejnar, 1982）。尽管占据主流地位的劳工运动长期以来对合作社的经验持较强的怀疑态

度，但合作社却也被描绘成"经济民主的最古老、最纯粹的形式"(Potter，1891；Lambert，1963，p.177)。

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弱小的、有时并不明显的理论传统，它十分明确地尝试要建立一种从整体上来说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例如，英国的诺埃尔·汤普森(Noel Thompson)就指出："在19世纪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一小部分可以贴上市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标记"(1988，p.158)。但是真正明晰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化则是20世纪的成果，这时已经产生了能与之相对照的现实的计划经济(及其问题)。努提(Nuti，1992)认为最早运用"市场社会主义"(Marktsozialismus)这一概念的人是1922年的爱德华·海曼(Eduard Heimann)，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是把市场社会主义的肇端追溯到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著作，以及一些与其观点类似的其他理论家的著作。 81

二、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对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文章的回应。米塞斯的文章是在苏联正在形成的年代发表的。它于1935年又被重新发表，并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竭力推崇。米塞斯在文章中否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合理经济决策的可能性(von Mises，1935；最早于1920年在德国出版)。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机制；没有价格机制，也就谈不上经济计算"。依据他的观点，"社会主义是对合理经济的反动"(1935，pp.

110—111)。兰格的具体设计在这里与我们的讨论不太重要，总之他所作回应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可以通过确定价格(和社会主义企业的制度环境)来代替市场，然后通过重复性的"试错法"程序来调整这些确定了的价格，用以反映供求的波动情况。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合理的经济计算确实是可能的。兰格指出，在米塞斯提出批判之前，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和巴龙(Erico Barone)就提出了类似的社会主义价格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法(Lange, 1938, p. 59; Barone, 1935; 也见 Lavoie, 1985; Taylor, 1929; Dickinson, 1933; Lerner, 1937 和 1944)。

尽管人们对后来所谓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评价还没有达成普遍共识，但有许多分析家都接受了亚伯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在其著名的评论中所持的见解(Bergson, 1966 和 1967; 也可参见 Leeman, 1977)。伯格森认为，从技术上讲，兰格的观点成功地回应了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不合理性的批判理论，可是市场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因素，诸如动力与革新的改进，而这些只有真实的市场才能够做到(Bergson, 1967)。在 80 年代得以复兴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中，人们对兰格模式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唐·拉沃耶(Don Lavoie)在令人信服的分析中指出，虽然兰格模式作为一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确定过程的模拟几乎"无懈可击"，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其中包括米塞斯和哈耶克，同样坚决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均衡理论，认为它是静止的和不现实的(Lavoie, 1985, p. 168; Lavoie , 1981; 也参见 Murrell, 1983; Shapiro, 1989; Keizer, 1989)。在现实实践中，市场并不只是呈现出均衡价格。的确，正是市场中的非均衡和能够从中谋利的可能性，才激发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的动力 。还有一点重要的是，市场是"不可言喻的知识的发现和

82

传递过程",而这种功能是社会主义市场不可能实现的,即便其内部不乏管理和企业家创新机制(Lavoie,1985)。

我们将在后面回过头来讨论这种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做的重要批判。然而有一点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兰格在提供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时,他主要关注的是(通过一个集权国家)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关注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分权化。他的确也提到"保持消费的自由选择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以及通过需求价格表现出来的消费者偏好是生产和资源配置的指导标准"(Lange,1938,p.72),但是他没有试图限制(一党)国家的(特别广泛的)的权力,而是努力尝试找到一种模拟市场的手段,以求达到对资本价格和产品价格的合理计算。在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最好还是把兰格模式归于"中央计划内的分权过程",而不是促进真正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模式(Nuti,1992,p.20)。

事实上,兰格模式得以在其中确立的那种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治环境,是理解此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演变过程的关键所在。许多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都是东欧的经济学家(包括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奈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并且他们主要是为了在现存的共产党统治环境中进行内部改革。总的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既关注通过运用市场提高经济效率,也关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扩展(尽管必要性不那么明显)。的确,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短暂改革政府中,奥塔·锡克既是经济改革的首要倡导者,同时又是政府的代总理。然而,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是对严格限定的改革感兴趣,他们只是希望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而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及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希望发动与经济改革相伴行的政治改革。这种政治改革的 83

缺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多地在实践中瓦解了有效经济改革的可能性。即便是在那些被认为是经济改革进行得较为“成功”(这种“成功”是极为有限的)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经济效率和增长一再因多半未曾变动的政治体制大打折扣(见Hankiss,1990; Swain,1992)。

结果,虽然许多现存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不乏技术和理论上的严谨,但当西方重新把市场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构建基础时,其适用性却是极为有限的。诸多关于通过市场取得经济效率的见解,或者关于在没有资本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如何确立企业管理的激励结构的观点,在东西方都可以同样应用。然而,这些见解和观点在东西方得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却迥然不同。当然,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正在寻求一种在某些方面比现代福利资本主义更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例如,充分运用全部可用的劳动力资源的抱负),但是它与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它不是在试图对高度集权指令性经济进行改革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再有,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力图提高民主程度;的确,他们对提高经济民主的可能性的关注胜于对已经提高了的经济效率的前景的关注,但这是在现存发展成熟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公民自由和多党制)扩展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对这种制度的创新或替代来进行的。与此同时,在东方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仅仅是与马克思遗产或甚至就在其范围内进行辩论,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面对的那些否定市场的观点不是依据马克思的超越价值规律的设想,而是依据依赖市场所产生的道德上的不良后果,不管市场供应是否短缺。最后,紧接着半途而废的改革所发生的1989年巨变,使一些东方的前市场社会主义者完全放弃了“尚在中途的”市场社会主义,而去毫无保

留地拥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突出的是亚诺什·科尔奈,见 Janos Kornai,1990b)。在西方构建起来的那些几乎未曾试验过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否最终也会按照东方的逻辑发展下去,现在还不清楚。总而言之,尽管在东欧旧秩序下产生的经验十分重要,然而西方诸多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必须建立在完全不同的观点之上。但不论如何,这确实意味着东欧以及其他地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像一些西方针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 84 极欲认为的那样无可救药。

三、市场社会主义:西方模式

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将描述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方案。近十年来,这种方案在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中间发展变化已久。我将主要介绍和分析下述代表人物的著作,他们是: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索尔·埃斯特林(Saul Estrin)、朱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戴维·米勒 (David Miller)、亚历克·诺夫(Alec Nove)、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约翰·罗默(John Roemer)、拉多斯拉夫·塞卢奇(Radoslav Seluchy)、、奥塔·锡克(Ota Sik)、莱兰·斯陶贝尔(Leland Stauber)和詹姆斯·扬克(James Yunker)。在这些人的著述中,有的提供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致轮廓,有的则构设了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和政策的典型模式。我的意图并不是详细研究上面每一个人物的观点,而是想提供一个较为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把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那些关键性的、为多数人普遍认可的观点和主张呈现出来。尽管如此,这些观点之间也有不同之处。有的认为国

家只发挥极为有限的指导作用(勒·格兰德),有的则认为国家要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诺夫)。有的把市场社会主义看作是工人合作社制度(米勒),有的则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仍然采用较为传统的经济管理方法(扬克、斯陶贝尔和罗默)。究竟要将经济领域的多大部分以及基于什么条件仍然保留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他们的观点也有很大的差别(特别参见扬克和诺夫观点的差别)。在我认为重要的地方,我将展示出这些区别,然而我的主要目的仍是力图对市场社会主义作出"最恰当的"论述。至于这种方案的优点和缺点,我将在本书第三部分加以详细评价。

四、社会主义和市场

其实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原则很容易阐明。最简单地说,市场社会主义是把经济的社会所有制原则与继续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商品(包括劳动)的做法结合起来的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是内含着私人资本之社会和经济权力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不是市场本身是人们不能接受的。他们提供了一种把市场和各种形式的资本社会所有制结合起来的替代模式。对于这些倡导者来说,市场不仅是社会主义取得更大经济效率的手段,而且也是达到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或自由的平等价值、发展民主以及提高社会公正的途径。

85

五、为什么要倡导社会主义?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或最为基本的问题恐怕是"为什么要倡导社会主义?"尽管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明确回答

这个问题(Nove,1991,pp.1—11;Plant,1989)但是"赞成社会主义"这个总原则程度不同地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可以理解。市场社会主义者(有意向的)明确的初始立场并不是要捍卫社会主义价值——除了极个别的例子之外,这是属于较为正统的立场;而是断言这些价值目标可以通过市场得以最好的挽救——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非正统观点。实际上,我们最好还是按照本书第一部分所概括的那种历史和制度环境来理解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尽管它本身不是一种"失败主义",但是它明显是一种被(经常是痛苦的)经验所指导的社会主义形式,代表了"一种容忍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缺陷的尝试,但同时仍然坚持某些核心的社会主义理念"(Miller,1989, p.9)。一些代表人物试图把市场社会主义描述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最佳方案,但它主要还是被辩护成为"可行的"、"实用的"和"妥协的"的模式(Nove,1987,1989,1991; Yunker,1988h, 1990a; Miller,1989)。确实,它最好应被理解为一种"二阶的"概念,表示如何在一种能够提供最优经济效率和高度民主的社会制度中充分实现某些既有的、为人珍爱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诸如平等、公平、自由、自主、"社会公正"、"充分就业"等等。拉多斯拉夫·塞卢奇在概述其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著作的序言中援引了凯恩斯的下面这段话:"人类的政治问题是要把三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经济效率、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塞卢奇援引凯恩斯的话,见 Selucky,1979,p.vi)。市场社会主义者竭力要实现的东西就是这种调和。

与大多数倡导社会主义的人一样,许多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建立在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形式的基础上,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下面这项极为复杂的任务,即将"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东

西”和“市场必不可少的东西”分离开来。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86 “市场绝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Seluchy，1979，p.181）。然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评论都异乎寻常地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小心谨慎。尽管他们十分喜欢抨击资本主义将市场视为己有，但在谈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所谓的市场无效率这一话题时，特别是将其与计划经济许诺的经济效率成果相比较时，他们就有些含糊其词了。例如扬克就坚持认为：“如果考虑到像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这种极高的经济效率，那么看起来很显然，我们所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应与现在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十分接近”（Yunker，1990，p.113；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也参见Sik，1976，p.24）。

对市场所持的这种暧昧态度显然与较为传统的和较为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的核心主张不相容。给市场分派设计的上述功用也与下述要求难以调和：合理的条件平等，按需求分配产品，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我们不会把别人当作实现我们自己的市场目标的手段）。为了理解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抛弃掉这么多传统社会主义的东西，我们先要弄清为什么他们会如此亲密地拥抱市场。

六、为什么要倡导市场？

我们将在第五章里看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各自支持者都把二者看作是相互矛盾的原则。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市场是异化、私人资本特权、为追求利润进行浪费性不合理生产以及剥削工人的同义语。正像塞卢奇所说的那样：“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市场的批判”（1979，p.7）。

有趣的是，我们在新自由主义者那里也看到了同样的见解，他们认为增强自由的市场组织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无法相容。考虑到这种传统观点的权威性，我们需要较为详细地分析一下把市场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论据。

七、“别　无　选　择”

市场社会主义者首要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为消极的前提是：在一个尊重多样化和经济效率的发达社会里，没有其他选择能够代替市场。某些市场形式是不尽如人意的，所有市场都应该加以干预以防止它们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参见 Bardhan 和 Roemer，1993a）。而传统社会主义者试图在“超越市场”之外的环境里解决问题，总的看来他们是非常错误的。迄今为止，这种传统观点的最权威、最系统的代表就是马克思的著作。尽管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试图把马克思对市场的态度描绘成“模棱两可的”，但显然马克思理论在实质上是认为“市场与……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互不相容”（Harrington，1989；Brus 和 Laski，1989a，pp.5—6）。所以马克思这样认为：“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恩格斯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替代”（Marx，1974，p.213；Engels，1987，p.270；也参见 Lavoie，1985，pp.28—47）。

87

有一些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立场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他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达到了物质充裕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价

值规律(的确,所有这样的经济规律都是基于配置短缺的工具和资源的需要而确立起来的)将不再发挥作用。人们经常把注意力转向苏联曾经为了实现马克思的目标而陷入的那种困境。在苏联,试图超越价值规律的意识形态激情却不时地被重新引进市场机制的需要所挫伤,为的是避免发生灾难性的经济崩溃现象(Nove, 1991,pp.12—72)。奥塔·锡克是具有代表性的东欧改革家,他坚持认为"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产品不可能直接地在全部工人间进行分配,而必须利用商品关系和货币手段间接地进行分配"(Sik,1967,p.29;Sik,1985)。

拉多斯拉夫·塞卢奇特别严肃地指出:马克思及其继承者们假设,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市场也随之废除。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塞卢奇认为,要废除市场,"就得废除它的一些先决条件:劳动的社会分工,短缺和生产者自治"(1979,P.10)。可是他坚持说,在复杂的发达社会里,劳动的社会分工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获得达到全世界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条件。这样,马克思关于通过用命令管理整个经济的办法以废除生产者自治的设想必定是有害无益的,这种设想是把整个社会分工当作单个企业内部的分工一样对待("一个国家,一个工厂"模式)。

88 塞卢奇承认,因为不受控制的市场容易导致财富积聚到少数人手里,同时将大多数人降到雇佣工人的行列,所以"作为一副社会主义的拯治药方,废除市场的设想看起来似乎就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了":

>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废除了市场,同时也就废除了平等和自由的经济基础 …… 建立在社会劳动分工和短缺基础之上的无市场的社会计划经济,将会形

成人身依附、特权和屈从等纵向人际关系…… 无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可能将资本主义市场之形式上的、有局限性的平等和自由转变成为真实的、普遍的平等和自由。如果废除了市场但不破坏它的根基，特别是劳动分工和短缺，平等和自由的社会基础也就消失了。(Seluchy，1979，p.21)

塞卢奇认为，尽管马克思本人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的邪恶使他愤懑不已，这远远超过了他对市场优点的好感"。结果，"他本来可以设想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以铲除不平等，同时保留平等和自由的一般基础。可是相反，他却决定建立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便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Seluchy，1979，p.21)。

现存的计划经济被认为是代表了这种替代方法的全部弊端，这加强了上述这种在很大程度上说是理论上的判断。埃尔斯特和穆恩(Moene)就直截了当地评论说：

资本主义——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都表明它是一种粗鄙的、非理性的、浪费的组织生产、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方法。[正是这种粗鄙]使我们把中央计划视为可能的拯治药方。然而，中央计划的非理性又迫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并将其视为相对来说也许是危害较少的方法。(Elster 和 Moene，1989b，p.1；也参见 Sik，1985，pp.193—198)

这样，市场社会主义立场的核心前提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市场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它不是处理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最好

方法，而是在当今条件下害处最少的一种组织方法。2

八、效　率

但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不只是认为市场是一种有缺陷的必要机制，他们还在许多方面发现了市场的积极品质，特别是将其与无市场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可行性相比较而言的时候，89 情况尤为如此。市场最突出的优点可能是它能够使经济效率最优化。在埃斯特林、勒·格兰德和温特(Winter)的论述中，市场提供了一种"协调分权化经济决策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们是"处理信息的最佳工具，同时也提供了根据处理结果行事的激励机制"。它们"鼓励生产工艺及商品本身的发明创新"，以及"使经济权力分散"。市场"能够激励人们按照社会的要求行动，这并不需要中央指导"，因此，"激发竞争，竞争价格是对短缺的真实反映，追求个人利益与 …… 追求社会利益和谐一致"(Le Grand 和 Estrin，1989，pp. 1，3；Elstrin 和 Winter，1989，p. 107)。约翰·罗默虽然不这样乐观，但他还是毫不含糊地说："在正常条件下(包括企业的竞争环境)实现利润最大化会带来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在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庞大的经济却可以成功运行，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先例。"级差工资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存在是令人遗憾的，但它是必要的："它是运用劳务市场配置劳动的副产品，在一个庞大复杂的经济中还没有发现别的方法比运用劳务市场配置劳动更有效率"(Roemer，1991，pp. 564，567)。

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上述立场是自相矛盾的。从传统上看，取代市场的非理性和盲目性，同时消除只是为利润而不是为

需要而生产的倾向以及周期性的资本和劳动的利用不足，代之以更为有效地(合理和有计划地)运用所有的可用资源的方法，这是社会主义巨大力量之所在。如米德(Meade)所说的那样，总的来看市场社会主义者承认“为了效率而利用市场将导致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现象的产生”(Meade，1964，第13页)，可是他们坚持认为，如果考虑到工具和资源的短缺情况，市场仍然是引导经济力量的最有效率的机制。现存的市场结果之所以令人不满意，一方面是因为这种结果(长期地但不是必要地)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外部的干预以“矫正”市场或产品的再分配。

九、自　　由

如果人们对社会主义者倡导市场是由于它具有提高效率的能力这个原因颇感惊异的话，那么对于他们关于市场能够提升自由的主张就更感奇怪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市场表面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是如何掩盖潜在的不平等 90 和不自由的事实(Marx，1973a)。实际上，给自由下定义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参见 Berlin，1969；Miller，1989，pp.23—46；Rawls，1972；Hayek，1982；Gray，1984)。但是许多讨论都是从“消极自由”(简单地说就是没有强制)和“积极自由”(最简单的意思是指有效选择的能力)的(极不明确的)区分开始的。人们同样简单地认为，自由主义者对“消极”自由感兴趣，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则非常关注“积极”自由。相反，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自由观显得复杂一些，他们反对上面简单的“二分法”。他们特别关注行使自由的能力，这种立场有可能将他们的理论同古典自由主义为资

本主义市场所作的辩护理论区分开来。因此，米勒坚决反对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明显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条件的规定过于狭窄。他指出“新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有效选择的平等”(1988, p.52)。他坚持认为“对自由的限制就是一个或多个当事方应对其承担道德责任的那些障碍”，这将导致下述观点的产生，即“诸如失业这样的经济上的缺陷的确限制了我的自由，所以最自由的秩序必须消除这些障碍”(Miller, 1989, pp.35, 45)。同样，胡佛(Hoover)和普兰特(Plant)也反对哈耶克对自由所作的限定，认为“我之所以珍爱自由，是因为它能够使我朝自己的目标迈进。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当然需要资源、权力和机会”(Hoover 和 Plant, 1989, pp.208—209)。所以自由的价值依赖于有效手段的条件，这些是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市场无法达到的。的确，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进行资源的再分配，以赋予每个人在市场交易中成为有效和自由的主体的那种能力”(Hoover 和 Plant, 1989, p.212)。

不论如何，一旦这种资源和机会的再分配能够像所要求的那样提供了自由的大体平等的价值，人们就有多种理由相信市场是个人行为自由的最好的制度保证。首先，人们看到市场能够使选择最大化，这对于消费者和出卖劳动力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不满意的顾客可以换一下光顾的地方，不满意的雇员也可以换一下雇主(尽管较为困难)。虽然不是十全十美，但这些自由与集权计划经济的情况比起来还是要好得多。在后种情况下，工人和消费者面对的是国家的(几乎是)独裁权力。按照米勒的说法，市场的这种选择自由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为表达自由提供了先决条件。再有，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以提高人们接近传播工具的机会，避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媒介控制权

91

被少数人掌握这种典型现象的发生。另外，也最好由公共机构来控制这些媒介，不管这些机构的民主程度如何。

最后，塞卢奇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他将弥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市场和自由所作的积极评价进行改造，使其与社会主义协调起来。他指出消极自由只有通过市场方能实现：

> 惟一为人所知的宏观经济调控的自愿(非强制)方法就是市场手段。因为只有某些经济安排和政治安排的结合是可能的，所以市场手段就成为那种被人们界定为没有强制的消极政治自由的必要(尽管不是充分的)经济条件。(Seluchy, 1979, p.173)

与此同时，他还推断出市场、"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必要联系：

> 因为自我管理毫无疑问是积极自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没有工作地点的自治也就谈不上自我管理；因为没有市场就无法保证工作地点的真正自治——所以**在市场和积极自由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联系**。(Seluchy, 1979, p.154)

十、民　　主

新自由主义者经常靠经验把市场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联系在一起。例如塞卢奇就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这个判断："除了资本

主义社会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普遍的政治自由在何时何地曾存在过。"(Friedman, 1962; Seluchy, 1979, p.136)。但是和以往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市场对民主至关重要。他们提出一系列观点试图表明：一旦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代替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将会有很大的提高。

92 首先，持各种观点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过程被私人资本的集中权力扭曲了。这种观点涉及范围很广，从资本主义公司对大众媒介的不合理控制到私人投资者将社会主义政府置于不可抵抗的经济威胁之下。最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干脆主张通过消灭大规模的私人资本财产来扫除有效民主的这些障碍。作为合理的政治讨价还价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预料企业和利益集团会继续在政府面前代表自己的利益。然而，那种源于集中强制经济权力的不适当影响应该通过实现资本的社会所有制而加以消除。按照罗默的说法，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将要比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更为民主，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正是这个阶级拥有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选举和其他途径影响和控制国家政策"(Roemer, 1991, p.567)。

其次，虽然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那种认为民主控制的国家通过制定详细计划能够有效管理经济的观点，但他们还是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代表制民主制度将形成某种对经济管理的总的民主控制形式。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政府行使多大的控制权，这要取决于它的计划范围的大小。对于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国家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一个权威机构作出自觉的计划，这个机构要对经过选举产生的重大结构性投资会

议负责"(Nove,1991,p.245)。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建议,国家的作用应限制在指导性计划范围内,对独立的企业在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上作出整体性的指导。罗默设想了这样一种制度:国家通过在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利率政策来确定总体的社会投资方案。这种利率政策可以成为政党选举纲领的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人们"运用民主政治手段对社会储蓄的利用进行某种程度的民主控制"(Roemer,1991,p.563)。尽管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制度设计各不相同,但他们一致认为,一旦政府摆脱了资本家利益的不合理影响,它作为公共利益的监护人和总体经济管理的监督人的行为,可以较真实地体现符合基本原理的民主观点。 93

第三,(至少有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赞同这种批判性意见:在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住了脚步"。现存企业内部的经济决策,即便是公有制企业,很明显都是等级制和集权性的。例如达尔(Dahl)就指出:"如果民主在管理国家方面是合理的,那么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也是合理的"(1985,p.111)。按照乔舒亚·科亨(Joshua Cohen)的说法,"把自我管理扩展到传统的不民主的工作领域,对形成积极个性和发展共同利益意识都很有意义,从而对于形成民主更为充分的国家作用极大"(1988,p.29)。可贵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的社会主义思想之源可以追溯到罗莎·卢森堡(1961),即:没有一个庞大的发展了的社会能够支付得起抛弃代议制民主的代价。当然,还有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在局部范围内达到较为直接的民主的途径,同时并不抛弃必要的代议制形式的制度框架。这将通过互相作用的合作企业系统内的工人自我管理来实现(参见 Miller,1989;

Seluchy,1979)。在实践中,许多合作社内部都选择了代表制和直接民主相混合的形式,而且经常从外部雇用管理人员。工人合作社提供了这样一种组织形式:直接民主的许多必要条件和标准(小范围,永久性包括全体民众成员,没有立法和行政职能的分工)可与国家层面(和越来越超越国家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的"必要条件"相互协调。

然而并不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赞同这种创造性的建议。一些人担心,如果过多抛弃传统的管理结构,经济效率将被降低。还有一些人认为,工厂民主将导致工团主义和某种工人"集体资本主义"的危害产生,这两者共同反对整体的公共利益(Potter, 1891; Roemer, 1991)。即使是这种建议的支持者也担心这会导致那种把政党政治引入工厂民主的后果发生(参见 Seluchy, 1979, p. 179—189)。然而那些合作社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却坚持认为,这是把真正的经济控制权从私人资本所有者手中或从指令性经济的计划组织那里转移到工人手里的重要途径。

94

十一、社 会 公 正

最后,我们再分析一下市场公正问题。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都经常认为达到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工程的确定目标,市场资本主义的反对者也经常把不公正描绘成资本主义的最突出的弊病。当然,公正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才算得上是公正的分配,对这些问题是仁智各异,争论不休。哈耶克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社会公正"的概念既"毫无意义"又为害极大。(1982) 实际上,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只对

市场制度的"公正"问题提出一些有节制的主张。例如,约翰·罗默就持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认为任何市场制度,无论有无资本家存在,都能够公正地配置资源和收入"(1991,p.566)。在他的论述中,市场之所以被认可,并不是因为它导致的分配的合理性,而只是在于它带来有益的结果(主要是效率的结果)。

对于那些较为强调市场分配公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们来说,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之间的区别又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戴维·米勒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对利益的分配是不公正的,它与人们的绩效和努力无关。然而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依米勒看来,随着资本私人所有制的废除,个人和企业获得的不同量报酬大致反映了他们拥有资源的不同市场能力(或满足需要的能力)。市场的这种不平等回报是对较高效率、努力工作、企业经营技能以及自然能力的(所值)报酬。虽然也存在意外收入,但这归于(确实是任意的)运气,而这种好运是分散的和偶然的,不会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具有累积性。

类似的观点也被用于论述消除剥削问题。在各式各样的论述中(特别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社会主义者认为,市场表面上的平等交换实际上掩盖了资本所有者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强制掠夺。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处于剥削工人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上拥有制度性的特权。随着资本私人所有制的消灭,对雇佣工人进行制度性剥削的条件也就消失了(尽管这当然丝毫没有改变国内无工资收入的工人的地位)。这样,按照米勒的说法,没有了资本私人所有制的市场交换如果在均衡价格上进行,它就不可能是剥削性的,个人拥有的财产取决于:"(a)自然

95

情况 —— 资源的可用性，资源的自然性质，人的爱好和天赋，等等。(b)个人情况 —— 作出的选择，具有的技能，作出的努力"(Miller，1989，p.194)。

当这些标准不尽如人意时，市场社会主义就可能产生剥削。例如，一个成功的合作企业在某个市场中能够获得垄断权力。但是这种剥削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那种长期的制度性剥削。而且，一旦偏离均衡条件的情况发生，国家可以进行"矫正"。确实，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在创造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方面要发挥切实的作用。这样，米勒建议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应该通过一项分配政策，以保证每个人拥有充足的资源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要优先于非基本需求的满足"。这并不是

> 消灭市场的观点，而是规范市场的一种措施，以便使初次分配较为公正，同时也给那些不能在劳动市场上挣得足够收入的人提供特别补助…… 一旦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得以推行，人们就能够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换来满足他们的绝大多数需求。(Miller，1989，pp.148—149)

即使这样，某些需求，例如医疗提供，最好还是在市场之外来保证满足。最后，尽管这种将没有私人资本的市场和国家干预联系起来的混合体制还不可能达到非常公正和公平的后果，但它还是现实世界中达到切实平等的最好方法，而这是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的。

十二、市场社会主义:基本结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继续运用市场机制作为提供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手段,同时实行资本的社会所有制”(Miller,1989,p.10)。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将描绘出实现这个简要程式的制度设计的大致轮廓。在接下来的评述性部分,我将分析那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可行性和可取性的观点。 96

社 会 所 有 制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主张就是消灭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制,代之以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即便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最保守的代表人物(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等人)也认为废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是至关重要的。这种主张与他们下面的这个观点一致,即市场资本主义的邪恶并不在于市场,而在于资本私人所有制(带来的后果)。而且,如果这个主张有什么意义的话,是它能够使其倡导者把自己的模式称为是“社会主义的”。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向最为温和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转变,上述主张也会对其政治可行性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

然而,代替资本私人所有制的这种新的所有制形式(称作“公有”、“合作制”、“集体的”或“社会的”),其实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那些把“社会所有制”看成是“为社会所有”的评论家们坚持认为,与个人和企业相对的社会是不可能行使大多数所有权的。最后,他们怀疑社会所有制将意味着集权的国家所有制,同

时也包括后者的所有弊端。实际上,对于社会所有制的含义,市场社会主义者作了不同的诠释。例如诺夫就区别了三种社会所有制形式(1991,p.213):

1. 国有企业,集中控制和管理 …… 集权国有企业。

2. 公有(或社会所有)企业,有完全的独立性,经理向工人负责 …… 社会化企业。

3. 由工人所有或(和)管理的企业 …… [包括]合作社企业。

实际上,在一点上诺夫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非常不同。他仍然把集权国有企业放在其分类的首位,虽然罗默也喜欢把市场社会主义描绘成为"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制度:企业为公共所有,国家对经济的'关键部分'有很大控制权"(Roemer,1991,p.562;1992a)。由于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国家社会主义和现存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极不情愿将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除了一些自然垄断和社会服务业等例外)从市场的控制下分离出来。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对传统形式的以国有化和扩大公有范围为特征的国家所有制不持同情态度。总体上他们更愿意奉行分权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可是有一点不清楚的是,那种为工人所有的企业是否能提供一种具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正如埃斯特林所观察到的那样,当现存的合作社代表着浩淼资本主义海洋中的"社会主义孤岛"时,工人所有的合作社经济将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1989,p.185)。

97

塞卢奇利用在关于法人资本主义兴起的讨论中常可发现的那种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矛盾冲突,在被公认是有缺陷的南斯拉夫模式的经验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不论它是资本主

义的还是国家的，"它归根结底是由资本所有者统治劳动"。

> 为了消除任何一种对劳动的外部统治，工人们自己需要成为资本的主人…… 这样，生产资料所有权应该与国家分离，通过自我管理的方法将其置于工人们的直接控制之下。[然而]这并非必须意味着社会生产资料要直接由生产者正式拥有。虽然它们在总体上说仍为社会所有，但由运用它们的工人进行控制。(Seluchy，1979，p.111)

在埃斯特林的论述中，南斯拉夫模式理论提供了解决社会所有制问题的一种略微不同的方法。实质上，所有权在工人和国家之间分割：

> 工人们被赋予资本的使用权，可以增值资本和调配资本。他们从中赢得收入。然而他们并不拥有它们，也不允许卖掉或抛弃它们。资本股票为社会集体所有，只是由某些特定的工人集体进行管理。(Estrin，1989，p.173)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看起来对所有制问题没有这么多的困难。他们寄希望于私人企业普遍以合作的方式组成的制度形式，以及一种依靠国家(最终贷方)和企业之间的中介金融机构来监督 98 中央政府的过度经济权力的结构(参见 Miller，1989，p.10—11)。然而，尽管存在这些解释，也尽管消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拥有对于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具有无可怀疑的重要性，但是作为替代资本私人所有制的社会所有制的适当形式仍是非常不清晰。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家

虽然市场社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提倡消灭大规模的私人资本,但他们几乎都设想了在市场社会主义里要保留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在这种程度上说,他们的倡议是某种形式的"混合经济"。这种设计不应被简单地认为是为了安排农业小规模所有和个人服务行业的事情而作出的一种权宜的妥协,这个结论可能是基于公民自由方面的考虑。鉴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意欲废除的是法人企业资本,因而最好还是在自愿的成年人之间保留一些小规模的私人资本主义行为,而不是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的监控和处理来防范它们(Nove,1991,pp.204—205)。然而更重要的,还是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设想的真正企业家式的资本家所具有的那种积极作用。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无效率进行谴责的最常见的观点之一就是它们不能支持创新。实际上,奥地利学派在对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作的回应至少在某些方面也承认,兰格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或许能够模仿静态的市场配置资源功能(参见 Lavoie,1985)。然而,这种模式不能为市场中的积极发明和革新提供激励(或信息)。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正是预期的所有权收入才诱使私人投资者承担发明创新的风险。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具有这种革新的动力,结果可能会导致经济衰退。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这种批评。虽然他们坚持认为现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大规模投资既不是"英雄的"成绩也不是企业家才能的结晶,但他们确实承认马克思和熊彼特(1976)所预期的"企业家的死亡"有些夸大其词。他们强调,

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主要集中在非挣得性收入，即资本主义中的食利因素这一问题上，同时他们承认资本家所从事的一些工作（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协调）也代表了重要经济功能的发挥，这在任何所有制形式下都是必不可少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带些遗憾地承认，必须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他或她引进了一种新的产品和服务或者一项新的生产方法）。在劳动是收入的惟一源泉的经济社会中，企业家从事着尤为可贵的工作，他们也必须得到相应的激励和回报。在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对私人企业家的努力所给予的物质激励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激励一样多"（Yunker，1988，p.76）。然而，尽管容忍或甚至鼓励私人企业和企业家式的资本家的存在，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还是提出了要把这些企业（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或者其创立者死亡或退休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的问题（参见 Roemer，1991，p.566）。他们的意图是要把真正企业家罕有的才能的（可能是慷慨的）酬报与私人资本所有者的非挣得性收入区分开来。 99

企业结构和管理

尽管消除大规模的资本私人所有差不多为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共识，但他们在企业结构和管理这一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从米勒和埃斯特林（1985，p.6）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者对待企业管理的四种不同类型的态度：

1．自由主义的立场　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每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平等权利，至于人们如何行使他们的权利，则是他们自己

的事情。

2. 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　如果国家能够运用税收和规范力量矫正诸如收入差距等问题，那么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形式是社会主义可以接受的因素。

3. 共同决定的立场　企业中资本和劳动的各自权利应该重新理解为劳动-资本合作的关系，双方按照事先确定的比例取得各自的利润。

100　4. 工人合作社的立场　市场社会主义企业一般应采取工人合作社的形式，资本从外部提供，这些资本只有获得利息的权利。

米勒和埃斯特林把工人合作社描绘成为"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最适宜的形式"，在米勒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纯粹"形式的概括中，"所有的生产企业都应被组织成为工人合作社"(Miller 和 Estrin，1985，p.6；Miller，1989，p.10)。还有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把工人自我管理当作最好的形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达尔在其《经济民主序言》中这样写道：

> 在关于私人所有权利的种种推断论述中，没有一种论述能够成功地说明企业私人所有制的合理性……　结果，民众及其代表被授权通过民主程序决定经济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求实现……诸如民主、公平、效率以及理想人格的培养等价值。这种对最小的个人资源所赋予的权利对于一种好的生活来说可能是必要的。(Dahl，1985，p.83)

在经济市场和一个维护法律的国家所限定的范围内，这些目标

可以通过建立自我管理型企业来实现。这是“经济企业由集体所有并由其内部工人民主管理的制度”(Dahl,1985,p.91)。

让我们再看一看塞卢奇的观点。他的立场与达尔接近,但他的观点是建立在他所发现的“马克思关于人的经济解放的观点和政治解放的观点”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

> 马克思的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概念,包括一个基于特权与服从之间纵向(等级)关系的单一社会工厂。可是他的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概念却是基于横向平等关系的自我管理劳动的自由联合体和社会共同体。(Seluchy,1979,p.xi。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

我们已经看到,塞卢奇反对马克思关于废除市场的经济观点。在论证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设想时,他倡导一种“劳动自我管理”模式,在这里“劳动是收入的惟一源泉,生产资料由那些使用它们的人所有和进行社会性管理”(1979,pp.179—180)。依据塞卢奇和达尔两人的观点,企业内部的民主化是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其重要性至少不亚于消灭法人企业资本所带来的分配结果。然而,这些“劳动自我管理”模式的倡导者在资本所有权、工人/所有者的地位、企业管理的内部结构以及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等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第六章进行讨论)。 *101*

尽管有许多评论家追随乔恩·埃尔斯特的观点,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劳动合作制度”,但也有许多人坚持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应最好由工人自我管理的企业组成。[3] 较为保守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例如扬克和斯陶贝尔,则偏爱“没有资本家的

资本主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仍然保留现存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和管理之间的等级关系。尽管斯陶贝尔也倡导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性安排,可他却表示偏爱自己所称的"充分市场模式",即"完全模仿竞争私人资本主义的特征,只是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运用税收政策消除大规模私人和家庭财产以及其他一些极度经济不平等现象"(Stauber,1987,p.187)。虽然他对西德和瑞典经验中的那种共同作决定的方法表示赞同,但却对实行"过多"工人控制所具有的效率表示怀疑。他对南斯拉夫经验的评论也是着重强调工人自我管理的弊端(1987,pp.300—311)。与此同时,在扬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现存的大规模公有化企业的管理者同样享有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拥有的那种处置权",包括控制"生产的水平、价格、市场费用和广告费用……雇用与解雇工人以及税后利润分配,等等"(Yunker,1988,pp.7)。除了这种对工人有效自我管理能力所持的保守的怀疑态度之外,还有另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成果不属于任何一个特殊企业的工人,而是属于整个社会。约翰·罗默模式就包含这一立场。罗默对工人控制"颇为怀疑",担心它将"妨碍利润最大化目标以及与之相伴的效率的实现"(尽管他也认为工人控制与半独立的经理阶级的过分权力相比是"危害较小"的;Roemer,1991,p.567)。他进一步指出,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工人并不拥有自己于其中工作的企业,尽管他们要继续从这些企业中得到(有差别的)工资,但是任何一个企业的利润都应以社会红利的形式在资本所有者(即每个人)之间进行分配(1991,p.563)。

罗默的论述促使我们认真考虑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收入分配。社会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时至少特别提出了三个理由。第一,资本家获得的利润收入不是自己挣得的,而是(或)从真正的所有者——创造利润的工人那里剥削来的;第二,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利润分配不当,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差异悬殊,令人无法接受。这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公正原则,破坏了使社会利益真正、普遍共有所必需的条件。第三,收入只与(付酬)劳动相联系,而与人的需求无关。市场社会主义者部分接受了上述批判意见。一般地说,他们的立场源于塞卢奇所描述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第一原则",即"(被雇用的)劳动是收入的惟一源泉"(1979,p.179)。

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都非常愿意接受那种源于市场上不断变化的劳动价值而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收入差异。按照诺夫的说法,"收入差异(一种劳动市场)是替代(不可接受的)指令劳动的惟一已知的方法"(1991,p.231)。总的来说,收入的绝对平等(塞卢奇称其为"原始平等主义")经常被指责为"乌托邦",由于缺乏富足的条件,它必然导致对劳动资源的非经济使用,而且就劳动的专制性分派而言代价太高难以接受。但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现存的收入差异会被大大减小。首先,大规模财富得以形成的资本私人所有制这一源泉已被废除。第二,至少在合作社内部,工资收入的分配将由所有工人(民主)决定。尽管为了吸引技艺熟练的工人而不采取平等分配工资的做法,但是工资量的差别应减至3:1或4:1的比例。市场社会主义者经常援用

西班牙北部蒙德拉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经验,作为合作制能够减小工资差异的部分证据(Thomas 和 Logan,1982; Nove,1991; Estrin, 1989)。第三,由于废除了资本私人所有,这种工资差别反映的只是购买力的差别,而不是经济决策权力的大小。第四,在整个社会层次上的工资差异可以由国家进行干预,国家可以实行相应的工资政策,可以通过在市场之外提供非常重要的必需品和公共利益(例如医疗和教育)的措施作为补偿(Nove,1991)。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这种折衷立场在塞卢奇那里得到了

103 非常简洁的概括:"任何一种现实的社会主义纲领都依赖按劳分配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原则与按需分配的理想比起来魅力较小,但它同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则比起来却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Seluchy,1979,p.155)。

鉴于这些广泛的共识因素,各种市场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对收入分配方案的设计就各有千秋了。显然大多数人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为私人资本收入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但这只适用于仍然为私人掌握的小型企业或者企业家经营的企业,同时也适用于那些主要由自己筹集生产资金的合作企业。当然,市场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本一般来说是社会所有的。人们普遍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中,合作企业(或者其他形式的社会所有制企业)应该由外部来提供资本,企业要按照固定的利率从社会资本的监管机构或组织(国家、公共投资机构或公共持股公司、等等)借贷资金。借贷资金的企业要负责资本的保值和支付利息。

由于资本为社会所有,所以它就不能成为任何人收入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模式中(例如米勒模式,1989),企业的纯利润在支付借贷利息后,"形成一个利润库,人们的收入就从中付给"。在米勒的合作经济中,"每个企业都由其内部工人进行民主控

制，在诸多事宜中他们必须决定在合作社内部如何进行收入分配”(1989,p.10)。在其他模式中，企业的利润成为“社会红利收入”(Yunker,1990b,p.118)的基础。它或者用于支付“所有社会成员的全部工资、比例工资和增薪部分”(Yunker)，或“形成在所有家庭之间差不多平等[分配]的保障收入”，因为“这一部分国民收入……属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人”(Roemer, 1991,p.563)。在罗默的模式中仍然存在着对(社会的)资本的回报，但它差不多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分配的。

最后，可能还存在着源于家庭储蓄的收入。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特别是詹姆斯·扬克(1990a)，对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私人储蓄的利息收入深表怀疑。而其他的人则持那种较为传统的观点，即：对储蓄者的延迟消费应给予“报酬”。然而很清楚，这些私人储蓄应投入到(某种形式的)公共投资中，而不应成为“恢复资本主义”的代用品。 *104*

在罗默的模式中，市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每一个标准公民都应有三个收入来源：“工资收入，它随着工人的技能以及劳动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储蓄收入，它在不同的家庭中量的大小也不同；社会红利，从原则上说它在每个家庭之间的分配大体相等”(Roemer,1991, p.563)。

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

最后，我们需要简要地考察一下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性质的设想。当然，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在人们心目中消除社会主义与专制国家和集权国家计划的失败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不光彩印象，说明市场提供的经济效率能够

与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互相充分协调。像扬克那样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确实将他们的变革计划(尽管也很激进)限定在资本所有权的非集权社会化的范围之内。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同'市场与计划'的问题毫不相干"。他的主要目标就是确立一种为社会所有的"模拟物",它"完全模仿市场资本主义的市场特征"(1988,p.72)。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没有明显的计划或调节意向"(1990,p.136)。然而即便是这种"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主义也受到了新自由主义者们的攻击,他们认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不管看起来具有何种程度的市场化倾向,如果在实践中经济控制权不是在集权国家的监管之下,那么资本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就是非常必要的。然而,正如一些新自由主义批评家所敏锐发现的那样,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实际上都赞同国家和某种形式的经济计划(修正过的)要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这样,在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看来,社会所有制是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正如他们的敌意不是指向市场而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市场那样,他们的批评也不是指向所有形式的计划,而是指向那种集权的、指令性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在塞卢奇看来,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应该趋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105

> 虽然市场是进行合理经济配置和使用短缺资源、商品和服务的最有效的工具,但宏观经济(中央)计划则是促使市场调节适应福利优先的最有效的手段。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已知的所有类型的计划中,只有那种间接的(指导性的)社会计划才与市场和劳动自我管理相一

致(Selucky,1979, p.208;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

同样,埃斯特林和温特尽管也发现"与非集权化和效率相关的有力论证促使我们赞同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可是他们仍然强调某种形式的指导性计划的必要性,"一种专门关注计划的制定和确立的非集权化的,最好是民主的,协商和讨论过程"(Estrin 和 Winter,1989,pp.115—116;Brada 和 Estrin,1990;Estrin 和 Holmes,1990)。在埃斯特林和温特看来,指导性计划具有的非约束性和协商性质使其与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典型的行政集权计划迥然不同。在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中,"政府将拥有干预经济、指导投资方式和规模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不是通过命令体制来实现,而是通过控制利率的途径来实现,不同的产业部门可以根据这种利率从国家银行借贷资金"(Roemer,1991,p.563)。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虽然明确否定不含市场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但他们也在某种新形式的"混合经济"中为计划和国家所有制留下了重要的位置。锡克的"人道的经济民主"模式就包含着"宏观经济计划"的复杂机制(Sik,1985,p.133—229)。在锡克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

> 长期规划和中期计划将决定生活质量合理发展的宏观结构。这将包括增长速度的确定……必要的持续和协调的投资发展 …… 关于工资增长、工资差异和利润分享定额的计划确定。(1985,p.320)

以上所述是通过"计划经济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和信贷政

策实现的"(1985,p.321)。

诺夫的计划目标看起来可能要温和些,但其广泛性毫不逊色。在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中央"将发挥"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能":

> 首先,重大投资将是它的责任。第二,…… 计划者要努力监督分散的投资 …… 第三,在管理诸如电力、石油、铁路等"当然的"中心生产活动,中央将起直接的和主要的作用。第四,为自主的和自由的产业部门设定基本规范也是一项主要任务,在发展失衡的情况下保留干预的权力。显然中央还应该具有与外贸有关的功能。中央要制定长期计划草案。(Nove,1991,p.220—221)

106

此外,诺夫还设计了一种"中央国家企业",由国家所有和管理。它可能包括那些"至关重要"的大型企业和公用事业,至少要对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管理(Nove,1991,pp.213—214)。正如诺夫承认的那样,"国家的作用将会很大,它是所有者、计划者、社会经济优先权的实施者"(1991,p.247)。

最后,在市场社会主义,和现存的福利国家相关的诸多福利商品和服务(在医疗、教育、收入补贴、个人社会服务和住房领域)仍然由国家负责。塞卢奇用很长的篇幅论证说,就为医疗和教育提供的经费和设施来说,"按劳分配"的原则将让位于"按需分配"的原则(1979,p.163—168)。同样,诺夫也认为,在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一些领域(教育、医疗等)将自然排除在市场式的标准之外"(1991,p.246)。米勒坚持说"社会主义者在福利提供的形式方面不应拘于教条",总而言之,

> 对于教育和医疗事宜(无疑是关键的福利商品)来讲,争论的天平当然要向支持公共制度方向倾斜,同时要结合充分的消费者选择因素;在其他方面 …… 看起来最适宜的主要是依靠市场,在必要情况下公共权威机构将发挥辅助的资助作用(Miller,1989,p.317)。

朱利安·勒·格兰德在与众不同的论述中指出,国家最好应该从一些福利供给领域中退出,但要负责重新分配人们的购买福利商品的能力,以支持那些没有多少资产和机会的人(Le Grand,1989)。在他的"左翼票券"制度下,国家要分配指定用于购买福利服务的票券,以不成比例的价值给予那些拥有极少资源的人。这样消费者将在福利商品市场上从相互竞争的供给者那里购买自己的福利商品和服务(受限于一些国家标准和监督)。这种主张与格兰德自己努力详细论证的另一个观点相呼应,即:在现存的福利国家中,正是那些拥有较多资源的人从"免费"服务的供给中得到了较多的利益(Goodin and Le Grand, *107* 1987)。重新分配财富和机会的最有效的方法不一定就是提供免费服务,而是直接地重新分配初次收入。显然,格兰德的方案代表那种增加市场的福利提供能力的见解,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只是一个例外,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般规则。

结　论

显然,我们可以通过西欧和北美的一些理论家了解到当代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他们的观点至少部分地回应了本

书第一部分所列举的社会主义正在面临的种种难题。因此，市场社会主义者关心现存社会主义模式的无效率、高度集中计划的不可行性、国家干预的不受欢迎和有限的能力以及扩大经济民主的机会等等。总之，他们试图重新定向我们对市场的思维，以使市场在复兴的社会主义政治创新中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因素。在第三部分，我将考察一下这种新型的修正主义将被证明是如何必要。在第五章我开始讨论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根本不相容的种种反对观点。

注　释

1 具有代表性的讨论，参见吉莱斯比(Gillespie)和帕特逊(Paterson)的著作(1993)。

2 关于新自由主义者赞同市场是一种有缺陷的但却是"害处最少"的机制的观点，参见 Lavoie(1985)。

3 埃尔斯特声称"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和处于少数地位的合作社和睦共处"，这极大地修正了他自己的结论(Elster 和 Moene，1989b，第 26 页)。



第 三 部 分

市场社会主义评价



第五章 市场社会主义: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

人们对第二部分所概述的模式提出的最基本、最简单的否定意见是:社会主义和市场是根本不能相互协调的。从传统上看,这种反对意见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的共同立足点。这样,市场社会主义者就同时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诘责:那些认为市场是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有害制度的人,就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社会主义的”;而那些认为“真正的”市场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无法协调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右翼,又将市场社会主义说成是“非真正的市场秩序”。两方面的批评都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见 de Jasay,1990; Mandel,1986)。在这一部分,我将考察一下这两种否定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一、反对市场社会主义之一:来自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

有一点看来很明显:即便我们不会完全赞同后现代主义者和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立场,我们也不能期望自己会毫不含糊地确立起关于社会主义(不论这种社会主义是“传统的”还是其他的)的实质性的和确切无疑的建议。在本章中,我将列

举一些传统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本性的主要观点。这些即便不是全部，它们也依序散见于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我认为可以通过这些观点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最为深刻的反对市场的意见。当然，我这样做并非意味着：把这些意见合起来就构成一种对市场社会主义者之市场工程的纲领性替代方案。然而，这种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点至今仍然是对市场的局限性所作的最为系统和最有见地的说明。如果我们考虑到目前有一些人为市场所编造的种种普遍性神话，即便假设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批判市场的观点从来不曾存在过，我们今天也不得不自己提出这样的批判；即便我们将这种"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积极意义都排除掉，它对于评判那种既倡导社会主义同时也倡导市场的构想也是大有用途的。相应地，下面的讨论就是围绕着涵盖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七种近似公理的命题而展开的。

112

命题一

> 市场产生不平等　市场会造成资源和机会的分配严重不平等，这有悖于人类追求平等的愿望（哪怕是非常温和的愿望）。

尽管我坚决反对任何一种确认社会主义固定标准的尝试，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对平等的追求是大多数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的确，贝尔基（Berki）把平等主义描绘成是"社会主义的经典原则"（1975，p.25）。遗憾的是（至少是为了便于分析的缘故），平等原则也为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普

遍认同和倡导,其中甚至包括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人们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并不是平等本身的适意性,而是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平等(诸如条件平等、机会平等和受尊重的平等,等等)以及这种平等(和其他一些被倡导的原则,诸如需求、应得和个人自由)可能产生的一些合理的不平等。[1] 传统社会主义营垒中的观点五花八门,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或许他们存在着这样一种共识:平等是具体的、实际的,远不止于一种纯粹抽象的原则,所以在某些方面讲,条件均等是社会主义者的理论重心。但不论如何,对绝对的条件平等的追求是罕见的例外,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其视为空想(最好地讲),甚至经常认为它是一种反面乌托邦(如果考虑到用以维持它的制度设计)。与此同时,平等原则也受到其他一些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制约,诸如对(不平等)需求的公平(但不平等的)回应。但不论如何人们广泛认为,正是使财富(地位和机会)的分配相差悬殊的市场产生了不能为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的各式各样的不平等。 *113*

虽然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观是复杂的和有限定的,但是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理论看来并不接受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这种立场。例如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比较含糊地)认为,虽然一些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比新自由主义者持有更为积极的自由观,但他们仍然把这种自由视为"出发点的而不是结果状态原则"(Plant,1989)。根据这种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市场之所以还需要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使市场的出发点更为公正和自由,但它不会顾及市场交换和交易的结果。这种构想存在着许多难题,部分是因为:从一方面看来,无限循环发生的问题可能是可被接受的不平等的结果状态,但从另一不同的方面来看,它又可能是另一种新的交易中不可接受的不平等的

起点问题。还有一点很明确的是，是否考虑“结果状态”，是人们用以区分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标准之一。尽管人们(基于考虑自由、效率或甚至公平)可能偏爱这种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法，但它是否应该被称之为“社会主义”，我们这里还无法断定，如果我们不想严重扭曲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正常理解的话。

至于不太“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是否赞同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这不是很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市场社会主义者会反对下面这种立场：现存的通过资本主义市场进行的财富和机会的分配过程，必然存在着为社会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那种形式和程度的不平等。他们的理由是：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大规模私人资本的废除，不平等会迅速降至能被人所接受的、保证整个社会福利最优化的程度。现存合作企业的经验表明，尽管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等(虽然这种不平等不是由于私人资本占有上的差异)，但它可以被大大降低，而且可以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限制。鉴于传统社会主义者对条件平等的要求是有限定的，那么这种温和的市场社会主义见解就可能极为适合批判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的口味了。然而在合作市场经济中，不平等的程度是否能被大大降低，这是绝对无法断定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成功的合作社或甚至一个颇有市场竞争能力的个人的情况(诸如诺齐克[Nozick]所举的关于篮球健将的例子)。这种企业或个人所要求的价码会冲击收入的级差比例为3:1或4:1的界限。对这类市场情况的限制和规范一定需要国家的具体干预(可是把国家干预降至最低程度却是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目标)。

114

命题二

> 市场产生不公平　市场对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它不仅对人们的需求无动于衷，而且对人们的绩效和努力也漠然视之。在财富和机会的配置上存在着系统的阶级偏见。

部分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种批评的反应是：是资本主义市场不公平，不是市场本身不公平；而且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社会主义者对不公平现象的传统批判，首先考虑的是私人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公平的交换结果。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也是全部集中于资本主义劳动合同中发生的不平等交换现象。由此人们一定会这样假设：消灭了私人资本，就能消除掉市场经济产生不公平现象的主要根源（当然这不能完全消灭其他的和也许可能更为严重的剥削劳动的基础）。消灭私人资本也必然对商品和机会的阶级间的分配产生实际的影响，这里所说的阶级是围绕是否具有私人资本所有权来界定的。但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上述解释并没有完全回答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提出的批判。因为传统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个批评观点，那就是：市场对人们的需求不能灵敏反应，也不能成功地回报人们的绩效和努力。

戴维·米勒对这两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对于前一点，他较为合理地指出：确认什么东西才算得上是"基本的人类需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基本的人类需求还没有得到满足，可是还有一些人正享受着自己独特的非基本需求）。他还恰当地指出，建立一个配置商品的非

市场机构以满足这些需求也是极为困难的(参见曼德尔的建议,Mandel,1986,pp.14—25 和 Martell,1992,p.159)。然而戴维·米勒的论述尚未触及传统社会主义观点的潜在核心。如果用较为激烈的话表达这个核心内容,那就是:因为市场只对具有市场能力("支付能力")的资源要素作出反应,而不是对需求作出反应,所以百万富翁就可以到法国南部去打发温暖的冬日,而靠领取补助金生活的人因为缺钱取暖而死于体温过低。

115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米勒对这个问题曾作出过一个回答。那就是,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通过一项能够保障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的资源以满足基本需求的分配政策。这些资源要优先于那些用于满足非基本需求的其他资源"。与此同时,某些基本需求(例如医疗和教育)应该在市场之外得到满足(Miller,1989,pp.148—149)。我认为,米勒的建议(如果十分合理的话)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作出的切实妥协。但也就是这一点,使人们对米勒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市场"性质产生怀疑。只有那些强烈倡导高度集中计划的人,才会同意米勒的建议,对"日常个人商品——食物、衣服和住房等等"采取非市场供应方法。而且米勒的建议被人们认为是设想建构一种和现存的(即使是激进的)福利国家极为类似的组织。在这些福利国家中,一些福利供应是实物性的(特别是医疗和教育),而另一些福利项目,诸如补助金和收入补贴,是以货币形式再分配给受惠者,以保证他们能够在市场上购得商品以满足其基本需求。至于这种再分配达到什么程度,在什么范围内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能优先于现存的资产所有者的需求而得到满足,都应由国家来决定(或多或少地通过民主方式)。米勒坚持认为,"建立了市场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能够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换满足

自己的大部分需求”。然而这种建议又是以尚待证明的假设为证据来论述问题，社会主义者如何事先做到充分公平的再分配以实现这种令人满意的结果呢？上述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和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任何一种形式的市场社会都需要一个采取强有力干预措施的国家，而且这种国家干预要比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福利国家的干预更为广泛。

米勒还提及传统社会主义者声言市场对利益的分配与人们的绩效和努力无关。米勒同意，这种论点也许对于反对资本主义市场有效，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来说，它就大错特错了。这是因为，如果消灭了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个人和企业获得的有差别的收入将会反映出他们的资源的市场竞争能力(或满足需求的能力)。这种市场上的不均等收入是对高效率、辛勤工作、企业家才能以及个人天赋的回报。虽然人们也可能由于幸运在市场上获得意外之财，但这种好运是分散和偶然的，远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具有累积性。

看来，消灭资本私有制的假设又一次架空了传统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带来不公平分配这一重要论点。的确，传统社会主义者最尖锐的批判一直是针对“食利者”资本家之“非挣得”收入与财富的真正生产者之毫无生活保障和穷困潦倒。但是废除私人资本所有这一假设并没有使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如下观点失去说服力，即那种市场分配在任何必要的道德意义上说都是“值得”的言论是错误的。显然，传统社会主义者是要反驳米勒关于(道德上值得的)价值与市场价格相应这一等式。例如，难道麦当娜的演出价值一定是几百倍高于那些进行日常劳动的家庭主妇的工作价值吗？约翰·克里斯特曼(John Christman)认为，如果考虑到实际市场中存在的运气和不平衡现象，米勒关于商品价 *116*

值与其生产者应得之间的假设的联系是站不住脚的。还有，米勒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的每一要素都应获得与其所创价值相等的回报”这一观点也颇受怀疑。森(Sen)批驳说，这种关于市场的“个人生产观”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生产过程必然是社会性的，要计算最终产品中任何一个生产要素最低限度的贡献“实际上是个幻想”(Miller, 1989, p. 172; Sen, 1985, p. 16)。这种边际计算对于生产资源配置来说可能是合适有用的工具，但它不能成为对道德所值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即便人们接受了米勒公平代价的前提，却还仍然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米勒承认，他的观点对一些人来说(例如罗尔斯，或另一位市场社会主义者约翰·罗默)确实不能接受。这些人根本就不赞同对源于不同天赋能力的回报是值得的这一观点(Rawls, 1973; Roemer, 1982 和 1991)。最后，也如米勒承认的那样，他的理论是以“市场趋向竞争均衡状态”(1989, p. 172)这一假设为前提的。但传统社会主义者及其对手奥地利学派从不同的立场共同指出，这正是我们不能对市场作出假设的事情。至于米勒对这种批评意见的答复，我们最好在下面作出论述。

命题三

> 市场产生不公正　从传统意义上说，没有财富(或没有资本)的工人的致命弱点是经常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受剥削地出卖给雇主。那种使市场运作起来的利润的源泉是工人的无偿劳动。

117　显然，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来说，市场造成剥削的秘密潜藏在劳

动合同中。各种形式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都认为,表面看起来非常平等的劳资市场交换,实际上掩盖了资本所有者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剥夺。资本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剥削工人,是因为他们在市场中占据制度性的特权地位;所以,消灭了资本私有制(只要替代它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消灭了工人在制度上遭受剥削的条件(尽管这没有改善工人在国内的生活条件,也没有减轻工人失业的压力)。米勒认为(1989,p.115—116),即便市场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剥削,它也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那种长期的制度性剥削环境。而且那种破坏均衡条件的事情(如垄断)一旦发生,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通过国家干预来矫正。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卷入目前关于"什么才是剥削"这样复杂的问题的争论(当然对这个问题社会主义者应该给予合理的关注),我只是关注以下三点[2]:第一,消灭了资本私人所有制,无疑也就消灭了传统社会主义者所关注的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的基本前提。然而这又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由谁控制那些已经社会化了的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资本要素?左翼和右翼都有人声称,社会所有制(特别是在国家控制之下)所产生的剥削工人的机会要比资本主义市场通行的做法还多。第二,我们可以对米勒提出的非剥削标准(基于竞争均衡状态的非强制交换)之充分必要性提出疑问。例如有一些社会主义者指出,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交换即便发生在均衡价格基础之上,且能够满足米勒提出的公平交换的其他条件,它也极具剥削性。如果恰当地回答这样的质疑要依靠进一步控制"公平交换"得以进行的那些参数和条件,那么显然就是把重心放在公平市场交换的非市场条件上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还要

在下面进行讨论。第三个问题是，米勒提出的关于非剥削市场形成的条件是否能够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情况下实现。人们当然可以想象个人(和企业?)可以在不受各种市场力量限制的情况下进行交换，但是如果超出新古典经济学教义的范围，我们很难设想这种假设的交换关系能够在现实经济中维持多久。在过去的150年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遭遇并不见佳，特别是它的资本主义剥削过程理论。然而，很少有人去批评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竞争趋向垄断的论断。这一论断形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奥地利新自由主义者和传统经济学(它认为垄断的形式是市场失败的长期形式)的共同基础。如果我们承认市场不公正的重要表现是由于剥削的存在，那么对米勒的观点构成真正挑战的并不是能否设想一个不含剥削的市场，而是能否设想出这种市场得以在其中运作的历史和组织环境。当然，人们有可能认为米勒提出的非剥削性交换标准不能被当作是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可能存在的经验关系，它只能被看作是用来评判现实存在的任何一种交换形式之缺陷的基准。但不论如何，如果真的采取了这种标准的话，那么很显然，人们就必须着重关注如何在市场之外确立市场交换的限制性条件了。

命题四

市场产生无效率　从各方面来看，市场对商品和机会的盲目配置就是经济无效率。短缺资源的过度开发，商品的过度生产，市场主体的过度消费，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周期性利用不足，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机制的无效率。

长期以来，市场无效率的断言在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他们认为用以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一定是计划经济。最近，这种观点被一些人重新加以阐释，用来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Mandel，1986 和 1988；Elson，1988；Devine，1988；早期捍卫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论述，见 Dobb，1955）。在戴维恩（Devine）的系统阐释中，"计划经济能够自觉地塑造经济行为，与个人和集体确定的需求相一致，而且能够治愈市场经济染患的流行性不稳定之疾"（1988，p.5）。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力量在于"它以自觉计划决策的事先调节代替市场机制的盲目和无政府的事后调节"。（Devine，1988，p.18；也见 O'Neill，1988）。而正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这种"巨大力量"，市场社会主义者宣称要把它抛弃掉。 119

当然，这种反对意见的力量主要来源于关于计划经济可行性的主张。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承认，在相当适宜的条件下（社会需求明晰、没有信息流失、计划系统合理运转），计划生产可能要优越于市场调节。但他们认为现实的经济生活远远满足不了这些最优化条件，所以人们就一般地倾向于偏爱市场。并非因为市场能够提供非常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分配，只不过因为市场的无效率性较少于集中计划。根据"现实"计划经济的历史记录，计划的捍卫者们必须提供计划经济可行性的更有力的证据，以同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失败主义"抗衡（关于计划模式可行性的几种论证，见 Mandel，1986；Elson，1988；Devine，1988）。然而，尽管我们对捍卫计划经济的理论有保留意见，承认支持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市场的理论的关键力量也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讨论市场产生不平等和不公正时，曾提到过资源配置失调问题，

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市场对短缺资源的滥用又将会使经济决策普遍政治化(见 Pierson,1991a,p.218)。任何一位亲身经历最近十年英国经济滑坡的人,都看到了两次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可能长期性的大规模失业。他们毋需提醒就能认识到,市场并非总能够保证资本和劳动的最优运用。这一来,左翼对市场所保证的有效率的任何一种认同可能都要大大修正。

更重要的是,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市场只能在给定的规范框架内运作。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了那些最无政府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外,这已经成为各种经济理论流派的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规范框架的范围大小。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来说,它当然越小越好;而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为自己的有调节的市场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标准。他们希望看到,即便是社会主义市场也要受到各种规范制度的调节。所以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中,我们能够看到下面这些承诺:实现充分就业,保证最低额的工资,改革收入和价格政策以及实行广泛的政府经济计划等(Nove,1983,pp.172—173,207—208,227;Miller,1989,pp.295—298;Estrin 和 Winter,1989,pp.100—138)。毫无疑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国家干预市场持同情态度,认为通过这种干预可以矫正由于种族和性别差异所导致的不平等。这些正是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完全合理的政策。但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提出两点质疑:(1)在何种程度上这样的设计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如果考虑到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市场),以及,可能更重要的是(2)这种设计是否真正能够提供一种替代奉行干预主义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方案。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呈现出来的失败景象是寻求市场化改革的原因之一。尽管这还没有被普遍认识到,市场社会主义者所

120

要求的调节和计划框架可能要比凯恩斯福利国家战略的干预范围还要广泛，而后者正是由于组织机构过于庞大而不得不被抛弃。如果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作用不容易被降低的话，那么市场社会主义者就需要认真考虑：国家干预如何更负责、更民主和更有效。

命题五

> 市场反民主　当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宣称市场是民主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时，其批评家却认为市场是非常反民主的制度。只有把民主的实践限定在受正式政治影响程度较小的领域——且容许市场内部私人资本独裁权力的存在——关于市场经济内部的民主幻想才得以持续下去。

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显然很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能够回应"市场是绝对反民主的"这一观点的挑战。因为他们否定集中计划是经济民主化的有效手段，所以他们必须能够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市场制度，如果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能够实现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这对于评判那种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自由民主制的可行方案的断言来说，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自由民主制的一个明确特征是：承认在政治领域（这里可以合理地运行民主程序）和经济领域（这里却不能）之间存在着制度差别。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反对这种区分。 *121*

市场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仍然持这种见解：不是市场不民主，而是资本主义市场不民主。在论证这个观点时有两个基本要素：第一，在经济权力集中在相关的私人资本家手中时，控制资

本的人将会对民主选举的政府施加不适当的影响。这样，在自由民主制名称下理应民主控制的政治生活，却被资本权力所篡夺(Lindblom,1977,pp.172—184)。市场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第二个论据是："民主在工厂门前停下了脚步"。因而经济企业内部的决策，即便是在公有制领域，也是等级制和专制性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声称他们能够在改革的市场体制内克服上述两种弊病。第一，源于集中性和强制性经济权力的不合理影响可以随着资本所有权的普遍社会化而消失。第二，经济企业内部缺乏民主的问题可以通过以工人合作社代替资本主义企业这种同样强硬的战略来加以解决。虽然这种企业内部的民主采取何种形式还不太具体，也不一定意味着废除(现在是经过选举的)管理权力，但是它把企业的生产控制权赋予全体工人的总的意向是很明显的。

如果我们暂且不提资本社会化和实行工人合作社模式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巨大障碍和困难的话，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能抵消传统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条件下民主之不可能性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原则上，资本社会化和合作经济方案与传统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市场非民主因素的几个重要主张是一致的。私人资本的不正当权力必然要被废除，资本不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由内部全体工人控制的企业也倾向于将自己托付给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而不是选择那种使资本主义管理的无限制权力得以强化的制度。

可是，虽然这种模式为经济决策提供了比新自由主义所承诺的更为广泛的民主，但它显然还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化形式。市场社会主义承诺了企业内部的经济民主，但没有考虑企业之间的民主，企业还同样要在市场上竞争；它承诺赋予所有就业

的人员以经济权利，但没有考虑到在所有发达社会中日益增多的(由于各种原因)被排除在受雇人口之外的人；它倡导对微观经济决策实行较大的民主控制，但不期望对整个经济进行民主控制。对于那些把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合理民主管理视为民主实现之核心的人来说，他们一定会对市场社会主义将企业内部的直接民主(措施)和国家层面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未加改革的)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做法感到失望。还有，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确实给热衷于更多直接民主形式的人以某些鼓舞，工人合作社也确实为满足至少几项重要的标准提供了制度环境，但是这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协调平衡"问题，因为：在整个社会层面，仍然采用代议制方式进行管理。而在企业内部，某些形式的权威和决策可能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尽管他们有责任心)。与此同时，相对来说本书少有涉及市场社会主义政策之中存在的民主管理不同层次之间的冲突，但很显然，在民主选举的政府和民主自我管理的合作社之间一定存在着冲突。正如一些评论家所承认的那样，这种紧张关系在配置短缺资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市场社会主义关于不同层次的民主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还不完善和成熟。

命题六

市场反自由　尽管市场的捍卫者把自由视为市场的巨大力量之一，但市场的反对者却认为，市场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自由)实际上只是把处置权赋予拥有现存权力和资源的人。对于那些由于市场关系而处于依附地位的人来说，行使自由的能力实际上被剥夺了。

照传统社会主义的市场批评家看来,在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捍卫自由未免有些滑稽。确实,每个人都有在豪华的餐馆进餐的自由,或者都有出版一份全国性报纸的自由。没有人会被禁止做这些事情。可是,只有那些拥有实际资本的人才有必要的资源做这些事。在实际生活中,市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除了保证强者欺压弱者外,谈不上还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123

实际上,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对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抱有极大的同情。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有局限性的自由定义(界定为没有强制)方面倾注了巨大精力。他们认为对自由的完整诠释应该包括行使自由的能力,关于自由的观点要为"资源再分配提供支持,以赋予个人成为市场交易中有效的和自由的主体的能力"(Hoover 和 Plant, 1989,p.212)。不过,随着这种资源再分配的实现,市场运作会极为有效地使每个经济主体获得自由,因为市场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充分的反应,能够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加强一种"发展了的个人主义"感(Miller,1989,pp.213—219)。

有必要强调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论述的自由与新自由主义者论述的自由有很大的区别,而且前者还为那种对市场行为更为广泛的干预过程辩护。然而,即便考虑到实现更大程度的资源平等分配和消灭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传统社会主义者还有很多理由对市场能够保证的那种自由持怀疑态度。第一,他们认识到"在现实世界里",市场从来就没有实现过新古典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所假设的那种平等的使用权和处置权。任何一种缺少(一再要求的)平等的再分配都将会把有效的市场权力转移到那些拥有特权的经济主体手中。第二,如果考虑到消费

者的偏好的左右、生产者势均力敌的权力和市场提供的有限数量的选择(对于那些具有特殊的和反常的需求的人来说,情况尤为如此),消费者并非真正拥有主权。第三,市场中的消费主权提供的是一种极为贫乏的人类自由概念。对于一些传统社会主义者来说,它赋予了消费自由不应有的重要地位,却以付出其他宝贵的自由为代价。还有一些传统社会主义者追随早期马克思的论述,认为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自由不过是那些被异化的、自私自利的和分化的个人的自由。依这些传统社会主义者看来,"真正的人类解放"是以克服"市场"为先决条件的(Marx,1975;关于这个问题的评论,见 Pierson,1986)。还有人认为,尽管市场被提升为作出选择的"价值中立"手段,但实际上它作为一种制度,却倾向于偏爱某种特殊的实际结果。无疑,市场正是对那些最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和合作行为非常不利。至 *124* 于那种较为一般性的观点,即市场会强化与社会主义目标不一致的自由和个人主义,我们将在下一节进行讨论。

命题七

市场"反社会" 市场经济的分化的个人主义和"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充分实现我们固有的社会自我的可能性。人类本质中的团结、互助和合作的品质以及社会本身的可能性完全被这样一种制度排斥了,在这种制度中,我们相互把对方作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视对方为实现自我目标的障碍。由于依附市场,我们可能实现的最好的社会组织也被拒绝了。

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在社会关系以市场为前提的地方，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得以建立的社会性和集体性根基必然会遭到侵蚀（例如见 Devine，1988；Martell，1992）。传统社会主义者一直否认这意味着压抑个性，他们的锋芒所针对的是市场社会中分化和异化的个人主义。他们经常争辩说，从市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真正的"个性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但他们一贯主张，克服了市场，就能带来共同道德的"发现"，人们也就对社会主义社会组织的前提达成广泛和明智的共识。

市场社会主义者面对这种传统观点深感不安。雷蒙德·普兰特（Raymond Plant）就曾明确指出："最激进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接受新自由主义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评方面会走得很远，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是以目的状态和向好的方面设想为基础"（1989，p.63）。虽然普兰特自己的主张非常审慎，但显然他还是过分看重了市场所提供的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的多样化，而且市场社会主义者从整体上看显然对这样一种观点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观点认为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道德"。

在把传统社会主义观点和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调和起来的尝试中，戴维·米勒做得最为熟练。同样，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论证社会主义者曾经归咎于市场的那些异化特征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市场造成的。这种提法至少部分回答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批评，因为这里大多数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是指向任何形式的市场的。米勒从马克思对市场异化结果的批判中分离出三个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和人类需求之间的关系由于交换价值的介入而遭到歪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分离的、潜

125

在敌对的形式;整个经济制度脱离了人们的理论和实际控制”(Miller,1989,p.207)。米勒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马克思期望的那种共产主义条件下发展了的个性只有通过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但这如何能够避免衍生出来的异化问题呢?米勒的答案是:如果对市场机制的运用是一种理智的和集体选择的结果,那么市场的大部分异化特性也就随之消散了。例如,在市场中,特定的结果都不是计划中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超出了人们的控制。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市场(连同其不可预料的结果)作为实现某些特定目标(例如使产出或选择最充分)的最有效手段。作为发展了的个人,我们有能力在下面这种具有双重特性的社会关系中生活:一方面是竞争,一方面是合作(米勒以朋友间的网球比赛作类比)。“在市场社会主义社会 …… 工作看起来可能仅仅是工具性的 …… 但是在根本上它被看作是共同参与的。因为每个人都明白交换制度会带来有益的结果”(Miller,1989,pp.220—223)。因为运用市场过程本身就是共同体的一种自觉和有意的选择,所以其结果不会超出人的(非异化)控制。

米勒的见解确实很有创意。他很可以认为他的倡议与那些关注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的人可能期望的公有经济形式最为接近。但是我怀疑他的观点是否容易同传统社会主义协调起来。首先,还确实存在着一些靠“选择市场”不能克服的异化因素。例如,没有什么理由相信:选择了竞争性市场就会减弱精细的劳动分工造成的异化。第二,不论人们如何不满意,马克思的异化观点(米勒对此非常关注)很难同其通过“选择”来进行的解决方法调和起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异化可能要在某种更为激进的意义上加以克服——就是说,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法改

126 造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制度;消除传统形式的竞争、劳动分工和交换。我想最好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或空想的),而不是坚持它可以用米勒描述的方法加以修改。

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这一确切结论:在某些十分重要的方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典型特征与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核心主张难以相容。但在我们考虑这一判断的后果之前,我先要考察一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右翼批评家对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挑战。

二、反对市场社会主义之二:来自右翼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及其对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进行非难的基本理由,就是对市场绝对权力的普遍诉求。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用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市场的尝试所造成的有害后果,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显而易见的"世界历史性"崩溃。同样,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场的最优能力与计划和国家干预普遍无能之间的对比之上。对于那种公开倡导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来说,右翼的许多传统的批评和攻击意见看来与它毫不相干。与社会主义本身相比,市场社会主义易遭攻击的范围要小得多。可是,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批判,却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缺陷根本不逊色于它的传统先辈。市场社会主义(错误地)以市场为幌子伪装自己,这样它就比"真正的社会主义"更具危害性(也更缺乏连贯性)(de Jasay,1990,pp.33—35)。所以,我在这里不是讨论(再三重复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否定论据,而是集中探究那些用来谴责市场化形式社会主义的非

常具体的理由。

市场:真与伪

在反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诸多观点中有时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即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的提倡一定不是真心诚意的,它部分反映了东欧的经验:实行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只是试图在不松懈 *127* 一党统治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率。但是,即便社会主义者的诚意已被认可,新自由主义者仍然坚持下面这种反对意见(在某些方面摹仿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市场逻辑根本不能同(任何)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要求相容。尽管同其传统先辈相比,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结果宽容得多,但他们仍然歪曲和篡改了市场秩序,而这最终会否定市场的全部优点。

哈耶克的 Catallaxy:普遍的市场秩序

我们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中(特别是 1982 年和 1990 年的著作)可以看到关于上述立场的最权威和最完善的论述。无疑,哈耶克抨击的目标主要是以中央计划经济为前提的社会主义。虽然他也提到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观点,但这些主要是兰格及其合作者倡导的模式。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模式实际上属于"中央计划内的分权化"范围,不是实行一种真正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形式。甚至有一些(很不明确的)证据表明,在市场被允许发挥更广泛作用的地方,哈耶克对市场的苛责要温和得多(见 Lavoie, 1985)。但不论如何,哈耶克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主要谴责理由显然也同样适用于更为市场化的社会主义

形式。

哈耶克反对社会主义的核心理由在于他对市场秩序本质的理解。他认为,一个自由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Catallaxy(普遍的市场秩序)的基础上"。"Catallaxy"这个新词是用来描述"市场所产生的那种特殊的自发秩序,它是通过人们在所有权、债权和契约法则的制约下从事活动而形成的"(Hayek,1982,vol.2,p.109)。有趣的是,哈耶克承认:

> 如果社会主义者对现存经济秩序的运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的分析果真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就得被迫保证收入分配要遵循某些道德原则,而且只有在赋予中央权威以指导可用资源的运用之权力时,这样的分配才有可能,而这要以废除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为先决条件。(Hayek,1990,p.6)

128 但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只有通过竞争市场上的产品分配,才能使人们知晓他们应朝什么方向努力以求对总的成果作出尽可能大的贡献。除此以外,还没有发现别的方法"(1990,p.7)。哈耶克接着说:

> 一边是由竞争市场产生的、自发延伸了的人类秩序的倡导者,另一边是基于对有效资源的集体控制而要求通过中央权威对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自觉安排的人们。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源于后者的实质性错误,即他们无从了解这些资源是什么以及如何生产和利用它们……而通过遵循潜藏在竞争市场后面的自发产生的道德传统……与中央指

导性经济能够获得和利用的知识和财富相比，我们将能够获得和积累更多的知识和财富。而坚持中央指导性经济的人却声称他们是严格按照“理性”行事的。(1990,p.7)

与社会主义立场的根本性认识论错误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纲领性错误。第一，社会主义者运用国家权力试图“改进”市场交换所产生的自发秩序。但在哈耶克看来，对市场的这些干预将永远达不到最佳的结果，并永远缩减总的社会福利。第二，社会主义者建立福利国家，制定详细的法律条文，其明显意图是赋予劳工运动中的同盟者以特权，这违背了哈耶克所坚持的法律必须受制于“普遍适用的公平实施”规则。第三，社会主义者干预市场及其结果以求达到社会的公平，但哈耶克坚持认为，公正只是一种严格的程序性的东西，它只意味着合理施行那些普遍适用的总体规则，而不顾及它的特别结果。最好地讲，社会主义者追求的公平幻想毫无意义；最坏地说，它是有害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它意味着瓦解市场公平，剥夺成功者的财富，维持穷人的依附感，加强集团利益的特权以及侵犯个人自由。

Catallaxy 和市场社会主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满足哈耶克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评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他们也否定中央计划经济的连贯性和效率，并且接受了许多关于市场具有不可缺少的认识论功能的观点。这是不是表明市场社会主义可以避开哈耶克及其追随者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提出的那

129

些苛责呢？当一些左翼批评家讥讽市场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哈耶克思想的注释”时，新自由主义评论家却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对市场的钟情被他们自己不断强调社会主义目标的做法推翻了(Tomlinson, 1990; de Jasay, 1990; Gray, 1992)。依哈耶克本人看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该情愿以通过市场分配商品的做法取代中央计划，还是该把市场运用到特定的(即便是极为广泛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以求获得最有效结果或使消费选择最优化，都是不够的。Catallaxy(市场普遍秩序)的核心要求并不是把市场运用到这种或那种环境，而是整个道德秩序都应该以自由选择的个人之间进行的市场般的交换为前提。

三、社会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

我们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为了使自己免遭更为保守的左翼的攻击，他们声称自己所践行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纲领，因为他们强调要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确，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被概括地描述成为“社会所有制加市场”，(如果有区别的话)正是这种承诺把他们同传统形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为自己作为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提供了证据。相反，新自由主义者差不多一致认为，私人所有权，或用哈耶克偏爱的话说——“各自所有权”(several property)，是一个自由、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不可缺少的核心制度。哈耶克认为，“人们可以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智慧去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彼此间互不抵牾。而这一点只有在各自自由行为的领域界限被明确划定时才能实现”，而且一定存在着一种规则使“受保护的个人领地边界的划

定成为可能，这样就把我的（meum）和你的（tuum）区分开来”。这是“所有已知的文明赖以发展的基础”（Hayek，1982，vol.1，p.107）。尽管私人所有权采取的明确形式可以变化，但哈耶克明确指出：“如果不承认私人所有权，公正就不存在”（1990，p.34）。相反，市场社会主义者却要求实现社会所有制，新自由主义者确认这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认识论以及道德方面最有破坏性之弱点的根源。 *130*

作为自由和自治之基础的私人所有权

当然，新自由主义者要否定社会主义者的核心理论观点（市场社会主义者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私人所有权主要（和不公正地）是一种服务于特殊利益的制度，特别是服务于那些对累积资本具有处置权的人们的利益（见 Hayek，1990，pp.77—78）。但是，尽管颇具哲学思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们谴责社会主义经济“无效率”，可是他们至少不会笼统地认为市场秩序的巨大力量仅仅在于它取得经济利益的能力。的确，依许多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经济的生产率只是其有益的副产品，人们之所以倡导这种制度，大部分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他们认为，以各自所有权为基础的市场制度的基本价值在于它对获取个人自由和个人自治方面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和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都赞同下述观点，即扩展的市场秩序不能从某种“享乐主义的”或功利主义的伦理方面加以说明，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仅仅通过可以预见的、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我们愿望的事物来作出自己的道德评价了”（Hayek，1990，p.8）。因此，“市场的道德合法性恰恰在于它作为个人自治的重要前提之一所发挥

的不可或缺的作用"(Gray,1992,p.19)。按照格雷的说法,"自由市场能使每个人按照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自己的目的和生活计划行事,不必依附任何其他个人或屈从于任何集体决策程序"(1992,p.19)。

哈耶克和格雷的见解都属于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正统观点。这种正统认为私人所有权对人类个性的发展至关重要(参见 Reeve,1986,pp.136—143;Waldron,1988)。哈耶克这样讲:"能够拥有自己的东西,不管多么少,它却是 …… 独特个性赖以形成的基础,也是追求独特的个人目标所要求的环境"(Hayek,1990,p.63)。格雷认为,"正是从其作为保护和提高人们自治的促进工具的作用中,市场才最终获得了道德上的证据"(1992,p.19)。这样,否定市场社会主义的最为原始的观点就是:人类个性的发展以及个人自由和自治的获得只有在私人所有权的范围内才有保证。

131

"社会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所有制"作为一种介于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的第三种财产所有形式的真实存在深表怀疑。[3] 一些最强硬的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所有制"的提法本身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掩饰"。之所以设计出这一概念,只是为了隐藏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在私人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之间作出(惟一有效的)选择这种客观情况。依德亚赛(de Jasay)看来,"社会所有制"这一概念之所以被搬出来,是因为"国家所有制"的记录非常糟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所有制'…… 显然就是国家所有制"(1990,p.19)。哈耶克基本上也坚

持同样的立场,他认为“社会所有制”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一种温和的、非强制的和令人乐于接受的财产管理形式,可是在实践中它只是意味着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强制控制。从实质上看,所有权只存在于对确定的财产行使处置权的法律实体中。这些财产权利可以由个人、企业或国家行使,但决不可能由“社会”来行使。“社会”享有的这类所有权权利在实践中只能由国家来“代表它”行使。看来市场社会主义陷入了不能克服的两难困境:它(在劳动、消费和商品生产等方面)积极倡导市场,以避免国家主义和曾经困扰传统社会主义的无效率;但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因为市场社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资本市场,所以他们从倡导市场中可能获得的所有成绩又都被损毁了。可是市场社会主义者之所以不想采取这一最后的决定性步骤,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新自由主义者也这样认为):正是由于缺乏资本市场,他们的纲领才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所有制的认识论和激励问题

不情愿接受资本市场的做法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同样,它也使市场社会主义容易受到那些削弱较传统的社会主义形式的许多其他弊端的侵害。首先,由于没有资本财产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就暴露在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的批评之下。这种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冯·米塞斯(von Mises)的著作,那就是:社会主义缺少那种有效运用有限资源所必需的激励结构。[4] 只有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以及私人所有者自己承受投资收益(或损失)的后果,才能诱导出经济增长所依赖的企业家行为。按照阿尔弗雷德·舒勒(Alfred Schuller)的观点:

132

> 企业家权威的经济潜能的实质、范围和使用成本完全取决于所有权制度。如果在处置权和责任之间不存在充分的个人关联，那么就会有持续的动机以下述方式分割权威，即对资源价值的决策后果并不是由负责决策的人来充分承担。相反，处置权越是为个人独有和与个人联系密切，它们就越是能够按照处置和责任相统一的原则被自由地加以运用，获得和运用企业家权利的动因也就更为强烈。(1988，p. 62)

依格雷看来，更为基本的是“认识论上的理由”才真正使“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市场社会主义”不具合理性(1992，p. 47)。我们在拉沃耶的论述中看到，市场代表的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知识的发现和传递过程”(Lavoie，1985)。在这一过程中，相互竞争的私人资本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财产所有权收入是携带信息的货币流动”，“用单一社会所有者的独白取代相互作用的私人所有者之间的对话过程，只能会消灭产生 …… 价格信息的平等交换过程”(Lavoie，1990，p. 78)。格雷也持相同的观点：

> 在缺乏市场价格的条件下，计划者将不可避免地缺少合理配置资源所需的关于相对短缺的知识。这是对中央计划的根本否定。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在缺少资本市场的条件下，国家投资银行如何知晓怎样做才能对它们能够处置的投资资本进行最有成效的使用呢？(1992，p. 46)

格雷认为，社会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潜在的政策是根本性的……必须要有一个资本市场存在，也就是说，必须要有资本的私人或各自所有制的存在"。但这一结论对市场社会主义纲领又是致命性的。因为，如果恢复了资本市场，"我们至少又在重新创造市场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要素的道路上走了一半"(Gray，1992，pp.46—47)。至少依格雷看来，只要还没有获得"真实的东西"，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停下脚步。

社会所有制和合作经济

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些缺陷在其倡导者所偏爱的工人合作社这种企业形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合作经济是那些"不敢直称名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代替形式。因为在合作经济中所有权权利并不属于每个合作者本人(因为这一点它可能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它们必须由"社会的代表"，也就是说，由国家来行使。所有权可能转移给一些互相"竞争的"国家投资银行，但这样做根本不能消除由于国家掌握所有的资本所有权而对自由和效率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第二，缺少真正的资本市场意味着国家投资银行"根本无从了解合理的资源配置所需的关于相对短缺方面的知识"(Gray，1992，p.46)。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经济将会缺乏资本配置的多重空间，而这一点对于合理的经济决策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人不能持有资本会导致各种反常的经济动机的产生。缺乏资本收益这种经济动因，将会妨碍新企业的形成，从整体上看压抑了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和在中央计划条件下的情况一样，合作经济领

133

域中的资源配置也倾向于“偏爱有牢固地位的生产集团，出现很严重的逃避风险现象和故意掩盖投资不当行为”(Gray，1992，p.47)。在合作企业内部，对工人来说存在着一些反常动机，怂恿他们低于标准投资，不去成功地利用新的市场机会，限制就业的扩大以及浪费企业的生产资本。

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公正和再分配

最后，由于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致力于某种形式的“社会公正”和某种财富再分配措施，因而新自由主义者对此也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已经看到，出于个人自由和经济效率方面的考虑，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容忍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的存在，但他们也相信，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再分配实行某种程度的干预，也由于对社会公正的追求而具有正当理由。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这种批评是哈耶克谴责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他争论说：“在自由人社会中[原文如此]，社会公正的概念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空泛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在这样的自由社会中，“没有任何人的意志能够决定不同的人的相应收入，或妨碍他们部分地依赖偶然事件”(Hayek，1982，vol.2，pp.68—69)。普遍市场秩序的规则和程序是，而且也应该是公平的，但是特殊的市场交易结果及其可能产生的分配方式是不具道德内容的。尽134 管国家提高税收有其合理的目的，但它们不包括通过从一些公民到另一些公民的强制性资产再分配来促进平等(或任何其他分配方案)。同样，格雷也认为，再分配没有什么合理的道德基础。分配原则经常涉及一些个人或团体与另一些个人或团体之间的关系。“每种分配主义形式的错误[在于]其固定在没有道

德地位的关系性质上”(Gray,1992, p.40)。政治道德——个人福利——的惟一真正前提是要求我们满足所有公民(可满足)的基本需求,而不是去关注收入的相应分配。依格雷看来,这可能会合理地说明极为广泛的国家行为(例如,加强有能力的福利国家和资助歌剧),但无力解释那种实行政府干预以支持某种特殊的商品和资源分配模式的做法。

结　　论

显然,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概括的现代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面临着来自右翼和左翼两方面的具体的、系统性的挑战。一些批评家将市场社会主义谴责为无连贯性、无效率、不公平、不民主和反自由,而且根据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作出的反应,人们不得不说其中的一些批评意见颇有分量。但是它们不是像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对市场社会主义工程极为不利。因此,只有我们认为传统社会主义观点是“正确的”、可行的和穷尽了社会主义的所有“真正”内容,左翼的批评对市场社会主义方案来说才可能是致命性的。因为这些批评意见中没有任何一项特别具有说服力,所以,那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由于同这种正统的要求不相容而必须被抛弃的观点看来是错误的。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秩序真的像哈耶克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那种情况一样,那么新自由主义右翼的批评看来很重要。然而虽然哈耶克的挑战很有分量,且一些人认为它为批评市场社会主义提供了恰当论据,但是这种挑战不会无可争辩地赢得胜利。当我们从普遍市场秩序领域转向现实市场社会时,情况尤为如此。哈耶克市场秩序中的许多看来合理的前提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

在。因为市场社会主义被其倡导者首先视为一种实用的或可行的战略，所以我们应该首先根据现实可能性对其作出判断。最后，尽管来自左右两翼的联合挑战实际具体，但决不是两种倾向中所有的观点在反对市场社会主义方面同时具有效力。如果这样谴责市场社会主义，即：既要求它抛弃社会所有制又同时要求它将所有经济资产国有化，既要求它追求社会公正同时又要求它抛弃社会公正，这样做看来就是违背常理了。（当然，为了跨越社会主义和市场之间的壕沟，市场社会主义最后当然有可能去拥抱两者的最坏方面，而不是最好方面。）

有趣的是，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却一致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同一领域最有问题。这样他们就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地放在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和合作经济的本质上。我将在本书第六章里对市场社会主义手段中的这些重要因素进行详细讨论。与此同时，虽然左右两翼的批评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的本质有所涉及（非常传统地提及），但是他们（以及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本身）都没有对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实质和民主化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5] 然而很明显，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要成为行动的指南，那么就要求对（国家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所进行的再思考，应和对其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改进了的市场等问题作出的考虑一样多。我在本书第七章对这些尚未充分考虑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进行分析。最后，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的最有力论据（据说它能抵消其许多理论上的不完善和不连贯之处）就是它的可行性。在最后一章，我将考察所说的这种可行性，这不仅要对市场社会主义是否能够提供一种连贯的和可行的模式作出判断，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对它能否在现实情况（本书第一部分所分析的那种

情况)下为处于变化环境中的中左政治力量提供一个可行的政治纲领作出判断。简而言之,是否有人想做这件事情?而且,假若有人去做了,它能否成功呢?

注 释

1 关于"平等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论述文献很多,我在这里不能一一涉及。可参见 Baker(1987);Dworkin(1981);Miller(1993)。

2 对这一困难领域作出的有益介绍,见 Reeve(1987),Roemer(1982 和 1985)。

3 参见 von Mises(1951),Nuti(1992,p.22)中援引。

4 对这个问题的近期争论,见 Roland 和 Sekkat(1993)。

5 米勒(Miller,1989)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例外。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七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他对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的论述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问题。

136

第六章　劳动管理的政治经济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在许多方面看来最为显著的地方，就是希望保留市场经济的许多配置手段功用，同时将这种经济同经常与其联系在一起的私有资本的统治分离开来。在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虽然远不是全部)，生产者合作社和/或劳动管理型经济是必不可少的经济组织形式，采取这种组织形式，能够使社会主义远离庞大的国家，并可以同被重新确立的市场经济的规则连接起来。[1] 从单个企业层面来看，生产者合作社由其内部工人自我管理，这些工人已不再是雇员，而是成为“企业的成员”。这种组织形式被认为是能够将市场的许多优点，诸如效率、革新、消费者选择、分权、多元主义等等，同那种与私人资本的统治剥削权力分离开来的财产制度结合起来。从宏观经济层次上来看，劳动管理型经济在没有私人资本统治监护的条件下，能够保证市场的效率和分权。本章将要考察的内容就是生产者合作社和劳动管理型经济在市场社会主义计划中实现这种重要功能的能力，及其必然产生的关于“社会所有制”性质的难题。

一、合 作 社 传 统

合作社运动有着漫长的和令人瞩目的历史，盛衰交替，荣辱

并行。现代形式的合作社可以追溯到19世纪20和30年代,英国著名的罗伯特·欧文和其他一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傅立叶、布切兹和布兰克,在他们的著述和言论中都有源可及(Potter,1891;Cole, 1953; Lambert,1963)。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合作社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一代较为现实的男女,其中最有名气的要属罗奇代尔合作社先驱者(Rochdale Pioneers)(Cole, 1945; Pollard,1967; Oakesshott,1978)。有一些积极分子认为,合作社原则发展到19世纪末已经代表着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替代形式,只是在社会主义(不幸地)蜕变成为工联主义、集体讨价还价和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的时候,这种替代形式才失败了(见 Luard,1991;Hirst,1993b)。当然,曾经确实存在过工人阶级互助主义的重要历史传统,它们在某些环境中完全被国家干预破坏了。在英国,通过采取法定福利供给措施使友好社会边缘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Gilbert, 1966; Pieson,1991a)。但是,如果把生产者合作社当作20世纪劳工运动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便是一种幻想了。虽然有些时候消费者合作社据说已经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组织(尽管不可能是一种群众运动),但生产者合作社却常常代表着产业活动的极小部分(Estrin 和 Perotin,1987)。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领域中(尽管存在一段时间的法西斯压制的插曲),生产者合作社长期以来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们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具有特殊的宪法地位。1951年,意大利已经有2000多个生产合作社存在,雇用了55 000多名工人(Zevi, 1982, p.241)。到1970年,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著名的蒙德拉贡联合体已经合并了不止40个产业合作社,拥有8500名工人(H.Thomas,1982,p.131)。但在这些国家,这代表的仍然只是经济活动的极小比例。在规模庞大的英美国家经济中,生产者

137

合作社的作用仍然处于很远的边缘位置。据德雷克·琼斯(Derek Jones)的记载,到1968年,英国只有30家长期稳固的生产者合作社,雇佣工人不足4000人(Derek Jones,1982a,p.181;1983,p.36)。在庞大的美国经济中,他估计在20世纪50年代,大约有不到500家生产者合作社,而且大多集中在特定的产业部门和地区(Jones,1982b, p.54)。

近20年来,生产者合作社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尽管是从极为适中的基线上发展起来的)。据巴特莱特和他的同事们(Bartlett 和 Pridham,1991; Bartlett, Cable,Estrin,Jones 和 Smith,1992)提供的材料说,到80年代中期,生产者合作社的数量在意 138 大利已经达到20 000家,在西班牙是6000家,在葡萄牙超过2000家。据托马斯估算,到1990年,英国的生产者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包括1400多家企业、约有10 000名工人的规模(A.Thomas,1990;也见 Hobbs 和 Jefferis,1990)。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生产者合作社领域的就业人员超过了30万人。在整个80年代,合作社领域的增长率也是令人瞩目的。在这个时期里,许多传统的产业部门面临着严重的萎缩,同时许多左翼政党和组织(工会、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处境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却又重新激起了学术界和政界的兴趣。然而,除意大利局部地区例外,在大多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的经济中,这种迅速扩展的趋势仍然使生产者合作社占很小的比例(例如,甚至到了1990年,英国的生产者合作社人员占全国就业劳动力的0.001%还少)。[2]

二、劳动管理型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虽然合作企业和劳动管理型经济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处于边缘地位,但它们确实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关于它们早期发展阶段的论述,见Jones,1968;Potter,1891;Fay,1908)。在当代的讨论中,亚罗斯拉夫·范尼克(Jaroslav Vanek)、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以及在低得多的程度上,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布兰柯·霍瓦特(Blanko Horvat)和艾弗塞·多马(Evsey Domar)等人的理论著作具有权威性。[3] 当然这些著作都非常抽象,如果不具备经济学正式术语的背景知识,一般读者是很难理解的。关于赞同和反对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广泛的理论观点可以用许多非技术的用语来概括(可能有失准确)。由于多种原因,讨论劳动管理的现实经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虽然合作工厂的近期发展为人们进行比较性和经验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真正的现实例证还是很难找到(特别是在我们对那种在任何时期都能延续的企业范例感兴趣的时候)。更为困难的是,我们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些为数很少的合作工厂的经济活动中所发现的证据,很难用于说明它们在那种合作形式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中可能的运作情况如何。因而,对于资本主义环境中完全非典型企业形式的合作社(常常是在非典型的条件下由非典型的劳动者建立的)能够适用的东西,不一定就能适用于那种在劳动管理型经济中作为"一般性"工厂形式的合作社。可能的情况是,合作工厂在规模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在这种敌对的经济和法律环境面前相形见绌)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可能容易解体),可能遇到许多在广泛的 *139*

合作经济中将不可能会产生的问题(Horvat,1982,pp.456—461;Elster,1988)。甚至可以说,处于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合作社的实际弱点不一定与评判市场化社会主义条件下合作形式的可取性有多少联系。

鉴于以上这些考虑,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是:不存在一个"真实的"劳动管理型经济模式,以供人们从中分析得出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潜在可能性。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化经济中确实曾经存在过合作社,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深深卷入到国家统制型经济中,根本不能为说明社会化市场经济中合作社的运作情况提供多少启示。[4]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经验空白已被前南斯拉夫经济的例证填补了。众所周知,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从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脱离出来,就是通过宣布建立一种新型的"工人"自我管理的政治经济体制来实现的。(Broekmeyer,1970; Comisso,1979;Djordjevic 等,1982;Estrin,1983;Lydall,1984;Ben-Ner 和 Neuberger, 1990;Dyker,1990;Prout,1985)。至少从形式上说,南斯拉夫的经验为关于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假说提供了试验场。我们可以有理由把 1950 年后的南斯拉夫看作是与真正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最为接近的经济形式。然而在现实中,南斯拉夫是否为劳动管理型经济提供了令人满意的试验场所,这还很难说清。用波宁和普特曼的话说,

> 如果把南斯拉夫当作一种独立的、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竞争的工人管理型经济模式,那就是一种误解。实际情况是,工人控制是在计划者和市场规律都缺乏的社会主义经济环境中开展的,而且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是那种视工人自我管理和工人收入保障为神圣的意识形态的抵押品。(Bonin 和

Putterman, 1987, p. 112)

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关于共产主义联盟的政治考虑和维持国家联邦结构的复杂任务，也经常削弱工人的自我管理和市场逻辑。而且，南斯拉夫体制也一直处于不断的改革中。本纳和纽伯格指出，从二战末期至 1990—1991 年南斯拉夫正式解体这段时间，南斯拉夫国内存在着不少于六种不同的经济体制，或许只是在 1965—1974 年，南斯拉夫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才可以被描述成为一种"市场自我管理"的形式（Ben-Ner 和 Neuberger, 1990; Estrin, 1983, pp. 58—77; Flakierski, 1989, pp. 3—17; Prout, 1985）。 *140*

鉴于南斯拉夫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惟一模式（但有很大的缺陷），所以它引起了人们的许多关注。[5] 尽管大多数评论家（批评者和赞扬者兼而有之）面对的是一种极为混乱的经济和政治现实，但他们都倾向于从南斯拉夫的实际经验中推演出非常特殊的典型理想模式，即南斯拉夫型经济模式。这种倾向的典型代表是本杰明·沃德的评述劳动管理型企业的著名著作，他的观点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广泛接受。他把这种模式称为"伊利里亚企业"（the firm in Illyria）（Ward, 1958）。伊利里亚当然是想象中的理想之地，但与斯洛文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半岛同名，它曾经是南斯拉夫的领土。沃德的著作理论性较强，但能对那些倡导南斯拉夫式工人自我管理经济的人有很大的启示。那些同情劳动管理型经济观点的人，如霍瓦特和范尼克，都在有缺陷的南斯拉夫经验中看到了自我管理型经济可能性的征兆，并把这种经济在现实中的失败归咎于南斯拉夫经济和政治局势的独特性，而不是工人自我管理型市场经济的普遍性弱点（Vanek, 1972; Horvat, 1982）。

上述背景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要对工人自我管理型经济的可行性和可取性作出明确的判断是很不容易的。但不论如何，现有经验的许多证据能使我们对作为未来市场社会主义之核心因素的生产者合作社的可行性作出一个暂时的判断。我相信，它能够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构建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一个基本问题上去，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所有制的实质。

三、劳动管理型经济概况

当然，人们可以用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叙述工人所有制企业和劳动管理型经济的特征。[6] 在这一节里，我将提供一个我认为是最能被广泛接受的劳动管理型经济模式的概括性叙述，并从随后的严谨的分析中得出一些十分重要的与这种模式有偏差的结论。我认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企业作出评价，基本上是增进我们对较为一般的工人自我管理体制的理解的一个途径。

141 最简单地说，劳动管理型经济是这样一种模式，即"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并由利用它们的那些人进行管理"，它是一种"劳动雇佣资本而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Selucky, 1979, p. 179; Estrin, 1983, p. 12)。依据米德的概括，劳动管理型经济是这样的：

> 工人们联合起来形成集体或合作团体以经营企业；他们根据投入和产出，以自己能够获得的最好市场价格租用资本、买进原材料和出售企业产品，他们自己承担意料不到的盈亏风险，并在集体内分配从而产生的盈余（1988a, p. 158)。

在劳动管理型企业的"纯粹"形式中,"最终决策权 …… 由工人们自己掌握,这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础,不分职业、技能级别,或投入资本多少",在这里"不会有一位非企业工人在企业决策中有直接的发言权","也不会有一位工人被取消企业决策的平等发言权"(Bonin 和 Putterman,1987,p.1)。这样,所有的劳动管理型企业成员,也只有他们,应该在企业管理中(尽管日常事务管理也可能由职业经理负责)拥有平等的发言权。企业内部的分配不需要是人人平等的(尽管应该是集体赞同的和"公正的")。虽然工人们仍然需要自己自由选择工作和工作场所,但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了(Vanek, 1970; Steinherr,1983;Horvat,1982)。在斯科特·阿诺尔德(Scott Arnold)的论述中,这种体制与市场资本主义有两个基本方面的区别:"第一,工人们集体控制生产资料。第二,工人的劳动力不是出卖给企业以换取工资的商品。因为工人已成为剩余索取人,他们是为了得到企业收入的份额而劳动,而不是为了一份工资"(Arnold,1992,p.9)。

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倡导者认为,这种体制具有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许多优点,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许多严重的道德和政治缺陷。剥削,如果理解为"控制他人劳动(加之)攫取非劳动收入",被消灭了;异化,在那里首先认同为工人们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给雇主,也可以大大减少(Horvat,1982,p.90)。工作场所的民主参与和个人自主的机会,这些都遭到法人资本主义组织结构的严格限制,却能够由于劳动管理型经济之新型参与机构的建立而大大拓展(Pateman,1970;Dahl,1985;Cohen,1988)。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将被大大降低。与此同时,鉴于组织机构合理,劳动管理形式还能够大大提高 *142*

现存市场经济的纯经济效率。倡导者还认为民主参与能够大大提高工厂的工作动力和精神状态。劳动管理型经济还能够消除由于经理/所有者与工人之间的传统性敌对而造成的损失，它能够节省由于监督抑制怠工的需要而付出的精力，减少停工和罢工的次数。它将在工厂中鼓励更大的灵活性和创新，加强技术和组织信息在企业内部的自由流动。由于在劳动管理型企业中平均的劳动持续期可能延长，还能够增强培训和强化综合性的和企业专门性的人力资本的动机(Vanek, 1970; Pateman, 1970; Jones 和 Svejnar, 1985; Estrin, Jonesh 和 Svejnar, 1987; Elster 和 Moene, 1989a)。

四、否定劳动管理型经济的观点

当然，工人自我管理的倡议还远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成。在本节中，我考察一下那些否定劳动管理型经济之可行性和/或可取性的观点(主要是理论上的)。现在，我将不讨论那些专门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企业所面临的困境的论述(例如，商业银行不愿意为合作社提供贷款；合作企业也雇用工人，有"蜕变"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公司的倾向)。[7] 我将主要集中讨论那些反对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劳动管理形式(即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的观点。

诸多这种讨论的共同起点一般见于本杰明·沃德(1958 和 1967)和亚罗斯拉夫·范尼克(1970 和 1972)的著作。虽然两个人在工人自我管理的前景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都是在广泛类似的劳动管理型经济模式的基础上讨论问题的，而且这种模式也为后来的一系列争论限定了范围。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一

致认为，劳动自我管理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企业的经济目标不再是（像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每个工人的收入最大化。通过考察这种企业的简单模式和基于传统新古典主义的假设，沃德认为，从短期来看，在一种劳动管理型经济中追求每个工人收入的最大化将会产生一种反常的后果。简而言之，一个合作工厂（与其资本主义同行相对照）要对其产品价格的上涨（下降）作出反应，减少（增加）产量和（如果可能的话）就业。沃德还指出，劳动管理型企业将对财政政策的变化作出反常的反应，并将比垄断条件下相应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要少。从长远来看，自我管理经济也应达到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是通过新企业自由进出的均衡效果来实现的。然而，如果这些考虑都与预期的现实经济运行有关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为企业自由进入（退出）而确立的制度机制。 *143*

尽管人们对沃德的假设（以及对一些"修正过的"伊利里亚经济的衍生模式）非常关注，但是它关于劳动管理的真正特征的论述还是很模糊的。[8] 一些人认为，沃德预言的那些反常后果也许在理论上很有说服力，可是它们是一系列不真实的假设。或者，一旦采用一种非简单化的模式，这些假设也就难以成立了（Pfouts 和 Rosefielde，1986；Mygind，1986；Miyazaki 和 Neary，1983；Fleurbaey，1993）。其他一些人，如布兰柯·霍瓦特，则坚持认为，我们已经获得的关于劳动管理型经济中企业实际运作的有限经验证据表明，它们对市场信号的反应方式根本不是沃德所描述的那种情况，而是与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的情况极为相似（Horvat，1982，pp.339—344）。可以这样讲，沃德的整个见解过于简单和抽象，不能对一种真正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可能性构成强有力的

否定。可是，还有其他一些较为具体的否定意见，或从经济理论中得出，或从合作社经济的实际经验中得出，它们很有可能给劳动自我管理的倡导者带来棘手的难题。

许多批评意见都集中在自我管理的经济可行性问题上，其中或许最为持久的和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合作企业将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工人的机制。[9] 有人认为，经选举产生的管理机构经常缺乏约束其“选举人”的权威。在一个工人控制的工厂中，没有人拥有指导生产的权力，也没有人具有执行工作纪律的动机。工人相互监督也许在较小的团体内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即便这样，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见 Demsetz，1967；Chiplin 和 Coyne，1977；Potter，1891）。批评家们还看到，与资本主义企业相比，合作企业在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方面组织不力。这种批评部分是指所谓的民主决策缓慢无效率，以及对市场条件的迅速变化无力作出迅捷果断的反应（纵然如此，如果给予充足的时间，工人们也许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它也部分是指工人缺乏应付复杂的和经常变化的市场环境所需的技术和资金能力。批评家们还坚持认为，工人管理型经济的内在结构形式极大地妨碍了技术革新和最优发展。企业家的作用经常是以自发的个人主义表现出来的，革新的动力及其伴随的风险主要是建立在对相应资金回报的期望之上（见 Fanning 和 McCarthy，1986）。即使一个工人管理型企业以企业家的经营方式运作，可能发生的情况也许是，工人收入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这一反常机制也使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技术发明（Brewer，1988）。而且，考虑到工人在一个特定企业中的利害关系（即使是在工人们自己不提供资本的企业里），工人们可能越来越逃避风险，这正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相反（他们能够通过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同样，新建一个

144

工人集体性企业(工人之间还要相互认定)要比新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可能单独建立)付出更多的代价。最后,不管沃德如何设想,合作企业在实践中是特别不情愿解雇工人的。的确,这有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力量所在,它们能够通过降低收入而不是减少就业人数的方法度过经济萧条时期。然而,一些批评家有时却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劳动合作企业的弱点,它们不进行长期的自我消耗就难以生存下去。劳动管理型经济的上述缺点合起来,就会造成宏观经济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混乱,不能将资金和劳动力运用到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方,经济效率和增长也相应降低。

另一类批评意见与工人自我管理的政治特性相关。最为基本的观点是,市场社会主义缺乏任何一种可信的政治支持。约翰·格雷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在西方社会缺乏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支持 …… 在苏联集团内部 …… 它也遭到嘲笑否定"(1992,p.53)。然而还存在一些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更具理论性的否定意见,其中许多是批驳所谓的自我管理体制的优点的。例如,斯科特·阿诺尔德就对广泛声称的市场社会主义将消除剥削的观点进行批驳。他认为,在工人合作经济中,一个特定企业的工人收入是由全体人员民主决策决定的。就中期而言, *145* 将会发生这样一种倾向:较不熟练的工人联合起来形成多数,使熟练工人的收入降至低于能够反映其对企业"真正"贡献的收入水平,同时他们却获得比自己的"贡献"水平要高的收入。这样在企业内部,较不熟练的工人就剥削熟练的工人。而且,在这样的工人合作社经济中,在消除私人资本的情况下,这些较为熟练的工人别无选择,只能使自己屈从于那些从事价值较低的劳动的人的剥削(Arnold,1992)。

约翰·格雷提出了相似的见解。我们已经看到，合作社经常被其倡导者说成是能够使工人摆脱私人资本的支配，然而实际经验证明，普通工人却极不情愿选择合作社形式。按照格雷的说法，"没有经验证据表明大多数工人喜欢自我管理的工人合作社而不喜欢资本主义企业。如果他们能够作出抉择的话，他们不会选择退出资本主义企业而加入合作社"(1992, p.49)。戴维·米勒和乔·埃尔斯特都试图这样解释这种不情愿现象，认为这是制度造成的成见作怪，是因为较小的合作领地被汪洋大海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包围的结果(Miller, 1981; Elster, 1989)。格雷的解释更为直截了当。他断定，实际上工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能比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享有更大的自由，这也包括工人合作社的市场社会主义(Gray, 1988 和 1992)。工人们很容易对合作社抱有敌意。看起来只能通过取消工人向雇主出卖劳动力的权利才能建立起合作社，即废除传统的工资劳动形式。然而这种废除并不能以所谓的能够使工人获得更多的自由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格雷指出，随着资本的社会化，工人们虽然不再面对多个资本所有者，但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的资本提供者(以国家或其代理人的面目出现)。资本分配将会越来越变成政治性决议，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越来越难以获得生产资源。由于禁止选择其他形式，工人们将被"囚禁在他们的工人合作社内部，可能要屈从于中央政府的剥削性干预"，用斯科特·阿诺尔德的话说，是受联合起来的不熟练的工人的剥削(Gray, 1992, p. 51; Arnold, 1992; 也见 Arnold, 1987a, 1987b, 1989)。在现存的法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下，工人们的确面临着对其自由的种种限制，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仍然)是比其他任何可实行的方案(其中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更能够提高工人自由的制

146

度"(Gray,1988,p.109)。

人们进而对市场社会主义能够促进(更具参与性质的)民主这一核心主张也提出了挑战。这种反对意见是在两个层次上提出的。第一,虽然合作社形式看起来能够提高企业内的民主,但在实践中这种期望却往往变成失望,因为自我管理"要被必然出现的管理精英所削弱,也经常遭到权威的干预 …… 被中央政府的干预所削弱"(Gray,1992,p.49)。更为重要的是,在那种企业层次上的民主预期必定要变成失望的同时,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的结果也将给现实存在的民主,即国家层次上的代议制民主,带来损害。我们知道,例如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著作中,民主是以现存的私人自愿交换为前提的。市场社会主义反对者的观点是,在实践中,令人难以捉摸的"社会所有制"范畴将意味着实际的国家所有制,整个 20 世纪的经验证据也表明,经济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的做法将助长更为集权的管理形式。

对工人自我管理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反对意见汇集起来,集中在如何处理颇有争议的所有制和资本分配问题上。显然,诸多这样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资本主义环境中运作经营的合作社必须面对的。例如,在募集外部资金问题上,合作社,这里自我管理已经预先排除了企业外部持有股票的可能性,与资本主义竞争者比起来将发现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为集体所有并由内部成员提供资金的合作社(对于私人成员来说不具有企业资本转让权利)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即难以协调"旧的"和"新的"成员之间的意见冲突,也难以处理工人的激励机制问题,因为工人不能指望从自己投入到企业中的资本那里获得回报(Furubotn 和 Pejovich,1970; Pejovich,1990)。无论如何,这种内部投资对于工人成员个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财产风险。正如米德指出

的那样，“财产所有者可以将其财产分成小部分投入到许多不同的企业中去以分散他们的风险，而一个工人却不容易将自己的努力分散投入到许多不同的工作上去”(1988a,p.181)。那些将自己的工作和资金固定投入到一家企业的工人如遇这家企业破产，自己就不得不遭受灾难，因而他们就特别想逃避风险。

147

上述许多问题也许不能简单地适用于沃德和范尼克所界定的市场社会主义类型。在他们界定的类型中，生产资料是归整个社会所有的(Ward, 1967, p.7)。尽管范尼克确实是合作形式的热情倡导者，但是他非常相信把集体所有制和自我提供资本结合起来的做法具有许多弊端，因而他坚持认为劳动管理型经济应该是一种全部企业都完全由外部提供资本的经济。在一种“混合经济”中，自我提供资本所付出的成本代价看起来使工人管理的企业不具成功的机会(这也的确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处于混合经济环境中的合作社经常是长期性资本供应不足)。当然，这种竞争上的不利不适用于合作社是惟一合法的或至少是有法律特权的企业形式的地方。然而，就是这种采取外部提供资本形式的劳动管理型经济也仍然有顽固的反对者。米伦科维奇(Milenkovitch)就是一例，她援引了新古典主义的原则，即“如果利润的领受者不同时是亏损的承担者，那么风险承担也不会带来效率”(1984, p.87)。她坚持认为，在资本完全由外部提供的条件下，企业会倾向于将资本过于集中使用。无论是采取高风险投资战略，还是通过超额发放工资的做法减少投资，工人们根本不去关心资本的真正亏损。奇普林和科因(Chiplin 和 Coyne, 1977)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认为工人们在不拥有企业的情况下进行该企业的经营，他们会倾向于以牺牲资本的“社会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通过超额增加工资的做法减少投资。当然，资本

也不是工人管理型企业的"自由"财源,因而可预料企业要支付反映短缺情况的资本租金,没有能力(继续)偿付这种花费的企业就将宣告破产。然而这将导致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个问题应和了冯·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之整体不合理性的论述:如果没有资本市场,我们怎么会知道反映短缺情况的租金是由什么东西构成呢?如果始终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既定框架内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的话,人们就很难说清(至少对我来说如此)上述主张到底能够表明什么。我们在本书第四章已经看到,如果我们始终在新古典主义假设的领域内兜圈子的话,一些评论家就感到米塞斯对兰格的反对也是不成功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具破坏性的观点是:在实践中,"社会所有制"将意味着实际上由国家所有(和控制)。人们可能(仅仅是可能)会想象出一种国家银行体制,由它根据市场上的资本利率向独立的工人所有企业出借资本。但是如果资本所有者(也就是"社会")的权利要得到很好保护的话,这些银行必然会积极卷入工人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去。 148 的确,对企业债务银行若无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我们没法对那种银行只贷出资本而不对企业经营感兴趣的金融制度作正常的评论。可是,如果(甚至多数)国家银行是企业资本的惟一来源的话,就存在着经济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手里的真正危险。(这是市场社会主义声称要克服的一项首要弊端)。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很容易设想引进政治压力,负责防止企业的自由进出(特别是防止破产),防止以完全市场价格向企业征收资本使用费,软化预算约束,甚至可能维护大型既定合作社的利益。批评家们认为,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在前南斯拉夫的经验中都能看到。它表明:这不是劳动管理的反常现象,而是其固有的本质。

五、劳动管理型经济评价

现在人们很难对劳动管理型经济的发展前景作出明确的结论。一些论述这样怀疑:关于劳动管理型经济的一些理论设计(不论是沃德的“伊利里亚企业”还是范尼克的“一般理论”)得出的结论,尽管看起来十分有趣并分析“得力”,可是它们却没有告诉我们多少有关这种经济形式的可行性证据。(Elster 和 Moene,1989a; Milenkovitch, 1984; Bonin 和 Fukuyama, 1986)。一些批评家坚持认为这种理论设计本身就会把人引入歧途。从理论上讲,劳动管理型企业要比资本主义企业更为资本密集,并且为了经营成功也更容易分流劳动力。从实践上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却是经常性资本不足,甚至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也不愿意将劳动力分流出去。当然,这极为可能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少数合作社与大型的劳动管理企业经济之间的行为差异。但是仍有一种怀疑观点认为,劳动管理型经济在实践中可能与这些新古典主义的设想截然不同。至少有一些评论家们相信:“(自我管理企业的)假设越现实,它与自己的资本主义‘同胞兄弟’比起来也就越有效率”(Mygind,1986, p.74)。虽然现实运行的经验越来越多,但它们还是极为有限,况且多数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存在的少数合作社的经验。至149 于那种在实行了资本社会所有制的普遍性劳动管理型经济中的企业行为,现在还是难以说清的。同时,关于劳动管理的宏观经济效果的论述大部分局限于颇有争议的前南斯拉夫经验。但不论如何,我认为还是能够合理地得出一些关于劳动管理的有限制的结论。

首先,大多数关于工人自己没有管理企业能力的那种启示录般的判断实际上很难自圆其说。确实,有许多合作社在其成立后不到几年就夭折了,但是这种命运也是许多非常正统的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小企业所面临的,况且有一些证据表明合作社的存活率如果谈不上较高的话,也不比资本主义小企业的存活率低(Estrin 和 perotin,1987,p. 167)。合作社也确实会有内部分歧和欺诈现象出现,但是近十年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法人企业,特别是在金融失控的情况下,也发生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欺诈、盗窃和内部分裂现象。在劳动管理型经济条件下控制金融混乱,也同资本主义经济一样,要依靠公司法、审查实际经营活动和政策,而不是依赖激励性的资产所有权。实际上,工人阶级合作主义的漫长历史记录也能极大鼓舞那些倡导扩展自我管理的人,尽管这个历史中也难以避免地穿插着一些不诚实的事件。

在发达西方经济里不断增多的合作社经验中也可以看到支持劳动管理倡导者的证据。格林勃格(Greenburg,1984)在对美国西北部胶合板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合作社要比其资本主义同行更有效率。布莱德雷和盖尔(Bradley 和 Gelb,1986)在他们对蒙德拉贡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合作社联合体在工资、利润和就业方面都比周围的资本主义企业做得好。巴特莱特(Bartlett,1992)和他的同事在意大利中北部对合作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所作的比较研究中,发现合作社不仅具有更为平等的工资结构、更为稳定的就业结构和较好的产业关系,而且还比其资本主义同行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埃斯特林、琼斯和斯维耶纳(Estrin,Jones 和 Svejnar,1987 和 1989)在西方的一些生产合作社中发现了工人参与制对生产率产生了积极作用的证据(也

参见 Jones，1985）。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证据都使劳动管理的倡导者欢欣鼓舞。例如，两位伯尔曼（Berman，1989）对美国胶合板生产合作社的记录就比格林勃格的论述要含混得多。在英国，150 霍波斯和杰弗利斯（Hobbs 和 Jefferis，1990）也对近十年来合作社领域的规模和扩展能力提出了异议。但不论如何，我认为我们拥有了充分的关于单独和联合的合作企业能够成功的例证以否定那种认为劳动管理企业必然不稳定的观点。

然而对于自我管理的倡导者们来说，还存在着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难以处理的政治支持问题。许多人都接受一种观点，即在企业雇员中间存在着（有时很含混）一种要求更多自主的愿望。那些较有头脑的自我管理经济的支持者们也承认，向劳动管理型经济转变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种可行的或者一种特别合理的政治目标。依照埃尔斯特"适应性偏好"的逻辑，情况也许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员根本不会表达对劳动管理的爱好。向劳动管理型经济逐渐过渡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作社的处境极为不利。[10]尽管到了 20 世纪末期，人们还绝对不会认为多数人的意志应该搁置一边而听从一位能够知晓多数人的"真正"利益的开明精英人物。政治支持问题和过渡政治将在本书第八章中进行讨论。

在劳动管理型经济结构中还一定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经济问题。其中一些是技术性问题，这最好留待经济专家们去解决（尽管人们现在难以确定经济学家们而不是政治理论家们在这一领域是否能够达成明确的一致意见）。面对关于劳动管理型经济的一系列理论预期，其中许多论述看起来还需要经验证据，由于已经讨论过的多种原因，这种经验相对来说还比较缺乏，且

又非常不确定。在某些意义上说，劳动管理经济的许多问题，诸如生产率、就业、增长、积累和通货膨胀等等，都还处在疑惑之中。尽管这些考虑都十分重要，可是我们已经反复看到的是，反对劳动管理型经济的核心观点却是关于所有制问题。当然，实际上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在他们社会化经济的边缘为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空间，而且大多数人还为国家保留了重要的经济作用，如果国家不是扮演所有者角色的话，它也是指导性的计划者和最后手段的提供者。然而很明显的一点是，捍卫一种明确的社会所有制，既不是私人性质的也不是国家性质的，对于市场社会主义者实现自己提出的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理论方案来说则是特别重要的。与此同时，关于实现社会所有制的后果问题也是批评家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重点，而且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反对意见在讨论劳动管理型经济和工人合作社时尤为激烈。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者能够捍卫住自己的立场的话，显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对社会所有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可行界定。 *151*

六、社会所有制：南斯拉夫及其他

为探求社会所有制的连贯定义，人们可能首先自然而然地转向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的理论传统。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自己所作定义的核心部分毕竟有这样的论述，即他们已经建立起一种以新的所有权形式为基础的新型社会主义政权。实际上，南斯拉夫的经验材料只能用来建立一种非社会所有制的财产形式。据说社会所有制不是全体共有的制度，全体共有制度是一种全部社会财富在任何时候毫无例外都属于所有公民的所有制

形式。这样定义可以免遭一些批评家(从亚里斯多德到德姆塞茨)所提出的严厉苛责,即所有的人共有容易导致无人管理(Aristotle, 1946, p.44; Demsetz, 1967)。[11]社会所有并不等同于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制(特别是在较为落后的社会)可以被看作是向更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过渡的重要阶段(Kardelj, 1979, p. 47),但它始终只是代表处于发展中的"低级"社会主义形式,只是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阶段才有必要,并容易蜕化成为(例如在苏联)这样一种新型统治:一个全权的官僚机构统治着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这些劳动者仍然是"在物质上依附、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屈从的 …… 工人阶级"(Djordjevic, 1966, pp.79—80)。[12]

如果回过头来看一看对"社会所有权究竟是什么"(而不是解释它不是什么)所做的较为明确的界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南斯拉夫自我管理理论实际上于事无补。著名的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极为赞同地援引了马克思的几段论述,这些论述是马克思试图说明那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形式与想象中的"原始共产主义"尚未分异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差别。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坚持认为那种代替资本主义占有形式

152

的政权"不是重建生产者的私人所有权,而是赋予他个人所有权,这种个人所有权是……以合作和共同占有土地和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Marx, 1973a)。然而这种"以合作为基础的个人所有权"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还是很不清楚的。南斯拉夫的一些评论家们认为(因为追随马克思,所以他们这样认为),社会所有权并不局限于"一种法律制度"(这看起来似乎能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而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Caresvic,1974,pp.3—5)。按照卡德尔的观点,"社会所有制的形式和

内容在不停地变化";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不是"静态的社会现象"(1979,p.47)。我们所发现的这些关于社会所有权的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内容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否定性的。在乔尔杰维奇的论述中,社会所有权"不是一种财产权,而是一种生产资料的非财产化形式"(Djordjevic,1966,p.87)。在南斯拉夫联邦宪法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强调:

> 因为没有人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以没有人——不论是社会政治共同体,还是劳动组织或者工人个人——在任何财产-法律基础上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或控制、处置社会生产和劳动资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由 Caresvic 援引,1974;强调部分有修改)。

在卡德尔的论述中,"社会所有制实际上意味着——在这个术语的积极意义上讲——没有人的和每个人的,也就是集体的和个人的所有制"(Kardelj,1979,p.49)。所以并不奇怪,乔尔杰维奇含糊其词地将社会所有权描述为"语义含混的概念",米伦科维奇则较为尖刻地把它说成是"空泛的"东西(Djordjevic, 1966, p. 83; Milenkovitch, 1971, p.266)。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现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倡导者来说十分遗憾的是,他们本应不再对社会所有制形式作出更多的论述了。索尔·埃斯特林(Estrin,1989)则极为广泛地赞同作为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概念之支柱的那些意愿,他把社会所有制描述成为这样一种制度:"资本股票由社会集体所有,但它仅仅是由单独的工人团体进行管理";"工人被赋予使用、扩大和调整资本的权利。他们以此挣得收入。然而,他们不能拥有它,也不允许

将其出售或使其耗竭"(Estrin, 1989, p.173)。尽管这种所有权划分的原则和意图使人一目了然,但埃斯特林对所有权制度形式的苦心论述以及这些形式对整个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还是不甚明了。另一方面,他遭到了德亚赛的尖锐批评,说他是在企图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实践中,"社会所有制"只不过是

153 "国有化"罢了。(de Jasay,1990, pp.19—20)。起初看来,这个批评意见被埃斯特林的其他主张所否定了。因为在埃斯特林的模式中,他赋予了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控股公司(其主要任务是管理社会资本)"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为了平衡起见,他认为这些控股公司应在"私人所有制"条件下运作(Estrin, 1989, pp.186—190)。使事情更为模糊不清的是,埃斯特林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因为国家承担着创建控股公司的任务,所以它可以选择自己保留所有权"(1989,p.192)。

其他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在所有权问题上也是同样含混不清。约翰·罗默有时倾向于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公司为公共所有,国家对经济的'至关重要部分'拥有很大的控制权"(Roemer, 1991, p. 562)。在另外的场合(Roemer, 1992a, 270—271),他似乎又喜欢以证券为基础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中每一个公民都在国家大企业的利润中享有个人的(尽管是不可分割的)份额。鉴于戴维·米勒精心设计了一种由外部提供资本的合作社经济,他承认新投资资本和一些相互竞争的基金源存在的重要性,"所以一个合作社可以从一家试图以不适当的严格方式决定贷款条件的投资机构转移开"(Miller, 1991, p. 412)。可是米勒不能确定的是:资本最好应该"由一系列私人银行提供,还是通过完善的公共基金体制来提供"呢?最后,他这样认为,如果考虑到会有适当的制度和法律控制的存

在，“投资银行无论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都是无关紧要的了”（1991，p. 412）。

对与“社会所有制”相连的各种含义所作的上述简要回顾表明：即便从最好的方面讲，“社会所有制”也是“语义上模糊不清”、理论上不甚完善的东西。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者们更希望深入一步，认为“社会所有权”在实质上是连不到一起的提法，在制度上也难以稳固。但是我认为，在作出这样不利的结论之前，有充分的原因应该停留一下。因为在所有权的确认和法律化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更为基本的问题，尤其是与现存私人所有权形式相比较而言，情况尤为如此——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在并非完全不利的条件下考察社会所有权。

七、私有制的主张

我们都知道，日常的语言和法律术语与学术话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讨论私人所有权问题时显得更加突出。那种看起来丝毫不成问题的私人所有权信仰——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我可以任意处置——已深深植根于公众的情感之中。维护现状的人经常运用高明的手腕玩弄民众的这种感情，声称即便是极为温和的改革都代表着对整个既有财产秩序的威胁，并巧妙地将谦逊的家庭主人的固定财产与庞大的联合资本的利益等同起来。[13]可是，看起来经常与民众对所有权的认识相联系的确定性却与法律和学术话语中的所有权主张的不确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法庭上的许多日常事宜，例如在遗嘱认证和家庭法中，都涉及对相互对抗和冲突的所有权的裁定。在更为抽象的层次上讲，法理学和许多经典的、现

154

代的政治理论中都充溢着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实质和地位问题的观点冲突。(Reeve, 1991; Macpherson, 1977b; Ryan, 1982 和 1984)。

只要对上述理论性论述稍作一番简要考察,就足以使人们极为严肃地怀疑那些关于私人所有权的许多基本主张。实际上,即便在私人所有权的捍卫者中间,他们现在也一致认识到,那种曾被人们长期渴望的关于私人占有财产的合理性(以初次占有和继承为基础)也毫不例外地丧失殆尽了。因而劳伦斯·贝克(Lawrence Becker)在题为《财产权利》(1977)的文章中提出了取得私人财产的最大可能性问题。然而在论证过程中,他具体反驳了那种源于初次占有或"加入个人劳动"(mixing one's labour)的关于所有权利的经典理由,并坚持认为,在实践中,他自己所说的"最大化的"所有权范围(以"应得"劳动理论为基础)也需要严格限定:

> 可让与和可传递权利 …… 应该被具体地修正以相应缩减终身所有权 …… 对重要的不可再生资源(石化燃料、纯净水、矿藏)的所有权也应根据收入权、转移权和有限的传递权加以限制,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实际占有应该置于真正的公共控制之下 …… 如果认为保留民主政治体制是道义上不可或缺的话,那么就应该采取新的措施以限制积累。(因为现有的措施)并不能阻止巨大财富的积累 …… 它会使政治权力充分发展,足以瓦解民主理念。(Becker, 1977, pp.116—117)

这就是贝克在提出私人所有权主张的最大可能范围问题时作出

的一系列令人印象颇深的“限定”。

在更为广泛的讨论中，杰里米·瓦尔德隆(Jeremy Waldron, 1988)在题为《私人财产权利》[14]的著述中提出了自己的论辩主张。虽然瓦尔德隆为个人拥有私人财产的观点辩护，反对集体或公共财产，但他据以论证的理论基础却对现存的私人财产范围具有过激的影响。他对下述一脉相承的观点（从洛克到诺齐克）持否定态度，这种观点认为，个人的财产权利来自于那种源于“他们偶尔所为或对他们偶尔发生的事情”的“特殊权利”（1988, p. 3）。他认为，洛克以“加入个人劳动”为基础为私人财产所作的辩护是“无条理的”，而诺齐克提出的历史权利的主张也是“站不住脚的”（1988, pp. 252, 27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洛克的理论中能够站得住脚的却是“普遍的生存权”，这种权利对任何一种私人财产的合法制度都具有强有力的福利性限制。实际上，瓦尔德隆是通过遵循一种自黑格尔那里发展而来的观点来为私人所有权的一般性主张进行辩护的。这种观点认为，拥有财产对于个人的个性和道德的充分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私人财产的拥有有助于培养诸如“个人自决、相互承认、意志坚定等优良品质，有益于确立合理的节俭意识和责任心”(1988, pp. 377—378, 4)。因为私人财产所有权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瓦尔德隆坚持认为，这一种权利不仅仅在于赋予个人取得财产的自由（如果他或她如此幸运的话），而且为个人提供了获得社会资源的合法要求。[15]瓦尔德隆援引了黑格尔的下面这句名言：“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接下来他写道：“正如以权利为基础的言论自由的主张使人们确立了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讲话的义务一样，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私人所有权的主张使人们确立了保证每个人都能成为财产所有者的

155

义务"(1988,p.4)。

因而对于瓦尔德隆来说,捍卫私人所有权决不是维持现状。每个人的私人财产权利,加之生存权的宏大背景,证明了以下各种变革措施的合理性:大幅度减少现存财产所有者的一些权利,对现有资产进行实际的再分配,国家在保证福利和再分配方面要发挥广泛的作用,对继承权作进一步的限制,对法人资本的一些利益要求进行正面反击,至少保证某些形式的公民基本收入。当然,瓦尔德隆的立场与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后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形式的非私人所有制。[16]但是,瓦尔德隆的观点确实消除了传统私人所有权理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许多责难,将一些反驳的论题由财产权转到现实的或实用的问题。

156

詹姆斯·格鲁内鲍姆(James Grunebaum)的《私人所有权》(1987)一书也贯穿着同样的思想,并给社会所有权的倡导者提供了更多的慰藉。格鲁内鲍姆的目标是确立这样的结论,即"多种可能的所有制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具有合理性"(1987,p.1)。其战略是从他视为至少是"看似合理的道德的第一原则"——自治原则(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出发,进而详细论述了实现这一原则所要求的那种所有权概念,也就是说,建立自治所有权形式(1987,p.170)。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讲,自治原则包括:"每个人都有决定和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同时尊重他人的自治,并且拥有自主行事的必要手段、又不侵犯他人的这种权利"(1987,p.143)。在格鲁内鲍姆的判断中,自治原则要求一种"混合的所有权范畴","它既排除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私人拥有,也排除对个人自我和劳动的社会所有"(1987,p.170)。对个人自治的尊重,要求个人具有使用和管理自己劳动的权利,具有

从自己的劳动中挣得任何收入的权利，具有将自己劳动的部分赠予他人或与他人交换的权利，这必然要有一个“自由劳动市场”存在(1987，pp.171—172)。在这种意义上说，对自我和劳动的所有权就将是“私人的”。但不论如何，这些私人权利必须受一个事实的局限，即“自治原则要求个人帮助确实需要帮助的其他人”，并且要求首先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格鲁内鲍姆批评说，所有赞成初始私人占有的观点都是“回避正题和语无伦次”，同时坚持认为：

> 自治原则要求对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支配进行所有权规范，这要尊重每个人决定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和拥有实行自治所需要的福利的权利…… 由此可以说，那种不允许每个人参与如何使用土地和其他资源的决策的所有权形式是与自治原则不相容的。(Grunebaum，1987，p.174)

他总结说：“自治原则从道德上要求对土地和其他资源所拥有的权利最终应该属于社会的全体成员”(1987，p.173)。

格鲁内鲍姆将这个原则范畴描述为处于“私人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和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之间”(1987，p.197)。可是从他的论述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对自我和劳动的“私人”所有制实际上只排除那些否定劳动市场存在的社会主义形式。虽然格鲁内鲍姆没有更多地引证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但看起来很明显的是，那种将劳动(和其他商品的)市场与保障社会最低收入加上资本社会所有制结合起来的经济形式，与他的“自治所有权”模式所要求的那种制度设计非常接近。 *157*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来说或许最令人振奋的观点见于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文章《经济民主序言》。在这篇文章中,达尔对在法人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制度化的私人所有制主张发起了针锋相对的挑战。达尔认为,在他所在的美国,私人财产所有权曾经一度成为杰菲逊的土地民主共和主义的支柱(至少对于白人男性来说是这样)。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些权利却成功地("令人惊异"地)转变成为"法人资本主义革命新秩序"的不加限制的所有权主张。达尔怀疑说,"对私人财产应该有某种合理的限制 …… 对现存的法人形式企业的私人所有权主张也应进行合理的说明"(1985, p.72,77)。达尔对洛克、诺齐克、J.S. 穆勒(Mill)和贝克关于私人财产所有权优先的主张进行了逐一驳斥,他总结道:

> 任何一种 …… 关于私人所有权的合理主张都不会为无限制地取得私人财产辩护。如果可以作些辩护的话,它们也是为了证明取得最少资源的权利之合法性,当这些资源对生活、自由、追求幸福、民主程序和基本权利来说十分必要时,情况尤为如此。(1985,p.83)

"我们不能",他明确表示说,"跳过取得自己身上的衣服和口袋里的现金等财产的权利而径直去追求在IBM公司取得股金的基本道德权利,进而追求这种持股依法转让的标准的所有权利"(1985,p.75)。

八、结　　论

显然,留心关注一下关于所有权的详细说明中存在的不确

定性，我们就会发现社会所有制原则缺乏强有力的支持。但在实际上，当我们将这种不确定性引入看起来是十分单调的关于私人所有权和社会所有权之间的对立时，就会得到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结论。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的那种"混合所有权"看起来就不是那样古怪了。正如一些较有头脑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所承认的那样，在现实社会中那种不受限制的私人所有制"几乎成为有限的个别例外"了(见 Gray，1992，p.54)。[17]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有关所有权的权利(使用权、收入权、转让权和控制权等等)在不同主体间分散的典型例证(尽管不是按照市场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进行的)。还有，那些较有思想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家们在为市场制度辩护时，他们倾向于着重论证诸如个人自由或自治等价值的提升，而把经济效率与增长看作是一种独立合理的财产制度偶然带来的利益(Gray，1992；Hayek，1982)。我们也已看到，人们对自由、自治、私人财产所有权和现存市场形式之间的联系争论激烈，这样就可能要求那些从经济效率和前程的保证方面得出的广泛的实用主义结论(可能是公众为私人财产所有权辩护的最有分量的结论)多做一些辩护性工作了。然而，尽管这些结论仍然很有说服力，可是它们都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如果为私人财产辩护的观点不论如何基本上都是从实用出发的话，那么私人财产就经常容易被人们按照一些新的和或许更好的制度设计来重新考虑了。

158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所有制不会被立即排除的话，我们就要重新看待社会所有制的批评家们对其提出的主要几项指责，将其当作市场社会主义的运作上的问题。最后我想非常简要地关注一下其中的三个问题。第一，由于合作企业内部没有资本所

有者，人们所料想的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激励问题在不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下能不能被克服呢？第二，社会所有制能不能按照资本合理配置的方式组织起来呢？第三，"社会所有制"能不能是一种别的组织形式，而不是"国家所有制"呢？

第一个问题的实质是：如果工人在自己工作的企业中没有资本份额，那么就会发生妨碍经济资源合理分配的激励问题。实际上，回应这种反对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单个工人在企业中拥有自己的股份。蒙德拉贡的合作者其实就是采取了这种做法。当工人加入合作社时，他要投入一笔初始资本。除了领取工资外，他每年还获得资本红利存入自己的账户。但是这笔资金只有在工人离开合作社时才能取出（关于一般性模式，见

159 Ellerman，1990）。虽然这种权利远不是奥诺雷（Honoré）所说的充分自由所有制（积累的资本不能转让），但显然这是对禁止资本收入原则作出的妥协（Honoré，1961）。然而在我看来，如果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折衷方案，那么这种看法就真的是一种定义上的花招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发达西方国家流行的一些资本主义制度设计，我们就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所有权（以及与此类似的平等的形式和程度）取决于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所以，一旦某种形式的私人资本所有权发生，就把市场社会主义当作法人资本主义的代理形式的看法，是毫无意义的。[18]

其他两个问题，资本合理配置问题和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之间的区别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前一个问题基本上是这样的：只有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资源配置场所，资本资源才能被合理使用。而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实行社会所有制容易使国家单一所有制旧态复萌，所以资源合理配置看起来

是不太可能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法人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一些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简单。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在市场社会主义处于劣势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在配置资本的过程中已经发挥着切实的作用。这种作用部分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的：制定财政政策、地区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制定公众消费政策，充当资本商品的庞大购买者。通过其中央银行机构，国家可以对资本配置起更为直接的决定作用，支配金融政策，控制利率和私人银行领域。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希望将所有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国家手中。市场社会主义者一般关注的是禁止在雇用劳动力的企业中持有股份，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承认，不管推行什么形式的金融政策，私人储蓄（按照固定的或变动的利率付给利息）对整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众所周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既存资本财产并不是直接由私人投资者所有，而是由各种养恤基金或众多小储蓄者的集资管理机构进行控制。这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所运用的金融手段（包括一系列限制持有股票的金融合作形式）并不一定要与绝大多数小资产所有者所面对的有效选择完全不同。

尽管上述这些限定和理由都存在，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批 160 评家们来说，还有一点仍然值得强调的是，一旦禁止了私人资本市场，市场社会主义就不能提供多个资本资源场所，而缺少了它们，合理的资本配置就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其实又是以一种看法为依据的，即社会所有制在实践中就是资本所有权集中于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许多有力的历史证据支持了这种断言，特别是南斯拉夫的不幸经验。批评家们还从许多传统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援引证据。在这些论著中，国家经常是以单一的

和直接的社会力量的面目出现的，进步力量掌握了它，它就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工具。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主张的混合所有权——其中某些权力和利益属于国家，其他权利则属于市民社会成员——并不是像某些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稀奇古怪。第二，国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也不是像一些宪法律师和信奉霍布斯和韦伯的社会理论家们所想象的那样统一完整（见 Mann, 1993）。实际上，南斯拉夫的经验不仅仅表现出联邦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的无情干预，它也同样清楚地表现出一些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对国家/联邦政府的意志及其制定的投资政策的（有时成功的）颠覆。在不同管理层次上的类似冲突也是其他和发展得更为成熟的联邦体制存在的普遍现象（例如在美国）。甚至英国这样的统一的贵族政治体制，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整个 80 年代，英国政府是通过撤销许多地方政府机构的做法来实际回应挑战的）。这说明，与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相符合的那种社会所有制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帮助确立这种社会所有制的国家必须要遵循民主的和宪政的方向进行改革。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将在第七章进行较为充分的评论。

注　释

1　参见诸如米勒（Miller，1989）、塞卢奇（Selucky，1979）、埃尔斯特和穆恩（Elster 和 Moene，1989a）等人的著作。同时很有必要指出的是，其他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则对按照自我管理的方式重组企业的设想深表怀疑（罗默 Roemer，1992a；扬克 Yunker，1990a）。

2　关于英国合作社的规模，见埃斯特林（Estrin）和帕洛丁（Perotin）的著作（1987）。

3 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范尼克(Vanek,1970,1972 和 1975);沃德(Ward,1958 和 1967);米德(Meade,1988a 和 1988b);多马(Domar,1966 和 1989);霍瓦特(Horvat,1975,1976 和 1982);德雷兹(Dreze,1976)。其次是史蒂芬(Stephen,1982);斯泰因赫尔(Steinherr,1983);埃斯特林(Estrin,1983);波宁和普特曼(Bonin 和 Putterman,1987)。关于许多问题的非技术性论述见范宁和奥马哈尼(Fanning 和 O'Mahony,1983);范宁和麦卡锡(Fanning 和 McCarthy,1986)。

4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社的一般讨论,见波宁和普特曼 1987 年的著作(Bonin 和 Putterman,1987,pp.156—161)。关于东欧在引入国家社会主义以前的合作社运动的论述,见巴劳伊德 1980 年的著述(Balawyder,1980)。

5 当然,匈牙利体制也可以被认为是"现实"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选择模式,但在实际上,至少从原则上讲,匈牙利体制与工人管理型经济相距甚远(见,Swain,1992)。

6 这里有必要重复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接受工人自我管理型经济是市场社会主义秩序之核心特征的观点。

7 见霍瓦特(Horvat,1982);范宁和麦卡锡(Fanning 和 McCarthy,1986);埃尔斯特(Elster,1988)。然而在这里我将主要关注那些能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合作社和劳动管理型经济中的合作社的批评意见。

8 关于对诸多修正过的伊利里亚模式的评论,见麦金德(Mygind,1986)和斯泰因赫尔(Steinherr,1983)的著作。

9 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对工人自我管理的严重无秩序作出了颇为鄙夷的挖苦评论:"设想一下根据如下制度管理一条铁路:搬运工人选举站长,站长选举铁路段长,所有的雇员选举董事会! 所有注意到这种模式内部联系的人都能够理解到,这种管理形式根本不适应于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工业"(B.Potter,1891,p.153)。

10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和约翰·斯普拉格(Przeworski 和 Sprage,1985 和

1986)提出一个相同的见解(尽管较为抽象),即在过渡成本面前,社会主义要得到民主支持是不可能的。

11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批评家们的判断一定就是正确的。例如,我们对世界地下运输制度作一粗略比较就会发现,人们对公共财产的态度要受限于巨大的文化差异。

12 乔尔杰维奇总结说:"国有化……工人阶级继续存在,经常在失去自主的意义上存在,特别是失去……组织自我管理的历史性权利。这种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被国家剥夺了,同时产生了各种旧形式和新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的异化与神话"(Djordjevic, 1966, pp.81—82)。

13 最为温和的所有权改革建议都曾经激起那些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想象,认为他们自己被寄生的霸占者剥夺了享受家庭幸福的权利。

14 瓦尔德隆的讨论长达近500页。对于那些时间较紧的人们来说,瓦尔德隆不得不在第三至第五页对自己的主要观点和结论作了概括。

15 关于不同类型权利的经典论述,见霍菲尔德(Hohfeld)的《基本法律概念》(1919)一书。关于社会主义和个人所有权的讨论,见克诺汉(Kernohan)1987年和1988年的著作、科亨(Cohen)1990年的著作。

16 瓦尔德隆也明确地讨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但他的反应有点含糊其词。

17 当然,这种论证并不能阻止格雷继续将市场社会主义贬斥为"一种不可行的荒谬理论"(1992, p.54)。

18 对这种措施的极为简单的反对意见,是说它在整个经济活动领域根本就不可行。我认为,如果不去尝试的话,怎么会知道它可行或不可行呢!我在这里只关注这样一个理论问题:这种安排是否应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呢?

第七章　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主和国家

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所有制，在此基础上取得同传统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一样的经济效率。与此同时，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也试图确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以避免过去那些作为东西方社会主义体制衰败之特征的国家干预监护形式。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声称，实现这两个目标也将带来民主的巨大扩展。在本章，我们将考察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尽管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这一进程的关注却少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而且提不出较为系统的观点。但不论如何，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零碎讨论至少在三个方面试图证明市场社会主义能够提高民主的质和量。第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工人合作社经济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实现更具参与性的民主形式的机会。第二，作为补充性论断，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通过消灭私人资本所有权的畸形政治影响，可以大大改善代议制民主过程。第三，期望通过采取某种形式的激进改造措施实行社会所有制，同时将大部分经济调节和革新事项交由市场机制，必然会缩减集权国家的过分权力。下面我就依次讨论上述每个断言及其影响。

一、作为参与式民主的合作经济

实际上,对作为一种民主化形式的劳动管理作出最令人信服的阐述的,并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本身,而是那些更为直接关注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的人。自从80年代初以来(及其以前),在西方政治理论家中间,就重新对民主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其基本口号就是"参与"。[1] 这些理论家对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平庸和虚伪极为不满,对"人民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败十分关注,也经常被尚有缺憾但颇具创意的新社会运动的经验所鼓舞,他们推动的这股广泛的当代民主思潮被如下信念所激励:民主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在西方实现,尔后被世界的其他每个地方所渴求),实际上,民主只是部分内容得到了兑现的一种承诺。在20世纪末,这些思想家有理由对更为直接的或参与形式的民主取代代议制的程度持谨慎态度,但不论如何,他们一般都是以下述信念为出发点,即在一种"混合"民主体制中(多层民主空间,包括代议制形式和直接形式两个方面),参与将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广泛鼓励。古尔德(Gould)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提倡"在一切可能的时候实行参与性决策,在其他情况下实行代议制形式"(Gould, 1988, p. 5)。与此同时,许多思想家们坚持认为,现在是经济生活亟需民主化,看来也正是经济领域为一种新型的和更具参与性的民主生活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广泛的机会。[2]

在近期这种对经济领域民主参与问题之关注的演变过程中,凯罗·帕特曼(Carole Pateman)的《参与和民主理论》(1970)是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明确论述了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以

及西方工业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反对那种她认为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科学正统的、理解过于狭隘的"实用性的"民主。帕特曼认为，这种正统的创立者们只有通过建立一种极为神秘的(不可行的)"古典民主"模式，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与其形成鲜明反差的精英主义方案当作最好的"现实"民主加以渲染。依帕特曼看来，如果人们读一些关于民主思想的真正经典著作(包括卢梭、密尔和G.D.H.科尔的著作)，他们就会发现情况恰恰相反，这些著作也中肯地强调了民主之教育性和参与性的必要。在此基础上，帕特曼呼吁将民主扩展到经济决策领域，既作为其本身的目的，也作为提高个人政治作用和政治能力意识的手段，促使他们更为充分地参与广泛的国家政治生活。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积极倡导那种"将参与意识作为核心的现代可行的民主理论"(1970，p.111)。

163

近些年来，对帕特曼在70年代初所详细论述的经济民主化作出最清晰阐释的人是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他是当时对流行的多元主义正统作出最令人信服的说明的理论家之一，他的思想至少使一些政治理论家的长期传统声望和开明意识得以弘扬。[3] 达尔在1985年发表的题为《经济民主序言》的文章，对工厂民主，或用他自己偏爱的术语，自治企业，作了生动而广泛的总体论述。达尔的讨论是从先详细说明人们拥有民主管理权利的总条件入手。[4] 他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存在这样的联合体，其成员"至少需要达成某些集体决议，且这些决议对集体的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这种民主管理形式就能被证明是正当的。他坚持认为，在这种有约束力的集体决议有必要作出的地方，它们必须要由"受决议约束的人——也就是说，联合体成员——来制定"。他接着又列出一些进一步具体的"民主设想"，

认为它们应该适用于这种联合体：自由原则，"联合体中的每个成年人都有权利对他或她自己的利益作出最后决定"；强弱平等原则，规定"每个人的利益都有权被平等考虑"，所有的人"都有大致平等的资格决定哪些事情需要或不需要作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定"；以及"基本的公平原则"，"一般地说，短缺或珍贵资源应该公平分配"。达尔认为，如果接受了上述前提，就为"联合体的所有成年成员确立了 …… 一种通过民主程序实行自我管理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985, pp.56—58)。

依照达尔看来，这些标准经常(和正确地)被用来评判国家的民主管理。但他坚持认为，经济企业也可以被看作是能够对其内部所有成员达成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议的联合体。这样，经济企业的成员和国家的公民一样，具有通过民主过程自我管理的权利。他提出的颇为鼓动人心的结论是："如果民主在管理国家方面被证明是有理由的，那么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也一定是有理由的；说它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没有理由，这也意味着它在管理国家方面没有理由"(1985, p.111)。

164

达尔并没有对企业民主运作的制度设计进行充分详细的叙述，他当然不认为所有的自我管理企业都将成为实行直接民主的组织，以及所有成员都将参与每一项决策。他明确期望建立一种"混合"体制，其中民众拥有主权，但他们只参与宏观政策问题的决定。除了规模极小的企业外，其他所有企业看来都是由其雇员"选出一个管理委员会或理事会，它以典型常规的方式被授权选举和撤销高级执行人员"(1985, p. 118; 1989, pp. 330—331)。达尔对实行更具参与性的工厂民主将可能带来的种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持谨慎态度，他坚持认为经济企业的自我管理在任何条件下只是一种权利，人们不能根据其有价值的结果(例如

在国家层次上增强公民的政治作用)来进行判断。然而，达尔的确相信"一种由其内部所有工作成员集体所有和民主管理的经济企业制度"标志着民主原则的极大延伸(1985,p.91)。

凯洛尔·古尔德(Carol Gould)的著作《民主再思考》(1988)也发展了与之类似的观点(从参与民主原则到自我管理形式)。古尔德对民主的"再思考"是以一对关系密切的前提为基础的：平等的积极自由(或"对自我发展的条件拥有平等权利")和互惠(要求在集体决策中，"每个参与者不仅容许他人表达他们的观点以及作出他们的判断，而且在形成他或她自己的判断时，也要认真考虑他人的观点"；1988,pp.88—90)。这构成了古尔德总体"民主原则"的基础，规定"每个人在与他人参加共同活动时，都有平等权利参与同这一活动相关的决策，这种确定的参与权利不仅仅适用于政治领域，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和经济领域"(1988,p.84)。在集体经济生产领域，"这种当事人的平等权利…… 实际上就是工人自我管理的权利"(1988,p.143)。在这种工人自我管理条件下，

> 企业的工人有权共同决定生产的计划和组织或服务的供应问题，有权共同决定企业的收入如何分配。[虽然]人们可以期望他们将各种职能授权给他们自己任命的经理和管理人员，但最终权威和决策权仍然属于所有在企业内部工作的成员。(1988,pp.144—145)

165

同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更为一致的是，达尔和古尔德都坚持认为这些工人自我管理企业都应该在(被改革了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运作。达尔对他所倡导的民主秩序是应被称为社会主义

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模棱两可(显然不太关心)(1985,pp.150—152)。但不论如何,他强调"为了实现民主价值和获得相当程度的效率,都要求大多数企业——不论其所有制形式如何——都要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并使它们的活动以市场为导向"。因而,"与民主和效率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惟一普遍形式,应该是相对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体制"(1989,p.328)。在古尔德看来,自我管理的企业应该在如下环境中运作,"市场成为商品交换的中心,(尽管)这里排除了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市场"(Gould,1988, p.251)。与市场社会主义者一致的观点还有,古尔德认为,社会主义者在传统上错误归结于市场的那些弊端是属于其他地方的。因为"并不是这样的市场产生了有害的后果,而是财产的社会关系使然。一些人控制其他人的生产活动会导致支配和剥削的产生"(1988,p.252)。如果取消了劳动力市场,对资本所有权进行合理限制,这些问题一般也就不会出现了(1988,pp.178—185)。

二、作为民主之扩展的自我管理

达尔和古尔德提出的详细的制度性建议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尽管能否赋予工人自我管理以切实可行的制度形式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反之,我在这里将要考察的问题是:达尔和古尔德展示的那种模式在原则上是否能够实现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论断,即工人自我管理将构成民主的极大扩展。简单地说,我将这样提议:如果我们承认企业能够合理地构成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话(这是大多数新自由主义者所不赞同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支持这种论断,即:如果可行的

话，工人自我管理将会导致民主的极大扩展。[5]

我们可以根据意大利民主理论家诺贝托·鲍比欧（Noberto Bobbio）持有的立场来发展上述提议（特别见 Bobbio，1987a 和 1987b）。人们非常恰当地认为，鲍比欧是对民主扩展的可能性作出最谨慎和最敏锐的批评的人物之一。他长期以来为代议制民主制度辩护，反驳左翼批评家的观点。他特别对那种支持扩展更为直接的民主形式的主张深表怀疑，强烈批评下面这种热切愿望，即将“生产者的自我管理”视为在国家层面上替代“古典议会制国家”的方案（1987b，pp.83—84）。然而工人自我管理议程却是令人吃惊地符合鲍比欧本人所论述的合理民主化形式。他的观点是，在当代条件下，“民主进步的标志 …… 并不是由有权投票的人数来确定的，而是政治领域之外行使投票权的范围大小所确定的”（“投票”是参与政治过程的较一般性权利的缩略表达）。在当代，民主化较少体现于对民主新形式的发现，而更多在于在新场所实现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传统的）民主权利。它要求从“国家的民主化转向社会的民主化”。民主并不是一种应该被运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场合的原则，但是在大量世袭的和等级制权力汇集的地方，民主是必要的。在所有的复杂社会，这些权力得以汇集的两个重要场所就是“大企业和公共管理部门”。因而鲍比欧得出结论说，“民主化进程”就应该集中于这些地区。他认为，在这些地方，民主化进程“甚至尚未开始触及其皮毛”（1987a，pp.55—57）。

166

如果初看起来这会令人感到惊讶的话，那么我们再经考虑就会发现，诺贝托·鲍比欧的著作中对达尔—古尔德论题的潜在支持可能不是如此显著，他们三个人代表着极为不同的社会民主观念。但他们都倡导在全社会层面继续保持代议制政府和市

场经济的环境下,在较为"公共的"社会机构里实行民主化。我们在鲍比欧的著作中看到的对这一立场的潜在支持还有助于突出如此事实,即"扩展参与"并不一定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讲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只要求其选民每隔四五年投一次票的代议制民主也是参与性的。古尔德和达尔也明确认为,更多的参与机会是非常需要的,也确实是民主扩展的必要因素。自我管理企业的组织原则中有一些途径(如通过经常性集会,所有成员有权对集体决策作出贡献,直接参与政策的执行等等)能够提供那种在现行自由民主国家层面不存在的直接民主参与形式。但是,工人自我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强参与程度,而不是取消代议制。

167

当然还存在着一种历史久远且颇受人们尊重的观点,人们一般认为是卢梭的见解,那就是,只有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如果这种观点可被接受的话,那么包含部分代议制度的工人自我管理(以及其他99%的声称是民主的组织制度)的民主真实性也就要遭否定了。[6] 然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它也意味着:工人自我管理组织也不太容易受到那些时常用来反对"纯粹"直接民主倡导者的传统言论(如繁琐程序和有限规模、缺少专家、缺少时间、缺少公民兴趣等等)的攻击。

但是,对于那些支持企业自我管理作为"混合"体制(包含或多或少的代议制民主空间)中应予重视的一种参与形式的人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可能最简单的反对意见是,处于这种更具参与性的模式中的政治将根本无法运作。这种意见可以追溯到米歇尔斯(Michels)论述德国社会民主问题的著名著作(1962)。约翰·格雷(John Gray)以典型的论辩方式,根据南斯拉夫的经验推断,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工人合作社里,"自我管理的制度和实

践会被必然出现的管理精英所削弱，以及经常被权威干预……被中央政府所削减"(1992,p.49)。达尔反对这样的结论，他虽然承认"必要的组织规则将会导致向少数人垄断的方向发展"，但他把自己的模式同南斯拉夫的经验分离开来，指出"米歇尔斯的'铁的规律'既不是铁的也不是规律"。他认为，"同管理国家的民主结构相比，管理工厂的民主结构也同样能够完全满足民主程序标准。作出这样的预期判断不是没有理由的"(Dahl, 1985,p.134)。这个问题可能只有通过实践经验才能得到明确解决(尽管像格雷这样的批评家坚持认为我们已经具备了所需的全部经验)。然而，由于现在缺少在达尔所期望的那种有利条件下扩大工人自我管理的证据，所以我们对其发展前景所持的态度并不像达尔那样乐观。

即便是在那些非常同情和支持将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的人中间，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促进工人参与的动力持有某些保留看法。这里可能最常见的问题是时下的政治经济。参与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且对于好的民主公民或好的工人-公民来说，参与成本是很高的。但由于增强的政治参与一般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利而非义务，所以这种情况不必作为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出现。但是，这里存在着这样的危险：一旦实际参与率降至某个最低点以下，决策活动实际上就成了相对少数的公民的事情。如果参与决策公民的人员构成情况与全体公民的构成情况大体一致的话，可能这也不会成为有太大危害性的问题。然而，如果这些积极分子的社会构成与总体公民的构成情况不一致的话，决策权实际上就可能落入不具代表性的少数人手中。的确，在现存的政治运动中以及南斯拉夫的自治经验里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积极分子可能不具代表性，而且他们倾向于过多代表那些拥

168

有较多现存资源(资金、组织和信息资源等)的人,以及向现存的决策过程投入较多的人。当代女权主义民主文化(虽然它也支持更具参与性的模式)中有一点提得很好,那就是:正是妇女掌握着最少的先存资源,但承受着最大的时间压力(见 Phillips,1991)。如果不彻底改变她们所从事的附属性社会实践活动(在育婴、提供非正式的社会护理工作、就业机会等等方面),公开参与模式对于妇女来说,其实际可用性可能是极不平等的。然而使真正的平等参与成为可能的那些变化使民主程序向工厂的扩展看起来像是一种温和的渐进改革。

这里还有一个虽然也很重要但不太迫切的问题,它源于这一信念:参与将要求普通公民道德非常地高尚。古人们会非常鄙视那种优先忙碌自己的私事而不是为城邦的良好管理作贡献的人。然而我们对此可能(也有理由)不敢深信。我们当中即便是把自己的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政治过程中的人,也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一种合理的民主政治秩序当然不会在时间和精力方面对其公民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使他们预先排除掉自己想做的全部其他多种事情。它也不会使参与成本变为阻碍,以至于只有最坚定的积极分子才不退却。这样看问题决不是允许人们消极行事,因为这只是为了将实际决策权交付到大多数自我选择的积极分子手中。这里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不仅使参与成为可能,而且能够保证一个有适当责任感的公民在正常条件下能够满足参与要求(关于"半高尚"的人的政治权利,见 Walzer,1970)。

169

这些争论有时被合并起来作为反对更多参与性民主形式自身的理由。有人认为那种包括最小程度参与的代议制政府是一种手段,它能够保证那些被假定为淡漠的大多数人不被少数积

极参与者欺骗(见 Sartori,1987)。但是为了避免少数积极分子在蜕变了的民主中支配多数人,就要任由国家层次上的管理精英去处理政治事务,这种想法实在令人吃惊。它看起来不过是这样一种拙劣荒谬的建议:为了避免鸡貂的骚扰,而让我们自己被狮子吞噬。[7] 用一个不很恰当的类比:不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多少个"小希特勒",他们都不会让我们渴求真实的事情!不论如何,这种批评对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工人自我管理建议来说是苍白无力的。正如达尔和古尔德明确指出的那样,参与并不是对代议制的替代,且参与程度也是经常变化的,它与规模、技术以及民众的基本意愿等问题有关。我们假定:那些希望增强参与的人将被吸纳到更具参与性的(可能是规模较小的或劳动密集型的)组织中来,而那些希望过安静生活的人(至少就其工作而言),可以在大部分决策权由管理机构来行使的企业中工作。这些组织上的差异并不排除民众在两种环境中都拥有主权。

参与模式还存在着一个进一步的难题,自由主义者对此特别敏感。它就是:参与模式具有导致人们的共识蜕变为因循守旧的倾向。实际上这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某些层面上的共识(如果没有别的共识是有关民主游戏规则和民众限定的)是民主过程不可或缺的。但是至少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他们一直认为(代议制)民主的巨大力量之一就在于它能够容纳不同的合理价值和利益。几乎所有倡导更具参与性政治的人,都设想了就要做的事情取得较为一致的观点的可能性。他们的建议是:通过开明(和开放)的讨论和发扬一些公共精神,同现存代议制条件下的可能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讲是敌对的)比起来,公民们能够发现更多的可以相互达成共识的领域(如见 Barber,1984;

Dryzek,1990)。人们认为这里存在的危险是,这种政治可能会变得过于一致。这不是与传统的过分武断的多数主义问题极为相似的问题,而是这样一种意识:特别是在小群体中,存在着形成(全体一致的)共识的压力,这可能会压制和反对那些非常正确的关于合理的目的和手段的不同意见。[8]

170

这的确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任何卷入新的或旧的社会运动政治的人都将明白:从"下一步以后"出现的反对者并不总是受欢迎的。然而在工人自我管理条件下,这个问题并不像批评家们所说的那样尖锐。第一,虽然关于企业目标问题(例如,决定利润最大化方案或引入有较少异化性质的劳动过程)可能存在着内部意见分歧,但有一些基本的政策限定将在企业外部制定(如果企业利润没有达到至少的足够额度,企业就应宣布破产或解散)。第二,虽然一些基本的政治信念(如关于生态对生产的限制的认识,或对雇佣过程中存在的强烈歧视问题的认识)可能对企业决策产生很大影响,然而在国家政治过程中引起最激烈争论的许多抽象的意识形态因素,却对日常的企业决策没有很大的影响。人们确实意识到,当公民们积极参与同他们的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真实决策过程时(这样他们面对着真实的选择和真正的资源限制),"意识形态的表演"也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和动因了。第三,同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情况比起来,共识在企业内部实际上更具积极合理的性质。对于那种不容纳一个长期有组织的反对派的国家政治制度,我们不敢说它是民主的。然而尽管企业内部也可以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我们可能认为存在一个长期有组织的反对派却不是企业民主的一个良好特征。企业自治必然以不同于国家自由民主的方式作出要求:一旦决议合理作出,所有人员都应该致力于它的成功贯彻执行。第四(尽

管达尔评论说企业是法人资本主义的“必定”成员)，我们应该设想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更有义务支持就业和促进新企业的形成，“退出”应该成为那些感到不满意的产业公民的一种现实选择，而国家的不满意公民却不能这样做。总之，对“太多共识”的担心确实构成了参与民主形式存在的一个真实问题，但在我们设想的劳动管理型企业中，其严重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况且我们还应想到：自我管理采取的是直接和代表制相混合的民主形式。 171

最后一个问题，我认为也是较难处理的问题：谁将是工人自我管理企业经济中的公民？更直接地讲，那种非常依赖工厂民主的制度能否避免一种情况的发生，即给予积极参与正式经济活动的人以政治优先权？长期以来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疑虑(至少可以追溯到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的著作)：企业自我管理将创造工人的自我领地，而对更广大的消费者和国家经济的需求漠不关心。她怀疑：国家及其公民的需要能否靠承诺将“管道工具交给管道工人”那样的改革来得到最好的满足？(由 Beilharz 援引，1992，p.64)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时代和方案中，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已经对费边式的计划和公共管理的必要性失去了兴趣的政治理论，因而上述疑虑可能不会对工人自我管理构成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如果管道工具(或任何其他工业服务)将由独立企业来提供的话(可能与市政当局签定合同)，那么在许多社会主义者看来，这最好要由一个合作社而不是一个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来提供。另一个保留性意见看来更有道理，它在传统上曾经用来反对工团主义。它提出这样的疑虑：工人合作社可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工人“集体资本主义”，其中那些被包括在正式经济中的工人的利益，将会优于那些越来越多

的由于各种原因(育婴、提供非正式护理、退休、失业、参加全日制教育等等)而不能成为职业劳动力的工人的利益。市场社会主义者可能偏好这样的市场经济,其中企业由自己的工人而不是由股票持有人或被指定的人所有和管理。但把这样的经济说成是工人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决不是简单地玩弄字词。因为,就那些置身于企业之外的人来讲,它们与传统的资本主义企业没有太大的区别。那种主张将所有人口(除了少数剥削者)都纳入正式经济中的社会理论可能对工人的民主代表全体民众的能力非常乐观,但20世纪末期劳动市场的变化情况并非如此。二战以后,妇女劳动力人数确实增长迅速,但正如安妮·菲利普斯(Anne Phillips)观察到的那样,“男人和女人与工作有不同的关系,与时间也有不同的关系,*没有任何一种基于增加工作参与的民主能够在男人和女人之间保持中立*”(1991,p.45;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OECD, 1985)。很显然,还有其他社会群体被排斥在工人合作社的边缘。

172

实际上,这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普遍认识到的问题。例如约翰·罗默(John Roemer)就坚持认为,在他的市场社会主义蓝图中,工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拥有他们于其中工作的企业:“劳动力将在劳动市场上雇用”,企业利润“在交税后要在所有成年公民中大体平等分配”(Roemer, 1992b, p.453)。对于其他市场社会主义者来说(诸如 Saul Estrin, 1989),这个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建立某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在直接生产者和社会之间划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又将把我们带回到那种特别困难的境地:确定某种适当的社会所有制形式。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六章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远未得到明确解决的问题。

尽管倡导更多直接民主的人(他们认为企业自我管理方案

中的民主化成分太少)和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却认为民主化成分过多)提出了极为不同的批评观点,我却认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工人自我管理方案至少在原则上作出了极大地提高民主的承诺。用鲍比欧的话说,他们希望将一些已经很稳固的民主程序引入新领域,用来挑战那种几乎已成为当代工业企业管理之普遍特征的"承袭的和等级的权力"。虽然这种模式还存在着许多难题,但由于它所设计的民主参与模式并不是仅把工厂当作民主参与的惟一场所,而且它还设计了一种直接参与和代表制相混合的民主形式,所以上述难题也就得以缓和了。但是后面这种设计本身,特别是因为它对代议民主制度的依赖,也带有自己的特殊难题。要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抛弃那种未经改革的管理国家的自由民主程序来在企业内部建立一种更为民主的管理方式?工厂内更多的民主参与是鼓励人们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如帕特曼所希望的),还是在纯粹地方性事务中浪费了积极公民的精力(如达尔所担心的)?自主企业公民的民主决定应该如何与国家(可能是超国家)权威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协调一致?这些问题,即关于在全社会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实质及其与工厂民主的关系问题,是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认真考察的。

三、市场社会主义和代议制民主

173

当我们考察代议民主制度对于捍卫企业自我管理秩序的重要性和将工厂民主与传统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协调起来的潜在困难时,可能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并不特别关注这种较广泛的代议制民主方案的特征。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待现存自由民主的典型态度只是关注这一个问题,即社会

变革，特别是社会所有制的确立，将如何改变那些使制度上基本未变的代议制民主得以运作的条件。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市民社会中那种强有力的、有组织的经济利益容易削弱有名无实的“主权”国家政府的行为自由。根据许多著名评论家(包括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见解，这意味着一个稳固的民主社会必须以(相比较而言的)社会和经济的平等规范为前提。依照许多当代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上述倾向表现在有组织的劳工利益对民选政府的意志进行挑战的能力上。[9] 相反，依左翼人士看来，正是资本(不论是否组织起来)的经济利益支配着民主政府所代表的公众意志。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议会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一个基本观点。[10]近些年来，这一观点在出人意料的地方获得了支持，那就是美国政治科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著作《政治和市场》。在这本书中，作者调整了自己早期对代议民主制多元模式的拥护立场，认为由于企业对工业运作(并因此对政府的收入和再当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在自由民主政治中拥有“特权地位”，能够对民主选举的政府可否做什么具有“否决权”(Lindblom，1977，特别见 pp.174—175)。

正是这种歪曲甚至颠覆通过代议民主制度表达出来的公众意志的私人资本权力，市场社会主义者极力主张要废除它。在这种程度上说，市场社会主义承诺的最伟大的变革与其说是革新不如(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矫正”，这种“矫正”要求恢复被既定的私人经济利益所破坏的民主权威和责任的合理秩序(Habermas，1990b)。当然，这样叙述问题并不是贬损这类改革的重要性。协调一致的私人经济权力确实对民主政府构成了巨大限制(当然依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是十分合理的)。对私人资本和股份所有制的废除将会以尽可能激进的方式解决这个问

174

题,但正是这种变革的激进性质使人们很难对其进行设计。在全球化经济中,那种甚至打算实行资本社会化的政治制度将如何防止破坏性极强的投资减缩呢?(这是我们在后面的第八章讨论可行的过渡政治时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即便我们设想这样的改革能够推行,我们是否能够避免以下两种情况的发生:(1)经济权力集中在特别庞大、非常成功和/或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社手中,使它们拥有不合理的影响国家政府的力量,或(2)侵蚀工厂民主的独立,增强被授权的国家的干预和监护,这正好与第一种情况相反。

实际上,或许人们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如此注重为自己纲领的经济合理性作辩护,以至于他们未能实现那种超越"矫正"逻辑的民主改革议程。约翰·罗默算得上是一个例外。在其"市场社会主义蓝图"中,他设想了这样一种改革方案:对经济过程较为间接的集体控制是通过政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纳入或多或少的具体投资计划来实现的。一旦当选,组成的政府在形成投资方面不是依靠必要的计划,而是通过在不同的工业领域实施不同的利率,以使投资流入预期的地方。罗默的确这样认为:"通过在五种和20种利率间进行调节,经济活动就可以实现其计划者所希望达到的投资构成"(1992, p. 445)。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但也同样困难的是:如何设计出这一方案得以实行的条件?甚至更为困难的是:如何设想它作为一种提高公众责任感的机制来运作呢?如果我们考虑到近些年来利率特别不稳定的情况,以及利率水平的决定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政府的事情,人们很难发现一个政党纲领中的投资策略与政府行为之间存在着任何具有约束力的联系。[11]

四、超越"矫正":协商性民主和论证性民主

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忽视市场社会主义的政治方面,但是戴维·米勒的著作是一个比较实在的例外。在《市场、国家和社会》中,他用最后的三分之一篇幅探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民主和公民权的实质。米勒坚持认为,如果缺乏某种共同体意识的话,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就不能在全社会层面运作。但是传统社会主义者所幻想的公共观念过于单一、过于倡导克己奉献和过于怀旧,不能提供一种适合发达工业社会的可行模式。实际上,"只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共同体才能够期望塑造自己的未来,才能在全体成员中间按照需求分配资源",以及"包括一切社会成员的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实现的惟一形式就是民族国家"(Miller,1989,pp.240,245)。在这种情况下,"全社会范围的共同体的惟一可行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内的普遍的公民权(1989,p.16;也见 Miller,1988)。在这种倡议中,公民权包括在一个特定民族国家中的成员资格,也包括对宪法具体规定的("防卫"、"政治"和"福利")权利的享有(Miller,1989,pp.245—246)。但是"真正的公民权"还要求一种同我们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所看到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政治过程和更为积极的公民。这里米勒的叙述是基于两种不同政治间的比较而进行的:一种是利益集合政治(Politics as interest - aggregation),他将其等同于现存自由民主制条件下的大量消极公民和公民投票政治;一种是对话政治(Politics as a dialogue)形式,即这样一种政治实践:公民通过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讨论和协商,力图就所有人关

心的事情达成合理共识。正如米勒描述的那样,"协商观念是从这一前提出发的:各种政治偏好是相互冲突的,民主制度的目标必须是解决这些冲突。但它是通过对相关问题进行公开和非强制的讨论而实行的,目的是达成一致同意的结论"(Miller,1993, p.75)。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更多民主参与的倡导者的意见一致的是,米勒的协商性民主也注重积极参与,并且要求普通公民既要有较强的开展合理讨论的能力,又极为情愿地以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为取向。对话政治形式并不排除代表制。正如米勒自己所表述的那样,他的目的并不是"完全废除自由民主制的代表制度,而是按照一种不同的调节观念对这些制度进行改造"(1993,pp.74—75)。即便如此,要符合米勒的标准,这些经过改造的制度就必须非常不同于我们在现存自由民主制下所看到的情形。

米勒的论述极为独特,他着重详细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在工厂之外实行民主的形式(也见 Cohen,1988)。他还竭力探索一条能够避免关于世界历史的空想和放纵的机会主义这两种孪生危险的合理的道路。他的论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这种协商性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及它将如何运作。实际上,米勒的论述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关于协商性民主之宪法方案的指导性设想。他明确指出:"为了使公民权切实可行和市场有效运作,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式组成,内部有不同分工,且在规模上有限制"(1989,p.17)。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宪法国家",其中没有霍布斯式的主权,只有管理权力的明晰划分,这要写入一个成文宪法,以一个宪法法庭为支撑。简单多数主义要受限于适当的法律程序,以及对某些形式的个人自主给予宪法保护。米勒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协商性民主的制度性框架方面不很具

176

体，但他明确指出：只要存在民主集会，它们就应该符合协商或对话决策的总体模式。然而，如果公众参与的实行要和现代社会的观念协调起来的话，政治共同体只能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组成。这里还须进一步界定以下两点：(1)在整个国家层面代表制的适当形式，和(2)政治制度中不同层次的公众会议之间的关系。关于第一个问题，米勒建议一种从低层会议到高层会议的"半委托性的"代表制形式，或某种较为激进快捷的抽签决定方式。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宪法规定下的正式权力划分及/或通过调停方法，这要假定公民原本愿意找到最大的公共利益并依此解决问题。无论如何，米勒承认在不同的管理层面之间存在的冲突可能会很激烈，且在实践中要更多依赖于存在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协商解决冲突的文化(1989，pp.271—274，198—199)。

米勒的初衷并不是想要设计一种极为详尽的、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我们不能期望他详细描述具体的宪法条款，诸如怎样协调国家对投资战略的指导和工人合作社的自我管理等。然而，人们必然担心"充实"这些制度设计将会被证明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这里我们将米勒的方案和约翰·德雷泽克(John Dryzek)的著作《论证性民主》(1990)进行一下比较。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不同之处，但德雷泽克和米勒一样，都致力于将民主改造成为一种协商过程，其中参与的公民会聚一起试图就他们的集体行为找到合理共识。他们基本上是被公共利益所驱动，自愿遵从"良好辩论的非强制性力量"。[12] 但是，德雷泽克一心想描述出如何赋予他的论证性民主观念以某种制度形式。

177

在这种情况下，德雷泽克探讨了一些"预示的"和"初步"的

能够体现论证性民主之合理性的论证形式。德雷泽克期望在一系列新社会运动的行为中发现这种论证性民主制度，并考察了美国公共政策经验中存在的少数“仲裁”和“调节谈判”的例子(Dryzek, 1990, pp.40—56)。但他认为论证模式得以推行的最佳场所是国际领域，因为这里(不管结果怎样)没有“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或国家类似物”来阻碍论证性谈判进程。他对一些国际环境保护问题——美国和加拿大边界水资源纠纷问题和全世界捕鲸控制问题——进行了评论，并探讨了通过协商谈判程序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势。可是这些例子并没有多少说服力。美国和加拿大边界加里逊河分流纠纷问题的谈判陷入了“僵局”，至于国际对捕鲸的限制，有许多证据表明，推动谈判进程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什么“良好辩论的非强制力量”(Dryzek, 1990, pp. 90—108; Poter 和 Welsh Brown, 1991, pp. 78—82)。人们无需成为一个传统的霍布斯主义者或一个对理性选择的顺从的皈依者，就会（或许是十分遗憾地）感到德雷泽克的论证性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并不是那么令人乐观。就我们这里感兴趣的问题（协商性市场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方案）来看，这更加突出了这一难题：一种可行的论证或协商民主及其现实例证缺乏强有力的制度性指导方针。在实践中，德雷泽克赋予批判理论原则以某种制度形式的强烈愿望只会部分实现。下面我们就开始探讨另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即向这种协商性民主秩序转变的问题。

五、代议制民主和“可行的”变革？

然而，上述难题尚未穷尽变革的可能性。近些年来在政治

左翼人士中间又对代议制或自由民主制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取而代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3]虽然他们的观点不能轻易与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协同起来,但由于两者都是基于对我们在本书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工程"面临的巨大危机所作的思考,因而人们可以将它们结合起来。因此,同新市场社会主义一样,对自由民主制的再评价问题,至少从部分上说,也是根据东西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衰竭、对社会主义传统话语(特别是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国家作为经济计划者和社会改革者角色的普遍失败等问题而进行的探讨。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作出历史性退却的时代,关于权利、正当程序和有限政府的话语看来越来越成为捍卫我们曾经假定的那些坚不可摧的历史成果的重要工具。当一种长篇大论的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失去了其内在逻辑性时,多元主义和开放看起来一定会更具魅力了。

178

这种民主复兴过程的最明确和最深思熟虑的代言人之一是戴维·比瑟姆(David Beetham)。他认为:"民主的核心含义就是平等的公民对集体决策的公共控制","它所能提高和规定的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自治"(1993, p. 61)。在提高这种以自治为基础的民主的过程中,"自由民主的矛盾结合"中有一些因素是很有价值的。其中许多因素都是从自由主义同专制国家的斗争中承继下来的历史成果,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承担不起将其抛弃掉的代价。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有:对个人自由(包括表达、活动和结社等自由)的追求;管理权力的制度性分工、正当的程序和法治;代议制议会制度;宪法制约的国家,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以及那种"没有一个关于好社会的终极真理的认识论前提"。他指出:"我们在20世纪末懂得

的一件事情就是：那种以更完善民主的名义企图消灭这些自由特征的做法，最终只是破坏了民主，以民主的名义攻击民主”。但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在历史上也是对民主扩展的最大限制。在公民权普遍化以前的年代，就什么人享有充分公民权的问题经常展开斗争。更一般地说，它是关于如何合理划分公共和私人领域问题的争论。例如，女权主义者极为关注“私人”家庭领域的不平等是如何损害正式政治领域中的平等的，而社会主义者认为对经济过程的私人控制结构破坏了对正式政治平等的追求。考虑到自由主义同民主之间的这种模糊关系，改革者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揭示如何或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推进民主化进程，这既是在扩大民众控制的意义上也是在使其实现的条件平等化的意义上进行的，同时又不破坏民主本身的条件”(Beetham，1993，pp.56—57，60)。 179

改革者的一个策略就是强烈要求更为充分地实现现存自由民主制内的民主因素，其目标是使自由民主政府根据它自己的宪法主张运作。在英国，对这种宪法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导活动是围绕八八宪章(Andrews，1991，pp.207—211 转载)开展的运动。这一文献，充满着对法治和捍卫个人权利的诉求，希望在一个成文宪法中写入一个包括捍卫公民核心自由，改革司法和众议院，明确划分地区、地方和国家政府之间的权力，扩大信息自由和改革选举代表制等条款的权利法案。这个宪章里不乏左翼人士提出的睿智和深思熟虑的批评意见。但有些人批评该宪章只是关注一些传统的自由政治权利，而没有考虑其他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另一些人担心，如果不直接面对和解决英国社会所存在的资源和机会的不平等分配现象，扩大了的权利也只能是以多种方式集中到少数强有力的公司集团手中(Andrews，pp.

205—264)。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对诸如八八宪章运动这样的活动取得的成就非常轻视,"原因正是它们只把自己束缚在那些希望使现存代议制民主更好运作的改革上"(Hirst,1993b,p.14)。这种批评看起来至少是非常苛刻的,尽管宪章的目标十分有限(可能这是为了获得最广泛的支持),但在当时英国宪法积淀少得可怜的环境中,使"现存代议制民主更好运作"就已代表着一个巨大进步。我认为,宪章最令人失望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倡议的内容(作为大多数民主改革者的最低纲领,它是无可指责的),而是它看来对英国政府的行为影响甚微(尽管对此泼墨渲染颇多)。

另一些人则试图追求带有更激进意图的改革议程。虽然比瑟姆本人为代议制辩护,但他也坚持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改善它:对政府进行更有效的控制,保证拥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和促使选举出的机构更具真实的代表性。这些改革将使所有的选票具有平等价值,增加普通公民担任政府职务的机会。与此同时,他还倡导变革,它能够缩小由于市民社会中资源分配不平等所导致的对政府影响力的差异,"限制集中在个人和强有力公司手中的财富的规模,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财富占有传媒、赞助或'聘请'被选出的代表或为竞选活动提供资金,从而购买政治影响力"。他还提出了一个不太具体的论断:"选举过程可以扩展到其他机构,私人的和公共的,地方的和邻里的以及国家的和跨国的"。至于这种改革对私人所有经济意味着什么,比瑟姆对此有些含糊其词。但他承认,同传统的苏联指令经济比起来,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不太容易遭到自由主义者的攻击。但不管怎样,如果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纲领的倡导者都要"在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内实现自己的纲领的话",那么他就赞

180

同那种“同私人所有权并存而不是对立的经济民主化战略”。这意味着可能要选择类似瑞典雇员基金模式那样的方案，而不是市场社会主义设想的社会所有制（Beetham，1993，pp.64—65，69）。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则更为广泛和雄心勃勃地尝试建构一种以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深刻见解为基础的民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自治”又成了关键术语。赫尔德也认为在现存自由民主制中有许多不可缺少的积极因素，其中包括“客观的”公共权力结构，成文宪法和权利法案，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但是他赋予了其中许多因素以激进的新内容。例如，他的“权利体系”中不仅包括了传统的公民自由，而且也包括了“同再生产、育婴、健康和教育等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权利，也包括了保障民主自治拥有充分的经济和资本资源的经济权利”（Held，1987，p.285）。同样，他的“法治”也包含着“对分配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的极大关注”。它不仅要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而且也要保障他们拥有实际能力（健康、技能和资源）以充分利用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1987，pp.85—86）。

赫尔德认为，从自由主义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或许是最有价值的民主因素就是，“强调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必然是任何民主秩序的主要特征”（1987，p.281）。迄今为止，人们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作了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描述。[14]这里最重 181 要的见解是：应该有一个公共生活领域，它要超越国家及其机构的直接控制，并与其隔离开来。任何一种取消这种区分的尝试——将公共生活纳入国家的管辖范围之中——最好地讲是不自由的，而最坏地说就是专制。正如赫尔德本人所承认的，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可以在制度上“分离”开来的想法是一种幻想，其

实最重要的是应该承认这两个领域都不可或缺,同时也要承认它们在功能上的相互依赖,而它们之间的相互独立应该由宪法加以保障。不论如何,赫尔德坚持认为,只有在现存国家制度和现存市民社会制度都得到了激进改造的情况下,民主自治目标才能实现。正如他所设想的那样,问题是双重的:

> 市民社会结构(包括生产财富的私人所有制、严重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问题)…… 不能为平等选举、有效参与、合理的政治协商和对政治议程的平等控制创造条件,而自由民主制国家结构(包括庞大的、经常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制度性依附、只为自己再次当选而考虑的政治代表)也不能创造一种组织力量来充分调节各种"市民"权力中心。(1987,pp.282—283)

这促使赫尔德将注意力集中在双重民主化进程上,其中国家和市民社会都要受民主更新过程的支配。我已经介绍了一些关于国家方面的改革倡议,至于市民社会方面,有两项改革特别重要。第一,要求男人和妇女行使民主自治的机会平等化。实际上,这提供了"国家和市民社会必须……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发展的条件"(Held,1989,p.286)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虽然这种民主参与机会的平等化一定要求市民社会内的基本改革,但很显然,只有在一个经过改革了的,但仍然发挥干预作用的国家的某些保护之下,这些改革才能维持下去。

市民社会的第二项重大改革包括缩减私人资本权力。对此赫尔德特别重视:"为了创造政治平等的条件,目前的物质资源分配制度必须进行重大变革,(同时)对于确立一种开放和公正

的政治议程的可能性来说，承认将生产资料所有和控制方面的不平等降到最低程度的必要性也是十分重要的"(1987, pp. 293—294)。然而，他小心谨慎地考虑了取代私人企业对经济进行控制的各种制度。既然国家和私人所有制都被证明是不太令人满意的，赫尔德便对合作社方案特别重视。他确实倡导这种"将民主扩展到工作地点和企业内部的有力方案"，并且承认，不管这种方案在实践中有怎样的局限性，"合作社所有制形式…… 同国家所有制或单一的私人所有制比起来，可能更容易与民主自治原则协调起来"(Held, 1991b, p. 884; Held, 1987, p. 294)。赫尔德关于这些问题的所有论述被概括在他自己的"自由社会主义"模式中。 182

目前，关于协商性或论证性民主的制度性设计以及关于向这种体制转变的可能性的论述看来发展得并不充分，以至不能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模式。相反，诸如比瑟姆和赫尔德这样的理论家那种使市场社会主义与"新自由民主"靠拢的提法，尽管远不是确切无疑的，倒是很有价值的倡议。在确立一种将或多或少的代议制度与奉行干预主义但受宪法制约的国家结合起来的混合政策方面，这些理论家则提出了许多被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的那种民主化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很清楚，追求民主自治将意味着对所有制和生产财富的控制方式进行改造，尽管他们对这种"经济社会化"可能采取的形式还不很明确。但这或许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打开了一个缺口。然而，如果考虑到比瑟姆和赫尔德持有的保留态度，也许只有在那里合作社经济结构中和向这种体制转变的政治学中存在的其他问题能够解决。

183 赫尔德的自由社会主义或民主自治模式

指导原则

每个人都应该自由平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在具体设计那种形成和限制他们可利用的机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以及承担相应的义务),只要他们不去利用这种组织结构去否定他人的权利。

主要特征

国　　家	市民社会
写入成文宪法和权利法案中的自治原则	家庭类型和信息来源、文化制度、消费群体等的多样化(根据 DP 原则进行管理)
议会或代表会议结构(围绕分别以 PR 和 SR 为基础的两院组织起来)	诸如育婴、健康中心、教育等的社区服务,内部根据 DP 原则组织起来,但是由使用者确定优先权
包括用来评判权利解释的专门论坛在内的司法制度(SR)	
竞争性政党制度(被公共基金和 DP 所改造)	自我管理企业(如果是至关重要的工业,就实行国有,否则就采取社会或集体所有)
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服务,根据 DP 原则在内部组织起来,同时要求调节地方使用者的需求	各种各样的私人企业,以帮助促进革新和多样化

总体条件

信息的公开利用性,以保证所有公共事务的充分全面决策
由政府确定总体投资的优先权,但在商品和劳动方面实行广泛的市场调节
减少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不负责任的权力中心
维护那种能够容纳各种组织形式试验的制度结构
集体负责日常任务,将惯常劳动减少到最低程度

DP(Direct Participation)直接参与　由一些特定公民(涉及公开性集会、公民投票和被授权的代表)直接参与组织管理。
PR(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比例代表制　在某种比例代表制基础上选举代表。
SR(Statistical Representation)统计代表制　以某种统计代表制为基础选举代表(即一些人在统计上代表主要社会群体,包括性别和种族在内)。

资料来源:赫尔德的著作(1987,pp.290—291)。

六、淡化社会主义国家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化形式，其最后一项要素就是承诺要淡化已经变成庞然大物的国家。市场社会主义者认为，扩张和独断的国家是传统形式的社会主义存在难题和不受欢迎的主要根源。当然，这种情况也时常被人们歪曲叙述和过分夸张。例如，福利国家就经常遭到批评，被说成是官僚化和干预过多，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却是普通公民主要权利的源泉，而这些 184 权利正是他们所要的和需要更多一些的，并非越少越好。同样，将"东西方社会主义"的全部经验简单地归结为"国家统制的社会主义"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国家统制在东方和西方具有实质上的不同，况且在西方，国家控制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然而在讨论了上述这些避免误解的说明后，显然存在的事实是，一些传统社会主义形式过于依赖国家，它被证明是官僚化的、非法干预的，对公众情感漠不关心，且其无效率性危害尤甚。

人们也有一些理由相信实行某种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就能大大缩减类似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那样的权力。在一种"纯粹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将放弃自己作为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者和经济领域强制计划的直接指导者的经济作用，其作为雇主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的作用也将被大大降低，选择的范围将得到扩大。相应地，从原则上讲，对最终消费者的社会和经济服务需求的反应要加以改善。所有这些同一种限制公共机构权力的正式宪法秩序以及对公民的一系列法定权利予以保障结合起来，使得市场社会主义看来能够建立一个在规模、目标和

法定权威等方面都更为合理的国家。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中，朱利安·勒·格兰德对减少国家的直接权力作了最深刻的论述。正如我们在本书第四章所看到的那样，勒·格兰德这样设想，国家不仅仅要从直接经济管理领域撤出，而且也应从大多数传统福利服务的供应（与资助相对）领域撤出。购买力，票券形式的或特定信贷形式的，应该在福利申请人（或他们的代表）中间进行分配，用以从非公共生产者那里购买服务。国家权力（中央的和地方的）应限制在资助服务或在必要时代表公众合理地大规模购买服务上面。它们一般不能卷入任何一种服务的直接生产（见 Le Grand，1989；Le Grand 和 Bartlett，1993）。但是，大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都设想国家要继续发挥更多具体的作用。确实，在亚历克·诺夫的可行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家仍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以至于一些评论家不赞成将他描述成一位市场社会主义者（见 Martell，1992）。在主张严格限制国家卷入经济生产活动的人中，有许多人还是不情愿降低国家供应福利的作用。一些人的确希望诸如卫生和教育等服务项目更为切实地远离市场标准（见 Seluchy，1979）。因而，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实行市场社会主义所意味的降低国家作用的程度。当然，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确实与旧苏维埃模式有实质上的区别，它所实行的干预也可能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不同，但是我们很难断定国家干预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一定会比在当前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要少。即便是极力主张降低国家在生产和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的勒·格兰德，也是通过坚持国家卷入初次收入具体和预先再分配的必要性，才能够捍卫自己的模式，公平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此外，人们对新形式的社会所有制最终不会变成国家所有制的替身的可信性（我们

185

已经看到,新自由主义批评家反复提出这个问题)也是难以确定。

那么,市场社会主义秩序是否存在着实现更大规模地削减国家权力的途径呢?一种可能性要看左翼人士的另一项创意了,那就是倡导某种形式的社团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15] 按照保罗·赫斯特(Baul Hirst)的解释,社团民主是对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中左政治困境的有力回应。实际上赫斯特认为,当代社会环境不仅受到集体国家社会主义衰竭的制约,而且也受到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失败的影响。同市场社会主义者比起来,赫斯特不太相信基于市场增强的作用就能够在当今环境下重建一种进步的政治。为了找到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他更愿意回顾在社会主义政治隶属于国家权威(现在看起来很具破坏性)以前的那个时期,并较为明确地希望复兴社团原则,"最被人们忽视的19世纪伟大的社会组织学说"(Hirst,1993a,p.112)。社团主义实质上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当尽可能多的社会事务交由自愿性民主自治的社团进行管理时,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将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在其价值体系中,它赋予自由以优先权,(但)认为自由只能被大多数人共同有效地追求,如果他们有能力并在社会的支持下同他人一起加入志愿社团从而共同行动的话"(Hirst, 1993b,p,24)。复兴社团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就是分权,以及将尽可能多的社会事务交由公共资助的但必须是自愿自治的社团进行管理。在社团主义中,

> 一种自治的市民社会跃居首位,而国家变为处于第二位的(即使是很必要的)公共权力,以维持社团和平,捍卫个人权利,以及提供公共基金机制藉此使社团的部分活动得到资 *186*

> 助。国家的活动，无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其范围将大大缩小……公共福利提供并不缩减，但提供的方式不再由国家直接管理。(Hirst,1993a,p.117)

在社团民主制度下，“自愿自治社团将越来越逐渐成为对经济和社会事务进行民主管理的主要手段 …… 权力将尽可能地在明确的权限范围之间进行分配 …… 这些权限范围内部的行政管理将降到能够对相关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最低限度。”(Hirst, 1993b, p.20)。国家供应将让位于国家调节。当国家的任务大大减少时，人们期望它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剩下的职能。

社团主义观点本身值得人们严肃思考，但我在这里只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它究竟能够为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淡化了的国家的主张提供一些什么东西呢？因为在赫斯特那里社团民主是对市场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方案)的替代，所以或许也就不很奇怪的是，社团模式中的那种作用降低了的国家很难被纳入到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中去。社团主义能够为市场社会主义者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诸如自愿性协调、市民社会的自主活动、对国家的宪法制约、实施辅助性职能等等。然而人们很难将社团主义国家视为这样一种理论的合适模式，这种理论承诺在那种被理解为在民族国家层面以公民身份运作的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所有制，并使具体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化。的确，人们很难看到最小化的国家实际上等同于社团民主制度下要求实现的简化议程。我认为，这种国家体制的可能性只是基于一个理念，即市民社会能够自发地创造一个自愿性社团联合体，这些社团能够相互宽容(它们中间的资源分配在某种可接受的意义上说是公平的)，以及愿意以某种经过协商的方式提供保证自愿性自主

活动(和满足最低限度的法定福利)所需的资金。这有待于我们去考虑向这种秩序的转变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

187 然而,对这事不必太感遗憾。人们已经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也是可以理解的)现代国家的威慑、邪恶和堕落表现上,以至忘记了市民社会也不是完全地可爱和光明。可能的情况是,即便承认了市民社会的这些非理想性,我们也还是愿意接受它们,而不是把空间留给扩张性国家的更不完善。可是,即便是开始承诺要解决市民社会中资源和机会的制度性不平等问题的政治纲领,人们也很难看到它是如何能够采取上述立场的。拉克洛(Laclau)和穆斐(Mouffe)在非正式场合曾直言不讳地讲,没有一位传统的国家主义者坚持认为在女权主义斗争中,"国家是促进经常性反对市民社会的进程的重要手段"(Laclau 和 Mouffe,1985,pp.179—180)。我相信,我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回到戴维·赫尔德提出的重要观点上来,即对于任何一种具有变革意向的政治纲领来说,改革进程必定都是双重民主化,其中"国家和市民社会 …… 相互成为对方民主发展的条件"(Held,1987,p.286)。这里的讨论到现在就应该弄清,这根本不是意味我们应该接受那种以目前的方式组成的国家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英国,改革潮流是无法抗拒的,而且这里正如赫斯特颇有远见地强调的那样:"对中央政府的基本制度实行宪法改革和政治改革,是任何形式的激进政治纲领的前提"(Hirst,1993b,p.40)。但是,如果这种激进政治是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很明显,国家将在这种政治中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七、结　　论

或许是这个事实，即多数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具有经济学而不是政治科学的背景，能够解释为什么那种将市场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民主化形式的主张相对来说受到了忽视。这是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将市场社会主义原则同当代其他倡导民主的观点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很有可能确立一种可行的市场社会主义，使其成为民主化的首要发起者。我们在本章的开端，就确认了关于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设计的三种核心主张——扩大参与、控制私人资本权力和淡化奉行干预主义的国家，其中每一项都不是能够简单明了地加以确定的。无疑，工厂参与可能受到限制，资本中性化难以设想，控制国家权力也是很有限度的。但不论如何，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混合民主体制，将那些经过改变了的自由民主因素与合理的工厂自我管理结合起来，它至少在原则上承诺了在国家和经济双重领域提高民主的可能性。我们确实可以这样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主化的政治理论，要比作为一种社会化的经济理论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更为复杂的转型政治问题的话，上述每种情况都不能更多地代表一种进步。我们在最后一章就是要讨论这种转型政治问题。

188

注　　释

1 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主要见 Barber(1984)；Dahl(1985)；Burnheim(1985)；Held(1987)；Gould(1988)；Dahl(1989)；Dryzek(1990)；Phillips(1991)；Held(1993)。颇有影响的先驱的著作，见 Pateman(1970)；Macpherson

(1977a)。对这一问题也颇感兴趣的言论，见 Arneson(1992 和 1993)。

2 一些人极为明确地指出，他们对扩大参与的追求完全是政治性的，与社会主义立法毫无关系。巴伯(Barber, 1984, pp. xv－xvi, 252—257)是这一立场的最好代表，尽管他的见解敌视法人资本主义，热情倡导市场而不是市场资本主义。

3 见 Dahl(1956, 1961, 1971, 1985 和 1989)。对达尔的著名思想传记所作的简短评论，见 Held(1991b)。

4 达尔的另一权威性著作《民主及其批判》(Dahl, 1989)也对这种民主作了充分明确的论述。

5 当然，许多新自由主义者并不希望看到民主的扩展。哈耶克是下面这种观点的最明确的代表，即"只有有限的政府才是恰当的政府"，以及，如果民主不想破坏自己和优先的自由价值，它就应该受到限制，使经济领域远离民众控制(Hayek, 1982, vol. 2, p. 102)。关于工厂民主将如何使剥削制度化的论述，见 Arnold(1992)。关于新自由主义者有限民主论的一般观点，见本书第五章和 Pierson(1993a)。

6 关于这种观点的经典论述，见卢梭的著作(Rousseau, 1968)；对反对代议制观点所作的颇有特色的两种当代评论，见 Barber(1984)；Burnheim(1985)。

7 这一有名典故当然出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反对霍布斯下面这种观点：人们为了安全起见，避免相互间的掠夺行为，就只能把他们所有的自卫权力拱手交给一个不受限制的统治者。洛克指出："这是认为，人们如此愚蠢，他们小心谨慎地避免鸡貂或狐狸对他们的侵扰，但却情愿被狮子吞噬，而且还以为这很安全"(Locke, 1963, p. 327)。

8 关于女权主义政治中表现出来的这种潜在问题，特别明确和有意义的讨论见 Phillips(1991, pp. 146ff)。

9 关于"难于治理"的话语在 70 年代中期讨论尤为激烈，按说它反映的是战后工会运动暂时的和保护性的力量，这是在早已逝去的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发生的事情。关于这方面的讨论，见 King(1987)；Pierson

(1991a)。

10 Marx(1973b);Lenin(1960);Luxemburg(1970);Miliband(1961);关于这方面的评论,见 Pierson(1986)。

11 约翰·梅杰(John Major)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的经验就提供了一个简单但非常生动的例子。由于意识到过分投机的压力,政府被迫于1992年9月16日放弃了自己作为欧洲货币制度汇率机制组织的成员国资格。而在此六个月前,保守党还在自己的竞选纲领中将这一制度说成是"我们反通货膨胀规范的核心内容"(《保守党纲领》,1992,p.6)。政府在什么时候和以何种可以想象的方式对这种政策逆转作出过解释呢?

12 德雷泽克和米勒之间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前者强调协商组织应处于国家之外并与国家相对,公平地讲,德雷泽克比米勒更受益于传统的批判理论。

13 任何一种对这些独创性建议的总结,都要包括下面这些著作:Beetham(1993);Bobbio(1987a 和 1987b);Bowles 和 Gintis(1986);Campbell(1983);J. Cohen(19[illegible]);Cunningham(1987);Esping-Anderson(1985);Gould([illegible]);Held(1987 和 1993);Held 和 Hall(1989);Held 和 Pollitt(1986);Hindess(1983);Hirst(1986);Keane(1984,1988a 和 1988b);Laclau 和 Mouffe(1985);Mouffe(1992);Offe(1985);Phillips(1991);Poulantzas(1978)。

14 关于这个问题的简要论述,见 Arato 和 Cohen(1992)。

15 其代表性例子,见 Matthews(1989);Cohen 和 Rogers(1992);Martell(1992);Cohen 和 Rogers(1993);Hirst(1993b)。

第八章　可行的社会主义?

对于许多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来说，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关键论据(据说这一论据抵消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许多不完善性和潜在的不连贯性)就是这一理论承诺自己具有更大的可行性。他们广泛接受一个论断，即在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运作的社会决不要实行全盘的社会改造。按照詹姆斯·扬克的说法，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范围广大的经济机制和社会事务计划方面的差异 …… 是如此之小，以至可以忽略不计”(1992, p.13)。约翰·罗默在论述自己的模式时(1991)也承认，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仍然还存在着不公平现象，市场规则也倾向于鼓励人们自私和敌对，而不是人类本性中的共有和合作特征。甚至戴维·米勒，尽管他对市场和传统社会主义目标的结合非常乐观，也承认市场化形式的社会主义将意味着至少要收缩两个“基本的社会主义目标”：自觉地指导社会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促进合作行动范围的扩大(Miller, 1991, p.406)。实际上在所有市场社会主义者那里，在社会主义议程的范围和纯洁性方面所丧失的东西要多于市场社会主义承诺的增大的可行性所能提供的东西。根据亚历克·诺夫的见解，“可行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它应该描述“一个孩子在其有生之年所设想的、在绝大部分发达世界能够存在的那些事情，而我们不必制造或接受一些不可能的或不切实际的关于社会、人

类和经济的假设"(1991,p.209)。

190 这种关于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议程由何构成的观点显然是根据什么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这种实践经验得出的，同时它也参考了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提出的可能性，即，任何一种根据理性的支配全面改造社会的尝试都会滑入反向乌托邦的泥潭。但是它应更多归功于一种理念，即：从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出发，现实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该期望世界"天翻地覆"，而是要坚持渐进的改良。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改革可能不是很完全的(而且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些改革至少代表了在较为长期的转变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它们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另外，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建议越是温和，它们的成功机会也就越大。[1] 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自觉地比其正统先驱理论少带一些英雄气，那么其倡导者就可以认为，它至少是"一种切实的、可行的社会主义"(Nove, 1983,p.ix)。

就是这种断言，即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我要在这最后一章里进行分析。我们一开始就应该弄清这种关于可行性的主张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含义是特别重要的：第一，针对传统计划经济形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构建这样一种可行的经济理论模式，它要把市场和社会所有制结合起来，同时能够满足某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标准和尺度。这里的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能否提供一种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既在理论上"可行"又能符合这些经典的经济标准(特别是根据它所体现出来的效率)。我们在前面的大部分章节讨论了这种模式的发展及其合理性。在缺乏更多现实经验的情况下，以及考虑到围绕这一模式的概念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我们最好还是把这

一方面的可行性主张描述成为一种争论激烈但情有可原的见解。[2] 然而,还存在着第二方面广泛得多而且更为重要的可行性含义,它是我们这里争论的焦点。因为,市场社会主义显然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战略的核心因素被提倡的,中左翼社会和政治力量能够围绕这种政治战略被动员起来。的确,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人们拥护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温和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正是这种温和性能够使市场社会主义成为处于不断被围攻之中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可行纲领。它被举荐为一种社会主义纲领,不是为那些过于乐观的梦想者而是为那些在历史性失败年代仍然坚持不懈和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们所设计的。在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代表着在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实行一种社会主义政治方案的可能性。总之,正是这方面的承诺(在20世纪流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形式被认为失败了的条件下提供一个清晰明确的社会主义纲领)证明了我们有理由集中这么多的注意力关注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191

我在这最后一章想要考察的正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可行性;由于对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提出支持的"硬件"看来经常是对制度变革的论述,所以我就集中关注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我尤其是要考察这种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论述能够克服困难的程度,这些困难被认为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阻塞了传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首先分析一下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对这种转变过程的论述。

一、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

鉴于我特别对那种将市场社会主义当作发达西方政治战略的倡议感兴趣,所以我就把自己对转变过程论述的分析限制在这个范围内。然而在这一分析过程中,我要公正地指出一点:许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却把这种倡议看作是在当代世界秩序中这种变革的希望最微的理由。我们知道,早期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被当作是医治苏联集团先存社会主义政权之弊病的药方(见本书边码 82—83;Nove,1983 和 1991)。一些评论家把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视为转变后的东欧国家,或者中国甚至古巴的市场经济选择方案(见 Roemer, 1994, p.122)。在“过去”的东欧国家,它被荐举为改革已经存在的社会所有制同时又不滑向不受限制的自由放任市场资本主义的一条道路。身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约翰·罗默,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也许有机会成为那些在集权政府统治下的、远未能够改善其工人和农民生活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实行改革的道路。[3] 他认为,在较为成功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如韩国)把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可能性较小。可能性最小的是在发达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提倡实行市场社会主义,这里私人所有权关系根深蒂固,而且更有可能通过“社会民主主义妥协道路”而不是“私人资产的国有化”来取得进步(Roemer, 1994, p.122)。(当然这种预测对于那些将市场社会主义当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战略的人来说可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因为他们正是感到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战略已经“元气耗尽”。[4])这样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这样一种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许多(但

192

不是全部)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都认为它是希望最小的选择。

但不论如何,这里值得人们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那些把可行性当作自己模式之王牌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改革道路的论述竟是如此之少。戴维·米勒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强调"巨大的困难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找到一条向这种经济转变的道路"(1991,p.414)。然而米勒自己的著作《市场、国家和社会》显然还是主要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基础作出理论上的分析。在这本著作中,他确实(简要地)谈到了转变机制问题。他似乎把这种转变看作是一种渐进过程,其中有同情心的政府将会支持各种关于利润分享和共同决策的计划,促使工人买下他们自己的企业的全部产权或组成新型的合作社。然而,任何一个政府在占尽优势的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大环境中要实现上述计划,都面临严重的困难。米勒极为谨慎地总结说:

>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将对这种转变十分有利 …… 如果国内继续支持更大程度的经济平等和更具参与性的工作组织形式。但是这一道路将会是漫长的,而且我们应该把市场社会主义当作是指导思想,而不是为下次选举准备的纲领。(1991,p.414)

亚历克·诺夫(1983 和 1991)则更为明确地关注设计有可能向"可行的社会主义形式"转变的环境。可是他对发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转变过程的评论大多局限于对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有化战略和财富再分配的批判上面。至于他所设想的那种可行的社会主义赖以实现的政治过程(以及支持基础),他接下来并

没有论述。他坚持认为“人们预见到的危险并不是投票拥护‘复辟资本主义’”(Nove,1991,p.247),可是关于使“投票选出社会主义”成为可能的那些更重要的政治支持和制度支持问题,他完全没有涉及。[5] 格兰德和埃斯特林主编的论文集《市场社会主义》(1989)在对转变过程的论述方面也是同样薄弱。或许较为切实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是索尔·埃斯特林自己撰写的论“工人合作社”的文章(1989)。其中埃斯特林考察了社会所有制可能得以实现的不同方式和手段。他描述的最激进的一种形式是:所 193 有权的社会化需要规定那些受委托的工人对一定规模以上的全部企业进行控制,将现存的全部股票转化为挣利息的公司债券,由一些相互竞争的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管理(Estrin,1989,pp.191—192)。但是这种可能性很大的政治方案本身却是基于这种预先(非常重要的)假设而制定的,即“一个市场社会主义政府(已经)当选上台,并毫不含糊地要求变革生产领域的各种关系”(1989,p.191)。

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不愿意直接去设想制度变革的机制,但詹姆斯·扬克的著作《修正的现代社会主义》(1992)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这本书包括了扬克对美国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详细说明(当然这是确切无疑的“硬件”!)。尽管实用主义是扬克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调,但它几乎没有扩展到他对政治变革过程的论述。他认为“迈向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反对愚昧和偏见的启蒙运动”。他设想这种“启蒙运动”是“一个特殊利益团体”发起的,“其中心目标就是实现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这一团体的名称可以暂定为‘实用进步社会’(Pragmatic Progress Society)”。他接着论述:

实用进步社会可能较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在最初阶段准备起草法案。这个确立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法律草案的名称可以称作"经济公平法"。该法案将列出那些不在社会化范围之内的事物，明确规定社会化的程序和时间表，确立公共所有局，规定公共所有局的权力范围和限制，规定对大规模发达企业挣得的资本财产收益的社会红利分配，以及处理诸如外国所有制等一些次要的问题。(1992,p.280)

这种示范性法案"将促使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得以较为顺利和迅速地实现，只要这种转变能够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的话"(1992,p.280)。扬克还考虑到这种纲领可能在职业经济学家中获得(很含糊的)支持，但认为它不可能(当然特别不可能)获得一些社会团体或运动的支持，诸如工会、新社会运动或者甚至包括民主党。可以说扬克对市场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及其影响作用的预期更为雄心勃勃(和深思熟虑)。[6] 扬克是一位职业经济学家，他对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着重关注实际细节问题。我们可能没有理由期望他作出相应的关于转变政治的论述。但不论如何，他的社会变革的政治方案却是极难令人信服的，它越过了两个世纪以来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和那些在政治科学领域几乎达成全面共识的判断，竟然主张依靠纯道德说教的变革力量。扬克在"甘于冒险行事"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并对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问题作了颇有预见性的论述。但是他的方案必然会走向政治决策的"乌托邦"一端，而不是"实用的"方面。

194

二、对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评价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发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者对制度变革的政治的论述是非常粗略的。但正是这种粗略的论述告诉了我们某种关于理解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转变过程的方法。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论述中并不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发明者。我们应该加上一点，那就是：他们大体也不想为自己特殊品牌的社会主义得以实现的手段提供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述。实际上，他们所倡导的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沿着"议会民主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法则。当然，确实有一些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特定的发达资本主义政策环境中倡导宪法改革，还有一些人至少将合作企业看作是新型民主自决的场所。然而，不论他们希望将来实现多少制度性的革新，他们一般都是在现存的宪法秩序内致力于推行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在发达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条件下，革命(这里理解为实行急遽的超越宪法之外的变革)看来是不受人们欢迎的，也是不可行的。

据此我们认为，不管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具有怎样激进的意图，它也不得不逐渐推行，而且为了响应民主公众的恰当形成的意愿，它还将被不断修正，甚至出现逆转。[7]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社会主义最好被理解为是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意图的表达，这个政党致力于上台执政，而且希望通过实际存在的自由民主国家制度来实施自己的立法纲领。于是将市场社会主义和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并不是对转变过程的论述。实际上，市场社会主义希望在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凯恩斯

195

主义加福利国家"方案及其依赖的选民基础不再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获得更广泛的选举支持和保持一种切实有效的经济。因而将市场社会主义和较为正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区别开来的东西(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是变革方案的内容以及获得政治支持的潜在基础，而不是改革方案可能赖以实现的政治机制。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一定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市场社会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提供一种转型政治的可能性，以避免那些被广泛认为是阻挡了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进步伐的弱点。

三、市场社会主义者和选举社会主义的困境

就是在人们把社会主义当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之长期性政治目标(当然这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的情况下，在关于这种社会变革赖以实施的合理手段问题上，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例如，在20世纪初的欧洲造成左翼分裂的分歧，经常首先表现在关于向预期社会主义目标之合理转变形式的争论上，而对这一目标的可取性却争论甚少。[8] 这种争论被人们用简单的形式表达出来，简约成了"改革或革命"之间的对立，可是这又很容易令人误解。然而很有必要强调的是，根据这种划分，市场社会主义和较为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都属于同样的改革倾向，这种倾向赞成以现存的宪法方案为媒介促进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更为确切地说，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差不多完全是一种选举社会主义(Electoral Socialism)。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是否是一种比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更有光明前途的选举社会主义形式。

任何一种对选举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市场社会主义)的争

论都必然要从分析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的权威性著作开始(Przeworski, 1977, 1980 和 1985; Przeworski 和 Sprague, 1986; Przeworski 和 Wallerstein, 1988; Przeworski, 1991)。在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精彩、简练的文章中,普热沃尔斯基以其令人叹服的缜密分析,提出了反对沿选举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普热沃尔斯基的论述是根据那些曾经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战略困境而展开的。从历史上看,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曾经面临着三个战略难题:是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还是在外部推进社会主义;是单独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支持还是寻求多种力量甚至非阶级力量的支持;是强调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进行改革还是将所有的力量和精力投入到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中去(Przeworski, 1985, p.3)。普热沃尔斯基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和民主游戏规则驱使社会主义者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利用参加选举的方法解决上述这些战略难题,在工人阶级之外寻求支持,追求在现存制度内直接实行变革。可是当工人运动的领导人除了参与之外别无其他道路可抉择时("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选举否决权从来就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这种参与受制于下面这种特殊的矛盾:"如果社会主义运动确实得到了工人们的广泛支持,参与选举政治是必要的,然而正是这种参与看来阻碍了最后目标的实现"(1985, pp.10, 13)。

196

有两个重要特征构成了这一矛盾。第一,当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进入民主过程时,虽然他们相信自己所代表的阶级构成了或即将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在任何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构成过选民的多数。这种"少数地位和多数原则"的结合迫使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在传统的工人阶级之外

寻求支持(普热沃尔斯基把传统的工人阶级非常狭义地界定为“在采矿、制造、建筑、交通和农业领域就业的工人,也包括其不活跃的成年家庭成员”)(Przeworski 和 Sprague,,1986,p.35)。但是这种寻求联盟的做法本身就意味着在最高纲领的社会主义议程上作出妥协,同时也冲淡了阶级利益政治。试图扩大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吸引力的做法在后果上被证明是适得其反,因为那种使社会主义政党在工人阶级之外获得支持的东西,也同样是遣散工人选民的东西。这样:“当社会主义者寻求其他人的支持时,他们侵蚀了自己在工人中的力量源泉。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他们不能维持自己的纯阶级性,而他们始终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工人政党身份。他们看来在哪一条战线上都不能获胜”(Przeworski,1985,p.106)。

参与矛盾也表现在纲领方面。因为一旦社会主义领导人被迫放弃了资本所有权直接社会化的最高纲领目标(这是寻求超阶级多数的迫切需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致力于现存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这样他们也就是为资产阶级谋取福利。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大部分投资都源于资产阶级。按照普热沃尔斯基的说法,“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不受触动的话,为了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就变成了不得不允许资本家占有利润”(1985,p.43)。在投资功能没有实行社会化的条件下,所有社会阶级的经济福利(以及任何一届政府的选举前途)都从属于满足私人资本投资者的积累需要。这样,“资本家的物质利益在目前得到实现,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在将来得到实现的必要条件”(1985,p.139)。“资本主义的危机”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当然也对工人不利,因为“经济危机,如果没有政治转变伴随的话,就会变成雇佣劳动者肩上的重负”(1985,p.

197

153;强调部分本书作者所示)。

普热沃尔斯基将这一论点加以扩展，得出了一个看来更为矛盾的结论，即参与政治意味着：即便工人们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还是理智地选择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阶级妥协政治将投资功能留在私人手中的话，那么工人福利（和收益流量）的长期最大化则要求他们积极维持一个长期资本积累的环境。然而情况也许是，即便我们假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福利或许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但决不会存在这样一个分界点，在这一点上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发动向新型社会秩序的转变过程。这种假设建立在普热沃尔斯基的命题之上：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并包括一个跨越凹谷的过程（"转变凹谷"：见图 8.1)。在这一过程中，工人的福利将被降低(尽管是暂时的)。

正像普热沃尔斯基假设的那样，如果"向社会主义转变意味着工人福利的恶化，如果工人可以选择与资本家合作的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物质条件"，那么"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就不能从工人的物质利益中推演出来"(Przeworski, 1985, p. 177)。即便我们假定社会主义潜力的最高点位于资本主义潜力最高点之上(见图 8.1)，但工人面对的仍然是向下的曲线，进入转变凹谷。在这一凹谷中，工人的物质利益促使他们维持现状，而不是希望实现什么光辉灿烂但十分遥远的、一种难以确定的社会主义未来的利益。即便转变过程通过某种途径得以启动，普热沃尔斯基仍然认为，在民主条件下，也不可能在民主公民坚持将转变过程逆转之前就达到转变低谷上升的部分(1985, pp. 176ff)。[9]

1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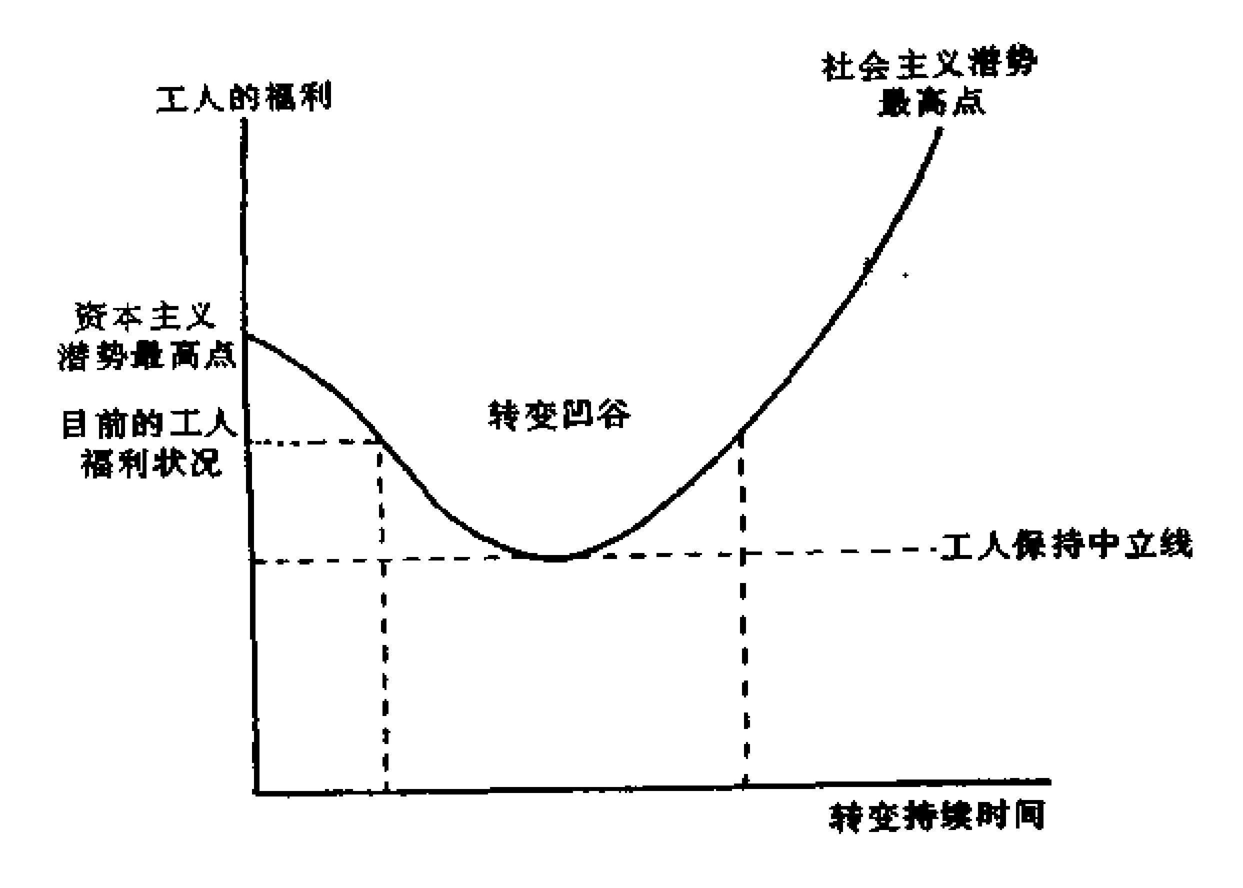


图 8.1 “转变凹谷”(来源于 Przeworski,1985,p.178:图 13)

四、对普热沃尔斯基观点的评价：阶级和选举抉择

亚当·普热沃尔斯基的反对意见看来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预测了惟一黯淡的前途。他与约翰·斯普拉格(John Sprague)合写的著作《纸制石:选举社会主义的历史》,最后得出了“选举社会主义时代可能结束了”这一结论(Przeworski 和 Sprage,1986,p.185)。[10]然而,尽管人们钦佩普热沃尔斯基的明晰论证和坚定立场,他的结论还是受到了坚决抵制,他的论题也遭到了持续不断的批评。[11]其中许多批评意见集中在普热沃尔斯基对变化的阶

级结构、潜在的阶级联盟及其政治影响的论述上。一些人反对普热沃尔斯基的极为狭隘的工人阶级的特性描述(Przeworski 和 Sprague,1986,p.35;Przeworski,1985,p.91)。尽管这个定义支撑着他所提出的"工人阶级取得多数地位的努力遭到失败"这一结论,但与此同时,它与普热沃尔斯基自己的这一理论观点也不一致,即实际的阶级形成在某些程度上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这是由政党领导人进行有效战略决策的能力大小所决定的(Przeworski, 1985, pp.47—49;Sainbury,1990,p.33)。实际上,在普热沃尔斯基的批评家中,很少有人回避他的一个意见,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产业工人阶级只构成一个少数群体(即便时常是一个实际的少数)。但是,人们对他的进一步主张提出了更多的实际反对意见,这个主张是:要在工人阶级之外取得对社会民主党的支持,只能以瓦解严格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为代价。普热沃尔斯基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关系:"在吸纳中间阶级和吸纳工人阶级这两种做法中间存在着一种抉择:当社会主义政党集中力量动员联盟的支持时,它们就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取得和维系工人对它们的支持"(1985,p.106)。

199

普热沃尔斯基承认,社会主义政党可以围绕超越产业工人阶级直接利益的纲领性因素(他举出了呼吁"诚实政府"的例子)成功地动员工人和"非工人"。可是提出这些超阶级的问题(以及向"公民"或"人民"吁恳)意味着降低了对工人本身的呼吁,从长远来看,这必然会损害社会主义政党动员这一核心选民层的能力。这种抉择最为可能在下述情况下表现出来:(1)有一个比社会主义政党更左的阶级政党可能会吸引持不满态度的工人的选票;(2)有一些公开坦诚的或纯粹语言上的党派可能以另一种认同为基础吸引工人,因为这些工人的阶级认同已经被社会主

义者的超阶级吁恳弄得模糊不清，以及(3)不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单一的全国工会组织，它本可以代替政党使工人围绕自己的无产阶级集体认同和利益而联合起来。普热沃尔斯基对很少进行这种抉择(如丹麦和挪威)的和更多采取这种抉择(如比利时、法国和1933年前的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选举战略(和运气)进行了对比，以支持自己的理论观点。

一些评论家反对这些关于选举抉择的主张。例如塞恩斯伯里(Sainsbury, 1990)指出，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经验对普热沃尔斯基的立场提供的支持就很有限。虽然不断变动的选举支持结构(以及一些变化因素的相互作用)较为复杂，但是塞恩斯伯里坚持认为选举抉择的发生(至少是在直至1985年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丹麦。总之，她认为"在选举抉择的存在和左翼选举运气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Sainsbury, 1990, pp. 38—41)。在英国，工党在近些年的选举中遭到了惨重失败，而这一情况没有包括在普热沃尔斯基的正式统计分析中。当然，英国工党可能也受到某些政治交易的影响，但是正如金(King)和维克海姆-琼斯(Wickham - Jones, 1990)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根据工党进行超阶级吁恳而失去传统无产者这一设想去理解选票的大量流失，那么这种理解必然是牵强附会的。[12] 马克·利奇巴赫(Mark Lichbach)对五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1975年以来获得的阶级选票作了比较研究，他发现：其实本来应该建议一些政党最好追求一种纯粹工人阶级的选举战略，而另一些政党可能会更好地集中吸引中间阶级。然而只有在澳大利亚工党那里，在吸引中间阶级选票和吸引工人阶级选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抉择结果(Lichbach, 1984, 439—448)。 200

对普热沃尔斯基的阶级抉择论题提出的最为系统的批评意

见可能来自赫伯特·凯奇切特(Herbert Kitschelt)的著作《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变》(1994)。的确,凯奇切特试图颠倒普热沃尔斯基的逻辑。因而他争论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治问题或经济利益能使社会主义政党只向传统蓝领工人吁恳的做法(例如,与此相反的是向所有雇佣劳动者吁恳)变得有意义。实际上,社会主义政党在"狭义的工人"及其同盟者中获得支持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一种抉择,而是一种乐队彩车效应(bandwagon effect,意指起到壮大声势的作用。——译者注),在这两个群体中获得的支持是同时增加(或减少)。这些运动不是发生在包含着固定不变的阶级地位、选举机会和战略抉择的环境中,而是发生在一种持续变化的环境中,其中社会主义政党与其他社会和政治主体共同面对着一个明确界定了的但却是真实的战略选择范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依据凯奇切特的观点,正是那些能够最好地利用这些"选举机会"的社会主义政党成了普热沃尔斯基所设想的面临着最严重的选举抉择威胁的政党。凯奇切特考察了普热沃尔斯基在《纸制石》中阐述的观点,认为"正是在普热沃尔斯基和斯普拉格所预测的……存在着最大灭亡可能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政党必然会蓬勃发展起来"(Kitschelt,1994,p.56)。在当代条件下,那些最少被蓝领选民"捕获"的政党,以及对工会认同程度最低的政党,也是最能够作出成功的跨阶级纲领性呼吁的政党。同样,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很强大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不是一种威胁(剔除不满意的蓝领选民),而变成了一种资源,其选民可以被那些"更新的"社会主义政党所吸纳。凯奇切特总结说:

如果说80年代在阶级交易结构和政党选举的成功之间存

> 在着某种关系的话，那么这种关系正与普热沃尔斯基和斯普雷格所预期的相反。那些在容易发生严重抉择的环境中运作的政党已经最成功地改善了它们的选举境遇。相反，那些面对中等或温和程度的选举抉择的政党做得最差。(Kitschelt，1984，pp.64—65；着重号本书作者加)

五、对普热沃尔斯基观点的评价：转变的问题

201

还有一些人提出的保留意见对我们这里的分析很重要，尽管我们不再广泛地一一讨论它们。这些保留意见反对普热沃尔斯基的观点，即向某种民主的社会主义形式转变的成本是人们难以承受的。第一个回应意见认为，普热沃尔斯基等人认可的“转变凹谷”可以在不抛弃经济改造或民主(或二者都不抛弃)的情况下被跨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普热沃尔斯基在后来的关于东欧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之可能性的论述中(1991)，自己也提出了一些跨越转变凹谷可能性的线索。这里，普热沃尔斯基再一次强调“转变凹谷”的问题，但同时他也提供了一个较为精细的时间范围模式和一些实行改革的战略。普热沃尔斯基所描述的两条重要转变途径同图 8.2 中的激进战略(R)和渐进战略(S)相对应。激进战略提供了一条时间捷径，但经济低谷较深。渐进战略中的经济生产萧条程度较小，经济福利损失程度也较小，但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

202

如果把普热沃尔斯基关于从指令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论述描绘得较为乐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现实条件下，他预测了在渐进战略和激进战略之间摇摆不定、重复发生的政策失败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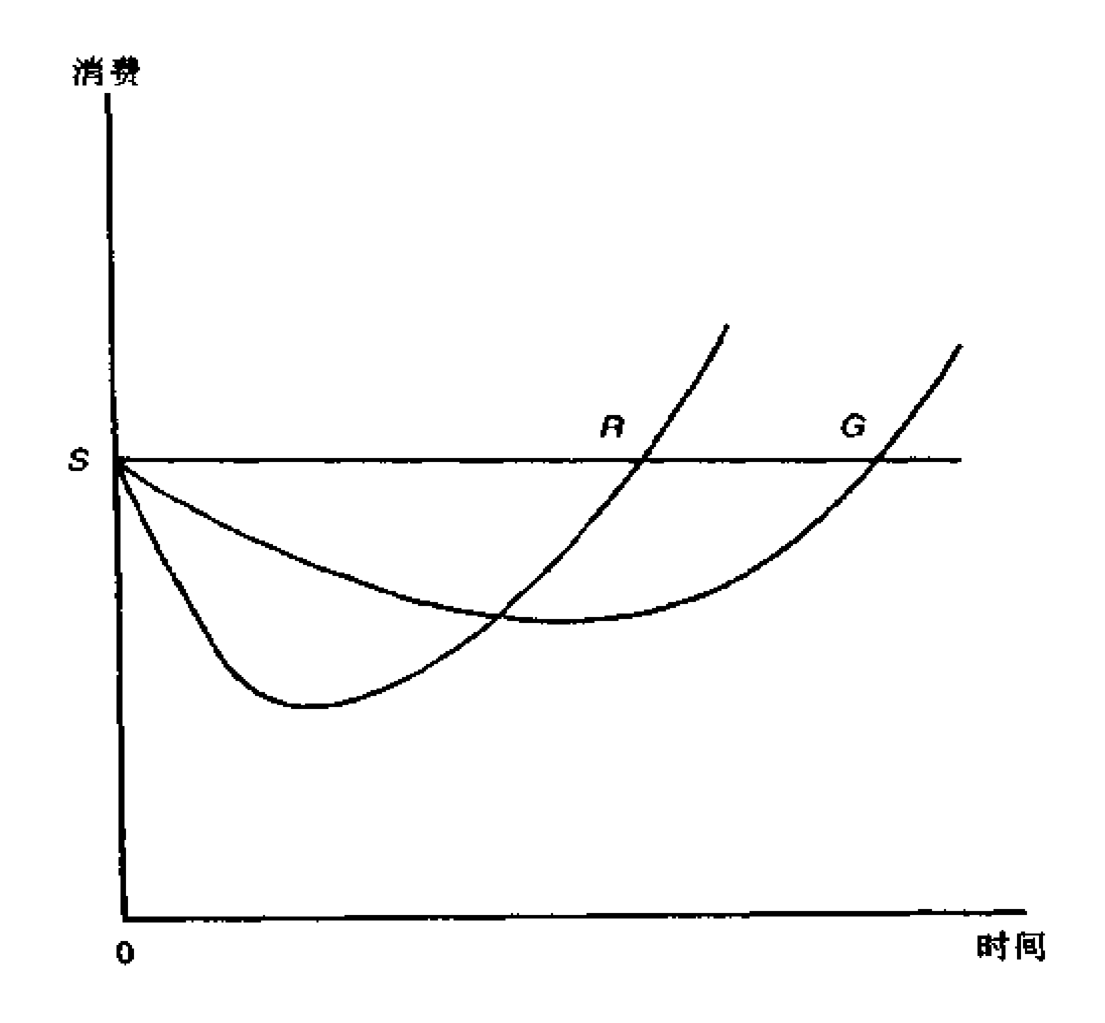


图8.2 改革战略。S:起始点; R:激进改革;G:渐进改革
(来源于 Przeworski,1991,p.163;图4.2)

经济改革和民主制度面临的实际威胁等,但他至少考虑了一种经济制度经过暂时的低迷期而成功地转向另一种经济制度,同时维系代议民主制度的可能性。这样:

> 如果人们相信改革后的未来足以比现状优越,也能足以弥补目前的条件恶化,那么他们就会投票支持想要跨越凹谷的政党。而且如果选民对未来信心十足,他们就会选择激进战略,尽管这比渐进战略要付出更高的社会成本。

(Przeworski,1991,p.164)

当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这些条件下选民的信心得不到回报,这可能会启动一个使改革松散瓦解的过程。还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尽管可以动员选民支持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或许根本不要期望人们选举支持那种从发达资本主义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13]但不论如何,普热沃尔斯基对转变过程的修改论述至少提出了那种包括暂时的经济衰退和维系民主制度的转变的可能性。

第二种回应坚持认为,普热沃尔斯基的悲观态度是由于他的模式过于简单化所导致的,理性选择的逻辑在这里没有被充分严格(和充分详细)地运用于揭示先进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主体所面临的实际(和变化的)选择。一些评论家指出,实际上普热沃尔斯基错误地描述了集体劳动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谋求联合的形势,也夸大了某种特定的资本可以自由运作的程度。因而,从形成"共识的物质基础"的角度来看,大多数雇佣劳动者在长期大规模失业的条件下对可能破产的担心必然会影响其对工资的要求,同时,在可能与资本积累的长期利益经常调和的情况下,多数雇佣劳动者不会就条件待遇进行谈判。而且,劳资之间的这种长期妥协得以在其中发生的"制度化信任"环境也渐渐失去了现代雇佣条件的特征。雇佣劳动者当然要承担任何"资本主义危机"的代价,但是在有利于资本最大限度积累的持续环境中,那种有系统地为雇佣劳动者提供长远利益的条件根本就不存在。

203

与此同时,尽管资本提高了自己的国际流动性,但它自己也面临着制约。依照金和维克海姆-琼斯的观点,"撤回投资的代

价是十分昂贵的，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 资本家不得不把（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管理下）可能低一些的利润与由于负投资、低增长和可能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更低的利润作一番比较”（King 和 Wickham－Jones，1990，p．407）。虽然对投资决策的私人控制和资本流动性的提高赋予了资本巨大权力，但是，甚至资本代理人也不得不被迫根据外部约束、有限的选择以及对其他重要主体（包括国家、其他资本，甚至工会代表）的未来决策难以确切知晓等具体情况来决定他们的行动。在现实世界中，知识远不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体制提供的支持也是有限的，同样，选择也不会像在普热沃尔斯基模式中的情况那样清晰明确。考虑到“现实世界”中的不确定程度和战略不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府，甚至从事根本性改革的政府，都要努力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这样，依据乔那斯·庞特森（Jonas Pontusson）的观点，“至少可以这样考虑：从事激进改革的改革主义政府可以运用胡萝卜和大棒相结合的方法维持充足的投资率，即一方面对私人投资实行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在控制资本外逃和囤积财富上实行大棒政策，可能还要用公共投资部分地代替私人投资”（1992a，p．19）。

当然，如果这只是对那种在凯恩斯福利国家旗号下所采取的激进社会民主主义战略之政治取向进行重新描述的一种方法，那么它就不是使我们从普热沃尔斯基模式进一步向前发展，而是让我们回到了作为整个研究之依据的那个问题上来。我们已经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的一个理论前提是不再可能追求这样一种政治：它以塑造私人资本所有者的投资决策为依据，让国家通过行使再分配职能去追求

更大程度的平等。人们认为这种战略越来越分散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者，也瓦解了对其最有利的选举联盟基础。不管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对转型政治的论述是多么模糊，有一点他们却很清楚：现在必须要面对投资功能社会化这一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性的挑战就是：这种激进的转变是否能够赢得公众的初步允诺，并能够在获得足够支持的条件下得以推行。为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看来至少要对雇佣劳动者承担的经济代价进行限制，而且转变期越长，这部分人可能情愿承担的代价也就越有限。 204

这把我们带到对普热沃尔斯基的观点所做的第三个回应意见上来。那就是：可能不需要通过一个重要的经济低迷期而推行一种合理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战略。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en)在《政治反对市场》(1985)中对“通往权力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论述就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正如埃斯平-安德森所设想的那样，挑战在于发现这样一种战略：它符合自由议会民主制的宪法要求，但它既能够解决重大经济决策的直接社会化问题，又可以避免那种人们无法接受的转型成本。他自己提出的方法就是倡导某种形式的雇员基金。迄今为止，有关雇员基金的理论和实践的文献非常多。[14]这里我们只关注一下下面这种形式的雇员基金就足够了，它就是人们最为广泛讨论的、鲁道夫·麦德纳(Rudolf Meidner, 1978)所倡导的那种形式，它把雇员基金看作是一种由(地区、地方和国家的)雇员集体所有的投资基金。它们的建立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每年要把一部分用于企业再投资的利润的所有权从原来的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作为集体的雇员那里。麦德纳设想，如果每年的转移率是20%，那么在25年至30年内，这种“缓进

的社会主义"就可能使雇员成为企业的控股人(1978,p.59)。所以埃斯平-安德森认为,从原则上讲,麦德纳的建议界定了这样一种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实行对经济决策的直接的公共或工人控制,但这要通过一种渐进主义方式,以避免资本外逃的威胁、生产不足的低谷和国内动荡,而这些正是较为传统的转变战略经常潜含的危险。从这种意义上说,它看来推翻了普热沃尔斯基的那种使通过选举方法转向社会主义的战略成为不可能的逻辑。

六、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变:政治上的支持

面对复杂的政治现实,普热沃尔斯基严格界定的论题也开始显得不甚清晰了,而且现实选举过程中较为粗糙的计算看来也使他精确的代数派不上用场。可是,尽管普热沃尔斯基的观点被证明不是什么公理,但它们还是提出了选举制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所面临的一些严峻挑战。这里我想特别考察一下市场社会主义对这些挑战的回应能力。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有两个领域看来尤其重要:政治支持和转型政治。

205

出于本书第一部分所广泛讨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工人阶级的衰退"形成的挑战并不像普热沃尔斯基假设的那么严重。我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原因很清楚:为什么"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群体比起来,被认为拥有更明确地对抗资本利益的利益(尽管近期一些论述在国内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领域生产性工人之间利益划分的著作甚至使这个问题变得十分不清晰)。[15]不太清楚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纲领对于如此界定

的工人阶级(例如,公共部门中的体力工人)之外的社会群体不应具有至少同样的吸引力。实际上,我并不相信这里最突出的问题是阶级结构问题(至少像普热沃尔斯基对这个问题所理解的那样)。普热沃尔斯基关于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具有独一无二的强烈向往的假设是源于这一观点:其他社会群体的消费正是取自这些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在社会化中具有最为迫切的物质利益。然而社会主义最高纲领应该获得的支持曾经就是局限在这一群体内。从特征上讲,他们与更为广泛界定的工人阶级拥有共同的政治目标(如充分就业、社会工资和广泛的福利国家,等等)。我们或许应该在其他地方(可能在知识分子范围内)寻找对社会所有制的长远支持。简单地说,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最高纲领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群体,这种社会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热望已经被社会主义者的非工人选民的沉重力量所挫伤。而且从历史上看,很难说"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曾经追求过把他们和广义界定(例如,可能围绕雇佣地位来界定)的工人阶级明确划分开来的那种利益和政治目标。因此,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阶级结构变化(特别是传统蓝领制造业领域的缩减)可能对社会民主主义调节资本主义的传统形式(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但对那种原本切实可行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来说,情况并非这么严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之(正在衰微的)少数地位可能不是我们寻求"为什么缺乏进入社会主义的选举途径"这个问题 206
的答案的正确场所。

这样论述实际上是对社会民主主义力量获得选举支持问题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看法。确实,传统蓝领制造业和冶炼业

工人人数的减少使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传统上汲取很多选举支持的源泉日渐枯竭，但是我们不能将其视为"核心"的耗尽，这个"核心"在以前曾倡导一种激进的社会化战略。我们也不应认为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一直就很少作为一种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的"贫民"政党而存在）不能从其他地方吸引选票。社会主义政党在维持自己的选举支持方面的确遇到了困难，但是现存的其他党派（包括右翼和中右翼的主流党派）也同它们一样面临这个问题，而且社会主义政党自 70 年代以来获得支持的记录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也说明，选举运气不一定就会直截了当地从阶级结构的变化中读出来。[16]

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结尾，我曾指出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它们已经不能吸引选举支持（尽管吸引和保持支持者可能变得更加困难）。较为困难的实际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政党现在看来只有抛弃哪怕是温和的改良主义政治纲领（这种纲领在传统上致力于"凯恩斯主义加福利国家"），才能获得支持。就是这种更深层次的挑战，据说市场社会主义者能够加以克服。其倡导者主张，市场社会主义代表的是这样一种替代方案：它不仅具有获得持续支持的可能性，而且也是在目前的（看来也是非常不利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实现社会化政治纲领的战略。

相信市场社会主义纲领能够以清晰和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为中心动员一个由新老支持者组成的联盟，这是否现实呢？如果我们首先关注一下这种论述的力量，那么我认为这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建立在自我管理基础上的政治可能会吸引一个新的（可能是正在扩大的）选民群体。正如凯奇切特指出的那样，如果在左翼政党的潜在支持者（"狭义界定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正在减少）中间一直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倾向"的话，那么一

种承诺更多自治和自主的政治经济就可能顺利地去争取一个新的(和扩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体,而且能够为支持这种政治经济的政党提供选举资本。同样,如果选民的自我界定不仅源于他们日渐破碎的职业认同,而且也同样源于他们在消费领域的经验的话,那么就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一种承诺不仅仅代表有组织生产者局部利益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在社会所有制条件下依赖于市场,还有望能够转移开许多对社会主义持有的敌意,人们认为这些敌意是由于社会主义与中央集权国家密切相连而产生的。(而且我们还应留意的是,当代选民对"和善的"跨国公司的怀疑态度,与他们曾经对"有远虑的"国家所持的怀疑态度一样强烈。)如果较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战略现在被广泛地认为已是不可行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什么实行那种带有可行性光环的政策将有选举优势。在市场经验看来非常普遍的地方,支持一种与市场逻辑共存而不是反对它的社会主义形式,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207

然而,当我们把市场社会主义描述成为一种较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战略时,还存在着一些特殊的问题。第一,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受市场驱动的世界,且我们每个人都是必需品的消费者,但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劳动市场上不很积极。[17]市场社会主义看起来仍然像一种"雇佣劳动者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同传统的凯恩斯福利国家比起来,它对处于正式经济活动之外的人的吸引力看来要小得多。第二,人们现在还无法断定国家的福利要素是否已经变得很不受欢迎。的确,人们抵制税收的活动有所升级,对特别"不应得的"福利享有人的敌意也越来越强烈,但有调查证据表明,仍然有相当多的选民支持由社会提供主要的福利服务(包括卫

生、教育和补助金等)。[18]尽管目前福利国家面临着实际的改革,但这不等于说一种最受欢迎和有效的改革措施就是新右翼所抛出的解散福利国家的建议。社会民主主义者实际上有能力改善自己的选举运气,重新以福利国家改革设计者的面貌出现。第三,正如埃斯特林和勒·格兰德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市场社会主义不考虑种族和性别问题"(Le Grand 和 Estrin,1989, p.22)。他们或许还可以加上一点,那就是:它缺乏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和生态之间的关系的远见。然而正是这些社会群体和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者在其他情况下应该认真对待和解决的,这是为了适应争取新联盟和进行"纲领性革新"的需要。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利益群体之所以被看作是潜在的同盟,正是因为市场看来不会顾及他们的要求。女权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以其不同的方式指出,现存的市场体制根本不能满足妇女和环境的需要。当然,他们也坚持认为妇女和环境的利益可以依靠市场得到很好的满足。[19]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生态-社会主义者或许相信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使这些利益得到提高,但是如果市场本身不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加以组织和控制,看起来上述利益也就不会得到满足。

208

最后这一问题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问题上来,即市场社会主义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我曾以一定篇幅指出过,期待社会主义的市场化形式成为实现"国家最小化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工具的愿望不过是一种幻想。根据现实的选举支持的政治看来,显然没有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愿意在一夜间抛弃数百万公共部门工人的潜在支持,它也不应该停止保护那些其使自己免遭贫穷的惟一方法就是支持国家的人的利益。事情还不只是这些,我曾经这样指出过,一种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在很大程度上

利用国家来对市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管理。那种将权力转交给未加改革的市民社会的做法对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吸引力。市场(以及市民社会中的许多其他制度)都需要加以监控,这不是国家是否需要做的问题,而几乎是一定要把它们置于国家的最终权力管辖范围之内。正是这一点使国家制度改革成为任何一种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秩序之运动的不争的(甚至可能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者倡导重新界定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做法(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赫尔德的双重改革模式)变得更有意义,而不是期望一种完全置于社会化市场管理之下的社会秩序的出现。

总之,看来在适宜的条件下(这将必须包括对政府管理能力的信任),社会所有制条件下的自我管理可能会成为革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一个基础。但是在争取获得最大程度的选举支持方面,在可预见的情况下还很难看到它能成为这种选举战略的确定性核心内容。

七、市场社会主义和转变政治

上述情况促使我们最后必须对作为一种政治转变方案的市场社会主义主张作出明确的判断。对于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来说,这可是根本性的问题。我从那种争议很少的观点开始,即从短期和中期来看,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前景都不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我们要承认,人们设想的任何一种政治变革的可行性必然都是推测性的。考虑到这些限制性的条件,实际情况仍然是:在可讨论的替代模式中,至少从转变过程方面来看,市场社会主义是特别没有前途的。这里我把自己的评论限定在两个问 209

题上:“渐进主义的必然性”和全球经济的政治环境。

人们时常认为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动力来源于当前这个时期的一系列独特情况。它们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特权地位日渐失去信任;选举的不稳定性增强;雇佣劳动者中间政治利益分化;对国家能力的尊重日渐减弱。正是这些诱导人们转向市场社会主义的同样情况,看来也要求任何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变革战略今天比以往更须建立在“渐进主义的必然性”上。然而,按照我们在本书第六章对合作经济所作的讨论,看来在实践中任何一种向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变都要求进行一场快速和彻底的变革。有趣的是,这正是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观点(1938,pp.124—125)。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近期关于合作经济的文章(1988)看来也支持这种观点,他特别强调了处于资本主义大海中的“合作主义岛屿”的困境。这样,可能的情况是:成功地推行一种合作经济实际上要求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应在相当短的时期内转移到合作领域。这可能有助于维护那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激进理论的主张,但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战略不得不被抛弃(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对大规模社会化的民众支持)的形势下,人们几乎不会相信它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选择。实际上,同那种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将“关键经济部门”国有化的非常传统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了的)政策比起来,人们也很难看到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的激进社会化战略更方便可行。

我们把市场社会主义和另一种“替代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即雇员基金倡议,作一下简单的比较,也许对我们这里的讨论有所帮助。雇员基金的提倡也是为了“超越”传统的凯恩斯福利国家政治,是一种直接解决投资功能社会化问题的方法。雇

员基金社会主义的历史较为复杂也颇具争议(尤其见Pontusson，1992a和1992b；Esping－Andersen，1985；Higgins和Apple，1983；Meinder，1978，1980和1993)。不论其广泛的优点和使其衰弱的弊端如何，雇员基金社会主义至少对怎样推行一种激进性质的但却是渐进的战略作了连贯的阐述(在书面上)。通过股份红利的增长而不是没收充公来使所有权渐进转移，目的是为了避免发生资本外逃和向社会所有制转变过程中经济衰退的问题。然 *210* 而，在曾经最为确切有效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中(以及面对着雇主和其他人的激烈反对)，雇员基金社会主义曾作为一种战略追求但一再遭到压制，最后终于被抛弃了。我在这里并不想对瑞典的雇员基金经验作出评价(关于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有很多话题要说)，我只是把自己限定在这种判断上，即在有利的条件下，一种比市场社会主义战略更为温和和渐进的转变战略遇到了强烈的抵制而归于失败。这对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我们根据市场社会主义战略将不得不在其中推行的国际经济环境考虑问题时，上述反对和抵制显得更具强迫性。这里的情况也颇具讽刺意味。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一情况：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追求一种社会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战略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破坏作用)。这样，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必须看作是重新对社会主义的市场化形式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可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却正是一种“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收入政策、充分就业和国家范围内对公民权的认同(所有这些我们都能在市场社会主义纲领中找到)很难维持下去，所以社会主义者不得不去“学习爱恋市场”。如果考虑到在广泛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维

持合作企业所遇到的困难，我们就很难看到如何“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市场社会主义”，但我们更难看到如何在全球范围推行这种制度。也许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有所裨益的是期望在一种自我管理经济中，社会主义可能在私人企业内的微观层次上产生。问题在于：尽管这种自我管理经济本身是一种很理想的方案，尽管它也可以成为企业管理的更为“社会化的”的形式，但这与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不是一回事。至于自我管理经济如何发展，以求逐渐地和最后达到确立市场社会主义制度的程度，目前还没有看到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论述。

八、结论：是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吗？

市场社会主义可能成为“讲究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一种手段，以求转变传统社会主义声望降低的选举结果。但在实211 践中，或许只有把“市场社会主义”这一标签贴在更为合适的“社会市场经济”（鼓励充满生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求扩大公共服务）上，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点。市场社会主义的核心计划就是将除了规模非常小的资本之外的全部资本社会化，这确实是一个极为激进的目标，对于捍卫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市场的社会主义”的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传统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社会主义方案的批评经常遭到这样的反驳：他们是在同“资本主义市场”争论，而不是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争论。但不论如何，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这种较为激进的方案能够站得住脚的话（这对于它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模式很重要），那么我们很难断定它是否具有其倡导者所声称的那种增大的可行性。使市场社会主义看起来可行的东

西是它同市场之间的密切联系，然而使它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却正是使它变得不可行的那些因素。

注　释

1 根据詹姆斯·扬克的说法(1992,p.278),"温和表述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戏剧性和言辞力量方面的损失,(人们相信)多于其在基本的可信性和合理性方面的收获"。

2 关于这种观点,即至少亚历克·诺夫所建议的模式"的确是一种'有效率'的社会主义,但并不比传统中央计划更为'可行',同资本主义混合经济没有什么区别",可参见 Nuti(1992,p.20)。

3 罗默(1994,pp.123—124)举出了一些国家,如南非、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西,作为极有差异的例子。

4 对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精力衰竭"的确切论述,见 Esping-Anderson(1985)。并不是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者都同意罗默的见解。例如戴维·米勒就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看来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很大的成功机会,因为在市场制约下的劳动具有同样的经历,但是这里的雇员们发现自己被传统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所挫败"(Miller, 1991, p.414)。

5 很有意思的是,人们注意到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第二版(1991)中,诺夫对投票拥护恢复资本主义的不可能性的论述显得更没有把握了。

6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世界政府的一个方面的论述,见 Yunker(1985)。

7 对这种可逆性的优点的论述,见 Yunker(1992),pp.281—284。

8 见 Pierson(1986);Hindess(1983)。当然,对于战后的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转变的思想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例如英国的Anthoy Crosland),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说社会主义还没有建立的话,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一定已经被超越了(见 Crosland,1964)。

9 关于转变问题的更有力的列宁主义论述,见 Emmanuel(1979)。

10 一些批评家认为，普热沃尔斯基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思一定会使他成为一个列宁主义者，普热沃尔斯基对此回应道：他“不会成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追随者，而会成为另一位伟大的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家乔治·塞斯坦丁诺维奇·佩西姆的追随者”(Przeworski, 1985, p.239)。

11 值得注意的批评意见包括Higgins和Apple(1983)，Lichbach(1984)，King和Wickham－Jones(1990)，Sainsbury(1990)，Kitschelt(1993和1994)。

12 很难说清为什么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尝试围绕雇佣劳动者的共同利益来扩大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这一群体要比普热沃尔斯基所说的“狭义的工人”广泛得多。

13 普热沃尔斯基确实承认，这种转变的特殊条件在实践中根本不适用于东欧任何一个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

14 例如参见Esping－Andersen(1985)；Meidner(1980)；Pontusson(1992a和b)；Pierson(1991a和b)；Meidner(1993)。

15 Swenson(1991)。也见Dunleavy和Husbands(1985)。

16 对这一问题的简洁论述，见Kitschelt(1994, pp.41—47)。

17 普热沃尔斯基是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Przeworski, 1977)。

18 关于这方面的简要论述，见Pierson(1991a)，Taylor－Gooby(1989)。

19 即便那些强烈主张运用市场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人也认为，只有在以往既定的(国家)框架范围内才有可能解决问题。参见Pearce，Markandya和Barbier(1989)。

结　论

212

在第一部分结尾，我曾大胆提出过判断：不管历史上的左翼看上去面临着怎样的困境，但没有证据确凿无误地表明一种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死亡"。然而，如果说为社会主义撰写讣告还为时尚早和过于夸张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能从本书开头几章的评价材料中发现：传统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基础在许多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无论在理论上抑或在实践上都是这样。根据这种情况，如此假设看来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命运在未来的任何复兴，都可能需要对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些最基本要素进行相当深刻的反思。其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要重新评价社会主义者对待国家和市场的态度。回想起来，社会主义同国家的长期联系并不总是愉快的。在管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国家并没有行使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那种重新分配资源和机会的职能。更糟的是，特殊的国家失败又经常被描写成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失败。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不合理性和无效率同中央计划（和社会主义）方案无一例外地不中用比起来，似乎只是小巫见大巫。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我才考虑那种经过修正了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的基本主张。不管人们如何表述它，我认为应该这样来界定这种市场社会主义：它仍然希望在制度层面表达社会主义的某些核心价值；这种制度应建立在现存的社会制度

213 和政治力量的基础上，同时致力于解决那些使早期社会主义思想遭致削弱的最严重弊端。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市场社会主义承诺通过实行下述经济形式来拯救社会主义的预期目标：绝大多数商品通过市场机制进行分配，同时对资本实行社会所有。这样，我们就能够享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有好处，同时又克服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所有弊端。毫无疑问，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取得对其新自由主义对手的最后胜利，其方法是：宣告市场经济（在社会所有制条件下）是履行社会主义赋予普通（劳动）者权力之承诺的最好方法。这种承诺经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追求。

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一系列对上述观点的详细而具体的保留意见，最后得出了我认为是极为不利的结论，那就是，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条件下，这种战略都是不可行的。这里，我想更扼要、更一般地表明：为什么我认为市场社会主义不能成为左翼重新确定战略的基础。

一、关 于 市 场

当代世界市场无孔不入的力量和顽强性不可能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考虑到某些简单的（和相当不可能的）假设，新古典主义解决供求问题的优雅风格也令人难以忘怀。显然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甚至具有敏锐预见能力的人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未来），市场可能要继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市场社会主义者试图利用市场的这种普遍性，他们采取机敏的论辩策略以求挫败新自由主义者，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正是接受后者关于市场的大部分观点，但同时又通过引入一种非常激进的资本社会

所有制建议而对其接受的观点加以改造。然而这种巧妙的做法最终难以奏效，其原因在于：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谈论的市场被证明是同新自由主义者所谈论的市场没有相似之处。依照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最好的社会秩序应该是能够保障那些自由地签订合同的个人之间的市场式交换具有完整性，而不管这种交换的特殊具体结果如何。当然，许多市场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在范围很广的情况下，市场能够提高个人的选择自由。但是，几乎没有市场社会主义者赞同更进一步的主张：市场结果，也正是因为它们是市场的结果，所以它们就应该受到尊重。即便是它们在被普遍认为具有破坏性后果时，人们也应尊重它们。多数市场社会主义者干脆就不接受新自由主义者对市场结果 214 (不管这种结果是什么)听之任之的前提。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前提。很难想象任何现存的体制(包括最自由主义的体制)会遵循市场所要求的最苛刻形式去服从"市场规则"。可是，如果市场真的表现为一种可以被干预的过程，那么它们就不再享有"真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加给它们的中心性或权威性了。最后，市场社会主义者倡导市场的做法是出于功利性考虑，新自由主义者却不是这样。同诸多类似的观点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的观点具有暂时性，它们随时可能根据实际结果被加以修正。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设想一种市场于其中发挥非常重要作用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市场的普遍性比过去更加广泛了，甚至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体制下，情况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要解决的不仅是理论上的最优程序，而且还有实际中的"次优"选择，那么市场看来将会在各种不完善的现实世界形势中提供一种"次优中的最优结果"。但是，不管市场化社会主义中的市场如

何具有普遍性，它们也不会具有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所占据的那种根本性地位。甚至那些把市场确实看作是提高自由的工具的市场社会主义者，也是通过与其他价值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方法，来证明市场提高自由的能力。当然在实践中，甚至最“自发的”市场也必须在具体的宪法和制度框架中运行。但是，从特征上讲，那些渴望“包含市场的社会主义”的人正是明确(和反复地)希望重新构建市场能在其中合理运作的社会和制度框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希望更广泛和更具想像力地利用市场，这毫无疑问是能够做到的。但把社会主义改造成“普遍的市场秩序和社会所有制”的特殊混合物，这一点却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关 于 国 家

这就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的立场。这里的困难与我认为属于对市场的态度方面的困难相辅相成。很清楚，如果考虑到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市场交易结果的主张的实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为什么倡导国家要发挥最小的作用。我们也知道，消除社会主义同一种过分自负的、无效率的国家的有害联系，是市场社会主义要点的一部分。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干脆以最激进的市场社会主义者的处理方式“抛弃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不管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使命声明”说了些什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关于制度变革的蓝图实际上都为国家继续发挥实际的作用留下了空间。如果市场交易的社会和经济环境适当营造起来的话，市场就只发挥市场社会主义者要求它所起的作用(一种同新自由主

215

义者完全不同的目标)。我们也反复看到,只有在市场运行的条件已经由某些外部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家)确立起来的地方,市场社会主义者才允许市场发挥作用。譬如,勒·格兰德就允许市场在福利领域发挥特别广泛的作用,但同时又希望这种市场只允许在国家已经(反复地)对消费权力进行调配以有利于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的地方发挥作用。这里,正如他们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建市场的讨论一样,市场社会主义者在关于利用和通过各种"辅助性制度"来促成公共干预的实现方面,可以提出许多有趣和创新的观点。他们这些观点的主要弱点是:也许是因为他们竭力摹仿新自由主义理论结构以及力图同国家社会主义形式保持距离,他们往往会忽视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形式的本质。他们反复强调不能简单地抛弃国家的支配权,但他们肯定不会满足于利用"原样的"国家。的确,国家权力已正在按照与社会主义者对公共权力的实质和界限的重新理解相一致的方式重构(不仅在民族国家层次上,而且在超国家层次、地区和地方层次上)。同样清楚的是,不管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市场信奉到什么程度,他们都不可能乐意于利用"原样的"市民社会。不仅仅是国家或市民社会本身需要人们重新对其加以考虑,而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需要人们重新思考。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也许就是按照本书第七章(pp.181—182)所讨论的双重民主化过程来进行。

三、关于社会所有制

显然,社会所有制是市场社会主义工程的核心部分。在详细说明社会所有权概念的实质、确立社会资本的多方面可能性

以及将其同国家或“工人”所有制区分开来等方面，人们已经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和才智。然而上述种种说明还很不够，用乔尔杰维奇(Dejordjevic)的话说，它们存在着“语义上的矛盾”(见Dejordjevic, p.152)。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并且被冷酷无情的批评家们死死抓住。然而，如果市场社会主义者仍然希望在这一领域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的话，那么我认为他们至少要质问一些恰当的问题。和一般流行的认识比起来，所有权的性质一般被证明是极为模糊的东西。曾经被详细说明的私人所有制也被证明不是市场经济的准绳，而是一种具有限定性的方案。现存市场经济所依赖的许多投资也被证明不是来自奉行节俭的冒险资本家的腰包，而是来自于在大规模养老基金中积累起来的“迟发工资”和那些管理数目庞大的较小储蓄者之集合资源的机构(G. Thompson, 1990, pp.144—146)。这不是马克思所预期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问题(Marx, 1972, p.429)。可是所有制形式已经是如此的多样化，储蓄和债务管理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我们必然希望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以求至少能够满足社会财产所要求的一些标准(如见 Roemer, 1992a)。当然，这种新型所有制看起来不可能与社会化经济的古典社会主义形式极为类似。但在这种古典形式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所有权的彻底社会化并没有取得无条件的成功，因而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应该找到一种逐步和渐进的变化形式，这无论如何也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探求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在目前已是势在必行，但采取的形式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及其以后的凯恩斯社会民主主义。但不管这些变化在实践中是如何地逐步和渐进，只要是把生产性资源的社会所有制问题提上日程，那么一种修正了的社会主义除了采

216

取激进方式外，几乎没有多少其他选择了。

四、(市场)社会主义的前途如何呢?

当20世纪蹒跚地迈向其终点时，没有多少人会对社会主义的前景持有乐观态度;虽然我拒绝接受那种关于社会主义崩溃的极为神秘的叙述，但这不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自己已经站在社会主义向前迈进的新时代的门槛上。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即:“左翼”(这一名称需要某种更好的表达)应该抛弃其沉重的社会主义包袱，围绕某种创新的，或者至少是较少受人怀疑的组织原则而重新构成?

按照本书开篇部分的分析，我的回答是“没有”，或者至少是“还没有”。我认为从本书第一部分所叙述的论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城市产业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进步事业”的普遍认同、关于社会主义的“真理”等等)几乎都必须要统统抛弃。然而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不是把社会主义设想成为这些世界历史性概括的总和，而是视其为资本主义的“解毒剂”(尽管这种解毒剂在临床上不很有效)。在由解构释放出来的“创造性破坏”旋风中心，许多人们非常熟悉的社会和政治分析的既定概念(“国家”、“社会”，以及尤为明确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被席卷而去。然而在随之而来的概念迷雾中，我仍然可以辨认出一些东西的极为朦胧的形式:如果说这些东西不是单一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们必定就是那些可以被有效地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关系、制度和实践。只要对资本主义关系、形式及其替代方案的分析还有意义的话，那么从社会主义方面作出的思考就很有价值。然而在这

217

种环境中，我们最好不要把社会主义政治想象成为达到人类史前终点的东西，而将其视为一系列指导思想，表明一种没有止境的政治过程。

尽管这里和别的地方叙述了许多令人气馁的事情，但这种重建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前景并非就永远暗淡无光了。看来很清楚，新自由主义复兴的潮头已经退去。这部分是因为：就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体现在政治实践中的观点而言，这种实践在目前看来的确失败了。现实世界的商品化或多或少地发展着，但这无论如何不足以构成一种社会普遍秩序的开端。与此同时，世纪末的全球资本主义看起来并不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更好些。的确，一旦失去了世界共产主义和许多成效不佳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这些极好的比较参照物，这种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便更无吸引力了。正如我在本书前面一些地方指出的那样，或许正是曾经存在过的种种社会主义形式所遇到的那些严重问题才使当代资本主义看起来像一个宠物。而且，尽管那种宏伟设计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民众心目中可能不会引起更多的共鸣，但那种较为世俗地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渴望是否也极为普遍地不受欢迎，现在很难这样断定。社会主义政党同许多其他政党一样，在保持选举支持和党员人数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们要看到有许多证据表明，民众还是继续支持公费医疗保障、国家提供教育、实行充分就业政策等等。与此同时，新右翼的矛盾思想中有这样一种令人奇怪的假设：那些敌视“工会会员资格枷锁”的雇员应该永远欢迎那种在典型资本主义企业中现存的权力等级结构。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这样的合理质疑：至少在一些西方国家，与其说是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所承诺的东西助长了民主公众中的怀疑主义，不如说是他们在取得

218

这些东西方面的无能使然。正如我在下面要指出的那样，我们也不能认为目前所有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必然会决定性地、单方面地于社会主义事业不利。

五、超越市场社会主义吗？

我在本书前面的论证中表明，当代关于社会主义经验的著作的一个明显弱点就是过于认真地看待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主张了。我们知道，尽管社会主义一直充满着“伟大的思想”，但其实践者的目标一般来说却是温和得多。我们也承认，没有什么很重大的事情马上要改变。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执政中，西方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们都不会乐意提出极为醒目的纲领性变革。一旦看到自己又恢复了执政地位，他们便试图推行那种自己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奉行的政策，尽管这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和以极为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这或许是不容忽视的目标。我们知道，能够同现存的社会和经济力量达成“和解”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如果“胡乱应付过去”就能够使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在收入不平等和失业方面达到诸如瑞典那样的水平，那么它看来仍不失为一项重大成就。然而，根据本书开始部分所讨论的那些变化，人们很难看到这种“胡乱应付过去”能够提供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只不过是临时解脱而已。我们必然要寻找一种较为激进和长远的办法来回应当前的形势。根据我的判断，我们不能完全确信市场社会主义能够为这种激进的选择提供一个可行的基础，而且很奇怪的是，如果考虑到我曾经对可行性所作的那些论述，那么我怀疑这是因为市场社会主义在重新反思社会主义思想时一直不够激进所造成的。在一系

列问题上——关于市场、关于国家，而且最重要的，关于所有制问题——他们已经把讨论转移到一种新型的和有希望的方向上来，但是要充分发挥这些创造性观点的潜力，他们需要向纵深推进。

219 当然，他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这是通过正视左翼中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不是所有的偏见都是没有根据的)和富于想像力地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的理论来实现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市场最终不能践行市场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所有概念性工作。虽然多样性和多元化受到了市场社会主义者的欢迎，并且在他们的市场经济形式中得到了鼓励，但是市场社会主义者最终不可能像真正的市场普遍秩序的倡导者那样对实际结果漠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把市场程序本身赞誉为一种最重要的价值，所以他们也就不能被恰当地重新说成是“左翼哈耶克主义者”。但是如果市场不能做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设想的那许多制度性工作时，那么这就为他们另外两方面的创造性设想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我认为这两方面的设想具有很强的论战力量。第一方面是关于民主的问题。我已经试图同那些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目标可以在民主的标题下简单地“重写”的人拉开距离，但我确实坚持认为一种更为激进的民主化观念至少在原则上对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赋予民主权力的形式颇有助益。本书第七章已经用了一些篇幅讨论了民主化问题，其中我指出有一些特别有力的证据支持把民主扩展到经济领域(虽然不是完全扩展到工作领域)。而且我还认为，虽然它们长期以来在市场社会主义者自己那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社会主义者将会很好地充分利用它们。但是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也有助于解决本书第三章中所提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些意识形态和认识论

问题。当代形势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所有的真理性主张或对"有根据的"知识的呼吁都会遭到怀疑；社会主义（至少就其包括一些较为宏大的认识论主张而言）就是这种怀疑主义的主要牺牲品。然而在这种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必须要在政治上采取行动和作出艰难的抉择。一个较为可行的回应策略就是更多地求助于实用性的思想模式和决策方法。[1] 至少有一些实用主义派别极为关注民主和共识形成（"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并在存在着认识论的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将其视为最适当的决策形式。因而那种使我们的知识要求变得更具暂时性（使社会主义的一些传统"真理"面临着威胁）的情况可能更为趋向实用主义，而这反过来又有利于那种与市场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经济民主化相适应的民主决策形式。实际上，那种把民主说成包含着"保护性"和"发展性"逻辑的惯常描述，正是极为有效地抓住了我们在当代提高民主决策程度的过程中所努力寻求的那种品质。 220

这就促使我们再谈一谈社会所有制问题。我认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独创性的惟一最巨大的力量。仍然有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许其人数越来越多，还是像以往那样坚持"所有制无关紧要"的立场。这无疑是不正确的（80 年代那些贪婪的国有资产私有化者看来认识到了这一点）。不错，凯恩斯坚持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重要的"，克劳斯兰德（Crosland）也坚持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Keynes，1973，p.378；Crosland，1964，p.34）。但是，这两个人之所以坚持这样的观点，正是因为国家有能力指挥经济活动，而无须将私有经济财产置于公共控制之下。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意味着对经济的间接公共控制之有效性变得很差。

这并不是指国有化的情况(自然垄断除外。自然垄断的公共控制的合理性并不是以“社会化”为根据的,而且自然垄断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都是无可争辩的)。毫无疑问,传统形式的国有化既不十分理想(只有当人们接受了那种被广泛地归于莫里森[Morrison]的观点时,即社会主义就是“工党所做的那些事情”,莫里森式的民营企业才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也是完全不可行的(我们毕竟考虑到了全球经济力量已经极大地削弱了奉行干预主义的民族国家的权力这一情况)。但不论如何,还存在着一种不同的和强有力的社会生产性资源的“社会”所有制方案。新自由主义批评家们把注意力转向市场社会主义者在界定“社会”所有制(这里社会所有制不再仅仅是“国家”所有制的委婉称呼)的可行制度秩序时所遇到的那些尖锐性难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这个弱点可以“同时从两个方面”加以克服:在更为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和在更为基层的地方提高决策的有效控制。我们不要忘记,所有制本身的特性并不是毫不含糊地有利于新自由主义立场。新自由主义者在对现存所有权进行制度性管理方面确实做得不错,但我们对其认真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提出的标准性论据看起来都是明显地摇摆不定。我们当然不应认为:对所有权形式进行深入的调查就会展示出右翼将占尽所有的最美旋律,拥有最令人信服的论据。

我认为,如果我们致力于解决市场社会主义日程令人奇怪地遗漏下的(几个)问题之一——“生态的迫切性”问题,那么上述那些关于民主和所有制的论据将会大大得到增强。当然,我们活动的精确的生态极限现在还无法知晓,可能也无从知晓。然而,尽管我们对自己利用外部环境的精确极限还缺乏知识,我们确实明白这样的极限一定存在着,而这将会对我们的政治思

221

维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这必然会进一步削弱那些占有私人财产的标准要求,而让其他人也以某种形式占有"同样多同样好的"财产。更一般地讲,如果我们承认我们面临着有限的集体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可能仍很富足),而且因此禁止无限制地使用,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有力证据支持更为集体性地控制人类的有限资源。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反对市场的趋向。的确,如果考虑到我们已经知晓的市场的效率特征,我们可能更强烈地倾向于利用市场来提供特殊的商品和服务。但正如那些既倡导市场又同情生态极限的人所发现的那样,这种条件下的市场只能在政治上已经给定的环境中运作(Pearce, Markandya和Barbier, 1989)。掌握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当然要包括对市场的利用,但这决不是以全球范围内市场普遍秩序的制度化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拥有更为迫切的理由探求(民主的)制度化形式,藉此我们会作出(公正的)有约束力的和自我克制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制定这样的政策:它们能够以可信的、连续的和(我认为结果将会是)渐进的方式,强调社会主义纲领中受欢迎的因素。市场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对这一改造过程作出重大的贡献,但我怀疑:市场社会主义本身能否提供一套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

注　释

1　我在这里使用"实用的"一词,并不是在其蜕变的、恶化的"无原则的"或"机会主义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与其早期倾向于实践和经验的思想相接近的哲学含义上来使用的。

参 考 书 目

Aglietta, M. 1979: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London: New Left Books.

Alber, J. 1988a: Is there a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Cross-national evidence from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Japa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181—207.

Alber, J. 1988b: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s and Society*, 16(4), 451—68.

Albertsen, N. 1988: Postmodernism, post-Fordism, and critical social theo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6, 339—65.

Andrews, G. (ed.) 1991: *Citizenship*.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Arato, A. and Cohen, J. 1992: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MIT Press.

Aristotle 1946: *The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Arneson, R. J. 1992: Is socialism dead? A comment on market socialism and basic income capitalism. *Ethics*, 102, 485—511.

Arneson, R. J. 1993: Socialism as the extension of democrac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0(2), 145—71.

Arnold, N. S. 1987a: Marx and disequilibrium in market soci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3, 23—47.

Arnold, N. S. 1987b: Why profits are deserved. *Ethics*, 97(2), 387—402.

Arnold, N. S. 1989: Marx, central planning and utopian socialism.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160—99.

Arnold, N. S. 1992: Equality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market socialist communit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9(1), 1—28.

Baker, J. 1987: *Arguing for Equality*. London: Verso.

Balawyder, A. (ed.) 1980: *Cooperative Movement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Macmillan.

Barber, B. 1984: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rdhan, P. and Roemer, J. E. (eds) 1993a: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dhan, P. and Roemer, J. E. 1993b: Introduction. In Bardhan and Roemer (1993a), pp. 3—17.

Barone, E. 1935: The ministry of production in the collectivist state. In Hayek (1935), pp. 245—91.

Barr, N. 1987: *The 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Barr, N. 1992: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n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0 (June), 741—803.

Bartlett, W. and Pridham, G. 1991: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in Italy, Portugal and Spain: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Economics*, 4, 33—59.

Bartlett, W., Cable, J., Estrin, S., Jones, D. C. and Smith, S. C. 1992: Labormanaged cooperatives and private firms in North Central Italy: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46(1), 103—18.

Beck, P. A. 1984: The dealignment era in America. In R. J. Dalton, S. C. Flanagan and P. A. Beck, *Electoral Change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Realignment or Dealig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40—66.

Becker, L. C. 1977: *Property Rights: Philosophic Found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eetham, D. 1993: Four theorems about the market and democrac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3, 187—201.

Beilharz, P. 1992: *Labour's Utopias: Bolshevism, Fabianism, Social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Bell, D. S. and Criddle, B. 1988: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The Emergence of a Party of Government*,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Ben-Ner, A. and Neuberger, E. 1990: The feasibility of planned market systems:

the Yugoslav visible hand and negotiated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4, 768—90.

Berend, I.T.1989: *The Hungarian Economic Reforms: 1953—19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gson, A.1966: Socialist economics. In A.Bergson, *Essays in Normative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e; first published in 1948, pp.193—236.

Bergson, A.1967: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5, 655—73.

Bergson, A. 1987: Comparative productivity: the USS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We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3), 342—57.

Bergson, A. 1989: *Planning and Performance in Socialist Economies: The USSR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Unwin Hyman.

Berki, R.N.1975: *Socialism*. London: Dent.

Berlin, I.1969: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man, K.V.and Berman, M.D.1989: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theory of the labor-managed firm.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3, 281—300.

Bernstein, E.1909: *Evolutionary Socialism*. London: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Beveridge, W.H.1944: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Blackburn, R.1991: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Verso.

Blanchflower, D.and Freeman, R.1992: Unio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advanced OECD countries. *Industrial Relations*, 31(1 Winter), 56—79.

Bobbio, N.1987a: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A Defence of the Rules of the Game*. Cambridge: Polity.

Bobbio, N.1987b: *Which Socialism? Marx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Bonin, J.P. and Fukuda, W.1986: The multifactor Illyrian firm revisite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0, 171—80.

Bonin, J.P. and Putterman, L 1987: *Economics of Cooperation and the Labor-Managed Economy*. London: Harwood.

Bowles, S. and Gintis, H. 1986: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Property, Community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Modern Soci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oyne, R. and Rattansi, A. 1990: Introduction. In R. Boyne and A. Rattansi, *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p. 1—43.

Brada, J.C. and Estrin, S. 1990: Advanc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dicative planning.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4, 523—30.

Bradley, K. and Gelb, A. 1986: Cooperative labour relations: Mondragon's response to recession. *Industrial Relations Journal*, 17, 177—97.

Braverman, H. 1974: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Brewer, A. 1988: Technical Change in Illyr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3), 401—15.

Brittan, S. 1975: The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of democrac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29—59.

Broekmeyer, M.J. (ed.) 1970: *Yugoslav Workers' Self-management*. Dordrecht: D. Reidel.

Bruno, M. and Sachs, J.D. 1985: *Economics of Worldwide Stagflation*. Oxford: Blackwell.

Brus, W. 1972: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rus, W. 1973: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Social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rus, W. 1975: *Socialist Ownership and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Brus, W. 1980: Political systems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 40—55.

Brus, W. 1985: Socialism-feasible and viable? *New Left Review*, 153, 43—62.

Brus, W. 1987: Market socialism. In J. Eatwell, M. Milgate and P. Newman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3. London: Macmillan.

Brus, W. 1989: Evolution of the communist economic system: scope and limits. In V. Nee and D. Stark, *Remaking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 (Stan-

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55—77.

Brus, W. 1990: The March into Socialism'. In H. Flakierski and T. T. Sekine, *Socialist Dilemmas: East and West*. Armonk, NY: Sharpe, pp.28—38.

Brus, W. and Laski, K. 1989a: From Marx to the Market: Socialism in Search of an Economic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Brus, W. and Laski, K. 1989b: Capital Market and the Problem of full employ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3(2,3), 439—47.

Bukharin, N. and Preobrazhenksy, F. 1969: *The ABC of Communism*. Penguin: Harmondsworth.

Burke, E. 191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London: Dent.

Burnham, W. D. 1989: The Reagan heritage. In G. M. Pomper et al. (eds), *The Election of 1988*.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p.1—32.

Burnheim, J. 1985: *Is Democracy Possible? The Alternative to Electoral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Butler, D. and Stokes, D. 1974: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rev. edn. London: Macmillan.

Callinicos, A. 1990: Reactionary postmodernism. In Boyne and Rattansi (1990), pp.97—118.

Callinicos, A. 1991: *The Revenge of History: Marxism and the East European Revolutions*. Cambridge: Polity.

Campbell, T. C. 1983: *The Left and Right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the Idea of Socialist Right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Caresvic, M. 1974: Social property in the drafts of the constitutions. *Soci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14(2), 3—17.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CSO) 1991: *Social Trends* 21. London: HMSO.

Chiplin, B. and Coyne, J. 1977: *Can Workers Manage?* London: IEA.

Christman, J. 1988: Entrepreneurs, profits and deserving market share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1), 1—16.

Cohen, G. A. 1990: Marxism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or: Why Nozick exercises some Marxists more than he does any egalitarian liberals.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suppl. vol., 16, 363—87.

Cohen, G. A. 1992: The future of a disillusion. In J. Hopkins and A. Savile (eds),

Psychoanalysis, Mind and Art: Perspectives on Richard Wollheim. Oxford: Blackwell, pp. 142—60.

Cohen, Jean 1983: *Class and Civil Society: The Limits of Marxian Theory*.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Cohen, J. 1988: The economic bases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25—50.

Cohen, J. and Rogers, J. 1992: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10(2), 282—312.

Cohen, J. and Rogers, J. 1993: Associative democracy. In Bardhan and Roemer (1993), pp. 236—52.

Cole, G. D. H. 1945: *A Century of Co-operati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Cole, G. D. H. 1953: *Socialist Thought-the Forerunners 1779—1850*. London: Macmillan.

Comisso, E. T. 1979: *Workers' Control under Plan and Market: Implications of Yugoslav Self-managemen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1: *Employment in Europe*.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rewe, I. 1984: The electorate: partisan dealignment ten years on. In H. Berrington(ed.), *Change in British Politics*. London: Frank Cass, pp. 183—215.

Crewe, I. 1985: Great Britain. In I. Crewe and D. Denver, *Electoral Change in Western Democracies*. London: Croom Helm, pp. 100—50.

Crewe, I. 1987: A New Class of Politics. *Guardian*, 15 June 1987.

Crewe, I. 1991: Labor force changes, working class decline, and the labour vote: social and electoral trends in postwar Britain. In Piven(1991), pp. 20—46.

Crewe, I. 1993: Voting and the electorate. In P. Dunleavy, A. Gamble, I. Holliday and G. Peele(eds), *Developments in British Politics* 4. London: Macmillan, pp. 92—122.

Crosland, A. 1964: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Cape.

Cunningham, F. 1987: *Democratic Theory and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1956: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hl, R.A.1961: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A.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A.1985: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Dahl, R.A.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hl, R. and Lindblom, C.1953: *Politics, Economics and Welfar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Dahrendorf, R.19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Europe*.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Deakin, N.1987: *In Search of the Postwar Consensus*. London: Suntory-Toyota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LSE.

De Jasay, A.1990: *Market Socialism*. London: IEA.

Demsetz, H.1967: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roceedings and Papers*, 57, 347—59.

Denemark, D.1990: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Labour's New Right agendas: findings from the Fendalton Survey, 1987. *Political Science*, 42(1), 62—82.

Dennis, N. and Halsey, A.H.1988: *English Ethical Socialism: Thomas More to R.H.Tawney*. Oxford: Clarendon.

Department of Employment(UK)1991 – 4: *Employment Gazette*, Jun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Security(DHSS), UK 1985: *Th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Cmnd. 9517, vol 1. London: HMSO.

Devine, P.1988: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Dickinson, H.D.1933: Price formation in a socialist community. *Economic Journal*, 43(June), 237—50.

Djordjevic, J. 1966: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property. *Soci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24(Oct.-Dec.), 73—110.

Djordjevic, J., Jogan, S., Ribicic, M. and Vratusa, A.(eds) 1982: *Self-management: The Yugoslav Road to Socialism*. Belgrade: Jugoslovenski Pregled.

Dobb, M.1955: *On Economic Theory and Socialism: Collected Paper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Dobson, A.1990: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Unwin Hyman.

Domar, E.D.1966: The Soviet collective farm as a producer cooperativ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734—57.

Domar, E.D.1989: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Serf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reze, J.H.1976: Some theory of labour management and participation. *Econometrica*, 44, 1125—39.

Dryzek, J.S.1990: *Discursive Democracy: Politics, Policy and Politic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unleavy, P. and Husbands, C.T.1985: *British Democracy at the Crossroads: Voting and Party Competition in the 1980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Dworkin, G.1981: What is Equality? (Parts 1 and 2),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87—246, 283—345.

Dyker, D. A. 1990: *Yugoslavia: Socialism, Development and Debt*. London: Routledge.

Electoral Studies: 1982—

Ellerman, D.1990: *The Democratic Worker-Owned Firm: A New Model for the East and West*. London: Unwin Hyman.

Ellman, M.1989: *Socialist Planning*,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on, D.1988: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172, 3—44.

Elster, J.1988: From here to there, or: If co-operative ownership is so desirable, why are there so few co-operatives?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93—111.

Elster, J.1989: Self-realisation in work and politics: the Marxist conception of the good life. In Elster and Moene(1989a), pp.127—58.

Elster, J. and Moene, K.O.1989a: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ster, J. and Moene, K.O.1989b: Introduction. In Elster and Moene(1989a), pp.1—35.

Emmanuel, A. 1979: The stat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New Left Review*, 113/14, 111—31.

Engels, F. 1987: Anti-Dühring. In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25.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Esping-Andersen, G. 1985: *Politics against Marke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sping-Andersen, G.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Esping-Andersen, G. 1992: The emerging realignment between labour movements and welfare states. In M. Regini(ed.), *The Future of Labour Movements*. London: Sage, pp. 133—49.

Estrin, S. 1983: *Self-Management: Economic Theory and Yugoslav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strin, S. 1989: Workers' co-operatives: their merits and their limitations. In Le Grand and Estrin(1989), pp. 165—92.

Estrin, S. and Holmes, P. 1990: Indicative planning in developed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4, 531—54.

Estrin, S. and Perotin, V. 1987: Cooperatives and participatory firms in Great Brita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1, 152—75.

Estrin, S. and Winter, D. 1989: Planning in a market socialist economy. In Le Grand and Estrin(1989), pp. 100—38.

Estrin, S., Jones, D.C. and Svejnar, J. 1987: Th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worker participation: producer cooperatives in Wester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1(1), 40—61.

Eurostat 1988: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Community*, 26th edn. Luxembourg: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stat 1989a: *Rapid Reports: Population and Social Conditions*. Luxembourg: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stat 1989b: *Labour Force Survey, 1987*. Luxembourg: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stat 1990: *Some Statistics on Services*. Luxembourg: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stat 1993: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Community*, 30th edn. Luxembourg: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Fanning, C. M. and McCarthy, T. 1986: A survey of economic hypotheses concerning the non-viability of labour-directed firms in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S. Jansson and A. B. Hellmark, *Labor-owned Firms and Workers' Cooperatives*. Aldershot: Gower, pp.7—50.

Fanning, C. and O'Mahony, D. 1983: The worker co-operative. In Kennedy (1983), pp.11—29.

Fay, C. R. 1908: *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P.S.King.

Field, F. 1989: *Losing Out: The Emergence of Britain's Underclass*. Oxford: Blackwell.

Flakierski, H. 1989: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Yugoslavia*. Armonk, NY: Sharpe.

Fleurbaey, M. 1993: Economic democracy and equality: a proposal. In Bardhan and Roemer(1993), pp.266—78.

Flora, P.(ed.)1987: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2 vols. London: Macmillan.

Frankel, P. E. 1989: *Socialism*. Oxford; Blackwell.

Friedman, M. 196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ukuyama, F.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3—18.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Furet, F. 1990: From 1789 to 1917 and 1989: looking back at revolutionary traditions. *Encounter*, Sept., 3—7.

Furubotn, E. and Pejovich, S. 1970: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firm in a socialist state: the example of Yugoslavia.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ökonomie*, 30, 431—54.

Galbraith, J. K. 1990: Revolt in our time: the triumph of simplistic ideology. In Prins(1990), pp.1—11.

Gamble, A. 1988: *The Free Economy and the Strong State: 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 London: Macmillan.

Garton Ash, T. 1990: *We the People*. Cambridge: Granta.

Geras, N. 1990: Seven types of obloquy: travesties of Marxism. *Socialist Register*, 1—34.

Gilbert, B.B. 1966: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Michael Joseph.

Gillespie, R. and Paterson, W.E. 1993: *Rethinking Social Democracy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Frank Cass. (Originally appeared a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Special Issue, 16(1), Jan. 1993.)

Glennerster, H., Power, A. and Travers, T. 1991: A new era for social policy: a new enlightenment or a new Leviatha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3), 389—414.

Goldthorpe, J. H. (ed.) 1984: *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odin, R.E. and Le Grand, J. 1987: *Not Only the Poor: The Middle Classes and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Allen and Unwin.

Gorz, A. 1982: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Gough, I. 197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Gould, C. 1988: *Rethinking Democracy: Freedom and Social Cooperation i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uldner, A. 1980: *The Two Marxisms*. London: Macmillan.

Gray, J. 1984: *Hayek on Liberty*. Oxford: Blackwell.

Gray, J. 1988: Against Cohen on proletarian unfreedom.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1), 77—112.

Gray, J. 199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Institutions*. London: IEA.

Greenberg, E.S. 1984: Producer cooperatives and democratic theory: the case of the plywood firms. In R. Jackall and H. M. Levin, *Worker Cooperatives in America*.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runebaum, J.O. 1987: *Private Ownership*.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bermas, J. 1972: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London: Heinemann.

Habermas, J. 1981: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22, 3—14.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Habermas, J. 1990a: The new obscurity: the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exhaustion of utopian energies. In J. Habermas, *The New Conservatism*. Cambridge: Polity, pp. 48—70.

Habermas, J. 1990b: 'What does socialism mean today? The rectifying revolution and the need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Left'. In R. Blackburn, *After the Fall*. London: Verso, pp. 25—46.

Hall, S. and Jacques, M. (eds) 1989: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Hankiss, E. 1990: *East European Alternatives*. Oxford: Clarendon.

Hardin, R. 1982: *Collective Ac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rrington, M. 1987: *The Next Left: The History of the Future*. London: Tauris.

Harrington, M. 1989: Markets and plans: is the market necessarily capitalist? *Dissent*, 36(1), 56—70.

Harrop, M. and Shaw, A. 1989: *Can Labour Win?* London: Unwin/Fabian.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Hassan, I. 1985: The culture of postmodern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 (3), 119—31.

Hayek, F.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1940: Socialist calculation: the 'competitive solution'. *Economica*, 7, 125—49.

Hayek, F.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1982: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3 vol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ayek, F. 1990: *The Fatal Concei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eath, A. et al. 1985: *How Britain Votes*. Oxford: Pergamon.

Heath, A. et al. 1991: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Change: The British Voter 1964—1987*. Oxford: Pergamon.

Heilbroner, R. 1989: 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 *New Yorker*, 23 Jan.

Held, 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London: Hutchinson.

Held, D. 1987: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1991a: Democracy, the nation-state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 Hel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p.197—235.

Held, D.1991b: Review essay: The possibilities of 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ety*, 20, 875—89.

Held, D.1992: Liberalism, Marxism and democracy. In S.Hall, D.Held and A. McGrew,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pp.13—47.

Held, D.1993: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Held, D. and Hall, S.1989: Left and rights. *Marxism Today*, June, 16—23.

Held, D. and Pollitt, C.(eds)1986: *New Forms of Democracy*. London: Sage.

Higgins, W and Apple, N.1983: How limited is reformism? A critique of Przeworski and Panitch. *Theory and Society*, 12(5), 603—30.

Hindess, B.1983: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Socialist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Hirst, P.1986: *Law,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Hirst, P.1993a: As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Held(1993), pp.112—35.

Hirst, P.1993b: *Associative Democracy: New Fo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Cambridge: Polity.

Hobbs, P.and Jefferis, K.1990: So how many cooperatives are there? In G.Jenkins and M.Poole(eds), *New Forms of Ownership*. London: Routledge, pp. 289—302.

Hobsbawm, E.1981: *The Forward March of Labour Halted*? London: Verso.

Hodge, C.C.1993: The politics of programmatic renewal: postwar experiences in Britain and Germany. In Gillespie and Paterson(1993), pp.5—19.

Hohfeld, W.N.1919: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onoré, A.M.1961: Ownership. In A.G.Guest(ed.), *Oxford Essays in Jurispru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07—47.

Hoover, K. and Plant, R.1989: *Conservative Capitalism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cal Appraisal*. London: Routledge.

Horvat, B. 1976: *The Yugoslav Economic System*. White Plains, NY: IASP.

Horvat, B.198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Armonk, NY: Sharpe.

Horvat, B., Markovic, M., Supek, R. and Kramer, H.(eds)1975: *Self-governing Socialism: A Reader*, 2 vols. White Plains NY: IASP.

Hyman, R. 1992: Trade unions and the disaggreg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M. Regini(ed.), *The Future of Labour Movements*. London: Sage, pp. 150—68.

Jenkins, P. 1987: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The Ending of the Socialist Era*. London: Cape.

Jessop, Bob 1991: The welfare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Fordism to post-Fordism. In B. Jessop, H. Kastendiek, K. Nielsen and O. K. Pedersen, *The Politics of Flexibility*. London: Edward Elgar, pp. 82—105.

Jones, B. 1968: *Co-operative Production*. London; repr. New York: Augustus Kelley.

Jones, D. C. 1982a: British producer cooperatives, 1948—1968: productivity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n Jones and Svejnar(1982), pp. 175—98.

Jones, D. C. 1982b: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survey of producer co-operative performance. In Stephen(1982), pp. 53—73.

Jones, D. C. 1983: Producer co-operatives in industrialised Western Economies. In Kennedy(1983), pp. 31—60.

Jones, D. C. 1985: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producer cooperatives within command economies: evidence for the case of Poland.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9, 111—26.

Jones, D. C. and Svejnar, J. (eds) 1982: *Participatory and Self-managed Firms: Evaluating Economic Performance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Jones, D. C. and Svejnar, J. 1985: Participation, profit sharing, worker ownership and efficiency in Italian producer cooperatives. *Economica*, 52, 449—65.

Kaldor, M. 1991: After the Cold War. In M. Kaldor, *Europe from Below: An East-West Dialogue*. London: Verso, pp. 27—42.

Kalecki, M. 1971: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 1933—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menka, E. 1969: *Marxism and Ethics*. London: Macmillan.

Kardelj, E. 1979: Social ownership and socialist self-management. *Socialist Thought and Practice*, 19(2), 46—57.

Katz, M. 1986: *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 New York: Basic Books.

Kautsky, K. 1920: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Kautsky, K. 1964: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Ann Arbor, Mich.: Univer-

sity of Michigan Press.

Kavanagh, D. 1990: *Thatcherism and British Politics: The End of Consensus?*,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vanagh, D. and Morris, P. 1989: *Consensus Politics from Attlee to Thatcher*. Oxford: Blackwell.

Keane, J. 1984: *Public Life and Late Capitalism: Toward a Socialist Theor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ane, J. 1988a: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Verso.

Keane, J. (ed.) 1988b: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London*: *Verso*.

Keane, J. and Owens, J. 1986: *After Full Employment*. London: Hutchinson.

Keizer, W. 1989: Recent reinterpretations of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6(2), 63—83.

Keman, H. 1993: The oretical approaches to social democrac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5(3), 291—316.

Kennedy, L. (ed.) 1983: *Economic Theory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Selected Readings*. Oxford: Plunkett Foundation for Co-operative Studies.

Keohane, R.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rnohan, A. 1987: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private propert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22, 145—66.

Kernohan, A. 1988: Capitalism and self-ownership.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1), 60—76.

Kesselman, M. 1982: Prospects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in advanced capitalism: class struggle and compromise in Sweden and Fra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11 (4), 397—438.

Keynes, J. M. 1973: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King, D. S. 1987: *The New Right: Politics, Markets and Citizenship*. London: Macmillan.

King, D. and Wickham-Jones, M. 1990: Social democracy and rational worker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3), 387—413.

Kitschelt, H. 1993: Class structure and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trateg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299—337.

Kitschelt, H.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olakowski, L.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rnai, J. 1980: The dilemmas of a socialist economy.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4(2), 147—57.

Kornai, J. 1986: The Hungarian reform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4), 1687—737.

Kornai, J. 1988: Individual freedom and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econom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2(2—3), 233—67.

Kornai, J. 1990a: *Vision and Reality, Market and State: Contradictions and Dilemma Revisited*.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Kornai, J. 1990b: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London: Norton.

Kornai, J. 1993: Market socialism revisited. In Bardhan and Roemer(1993), pp. 42—68.

Korpi, W. 1983: *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Korpi, W. 1989: Power, politics, and state autonom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itizenship: social rights during sickness in eighteen OECD countries since 193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 309—28.

Kumar, K. 1992: The revolutions of 1989: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Theory and Society*, 21, 309—56.

Laclau, E. 1990: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Laclau, E. and Mouffe, C.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Ladd, E.C. 1981: The brittle mandate: electoral dealignment and the 1980 Presidential elec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96(1), 1—25.

Lafferty, W.M. 1990: The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of a social democratic state: as the world moves in, Norway moves righ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3(1), 79—100.

Lambert, P. 1963: *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Co-operation*, Manchester:

Cooperative Union.

Lane, J.-E. and Ersson, S.O.1987: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Sage.

Lange, O.1938: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 Lange and F.M. Taylo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55—143.

Lash, S. and Urry, J.1987: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Lavoie, D.1981: A critique of the standard account of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5, 41—87.

Lavoie, D.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voie, D.1986: The market as a procedure for discovery and conveyance of inarticulate knowledge.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8(1), 1—19.

Lavoie, D.1990: Computation, incentives and discovery: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markets in market social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7, 72—9.

Le Grand, J. 1989: Markets, welfare, and equality. In Le Grand and Estrin (1989), pp.193—211.

Le Grand, J. and Bartlett, W.(eds)1993: *Quasi-Markets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Le Grand, J. and Estrin, S.(eds)1989: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Leeman, W.A.1977: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c Systems: The Soviet-Type Economy, Market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Lemke, C. and Marks, G.1992: *The Crisis of Socialism in Europe*.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nin, V.I.1960: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In *Collected Works*, vol.28, pp.227—326.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Lerner, A.P.1937: Statics and dynamics in socialist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47(June), 253—70.

Lerner, A.P.1944: *The Economics of Control*. New York: Macmillan.

Lichbach, M. 1984: Optimal strategies for socialist parties: does social class matter to party fortun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6(4), 419—52.

Lindblom, C. 1977: *Politics and Markets*. New York: Basic Books.

Lindblom, C. 1982: The market as prison. *Journal of Politics*, 44, 324—36.

Locke, J. 1963: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masky, L. E. 1988: Socialism as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112—38.

Lowi, T. J. 1985: An aligning election, a Presidential plebiscite. In M. Nelson (ed.), *The Elections of 1984*. Washington, DC: CQ Press, pp.277—301.

Luard, E. 1991: *Socialism without the State*,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Lukes, S. 1985: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ukes, S. 1990: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Left and Right. *Social Research*, 571—8.

Luxemburg, R. 1961: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Leninism or Marxis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Luxemburg, R. 1970: *Reform or Revolution*. New York: Pathfinder.

Lydall, H. 1984: *Yugoslav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Lyotard, J.-F.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McCarney, J. 1993: Shaping ends: reflections on Fukuyama. *New Left Review*, 202, 37—53.

McKay, D. 1993: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3rd edn. Oxford: Blackwell.

Mackie, T. T. and Rose, R. 1991: *The International Almanac of Electoral History*, 3rd edn. London: Macmillan.

McLennan, G. 1989: *Marxism, Pluralism and Beyond: Classic Debates and New Departures*. Cambridge: Polity.

Macpherson, C. B. 1977a: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cpherson, C. B. 1977b: *Property: Mainstream and Critical Position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Mandel, E. 1978: *From Stalinism to Eurocommun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Mandel, E. 1986: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New Left Review*, 159, 5—37.
Mandel, E. 1988: The myth of market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9, 108—20.
Mann, M. 1993: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quand, D. 1988: *The Unprincipled Society: New Demands and Old Politics*. London: Fontana.
Marquand, D. 1991: The life after death of socialism. *Guardian*, 5 June.
Marquand, D. 1993: After socialism. *Political Studies*, 61, 43—56.
Marshall, G., Rose, D., Newby, H. and Vogler, C. 1989: *Social Class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Martell, L. 1992: New ideas of socialism. *Economy and Society*, 21(2), 152—71.
Marx, K. 1972: *Capital*, vol. 3.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Marx, K. 1973a: *Capital*.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rx, K. 1973b: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In K. Marx, *Surveys from Exile*. Harmondsworth: Penguin, pp. 143—249.
Marx, K. 1973c: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The Revolutions of* 1848. Harmondsworth: Penguin, pp. 62—98.
Marx, K. 1974: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pp. 187—268.
Marx, K. 1975: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pp. 211—41.
Matthews, J. 1989: *The Age of Democrac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thews, R. C. O. 1968: Why has Britain had full employment since the war? *Economic Journal*, 78(3 Sept.), 555—69.
Meade, J. 1964: *Efficiency, Equality and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Meade, J. 1988a: The theory of labour-managed firms and profit sharing. In J. Mead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James Meade*, vol. 2. London: Unwin Hyman, pp. 158—82.
Meade, J. 1988b: Labour managed firms in condition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J. Mead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James Meade*, vol. 2. London: Unwin Hy-

man, pp. 192—200.

Meidner, R. 1978: *Employee Investment Funds*. London: Allen and Unwin.

Meidner, R. 1980: Our concept of the third way: some remarks on the socio-political tenets of the Swedish labour movement.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1(3), 343—69.

Meidner, R. 1993: Why did the swedish model fail? *Socialist Register*, 211—28.

Merkel, P. 1992: After the golden age: is social democracy doomed to decline? In Lemke and Marks(1992), pp. 136—70.

Michels, R. 1962: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Milenkovitch, D. D. 1971: *Plan and Market in Yugoslav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ilenkovitch, D. D. 1984: Is market socialism efficient? In A. Zimbalist (ed.), *Comparative Economic Systems*. Boston: Kluwer-Nijhoff, pp. 65—107.

Miliband, R. 1961: *Parliamentary Socialism*. London: Merlin.

Miller, D. 1981: Market neutrality and the failure of co-operativ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309—29.

Miller, D. 1988: In what sense must socialism be communitarian?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51—73.

Miller, D. 1989: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Miller, D. 1991: A vision of market socialism. *Dissent*. Summer, 406—14.

Miller, D. 1993: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social choice. In Held(1993), pp. 74—92.

Miller, D. and Estrin, S. 1985: Market socialism: a policy for socialists. In I. Forbes, *Market Socialism*. London: Fabian Society, pp. 3—12.

Mitchell, B. R. 1975: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1970*. London: Macmillan.

Miyazaki, H. and Neary, H. M. 1983: The Illyrian firm revisited.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4(1), 259—70.

Mouffe, C. (ed.) 1992: *Dimensions of Radial Democracy*. London: Verso.

Mouzelis, N. P. 1990: *Post-Marxist Alternatives: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Orders*. London: Macmillan.

Murrell, P. 1983: Did the theory of market socialism answer the challenge of Ludwig von Mises?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ist controvers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5(1), 92—105.

Mygind, N. 1986: From the Illyrian firm to the reality of self-management. In S. Jansson and A.-B. Hellmark, *Labor-owned Firms and Workers' Cooperatives*, Aldershot: Gower, pp. 73—104.

Novak, M. 1982: *The Spirit of Democratic Capitalis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Nove, A. 1983: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Allen and Unwin.

Nove, A. 1987: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61, 98—104.

Nove, A. 1988: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the Soviet experienc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235—51.

Nove, A. 1989: The role of central planning under capitalism and market socialism. In J. Elster and K. O. Moene,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98—109.

Nove, A. 1991: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2nd ed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Nozick, R. 1974: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Nuti, D. M. 1992: Market socialism: the model that might have been but never was. In A. Aslund, *Market Soc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31.

Oakeshott, R. 1978: *The Case for Workers' Co-op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OECD 1977: *Towards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Paris: OECD.

OECD 1985: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to the Economy*. Paris: OECD.

OECD 1988: *The Future of Social Protection*. Paris: OECD.

OECD 1991: *Quarterly Labour Force Statistics*, 2.

Offe, C. 1984: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London: Hutchinson.

Offe, C. 1985: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Offe, C. 1987: Democracy against the welfare state? *Political Theory*, 15(4), 501—37.

O'Neill, J. 1988: Markets, socialism, and information: a reformulation of a Marx-

ian objection to the market.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200—10.

Padgett, S. 1993: 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ts: a redefinition of social democracy or Bad Godesburg mark II. In Gillespie and Paterson(1993), pp. 20—38.

Panitch, L. 1986: The impasse of social democratic politics. In L. Panitch, *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Crisis*. London: Verso, pp. 1—55.

Panitch, L. 1990: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the Economy' or the 'Democratization of Politics'. In H. Flakierski and T. T. Sekine, *Socialist Dilemmas: East and West*. Armonk, NY: Sharpe, pp. 107—27.

Pateman, C. 1970: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t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ry, R. 1986: United Kingdom. In P. Flora(ed.), *Growth to Limits*, vol. 2. Berlin: De Gruyter, pp. 155—240.

Pearce, D., Markandya, A. and Barbier, E. B. 1989: *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 A Report*. London: Earthscan.

Pejovich, S. 1990: A property-rights analysis of the Yugoslav miracl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07, 123—32.

Pfouts, W. and Rosefielde, S. 1986: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revisited.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0, 160—70.

Phillips, A. 1991: *Engendering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ierson, C. 1986: *Marxist Theor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ierson, C. 1990: The 'Exceptional' United States: first new nation or last welfare state? *Social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24(3), 186—98.

Pierson, C. 1991a: *Beyond the Welfare State?* Cambridge: Polity.

Pierson, C. 1991b: Welfare states and social democracies: redefining Sweden's social democratic road to power.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5, 277—97.

Pierson, C. 1993a: Democracy, markets and capital: are there necessary economic limits to democracy? In Held(1993), pp. 179—99.

Pierson, C. 1993b: Social policy. In P. Dunleavy, A. Gamble, I. Holliday and G. Peele(eds), *Developments in British Politics 4*. London: Macmillan, pp. 246—66.

Pierson, C. 1994: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In R. Burrows and B. Loader(eds), *Towards a Post-Fordist*

Welfare State? London: Routledge.

Pimlott, B. 1988: The future of the Left. In R. Skideleky(ed.), *Thatcherism*. Oxford: Blackwell, pp.79—92.

Piven, F.F.(ed.)1991: *Labor Parti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lant, R. 1984: *Equality, Markets and the New Right*. London: Fabian Tract 494.

Plant, R. 1989: Socialism, markets and end states. In Le Grand and Estrin (1989), pp.50—77.

Pollard, S. 1967: Nineteenth-century co-operation: from community building to shopkeeping. In A. Briggs and J. Saville,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pp.74—112.

Pontusson, J. 1992a: *The Limits of Social Democracy: Investment Politics in Sweden*.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ontusson, J. 1992b: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Road: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in crisis. *Politics and Society*, 20(3), 305—32.

Popper, K. 1961: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opper, K. 1962: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Porter, G. and Welsh Brown, J. 1991: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otter, B. 1891: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Poulantzas, N. 1975: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Poulantzas, N. 1978: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Verso.

Price, R. and Bain, G.S. 1988: The labour force. In A.H. Halsey(ed.), *British Social Trends since 1900*. London: Macmillan, pp.162—201.

Prins, G. 1990: *Spring in Winter: The 1989 Revolution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rout, C. 1985: *Market Socialism in Yugoslav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1977: Proletariat into a class: the process of class form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7(4), 343—401.

Przeworski, A. 1980: Social democracy as an historical phenomenon. *New Left Review*, 122, 27—58.

Przeworski, A. 1985: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rzeworski, A. and Sprague, J. 1986: *Paper Stones: A History of Electoral Socia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zeworski, A. and Wallerstein, M. 1988: Worker's welfare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capital. In M. Taylor(ed.), *Rationality and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9—205.

Rawls, J. 1972: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eve, A. 1986: Property. London: Macmillan.

Reeve, A. (ed.) 1987: *Modern Theories of Exploitation*. London: Sage.

Reeve, A. 1991: The theory of property: beyond private *versus* common property. In D. Held(ed.), *Political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p. 91—114.

Rein, M. 1985: Women, employment and social welfare. In R. Klein and M. O'Higgins, *The Future of Welfare*. Oxford: Blackwell, pp. 37—58.

Roemer, J. E. 1982: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emer, J. E. 1985: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emer, J. E. 1991: Market socialism: a blueprint. *Dissent*, Fall, 562—9.

Roemer, J. E. 1992a: Can there be Socialism after Communism? *Politics and Society*, 20(3), 261—76. (Reprinted in Bardhan and Roemer(1993a), pp. 89—107.)

Roemer, J. E. 1992b: The mor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arket socialism. *Ethics*, 102 (Apr.), 448—64.

Roemer, J. E. 1994: *A Future for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land, G. and Sekkat, K. 1993: Market socialism and the managerial labor market. In Bardhan and Roemer(1993a), pp. 204—15.

Rousseau, J. J. 1968: *The Social Contract*. Harmondsworth: Penguin.

Rutland, P. 1985: *The Myth of the Plan*. London: Hutchinson.

Rutland, P. 1988: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how can they be compared?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1), 197—227.

Ryan, A. 1982: The romantic theory of ownership. In Hollowell, P. (e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pp. 52—68.

Ryan, A. 1984: *Property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Sainsbury, D. 1990: Party strategies and the electoral trade off of class-based part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8, 29—50.

Sainsbury, D. 1993: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s and the legacy of continuous reform: asset or dilemma?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6(1), 39—61.

Sartori, G.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Part One: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Scharpf, F. W. 1991: *Crisis and Choice i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chmidt, M. G. 1983: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economy in periods of economic cri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3 OECD n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7(6), 641—59.

Schneider, W. 1981: The November 4th vote for president: what did it mean? In A. Ranney, *The American Election of 1980*.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p. 212—62.

Schuller, A. 1988: *Does Market Socialism Work?*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Communist Economies.

Schumpeter, J.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Selbourne, D. 1990: *Death of the Dark Hero: Eastern Europe, 1987—90*. London: Cape.

Selucky, R. 1979: *Marxism, Socialism and Freedom: Towards a General Democratic Theory of Labour-Managed Systems*. London: Macmillan.

Sen, A. 1985: The moral standing of the market.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2(2), 1—19.

Shapiro, D. 1989: Reviv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a defence of Hayek against Lange.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6(2), 139—59.

Share, D. 1989: *Dilemma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the 1980s*. London: Greenwood.

Shaw, E. 1993: Towards renewal?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s policy review. In Gillespie and Paterson(1993), pp. 112—32.

Shonfield, A. 1965: *Modern Capitalism: The Changing Bala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k, O. 1967: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NY: Rienner.

Sik, O. 1976: *The Third Way*. London: Wildwood House.

Sik, O. 1985: *For a Humane Economic Democracy*. New York: Praeger.

Singer, D. 1988: *Is Socialism Doomed? The Meaning of Mitter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kidelsky, R. 1979: The decline of Keynesian politics. In C. Crouch(ed.), *State and Econom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Croom Helm, pp. 55—87.

Smart, B. 1993: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Smith, T. W. 1989: Inequality and welfare. In R. Jowell, B. Witherspoon and L. Brook,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6th Report*. Aldershot: Gower, pp. 59—86.

Sombart, W. 1976: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S?* Armonk, NY: Sharpe.

Stalin, J. 1955: *The Task of Business Executives*. *In Works*, vol. 13.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Press, pp. 31—44.

Stauber, L. G. 1987: *A New Program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 Lessons from the Market-Planning Experience in Austria*. Carbondale, Ill.: Four Willows.

Steinherr, A. 1983: The labour-managed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economics literature. In Kennedy(1983), pp. 123—50.

Stephen, F. H. 1982: *The Performance of Labour-Managed Firms*. London: Macmillan.

Sutela, P. 1990: The marketization of Eastern Europe. In R. J. Hill and J. Zielonka (eds), *Restructuring Eastern Europe: Towards a New European Order*. London: Edward Elgar, pp. 59—75.

Swain, N. 1992: *Hungary: The Rise and Fall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Swenson, P. 1991: Labor and the limit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s of intraclass conflict and cross-class alliances in Sweden and West Germany. *Comparative Politics*, 23(4), 379—99.

Taylor, F. 1929: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 in a socialist sta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Mar.), 1—8.

Taylor-Gooby, P. 1985: *Pubic Opinion, Ideology and State Welfa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Taylor-Gooby, P. 1989: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R. Jowell, B. Witherspoon and L. Brook,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6th Report*. Aldershot: Gower, pp. 35—58.

Therborn, G. 1986: *Why Some Peoples Are More Unemployed than Others*. London: Verso.

Therborn, G. 1989a: Two thirds, one third society. In Hall and Jacques(1989), pp. 103—15.

Therborn, G. 1989b: States, populations and productivity: towards a political theory of welfare states. In P. Lassman(ed.), *Politics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pp. 62—84.

Therborn, G. 1992: The life and times of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194, 17—32.

Thomas, A. 1990: 'UK worker cooperatives 1989: towards the 10,000 jobs mark? In *Yearbook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 Oxford: Plunkett Foundation.

Thomas, H. 198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ondragon cooperatives in Spain. In Jones and Svejnar(1982), pp. 129—51.

Thomas, H. and Logan, C. 1982: *Mondrago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Thompson, G. 199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Right*. London: Pinter.

Thompson, J. 1990: *Ideology and 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Thompson, N. 1988: *The Market and its Critic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Tilton, T. 1990: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Tomlinson, J. 1990: *Hayek and the Market*. London: Pluto.

Trasler, G. 1982: The psychology of ownership and possessiveness. In P. Hollowell (ed.), *Property and Social Relations*. London: Heinemann, pp. 32—51.

Turner, B. S. 1990: The end of organized socialism?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7, 133—44.

Vanek, J. 1970: *The General Theory of a Labor Managed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nek, J.1972: *The Economics of Workers' Management*. London: Allen and Unwin.

Vanek, J.(ed.)1975: *Economic Self-Management: Economic Liberation of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Visser, J.1992: The strength of union movements in advanced capitalist democracies: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variation. In M.Regini(ed.), *The Future of Labour Movements*. London: Sage, pp.17—52.

von Mises, L.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Hayek (1935), pp.87—130.

von Mises, L.1951: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ldron, J.1988: *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 Oxford: Clarendon.

Walzer, M.1970: A day in the life of a socialist citizen. In M.Walzer, *Obligations: Essays in Disobedience, War and Citizenshi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229—38.

Ward, B.1958: The firm in Illyria: market syndical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8, 566—89.

Ward, B.1967: *The Socialist Economy: 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Alternativ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Wattenberg, M.P.1991: *The Rise of Candidate Centre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bber, D.1986: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re-emergence of mass unemployment in Western Europe. In W.E.Paterson and A.H.Thomas,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Clarendon, pp.19—58.

Wilson, W.J.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od, E.M.1986: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London: Verso.

Wood, E.M.1989: Rational choice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177, 41—88.

Wright, E.O.1985: *Classes*. London: Verso.

Wright, E.O.1993: Class analysis, history and emancipation, *New Left Review*,

202, 15—35.

Xavier, R. 1989: *The Hungarian Model: Planning and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unker, J. A. 1985: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 designing a supernational federation. *World Futures*, 21, 159—218.

Yunker, J. A. 1988: Risk-taking as a justification for property incom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2(1), 74—88.

Yunker, J. A. 1990a: A new perspective on market socialism.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30(2), 69—116.

Yunker, J. A. 1990b: Ludwig von Mises on the 'Artificial Market'.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32(1), 108—40.

Yunker, J. A. 1992: *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 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 London: Praeger.

Zevi, A. 1982: The performance of Italian producer cooperatives. In Jones and Svejnar(1982), pp. 239—51.

索　　引

（条目后数字为原文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译 后 记

本书原名为《共产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新市场社会主义》，经原书出版社(Polity Press)和作者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教授本人的同意，采用现在的书名《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探索》，以适合中国读者。

本书是一部全面研究和分析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著作。作者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是英国诺丁汉大学(Nottingham University)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西方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政治》(1986 年)、《超越福利国家?》(1991 年)、《同安托尼·吉登斯的谈话：理解现代性》(1998 年)等。他在 90 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在西方理论界有较大的影响，主要有：《“例外的”美国：是第一个新国家还是最后一个福利国家?》(1990 年)、《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通向权力的瑞典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再研究》(1991 年)、《民主，市场和资本：是否存在民主的必要经济限制?》(1993 年)、《“后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1994 年)以及近期发表的一些关注西方社会主义命运和前途的文章等。

本书运用新颖广泛的资料认真分析了苏东剧变前后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从社会主义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理论以及意识形态三方面考察了社会主义目前所处的境况和面临的极为迫切

的现实问题。作者对西方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死亡"论进行了冷静的剖析和驳斥，指出现有证据并不能真正说明那种颇有争议的所谓"社会主义死亡"的种种观点是能够经受得起检验的，认为西方社会主义如果能在新的环境下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更新，仍具有回答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的力量。作者在分析苏东集权计划模式和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指出目前西方社会主义面临的这种困境的直接根源在于全球经济中市场的普遍化，而在西方重新兴起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回答"这种迎面而来的特别挑战"的过程中，是一种"最为深思熟虑的，也是最富冒险性的对变化了的社会环境作出反应重新塑造社会主义政治的尝试"。接着作者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总体介绍和概括，展示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公有制、市场、国家、效率、公平、自由和民主等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诠释了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动因和主旨。作者随后用较大的篇幅对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评价。主要内容包括：市场社会主义、西方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理论冲突和联系；市场社会主义的市场理论和社会所有制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组织经济的主要模式合作社或劳动管理型经济（Labour Management）；市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组织形式，即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国家的作用；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可行性和条件；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局限等等。

从宏观上看，作者从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出发，既考察了西方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尝试解决问题、摆脱困境的新社会主义模式——市场社会主义，使读者对这一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

理论流派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也为人们预测和分析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资料和独特的认识方法。从微观上看,作者提出和分析的许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社会主义和市场结合、社会所有制的形式、效率和公平、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等等,都是西方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关注、研究和力图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有着实质的区别,但是又有许多相关和相通之处。如,社会主义和市场如何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等等。皮尔森的这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价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的著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同时,作者所展示的西方社会主义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其中许多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应认真关注并努力解决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各种有益的理论成果,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从本书中得到助益。皮尔森教授在为本书所作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不可能采取本书所讨论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希望它成为美国模式的翻版。但中国的独特模式,市场和国家相结合的模式,“将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探索那些符合 21 世纪新生活形式要求的社会和经济组织新形式的过程中,中国一定能够作出重要的贡献”。我们当然怀有同样的期望。

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和立场不同,作者在本书中的一些说法和结论我们是不赞同的,但这不妨碍

我们用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参考、吸收和借鉴。

这本书的翻译工作首先得到了作者皮尔森教授本人的慨然帮助。他在版权转让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才使得翻译工作顺利开展。在翻译过程中，逢疑难之处，译者通过电子邮件与他进行经常性联系和商讨，否则本书的问世定会延宕。最后他又专门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本书的顺利出版，也是译者对皮尔森教授的最好回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张金鉴研究员，对本书的译稿提出许多宝贵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他多年来一直从事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他审读了部分译稿，将丰富的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倾注于本书，使译者受益多多。在与出版社联系沟通方面，他又不辞辛劳，促成了本书的及时问世。在此我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莫大的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现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室主任余文烈研究员，对本书的翻译工作十分支持。他是国内著名的研究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专家，在他的带领下，研究室市场社会主义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些喜人的初步研究成果，目前正向纵深推进。本书的翻译便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在理论上进行了总体把握，最后又慨然作序。这里我向他深表谢忱！

东方出版社的郇中建同志对本书的出版作了多方支持和精心指导工作；编辑王一禾女士负责本书译稿的审校，她的认真细致态度和译审才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她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中受益匪浅。这里向他们二位一一申谢！

由于本书涉及经济、政治和哲学各领域的知识，加之译者水



平有限，译文中一定存在错误、不足和遗漏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

姜　辉

1999年8月于北京